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

本书编委会 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 本书编委会编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2 月
ISBN 7-5609-1678-3

. 中...
. 本...
. 人文科学-中国-高等学校-文集
. C53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第二版) 本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余东升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 蔡晓瑚 责任监印:

出版发行: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7545012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 排: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3 字数: 358 000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9 月第 7 次印刷 印数: 47 301—53 000
ISBN 7-5609-1678-3/ C·37 定价: 16.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简介

本书第一卷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等几十家报刊或发表书评，或转载讲演稿，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许多著名学者称本书是一本“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精品”。

随着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持续深入的开展，人文讲座在内容质量上也日益提高，听众的理解和欣赏水平也越来越高，各高校人文讲座的精品也越来越多。人文讲座正在走向系列化，特色化。

第二卷中收录的 40 篇精彩讲演稿，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提供。按内容分为人才与素质、科学与文化、文学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等五个部分。

讲演者当中，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杨振宁、钱学森、季羨林、杨叔子、吴小如、厉以宁、杨福家、杜维明等。

目 录

·人才与素质·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 永必重求真 今应更务善.....	(1)
胡显章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努力加强大学生 的人文素质教育	(20)
李士坤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共产党宣言》 导读	(35)
王家福 吉林大学国际战略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素质变位——跨世纪的空间通道	(48)
刘书林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谈跨世纪青年的素质要求	(58)
陈建新 华南理工大学社科系主任 教授 21 世纪呼唤软科学人才	(63)
林权圣 中国管理科学院武汉分院教授 白领之路从今日开始	(75)

· 传统与现代 ·

季羨林 北京大学教授

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82)

杜维明 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哲学历史学教授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88)

李德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传统文化与哲学批判 (100)

王玉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

世纪之交的文化发展态势 (106)

王殿卿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 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114)

徐久刚 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小平与邓小平时代 (125)

祝总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记》 导读 (136)

王正毅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创新：法国奏出的二重曲 (149)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 (159)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的人学观 (169)

尉天骄 河海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水”的历史人生意味 (181)

· 科学与文化 ·

- 钱学森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190)
- 杨振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204)
- 徐利治 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
科学文化人与审美意识..... (211)
- 钱学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学森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新见地..... (222)
- 陈 赫 中南工业大学校长高级顾问
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 教授
理工科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240)
- 袁正光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技术与社会..... (253)
- 罗汉军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
跨世纪的科学文化使命..... (265)
- 沈清松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技对文化的冲击..... (270)

· 文学与艺术 ·

- 吴小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牡丹亭》与中国戏曲..... (279)
- 褚斌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诗经》导读..... (290)
- 张良皋 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中的超前女性.....	(309)
沈石岩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塞万提斯与《唐·吉珂德》	(321)
夏雨田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武汉市文联主席	
幽默与人生.....	(337)
王立平 著名作曲家	
音乐与人生.....	(347)
周韶华 湖北省文联主席 著名画家	
中西美术纵横谈.....	(358)
韩石山 山西省作协专业作家	
作家的训练.....	(363)
周传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电影文化漫谈.....	(376)

· 经济与社会 ·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	(381)
杨福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404)
赵景瑜 山西大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公关艺术在大观园.....	(411)
朱光磊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与性质.....	(421)
陈一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婚姻家庭的变化与青年人的恋爱择偶.....	(431)
后记.....	(442)

人才与素质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

永必重求真 今应更务善

[在湖南大学讲演]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亡，人才为基。”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点。未来国际上的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龙头，高等学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地。作为出高层次人才、出重大科研成果、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的高等学校，应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中，努力起到自己应起的多方面的重大作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面临如此形势，我们不能不认真研究一下，要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学校以及如何把这样的高等学校带入 21 世纪。何况，此虑已非远，而迫在眉睫了！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针对我国当前的实际，强调指出，对我国而言，“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发展”。“在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成

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极其关注的大事”。这讲得多么现实，多么深刻啊！

一、请君莫奏前朝曲

我国的高等学校，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我们要积极推动这些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高等学校正在通过内部的发展，或者以合并、合作及其他合适的方式，把单科性的或学科门类很不全的学校转变成综合性的或某种形式的多科性的学校。华中理工大学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推进从机电类的工科院校向文、理、工、管、医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的转变。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和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有很深刻的关系。台湾成功大学讲，它是台湾唯一所有医学院，而且医学院是和本部在一起的大学，因此，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学术生态环境这个名称用得很好。我们学校校园里，大树参天，浓荫蔽日，鸟语花香，“欣欣此生意”，就是因为生态平衡。如同单一树种很难达到生态平衡，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样，在学科上，单一的学科很难发展，也有一个学术生态平衡的问题。我校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93年4月到1995年4月两年间，我们同电子部54所在电子部的直接领导下，共同研制出了一种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EIM—601，国家非常重视。但是，我们学校以往从来没有搞过程控交换机，甚至前些年还把通讯专业取消了，近几年才上马，为什么数字程控机很快就搞出来了呢？因为我们有相关的多学科的基础。1995年4月8日该项成果在北京通过鉴定，同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每日电讯》头版头条同时作了长篇报道，认为这是振兴民族工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之所以能搞出来，我想跟多学科的存在是非常有关系的。我国许多大学都在向着多学科的方向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发展，以形成各具特色的、良好

的学术生态环境。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学校办学中学科框架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50年代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只搞教学，很少搞科研，而现在各学校不但重视教学，而且根据自己的情况把科学研究提到不同的重要程度上来；与此同时，还同社会紧密结合，以多种方式直接提供为社会服务的成果，特别是发展校办高科技产业，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不开展科学研究，教师学术水平很难提高，教学水平也很难提高，研究生教育就无法开展。为社会服务是教育上重要的一点，高等学校一定要开门办学，走教育与生产劳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这条路。我们可否这样讲，教学是学校的基础工作，是主旋律，科研是用来提高学校水平，而校办高科技产业则是用来增强学校适应社会发展的活力的。

第三个转变是，50年代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基本上只有本科教育，而现在相当多的高等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研究生教育。同时，为了适应社会需要，还发展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国家教委周远清副主任说得非常好，在大学教育中，本科教育是基础，研究生教育体现着教育的水平，而成人教育带来了办学的活力。这表明大学里一定要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要求来办学。从长远来讲，高等学校不仅仅是为学生选择职业提供学习机会，而且更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造就一种新人而提供学习场所。进大学不仅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且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形成更好的素质。

第四个转变是，从科技教育为重发展到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从专业教育发展到同时高度重视素质教育，使人能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高等学校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我感到，重要问题之一是主要教学生做事，而不是很好地教学生做人；往往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能力培养注意不够，素质培养更注意不够，有点急功近

利。这种教育不是很好的教育。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有什么基础去谈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这完全正确！但问题是，是谁掌握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是建设性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还是毁灭性的力量、邪恶的力量？素质，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高层次人才，没有很高的素质，怎么能行？下面我想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982年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些华人教授给我提了一个意见，讲大陆的教育有缺陷，说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ABC很好，XYZ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知道《史记》、《四书》，这种人能不能为中国服务？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觉得讲得很深刻、很生动。这种人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对祖国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能不能产生深厚的感情？能不能学成以后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服务呢？香港知名爱国人士、企业家刘永龄先生1995年在我们学校设立了一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奖学金”，每年拨资10万元，5万元用于奖励教师，5万元用于奖励学生。9月18日那天下午开座谈会，有学生问：“刘先生，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买下一家万余人的大企业，了不起，凭的是什本本领？”他说：“凭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学生又问：“是德重要还是才重要？”他说：“当然是德重要。有德，才差一些问题不大，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如果缺德那就麻烦了！”学生问：“你所谓的‘德’是什么样的德？”刘先生听后沉重地讲：“我看至少是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吧！”他讲：“我可以告诉你，大陆有的学生到我们公司去，表现不好，不但不信守合同，撕毁合同，而且把公司借给他的东西，甚至不是借给他的东西席卷而走，不告而别，逃之夭夭。请问是有这种人好，还是没有这种人好？”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可见，如果学生不能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来为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服务，不能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引导社会潮流前进，而是相反，那么，其作用比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还更坏。有德无才，是庸才；有才无德，是害才。当然，有德有才无德，是病才，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颜渊，德才兼备，可惜身体太差，32岁就短命死了，这怎么行？我们学生一定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前些时候有人跟我说，在美国，那些坏事情从生活中走到荧屏上来，而在中国，则荧屏上走到生活中去。现实生活中诸如抢银行、偷汽车、杀人等，都是银幕上荧屏上学来的。这是个尖锐的问题。

今年有次开会时，有位兄弟学校的党委书记跟我讲，对现在有的青年来说，过去三句话被现在三句话代替了。过去是：“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是：“到公司去，到海外去，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还有一个例子，我校1995年作过一次大学生文化素质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碰到类似“银河号事件”，你该怎么办？大多数学生答复得很好，可是还有极少数学生的答案是，如果我在那个公司工作，就应该执行公司的指令，坚决检查“银河号”。我们不反对到公司去，不反对到海外去，不反对多拿到钞票，多多富裕。何况，我们要开放，要实现经济体制转型，为什么要反对呢？还得赞成。问题是，到这些地方去，不仅要谋求个人利益，而且不说首先吧，至少也得同时谋求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繁荣、集体的发展吧？总不能只顾个人利益，而去损害、去牺牲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与声誉吧？总不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吧？一个人的一生总得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对科技工作者有四点基本要求。第一点是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这一段最后一句话是：“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

社会价值。”讲得多么正确！现在如果不把精神文明建设，不把人文教育、素质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培养出的学生不爱国，没有崇高理想，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没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不姓“中”而姓“外”，不姓“公”而姓“私”，不姓“真”而姓“假”，那就麻烦了，那我们的教育是彻底失败的！邓小平同志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他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多么伟大的中华魂，多么深固的民族根，多么有血有肉，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结晶，感人至深。

我国高等学校的上述四个转变，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上述第一个转变关系到影响学校发展全局的学科结构；第二个转变关系到学校的三大功能的协调发展；第三个转变关系到学校培养人才层次、类型的定位，而第四个转变则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人才所具有的素质了。还应该讲，前面三个转变也为培养素质良好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乃至奠下了可靠的基础。这四个转变带有战略性质。我认为，这些转变就是改革，就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人的改革。唐代改革派、著名的诗人刘禹锡写得好：“请君莫奏前朝曲，且听翻新杨柳枝。”

二、在止于至善

我们强调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是不是不再重视专业教育、科技教育了呢？不，决不！应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这是由高等教育既具有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又具有上层建筑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个论断极为深刻，是继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后又一重要的论断。江泽民同志讲过，科学当然应该包括社会科学。

我认为，科学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是辨别真假，是求真，是一种知识体系、认识体系。如果对世界的真假都分不清楚的话，你怎么分得清善恶？因此，没有真假的区分，就很难去区分善恶。而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对人类社会、对自己的一种研究和认识，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是一种伦理体系。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仅包含了辨别真假，而且包含了区分善恶。科学技术本身越加同客观世界、客观规律相符合，就越加“真”；科学技术的作用对社会进步、人类幸福贡献越大，就越加“善”。真与善，我认为真是善的基础，而善必须为真导向。这一点我认为《大学》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学》讲：“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但修身的基础是格物致知，是求真。但是，格物致知只是前提条件，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到平天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但要有后者的话，还要有人的精神因素、人的主观努力。还有，五千言的《老子》里两次提出：“知常曰明。”什么是“常”？“常”就是老子讲的“道”，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知常就是格致，就是了解与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什么是“明”？“明”就是聪明、英明、贤明，就是不违背客观世界规律去行动、去办事。“不知常，妄作，凶。”不了解乃至违背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行动，是胡来，是妄作，必遭凶险，必定失败。这不是在讲科学技术及其重要性又是在讲什么？不管是《大学》还是《老子》所讲的，如果我们赋以新的含义，可以认为与江泽民同志所讲的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没有真，何从谈善？！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没有物质文明作为基础不行，船不坚，炮不利，科学不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爱国主义热情再高，也不行，绝对不行！但是，即使物质文明再好，而精神文明颓衰，乃至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了自己

的文化，没有了内部凝聚力，更不行。湖北出了个闻一多，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大文豪，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他讲过：“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虑。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的征服千百倍之。”六中全会决议中有一段话说：“看不到十八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我看后非常感动。危险到什么程度呢？社会变质，整个失败！我感到，目前强调人文社会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建议大家读一读美国《纽约时报》老主编哈特写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这本书，大家可以清楚地发现，从事人文社会方面活动的人物与精神世界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甚至难以想象！南京大学的副校长在广西大学“211工程”预审闭幕式上讲：“我认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视不够。有人讲，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批评我们。”我说：“对啊，搞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搞战略的，搞宏观的，搞长远的。我们搞科学技术的，是搞战役性的，搞局部的，我们错了就错一部分，你们那个部分错了就错全局。”我认为，解放后，我们国家之所以经历这么多艰难曲折，不是“两弹”没有爆炸，不是卫星没有上天，不是科技没搞上去，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在人文社会科学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视不够，或搞了不少形而上学的东西。

我还一再讲过，中学真奇怪，快班、理工科班是成绩好的学生念，慢班、文科班是成绩差的学生念，差的学文，好的学理工。这怎么行？我认为是很糟糕的事情，搞理工的应该有高素质的人才，但是学文科的，同样也应该有高素质的人才。为什么一些高素质的人，很有学识、很有天才的人，不能学人文社会科学呢？从整个历史来看，人文社会科学是极为重要的。居里夫人去世后，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讲：“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

更大。”凡是出类拔萃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把人格、道德、精神放在第一位的。道德、精神、善是导向。不讲善，真何以导向？！人，人的精神是世界上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大学》一开始就深刻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的方向与目的是“在止于至善”，导向的是“善”，要达到的也是“善”。有人问华中理工大学为什么要考中国语文，我认为跟这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有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层次，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生活在中国本土上的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应该掌握中国的文字、语言，这是很基本的。我国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在不用英文讲，而用中文讲了。第二个层次，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如果对中国的文字、语言、历史、文化与传统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可不可能对我们国家、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呢？很难！第三个层次，是更广、更深的层次，我们这么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一不是搞大国沙文主义，二不是搞狭隘的民族主义，三不是搞无批判的全盘继承；而恰恰相反，我们放眼世界，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大国，理应以自己的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对世界文化有出色的作为和卓越的贡献。因此，我们强调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繁荣中国自己的文化，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世界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而尽我们中华民族一份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这把宝剑有两面刃，如果不很好地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这把宝剑可能不是正面刃在起作用，而是负面刃在起作用。这对人类的繁荣、安全与社会的进步、稳定，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1995年12月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季羨林老先生作的发言，我认为他对人文精神讲得极为精彩。他讲中国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集中起来就是两点，一叫做爱国主义，二叫做有骨气。我认为这是高度的概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爱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有骨气。我想，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国，有的早已消失了，有的历史中断过，唯独中国既没消失，历史也没中断，而是一直不断发展到今天。这是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文化有极密切的关系的。我们这次在湖南大学开会，这里展示了“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精神：“博于问学，明

于务实，志于成

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他业务上还有某些不足，但如果有爱国主义精神、有骨气，他就能高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克服困难，那么，他一定能努力学习，努力思考，努力实践，不足的都能补足上来。宋朝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词中讲：“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桃李好是好，风一吹，雨一打，就完了；在野外溪边的荠菜花不怕风雨，它素质很好。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不做桃李，而要做荠菜花，经得住风吹雨打的考验。“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人，应该有点高尚的精神！应该经得起磨难与安逸！

三、知识就是力量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基石的科学技术，是怎样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作用的呢？在这里，我们撇开科学技术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基础这一最基本的作用，而直接从对人的精神方面的作用来谈，从科学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工作方法与科学的精神这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是通过科学知识起作用。有很多例子可以讲明这一点，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中心学说，提出了太阳中心学说，就把中世纪宗教的思想牢笼打破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盛赞哥白尼的那本不朽的著作是“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从而改变了当时欧洲的精神面貌。达尔文的进化论

传到中国以后，改变了当时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束缚人们不准变革，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王权思想，促进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后，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有了个飞跃，对物理学界是一个思想的革命，对宗教也是个巨大的打击。量子力学的建立对事物皆由前定的决定性论在思想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革命理论的形成，也是直接受益于当时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出现。而作为中国历史上人们所钦仰的“三皇五帝”，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巨大功绩也主要在于教给了人民科学的生产知识与生活知识。这些都非常生动地讲明了，科学的成就、科学的知识、科技的普及对精神文明所起的直接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科学的思维方式起作用。我一再讲，学生进大学，一是学会如何做人，二是学会如何思维，三是学会与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与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我认为思维方式非常重要。1995年我们学校开了一个国际会议，来了一位加拿大籍华人，他说他在大陆学的课都忘了，但有一门课最有用，没忘记，是《自然辩证法》，他说这门课放之世界而皆准。“岳麓书院”教育传统中就有“明于睿思”。“思”是关键，“明”与“睿”是用于说明“思”的。

思想方法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文化大革命”中，我到咸宁去劳动锻炼。有一天师傅要我去打猪菜。当时没有养猪的书，又不敢向农民去问。我从来没养过猪，不认识猪菜，最后想了个办法，不到两小时就把猪菜打回来了，还超额完成任务。师傅问：“是你自己打的吗？”我说：“是我打的。”“问了别人吗？”“没问。”师傅又问：“你怎么打的？”我说：“很简单，把猪赶出去，它吃什么，我打什么就行了。”这是个思维方法问题。有好的思维方法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所以，孔夫子对他最得意的门生颜渊十分称赞，这不仅在于颜渊“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仅在于颜渊的品德（当然

这是最重要的方面)，而且也在于颜渊的思维方法。子贡对孔子讲，自己比不上颜渊，因为自己只能闻一知二，而颜渊则闻一知十。如果我们教的学生只会读死书、死读书，结果一定是读书死。“心之官则思”，不思，不善于思，那怎么能成为有作为的高层次人才呢？所以，一定要重视思维方法。

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好的思维方法。这一点我想稍为多讲两句。最近有篇关于钱学森同志谈思维方法问题的报道，我认为谈得非常好。钱老讲，有人就是把文学艺术的思维方法跟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完全割开，认为是两码事情，而他则认为是一码事情。之所以认为是两码事情，因为把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前一半砍去了，只看到后一半。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是以严密的逻辑思维、精确的数字、经验的验证、抽象的方式来完成。而文学艺术的思维方法是以形象思维、高度的浪漫来完成的。一个是严密的逻辑思维，一个是高度的形象思维。但实际上还要考察前一半，对于科学技术的创造来说，首先要有非常广阔的设想，浮想联翩、大胆的猜想、冒着风险的探索，这时候不是严密的逻辑。爱因斯坦在他发表相对论的时候，数学还不算好，甚至还不深刻知道数学如此重要，当然这是相对高水平而言的。但他敢于想象，善于思索，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而后逐渐收缩，明确研究方向与内容，才能欣然命笔，写出逻辑非常严密的极为出色的论文。而文学艺术呢？开始阶段则需要大量的仔细的观察，定量的观察，由表及里深入的观察。没有严密而定量的观察，漫画家怎么能把人的形象寥寥几笔就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来呢？怎么那么准确呢？我对数学老师讲过，漫画家“懂”得现代数学中的“拓扑学”。他们的那“几笔”就是“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事实如此！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张大千画的山水，不但画出了外表，而且画出了内涵，画出了精神。不仅形似，更是神似。“神似”就是数学上的“特征不变量”。至于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不仅艺术上极为辉煌，而且从光学

上、解剖学上分析，也完全符合科学原理。成功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就是因为有了前面大量细致定量的观察，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与特征，才可能有后面那样高度的抽象，进而达到形象思维，甚至灵感、顿悟的境地。因此，统一起来看，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思维方法应是一致的，只不过前后的特点与份量各不相同而已。因此，从思维来讲，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分离的。人应该有比较好的、全面的思维方式。

第三个方面，是通过科学的工作方法起作用。思想指导行动，工作方法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映。人们都讲，从工科毕业出来的学生，一遇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首先就问这个方案或思路可不可以操作，即能不能够予以实施。科学的工作方式要求有十分严格的工作程序，工作程序中的每一步都要十分严密，工作从始至终不允许有自相矛盾之处。形象些讲，要求“天衣无缝”。我国流行过一个讲法，“三老四严”，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要严肃、严谨、严格、严密。这非常对头。居里夫人用了近4年的时间，不知从多少吨铀沥青矿的残滓中，才获得了1/10克的微量氯化镭；爱因斯坦用了近10年时间，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写了多少稿纸，才完成了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的工作。许多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是自己昨天推翻前天的，今天又推翻了昨天的，很可能明天又得推翻今天的，如此下去，一直到自己认为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都是可信的，整个研究过程是可信的，前后结论是无矛盾的，是无懈可击的时候为止，从而使其成果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四个方面，是通过科学的精神起作用。什么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科学精神，就是毛主席给延安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求真，就是求是，就是研究与认识客观规律，是什么就是什么。认真就是科学。很可惜的是，现在许多搞假冒伪劣的，搞“水货”！当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应该要而且一定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是绝对不行的。人类历史是一部创新史，科学技术也是一部创新史。应该讲，中国有创新的传统，中华民族决不保守。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讲：“富有之谓之大业，日新之谓之盛德。”你们看，孔子讲要使人民富起来，这才叫伟大的事业；要能每天创新，这才叫做隆盛的德行。孔子怎么保守呢？我们始终坚持“两分法”，决不掩饰我们的不足，决不把历史上的糟粕讲成精华，决不把孔子讲成一切都好，我们一定要反思我们民族的不足。然而，仅仅抓住《论语》中的孔子的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棒子把孔子打成保守派，而不加任何分析，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依生释义，三世佛冤。”确实如此！认真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创新！有多少克服重重困难而创新的史实！世界上更是如此！“远者不论，近其何如？”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理论等等的产生，又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啊！因此，在科学精神上，要有敢于创新的精神。要敢于创新，敢于改革的话，那必定有非常大的曲折，因此，又得要有敢于拼搏、乐于奉献的精神。我非常欣赏《西游记》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踏平坎坷成大道。”科学求真，就是要像唐僧取经那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成功，少了一难，也不行！恩格斯对布鲁诺等一批科学家怎么讲的呢？他讲得非常明白：“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的牢狱。”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求异的发现或发明，几乎都伴有实质上与此相同的磨难。真是美，善也是美，真和善的高级抽象与高度谐调就是美。

但是，科学对精神文明的影响绝对不是充要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是重要的基石。更重要的还是人本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内因”。没有这一点，不“修身”，不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科学技术不会自动升华与转化为人的精神文明。

江泽民同志在科协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得好：“科技工

作者要争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这揭示了科技工作者一方面完全有成为排头兵的条件与基础，另一方面要成为排头兵，就要去“争”。“争”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去“争”，决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排头兵。但如果向相反的方面去“争”，那么，人类本身不仅可能沦为现代化科技的奴隶，而且可能毁灭于现代化科技的力量。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其他许多高新技术的运用不当而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应，难道不是铁的证明吗？克隆技术是有利于人类还是有害于人类，这不取决于克隆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自己。

四、谁主沉浮

教育问题既是一个非常现代、前沿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经典、古老的问题。马克思讲，教育一方面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另外一方面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式。在中国的《礼记·学记》里，一开始就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治国安民，首先得办好教育。

我十分赞同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同志们的看法，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是适应不了 21 世纪的需要的。为此，我们要转变教育观念，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改革。而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其突破口之一，这点已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永必重求真，今应更务善。文化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有其特殊作用。

但是，如何来加强文化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呢？从我们学校多年来的经验看，文化素质教育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

次是校园文化建设，第二个层次是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的建设，第三个层次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校园文化，包括各种“讲座”、各种社团活动、各类科技节与文化节，也包括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建设。校园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走进一个好的环境，自然会感到心里非常舒服，很纯洁；走进一个坏的环境，课桌文化、厕所文化、乱丢垃圾、骑车乱闯，如此等等，感到很窝囊。因此，校园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的建设。这里面包括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的大量开设，很多学校都规定了，不达到一定选修课的学分或上不到多少门选修课不准毕业。清华大学在搞文化素质教育试点班，华中理工大学也在机械学院与提高班搞文化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很多兄弟学校都在这么做。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建设还包括非文化素质教育课的建设，这是很重要的。我教过本科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课，我认为这门课也是一门思维方法的课，因此要用动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讲。最近我和教这门课的老师商量，从三个方面修改我们编写的已经是第三版的教材。第一个方面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过去我们写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或有关控制类的书，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瓦特的蒸汽机调速器，这个例子很好。但是，中国在宋朝就有一种水运仪象台，是个典型的自动调节系统。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取得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在教材里反映？也应该反映！第二个方面是要更加重视思维方法。例如，在这次的改写中，我赞成写一章非线性，过去把非线性分散写了一点点，我认为要集中写一章非线性。世界的非线性是绝对的，线性是相对的。把非线性写进去有利于学生思考问题，有利于学生知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讲非线性要提高到思维方法上来讲。第三方面是增加一些现代科技新的知识，例如离散性。同时下决心删去一些过了时的知识。尽管这本书两次得了机械部的教材一等奖，但要适应新的

形势，还不够，要改写。因此，在非人文素质教育类的课程建设中，同样地可以贯彻精神文明建设。

另外，还有一个是教师在教学中为人师表的作用。“师道，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要教书育人。学校里，校园文化对学生影响很大，而老师的行为举止对学生影响更大。中国对老师有两句评价：教得好，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得不好，是“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表明中国人对教师作用重要性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关键之一是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学校中最基础的建设。

第三个层次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在高层次上进行学科交叉，很多兄弟学校都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工科跟文科、理科跟文科有关学科的大的交叉，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甚至有人提议，大学阶段学理工，研究生阶段学人文社会科学，这是人才培养的一种好的模式。不管对不对，这是一种讲法，至少其中有某些合理因素。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编的《高等教育简报》，最近一期转载了一篇介绍美国的小学教育情况的文章，最后译者建议，我国小学的数学比美国的难度要高几个等级，能不能在小学里面把数学课程的难度降下来，降下一两个等级，把省下的时间念念唐诗，念念宋词，念念传统文化，相信培养出来的学生比现在的好多了。这个建议很值得重视。因此，我认为在高等学校里面，在大的学科中间进行交叉，这对文化素质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与国外（境外）的许多大学相比，我们的高等学校一是严重缺钱，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二是科研体制十分不顺。许多国家与地区把相当多的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放到大学中，由学校直接运作，极大地发挥了高校与科研机构优势互补的长处。我们正相反，有几千所独立的科研机构，而大学中由国家设立的大型科研机构很少。当然，同一些国家与地区比，我们人多，从而生源质量高，教师后备力量足；我们地大，从而经济建设部门与社会发展部门齐全，教育、科研紧密同这些部门结合，容易在本土扎

根，紧密同这些部门结合，吸取营养与动力，易于发展。但是，同美国等国相比，人多地大的优势也不存在。那么，我们凭什么去发展高等教育，在未来去同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呢？还有一句老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人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和”。我国的优良传统美德，我国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凭着主人翁的优势，将力量组织起来，向前进军。 $1 + 1 + 1 = 3$ ，但在社会发展中，往往不等于3。中国的俗话讲得十分形象，“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和则利，这是好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不和则害，这是坏的。宋朝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引了《书经·尚书》中的一段话：“纣有臣亿万，亿万其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所以，武王打败了纣王，周灭了商。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事实：弱者最终打败强者。我们高校能够凭着我国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纳人才，组织力量，同心协力，顽强拼搏，发挥作用。

我们高校中的学术梯队就是这一优越性极富有生命力的体现。这是西方高校中所没有的学术组织。好的学术梯队，在好的学术带头人的率领之下，主要不靠经济杠杆，也不靠老板管雇员的方式，而是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谐和的感情、密切的合作、艰苦的工作、顽强的拼搏，将一批人才组织起来，将一个钱当十个钱花，将一个人当十个人用，形成群体优势，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国外一些学校每年以高于我们十几倍、几十倍乃至百倍以上财力投入，发展教育事业，与国外相比，我们以微小的教育投入兴办巨大的教育事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传统美德的优越性。在这里，我决没有轻视这点，我国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带来的严重危害。我深信，一旦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较足，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们的高等学校，我们高等学校中的学术梯队，不仅仅进行

了巨大的物质文化建设，而且更进行了巨大的精神文明建设。一所生气勃勃、团结奋进的高校，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文明象征，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文明熔炉。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崇高的理想与共同的事业，是将大家坚强团结在一起顽强奋斗的力量源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今天正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新的长征。这是一次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的长征，这是一次在各种不拿枪的敌人及其各种无情的糖弹的猛烈攻击下的长征。苍茫大地，我们一定要主沉浮。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是这次长征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求真，务善，完美，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敢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办成社会主义的一流的高等教育而不懈努力！

华中理工大学供稿 收入本书时，作者做了若干删改

【编者絮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教育思想大讨论。这篇讲演不仅谈到文化素质教育问题，而且还结合华中理工大学的实际，论述了面向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理念问题，如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学应该怎么办？为什么在强调科技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人文教育？作为一名机械工程领域的院士，演讲者如此重视人文教育，与演讲者深谙科技与人文领域且对时下重理工轻人文所造成的弊端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

演讲者的一些观点，如，“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没有一流的文科；就很难有一流的大学”，建国后，我们国家之所以经历了这么多艰难曲折，“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文社会科学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视不够，或搞了不少形而上学的东西”，等等，对今天的高等教育确有发聋振聩、惊世骇俗之作用。

胡显章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努力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在清华大学讲演]

1995年9月，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上，周远清同志提出要把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作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件重要大事之一来抓，并希望以此来探索并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过程的改革。在会上成立了以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任组长，北大、清华为副组长单位的试点工作协作组。在前后二年里，国家教委高教司召开了三次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一时间，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

为什么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被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文化素质（我这里着重谈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加强？下面向大家提供一些背景情况并谈几点认识，是否妥当，请批评讨论。

一、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为什么现在要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第一，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已被提到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高等院校面前。

从全国的大局看，在此世纪之交，我国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大战略性转变，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战略，以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无论从前提或是目的来看，都要求教育致力于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人文素质。

从世界的大局看，21世纪世界各国激烈竞争，将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国民的文化底蕴、民族精神和精神文明水准的较量上。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提出文化将是引起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他认为：区域性经济集团在未来的重要性会增加，而只有当它植根于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为此西方文明要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合。尽管亨廷顿的观点带有片面性，然而他所强调的文化的冲突或竞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西方列强总是用文化侵略为其经济扩张服务的。经济和文化的这种关系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也得到深刻的反映。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部的诞生，正是美国政府“让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策略的生动案例。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移民政策与留学政策，大力吸纳像清华、北大这些学校的高材生，除了用最廉价的办法缓解美国高级科学技术人才的缺乏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本世纪之初美国罗斯福政府“让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政策的延续。美国这种文化上的扩张是花样繁多的。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撰文揭露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实际上是在继续竭力推行殖民文化，借以影响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心理结构，征服其思想意识形态的深层空间，使之向他们顶礼膜拜。改革开放以来，努力汲取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国策，对此应认真贯彻。但我们不应忽视西方腐朽文化对我们国民精神，包括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的影响。在观念形态上不加分析地崇尚西方的文明，就会导致民族自信心的失落与国家民族意识的淡漠，甚至走向价值标尺的西化。而这表现在经济、政治上，就会导致发展方向的失误，就可能不顾国情、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实际，盲目认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结构。所以，江泽民同志告诫说，在我们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决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能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教育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一些国民包括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学生的全面素质不仅同有一个有 5000 年优秀文化传统和几十年党的革命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不相称，而且与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相比也有明显差距。以对出国的态度为例，本来，青年人出国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不少学成回国的青年人已成为建设的骨干，一些暂时未回国的也是“身在他乡，心系祖国”，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但我国派出的留学生多数长期滞留国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对西方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留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文明那种“个人至上”的价值观同中华文明“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在相当部分留学生内心天平上谁轻谁重的份量。这表明我们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我们历史上像岳飞的“精忠报国”，像“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像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像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像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兴盛而抛头颅洒热血，这些历史事实、这些故事中体现的民族精神及其深刻的文化底蕴，在

致于在我们中国革命史的课堂讨论中对待“侵略有功”的错误观点竟然有不少的同学认识模糊，甚至有的还持赞同态度。香港回归时，撒切尔夫人说：“英国把一块宝石交给中国。”我们的一个青年学生看到这个消息时脱口而出：“到了中国手里，便成为一块石

头。”这种缺乏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表现使革命史老师十分吃惊。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个日本友人，百多个中国留学生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这次受国家教委邀请来京，同时到我校为文科生活贫困学生授奖学金。他问：“许多中国留学生学成滞留日本，你们怎么看？”他建议我们的学生要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四书五经，要爱自己的祖国，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服务。一个日本人，劝中国青年人学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听起来内心说不出个什么滋味。造成以上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有人把当前中国社会上的种种弊端作为一些人脱离社会主义中国滞留国外的理由，但是，“人不嫌家贫而不归，子不嫌母丑而不孝”，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延续下来的为人育子的基本品德。为什么在一些受过高层次教育的青年人心中不起作用呢？甚至个别为人师表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不理解、不支持、不鼓励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举动。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从幼儿教育开始一直到大学教育，忽视了影响最基本的做人道理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从国际科技、经济的竞争来看，还是从抵御西方的“西化”、“分化”的战略来看，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有深厚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并能了解与吸纳世界一切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激荡和科技、经济、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维护国家与民族的正当权益，推动社会主义祖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是建设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

反映一所大学水平的根本标志是人才的质量，即它所培养出来的人在解决本国重大社会、科技、经济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业务上最强的一批学生，长期不在自己的国土上，不在国内的一些关键岗位上，为自己祖国的繁荣富强

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贡献力量，怎么能被称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呢？一个校友说得很对：清华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观念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深深植根于青年学生的内心世界，有利于他们把个人的发展融于国家和事业发展之中。同时，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首善之地，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为此，必须下大气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广大师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包括作为其基础的人文素质。

第三，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方针所规定的。这一方针也体现了对所培养的人才在素质上的要求。但是，在具体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及着力点并不都是全面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前，突出强调了教育为政治服务；在改革开放以后，又突出了教育的经济功能。这些都是着眼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而素质教育的提出，则强调了教育的本体功能，即人类自身的不断完善，注意了受教育者个性的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其完善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的发展需求与社会发展需求统一起来，把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本体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同马克思关于建立理想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将人们能按照自己的天赋、特长、爱好，在科学、文化、艺术的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从而使人具有“丰富个性”，获得“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变成全面发展的人，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并且认为，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使之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对毕业生的调查表明，加强人文、经管方面知识的传授和相应能力、素质的提高已成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共同的强烈呼声。实践告诉我们，人文课程的开设，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受到学生发自内心的欢迎。这实际上是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也反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现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学学生的文明素养并不都随学历的递增而提高，高年级学生的基础文明素养有时还不如大学一年级新生。社会上曾有人批评某些大学生“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养”。这说明，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德育上强调政治教育的同时，对学生的基本文明素养的教育、基本品德的教育是重视不够的，或者说，并没有找到更加有效的教育途径与方法。当然，由于人文素质的基础性特点，人文素质教育应当从基础教育抓起。事实上，目前在全国中小学普遍进行的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正是这一努力的表现。但是，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基础文明素养，使我们的教育对象进一步从一切非文明的、低级情趣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不断由必然王国向着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攀登，仍然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任务。

第四，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

20 世纪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原有学科分工越来越专业化，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学科的交叉渗透，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列宁曾预言过“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这种潮流在 20 世纪会越来越强大”。实际上，学科的发展正是从低水平的综合走向分析，现在又走向高水平的综合，这是一个值得教育工作者充分重视的重要趋势。譬如，三峡工程规划及其实施，涉及到上百万库区移民和生态、文物保护等广泛的问题，即使是库区设计，也要充分考虑人文环境。近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克隆技术”，它

的进一步推广到人类自身，遇到了伦理学的问题。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奥古斯丁称现代工程学已进入了一个社会工程时代，认为21世纪工程师面临的许多巨大的挑战，都是起因于非工程因素。因而，工程师的关键要素除了体现科学和技术综合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外，还必须了解政治程序，了解社会学，还要发展集体的技能、人际交流与组织管理的能力。他说，现在的工程里不同学科的综合，要求工程师善于研究跨学科的难题，并且能取得突破。当前，为适应这种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发展趋势，培养文理结合、能够综合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新的潮流。比利时根特大学认为，它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能看到最不同的科学领域间相互联系的人，而这种人应是普通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文学、法律、经济社会和教育心理等）和自然科学（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医学等）的内行。英国剑桥大学的专家说：“现代世界理科和文科的裂缝必须用科技人文科学来粘合。”1996年春天，一些日本高等教育家提出要创造跨学科教育的新时代，在大学理工科院系的研究中心聘用文科教授，在大学的社会科学院系的研究所起用理工科的学者和专家。东京工业大学于1996年4月成立了社会理工学研究生院，以适应所谓“超产业化社会”的发展，解决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接口问题，该研究生院设置了社会工学、社会系统、工业工程、人间系统等四个专业方向，以培养具有高深的价值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各种政策制定者、计划设计者和高级管理人才。

以上各种看法及做法是值得我们思考借鉴的。一个时期以来，为了增加学生的适应性，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拓宽专业面，如在培养科技传播以及复合型、宽口径的法学专业人才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从面上来看，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本身。现在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我们的视角，进一步在教育上实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自觉而有效地帮助理工科学生开拓人文社会知识领域

和文科学生开拓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领域，并提高相应的素质。所谓大学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设置了多方面的学科，更应体现学科及人的素质的交叉综合。

第五，重视学科交叉，提高人文素质，也是培养富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的需要。

与国际一流学校相比，我们一些学生创造性不足。究其原因，恐怕与我们过去从基础教育开始的、过重的作业负担，划一的要求，注入式的被动的教学方法有关，也同对成长的非智力因素的关注不够，对学生的个性发展的需要关注不够有关。首先，爱国情、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创造力的动力源，而作为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的哲学思维，则是创造力腾飞的翅膀和创造实践的航标。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的思维。古希腊、古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都有在当时高度发达的哲学作为其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支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是融为一体的，一些千古流传的历史故事、文学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哲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对丰富他们的哲学思维、形象思维，从而提高创造力有着重要影响。

在当代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经常产生新兴的学科及新的思维方式，MIT（麻省理工学院）特别强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同工程技术的交叉研究与教学，形成了适应新的科学、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使学院永葆青春的活力，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还培养出能领导新潮流的富于创造力的带头人。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说，创造性思维往往在不同学科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交叉渗透中产生。他自己是搞科学技术的，但是在哲学领域中，在系统科学与决策科学的交叉学科领域中颇有造诣，对艺术也很爱好。他在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颁奖仪式上，特别提到他夫人从事的音

乐事业对他的影响，他说：“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中所包括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的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了些艺术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些，活一点。”无独有偶，爱因斯坦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他对古典音乐有很浓的兴趣和很高的造诣。他曾说过：“如果没有早年的音乐教育，无论哪一方面我都将一事无成。”他甚至认为艺术使他“比从物理学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从艺术中获得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据统计，世界上各个领域的 1000 位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这说明音乐艺术对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方式的拓宽，想象力、创造性的开发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李政道博士 1996 年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研讨会，做了《科学与艺术》的学术报告，指出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杨振宁博士在另一场合作了《美与物理学》的报告，指出物理学原理有其结构美的特点，并以高适的“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的诗句描述了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钱学森在不久前提出了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构想，其中文艺创作、文艺活动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包括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美学。他认为：“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这些著名科学家的言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从单纯传授科学知识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系统论的角度去形成一种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方法与途径，应当是有启迪作用的。

重视素质教育，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当前世界高等工

程教育改革的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9 年在北京召开“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把“学会关心”作为主题，要求培养青年一代面对挑战而具有责任感、信心、意志和能力。从本世纪 70 年代该组织提出的“学会生存”，到 80 年代末提出的“学会关心”，反映出人类教育观念从适应自然与社会到关心自然与社会的转变。在这里，人的精神建设、人文教育被提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表明了当代国际教育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走向融合的趋势。许多著名理工科高等学校，如美国 MIT、加州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都纷纷增设人文社科专业与课程，实行文理渗透，引导学校向综合性发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综合化、基础化和素质化的趋势，人文社科教育被置于基础教育的位置上。在国内，以华中理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围绕强化人文素质教育采取了多种改革措施。华中理工大学提出，他们正在实现从注重理工到理工与人文社会科学并重的新阶段转变，他们在开展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并选择机械工程学院作系统改革试点。他们还以校长牵头成立了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第一年就投入百万元，以加速基地建设。我校在 80 年代以来，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方面，在继承过去已有经验与传统的基础上，又作了许多努力，在校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素质教育的观念不够明确，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在量上增加的力度不够，在质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学生全面素质与学校的地位、作用不相称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强烈的责任感与时代意识，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强领导，深化改革，使我校的素质教育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人文”一词，在词典上界定为“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国自古有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易·贲》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化”是教化，即教育的意识。只有那些优秀的，能够升华人的精神，提高人的价值的文化才能列入人文教育的内涵。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人文素质教育既有同历史上、同国外各种人文教育相通的东西，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其最根本之点是我们要以现当代最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坚定不移地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切腐朽没落的低级情趣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其根本的任务，说到底还是为了有利于受教育者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方面，它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致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所以，有同志建议，应在我们的人文教育前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

人文素质教育又与一般含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引导学生有选择地汲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为自己在政治思想方向的选择和价值取向上打下文化基础和审美基础。从学科角度看，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概括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教育两大类，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又以文、史、哲为主。我们不能要

求人文课程与活动直接解决政治方向 and 思想上的具体问题而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可以帮助学生打下文化和审美根基，再经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课程教学及德育实践活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他们自然的选择。这种教育往往带有寓教于美、寓教于乐的特点，可收潜移默化之效。所以比较易于被学生接受，而且一旦形成便比较稳定，它可以成为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甚至能收到一般思想政治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人文教育这种潜在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得到开发。

三、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80年代以来，我校逐步向着综合性大学方向前进，恢复建立了文科院系，并逐步形成了以下五个可以相互配合的途径，以发展人文素质教育。

第一，在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改革与建设的同时，开设人文选修课，并将其纳入教学计划。我们要求每个学生在认真学好“两课”的同时，在校期间至少选修五门不同类型的人文课程，这在全国理工高校中是首开先河的，其中文学选修系列课程成为学校选修课中第一批一类课。目前的任务是加强领导，严格管理，提高课程质量，使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育人功能，并真正使“两课”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教学计划中取得基础性地位。

第二，开展“三应”教育。规定清华大学学生中外文化与文学优秀作品的应读书目和艺术方面的应知应会。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如以课带读，把学生课外阅读的应读书目同选修课的指导结合起来。

第三，大力开展以培养人文素质为中心的校园文化活动，有领导地举办各种人文讲座、沙龙活动、人文学术节，建设学生文

艺社团等，吸引学生主动而广泛地参与，努力营造生动而健康的人文氛围。

第四，引导学生积极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参加服务集体、服务社会、献身祖国的实践，使作为内在品质的良好的素质在不断外现中得到检验，得到巩固与提高。

第五，通过其他渠道，特别是学生经常的大量参加的业务学习渠道，引导学生把做学问与做人结合起来。这样做往往更加自然，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业务教师、研究生导师在基本做人道理方面的言传身教，是应当大力提倡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素质教育，决不仅仅是人文社科教师的事，只有树立起全员素质教育意识，把真、善、美的追求融化渗透于育人的全过程，我们的工作才能有真正坚实的基础。

从全国的院校，包括我校近两年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试点的情况看，当前推动素质教育，要抓好五个环节。

第一，要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上有新的突破。一是在教育功能上，从注重教育的社会功能到同时注重教育的本体功能；二是在教育的目的上，从重知识传授到同时关注能力、全面素质的提高，树立起全员素质教育意识。

第二，要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过程的整体优化上下功夫，努力探索与确立更加完善的教育体系。

现在既要展宽基础，还要强化能力，又要提高全面素质，如果大家都搞简单的加法，那么，已经负担过重的学生更会不堪重负，到头来便会事与愿违。所以，必须在转变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在整体优化上下功夫。如教务处最近明确要着力打好本科学习的三个基础，即数学、自然科学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工程技术基础，体现了工程教育的基础化。

人文素质的提高不能全靠课堂教育，就从课堂教育来看，目前应首先着力于提高现有课程环节的质量，并将这些课程环节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上，得到重视与认可。据调查，有的系并不认可

如“大学音乐知识与赏析”、“大学舞蹈艺术与实践”这些课程，认为是唱唱跳跳的，不应列入正册。所以，要做到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放到基础教育的位置上，还要作观念上的转变。

最近学校进行了本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衔接的试点，提高了课程的质量与效率，但是有不少学生反映课程负担更重了，没有心思学习文化艺术课程及参加课外活动。如果不从教育观念上突破，不控制学生的课程负担，不搞整体优化，从类似于系列课程体系改革找办法，从深化改革找出路，要使人文素质的教育做到使全体学生受益是很困难的。

另外，从总体优化的思路看，应当把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联系起来落实。我们要继续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把人文素质教育放到基础性位置上来落实。我们提出了在共同的班子统筹领导下，建设好两个基地，即“两课”教育基地及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以此来推动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教育在相互促进、配合中得以提高。特别是学校要培养一批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一大批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骨干，必须在打好人文基础的同时，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第三，在具体操作上，既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又要实事求是。重大改革步骤要通过试验，防止大起大落，防止形式主义，徒具虚名。当然，试验要有一定的范围与力度。为此，学校的教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和领导。

第四，努力加强文科建设，包括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与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有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可为素质教育提供良好的学术基础、指导力量，以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潜移默化的育人氛围。

关于文科的建设已引起我校领导班子的进一步重视。在近两年，学校通过申报“211工程”，努力抓了工科的学科群建设以利于发挥综合优势，继而通过成立高等研究中心等努力把理科推

向世界前沿。这学期校领导要相对集中力量抓文科建设。由于文科的基础薄弱，需要加强与支持的方面很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学校对文科的最迫切的也是最重要的支持，应当首先体现在对文科的“三个认识一致”上，即对文科在国家建设和清华大学实现总体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包括区别于理工的特点的认识；对清华大学文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目标包括文科的结构、规模和侧重点的认识；对文科的发展方针政策的认识，这三个认识应取得一致。

第五，在人文素质教育上也必须加强领导。领导重视是搞好素质教育的关键，这是全国高校试点院校的共识。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提起清华大学，大家首先想到它强大的理工科，其实，老清华大学的文科也处于一流水准，它不仅拥有著名的国家研究院和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的四大导师，而且还培养了如季羨林等一大批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胡乔木、乔冠华、于光远等早年亦就读于该校）。进入 80 年代以来，清华大学着手恢复文科，这为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篇演讲稿全面反映了清华大学对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刻认识，介绍了他们的具体经验。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之一，清华的经验值得借鉴。

李士坤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共产党宣言》 导读

[在北京大学讲演]

再过一年，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小书问世 150 周年。正如列宁所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一个半世纪，弹指一挥间。可是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发生了如许之多、如许之深的巨大变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正从高峰跌落下来，处于低谷之中，其突出的标志是曾经作为《共产党宣言》胜利的光辉旗帜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走向了暂时的失败。这一剧变，使世界所有共产党人都在经受“炼狱”之苦。从资本主义制度来看，由于这个制度内在的不合理性和深刻的危机，曾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慑于社会主义凯歌前进的雄伟气势，资本主义在保持其根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了许多改革。加之借助科技发展之力，这个制度在今日居然使自己处于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境地。在与社会主义竞争中，竟取得了大喜过望的暂时的成功。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同《共产党宣言》时期比较，今天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还不过是蒸汽机时代，150 年的时间，人类不仅迈过了蒸汽机时代，而且也将把电气化时代抛在后头，正在进入电子和信息的时代。电报曾经是一

种先进的通讯手段，可在今天已完全被电传所代替，电报这项业务将被载入史册。

150 年前的中国，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作为一个落后的，等待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开辟的新天地被作者顺便提到。今天的中国已是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蓬勃向前发展着的国家。我们就生活于、工作于、实践于这个国家。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学习、研究 150 年前由两位德国青年人执笔的这个著作——《共产党宣言》。当时马克思 29 岁，恩格斯 27 岁。

一、《共产党宣言》产生的背景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1. 《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了 150 年前，一个我们非常陌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欧洲出现了一件怪事：一切反动势力一起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围剿。这是为什么？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遇到了多种的反抗。首先当然是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反抗，其次是小私有者阶级的反抗，再次是各种习惯势力的反抗。起初，当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革命力量向封建贵族统治发起进攻时，与这个阶级同时产生的无产阶级成了这种斗争的同盟军，指望通过这场斗争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等到封建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后，未曾料到它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丝毫不比封建地主阶级逊色，于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但这种斗争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前还是朴实的、自发的。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和腐朽越来越暴露，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这种斗争就逐渐超过了小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上升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斗争,就连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在举行民主革命时,也不能不对站在它身后的这个“小伙子”(无产阶级)有所顾忌。所有剥削阶级一下子意识到:真正与他们性质完全不同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是无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是如何概括这个事实的呢?这就是在前言中提到的那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对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从19世纪30年代到《共产党宣言》问世,共产主义被公认为是一种势力,表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的兴起和日益壮大,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先后出现了工人组织:1837年,法国布朗基领导成立了“四季社”;1840年,英国在宪章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与英法相比,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极为缓慢,但毕竟也有了发展,特别是毗邻法国的莱茵地区,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手工业和工场作坊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地方的工人因不能忍受工厂主和承包商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起来反抗,为了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834年在巴黎的一些流亡者成立了最早的秘密的工人组织“被逐者同盟”(也称“被压迫者同盟”)。这个同盟在章程里提出了“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人民团结”的目标。后来同盟发生分裂,一部分激进分子组建了“正义者同盟”。1838年,正义者同盟在巴黎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涉及纲领的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后来对工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的帮工裁缝威廉·魏特林、排字工人卡尔·沙佩尔等。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委托魏特林写了一本题为《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的书。在以后的若干年中,这部著作实际上就是同盟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了“财产共有制”,甚至提出通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消灭产生社会弊端根源的私有制。

那时,作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意图的思想流派,除了魏特林主义之外,还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等。所有这些思潮尽管都标榜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有些是颇为粗糙、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有些则是小资产阶级理想的理论表现,并不能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纲领。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科学纲领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来同各国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一方面对前述各种思潮进行评论和批评,另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在他们的努力和影响下,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对同盟进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邀请,同年6月,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他的指导下,大会制定了新的章程,并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同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就是不久以后产生的《共产主义原理》的雏形。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德国的代表外,还有瑞士、波兰、英国的代表。担任主席主持大会的是卡尔·沙佩尔,大会秘书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会经过深入的讨论和争辩,马克思的思想终于力克群雄,最终被大会所接受。因此,“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

2. 《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总有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理论诞生的标志,也就是它的最基本的东西。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是它的哲学的诞生。正因如此,我们常把于1845~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

形态》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因为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其实,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主要的东西,甚至比这更早马克思就提过。但是,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当时未能发表;第二,其他一些文章著作主要是论战性的,由于论战对手所提问题角度不同,就不得不跟着他走,这样,系统、严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反而成了不可能。而《共产党宣言》却是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自己理论并公开问世的第一部正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主要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 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 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正是这个缘故,原东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丁·洪特写道:“《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党人第一个公开的纲领性文献,作为对科学共产主义第一次完整的阐述而具有了‘长子的权力’。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希腊艺术‘作为人类历史的童年的永不回返的阶段(……)而散发着永恒的魅力’那样,《共产党宣言》则永远处在把人类最终从剥削和压迫、从阶级分裂和战争中解放出来的道路的起点。”

二、《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共产党宣言》包括一个简短的前言和四章正文。从 1872 年到 1893 年 20 多年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不同版本先后写了七篇序言,前两篇由他们二人合写,后五篇由恩格斯一人所作。我国的单行本或选集本都是把这七篇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一并发表。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这七篇序言已经成了《共产党宣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的不可不读的部分。

七篇序言大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明完成《共产党宣言》的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恩格斯的 1883 年德文版序言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5 年后，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重复他在 5 年前的思想。这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二是对《共产党宣言》作了重大补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872 年德文版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要把这个机器打碎，摧毁。三是序言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

以下谈谈各章的具体内容。

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

〔一〕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历史功绩

1.“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最早，从中世纪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后来，美洲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工业的发展，使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行会师傅也就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由于市场的扩大和工业革命，现

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即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中的中间等级。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2.“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A. 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使得一切关系都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金钱关系。

B. 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不断进行革命,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C. 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全球性的,把一切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

D. 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终于使得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的生产力,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

3.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其突出表现就是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商业危机。

资本主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冲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再也容纳不下它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资产阶级的关系太狭隘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随着危机的频繁和加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二〕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

1. 随着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发展了起来。

无产阶级是失去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它是随

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2. 无产阶级既是一个受剥削压迫最重的阶级，又是一个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

无产阶级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而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监工，首先是受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它又是一个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

3.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这种斗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这是斗争的自发阶段。后来，由于大工业的日益发展，交通也发展起来，这就促进了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逐渐把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它不再是以单个资产者为目标，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制度；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统治。过去的一切斗争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斗争。过去的一切斗争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无产阶级的斗争则是要摧毁一切私有制。

4.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基础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

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革命的联合，这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产生出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第二章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一〕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特点是什么

1. 共产党是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2. 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

3. 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整个运动的方向。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二〕共产党人的原理不过是眼前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

1. 关于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

所谓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如果是指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财产，那种财产用不着共产党人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消灭它。至于工人占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当然也就无从消灭。共产党人要消灭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得来的财产。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2.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资本是资

本家剥削雇佣劳动得来的财产,共产党人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而是剥夺剥夺者。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3. 关于消灭亲密的家庭关系、公妻制、取消祖国、民族等问题的辨析和批判。

关于消灭家庭关系。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资本和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关系将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实质是一种金钱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对资产阶级才是需要的。

关于公妻制。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乃是再可笑不过了。

关于取消祖国。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关于取消民族。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随着人对人的剥削的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4. 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

思想意识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它必将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以往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思想意识即传统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

5. 结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三〕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
1.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2.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3. 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4. 针对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提出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可以采取的十大措施。
 5. 消灭了阶级对立,将出现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这一章主要是对当时出现的、对工人运动或曾对工人运动产生过影响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所涉及到的的是三大类型共五种派别,这就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它们尽管形色不一,但从总体上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世界观、历史观是唯心的,就是说它们不是在正确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下去分析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的是赤裸裸的唯心史观,如反动的社会主义;有的是英雄史观,如资产阶级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有的是倒退的历史观,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第二,以上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唯独没有一个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第三,在对待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上,它们都反对进行暴力革命;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第四,正是在以上这些主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区别了开来。

第四章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1. 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2. 在联合这些力量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斗争时,共产党人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和长远目标。

3.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4. 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三、学习《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意义

《共产党宣言》问世一个半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遭遇真是罄竹难书,对它箴口不理者有之,查禁、中伤者有之,歪曲、篡改者有之,把它付之一炬者有之,在法西斯统治下,甚至把《共产党宣言》持有者定为死罪。但尽管如此,《共产党宣言》仍然是世界政治文献中译文最多和传播最广的著作,仍然吸引着千百万人的心,也吸引着在坐各位的心。今天学习《共产党宣言》有什么现实意义?

第一,掌握《共产党宣言》阐述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正确分析我国社会和世界发展的趋势,走历史必由之路。当今世界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面前,一方面可以说变得越来越大,人们不断地在开辟新的领域,宇航工程、海洋工程,真是“海阔天空”;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过去几天、几十天甚至几年的路程,今天几个小时、几天就可以走完。未来的世界还要大变样,在坐的各位就是属于未来的,未来的世界在迎接你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创造美好明天。这里讲的历史潮流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消灭压迫和剥削,才能使整个人类摆脱贫困和灾难,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因此,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不仅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也是当代青年最崇高的理想和最伟大的实践。

第二,立足现实,下大的决心,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个半世纪内遭受的磨难比《共产党宣言》遭受的还要多,还要深。至今我们仍在承受落后与贫穷所带来的后果。《共产党宣言》最早传入我国是在1920年,是由陈望道从日文译过来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抛弃圣人之书而祭起《共产党宣言》,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探寻一条富强幸福之路。从20年代到现在,75年过去,不管共产党人走了多少弯路,这一宏愿没有丢。在今天,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了,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整个人类就作出了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

第三,《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没有过时,每一共产党人必须坚持。这种坚持不是照搬《共产党宣言》的条文,而是要将它同当代国际国内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种结合的典范,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只要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就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宣言》在今天的维护、运用和发展。

【注】

列宁选集·第1卷.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271,252,249,293,29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196

列宁选集·第2卷.437

北京大学教务处供稿

王家福 吉林大学国际战略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素质变位——跨世纪的空间通道

[在吉林大学讲演]

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今天是我的第 100 场学术报告。高等学校的学术报告会是课堂的延续，是智能升华的阶梯。它对唤起人们广泛的求知欲望，追逐某一特定学科最新研究信息，激发勾画未来科学蓝图的兴趣，捕捉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都起到了课堂教学难以起到的作用。

今晚，我正本着这一理念，就大学生的素质变位问题展开多层次地探讨，其中重点探索世纪末的人才素质“裂变”现象、世纪之交的智能馈赠、构建素质变位的空间通道与三步到位地强化意志品质等四个问题。

一、世界人才素质世纪末的“裂变”现象

站在时代与战略高度，以开阔的国际战略视野检阅当代世界青年的总体走势，映入人们眼帘的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动态图像。这里有施放晶亮奇彩的才俊人物群，也有沉迷于底层黯然失色的“谷底帮”，更多的是夹杂于两者之间呈半明半暗的“困惑体”。世界青年这一整体走势超前地向国际社会报道了未来世纪的希望、难题与困惑之点。

在高科技、高物质的冲击下,国际社会出现了诸多“裂变”现象,由此引发了世界青年总体态势的巨大波动。当代世界“开拓型”青年在主体上乘信息革命之风锐意进取,激发了创造活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总的走势由热衷创业渐次变位于迷恋个人的享受。当代世界“理想型”青年曾在社会合力激发下,谱写了史诗般的奏鸣曲,如今在复杂社会思潮分解中,由意志坚定演化为“信念危机”。当代世界“游荡型”青年惊愕于信息革命共振余波之后,犹如高悬在夜空的红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随着社会风向荡来荡去,这一人群趋向由往昔的游荡滑向放荡。

青年最迅速、最直接、最尖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重担与精神重创的困惑。面向 21 世纪,当代世界青年面临着多层次的困惑,这是世界人才素质世纪末“裂变”现象的典型表现。它集中地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杰出人才日趋贫乏、信念强度渐次疲软、平庸因素无序扩张和才俊人才流向西方。

青年是社会问题的超前承负者。青年素质“裂变”更多的是前代某种“裂变”的“感染体”。我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大量的中、英、俄文献与信息的解析,在 1985 年提出:全世界有 113 个危险点。这一严重险情及其转化成的社会氛围,从某个角度分析,就成了青年素质“裂变”的诱导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领导人的素质的裂变。我在 1984 年 8 月 8 日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才培养的分析》中提出,在前苏联领导人才培养过程中,进抵最高层次时已出现了“腐烂”、“中间空”,即“断层”状态。造成这一态势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前苏联东欧各国的领导干部专业素质有所提高,但是,政治素质急剧下降。“裂变”是根源于政治“裂变”,前苏联青年由“喜欢”政治到“厌恶”政治的演化,正是全程“裂变”的中枢。

当代日本青年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据日本博报堂生活总会研究所调查,日本青年 98% 厌恶政治,49.9% 的青年把金钱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而精神的欲求与此相比黯淡无光”,愿为社会服

务者微乎其微;其因为“他们缺乏理想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欲望”。当然,正如日本诸多研究机构所强调的,日本公众厌恶政治也与该国的“金钱政治”与“二世政治”有关。

如果说素质“裂变”的枢纽在于政治“裂变”,那么素质“裂变”的自体在于素质结构失衡。仅就教育取向上,正如我国一位教育学专家所说,前苏联的教育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苏美相比较,前苏联是专才教育,美国是通才教育。前苏联大学是“适应性专家培养法”,而美国大学是造就有创意的人才。据国际研究机构考察,在高科技领域,前苏联用3个大学毕业生干美国1个大学生的的工作,这是素质失衡的量化体现。前苏联推行多年的应试专才教育,尽管中经凯洛夫教育学、赞科夫教育学与巴班斯基教育学的“微调”,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全局上仍是固守旧的模式,仍处于素质结构失衡状态。195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倡导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并在全社会助推下,实际上拉开了素质教育的序幕。中经几十年的努力,近年来美国又从素质教育转向文理科大交叉的立体化综合教育。

当然,美国素质结构也有失衡之点。素质结构良性运行要有有力度的牵引。美国学术界领袖人物主要是在1950~1970年期间所谓的“黄金时代”造就的。但是,到1970年初开始的“缓和”时期,由于诸多因素,特别是政治与战略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前20年中没有造就出相应的学术领袖。在综合素质时代,没有学术领袖也难免出现人才素质的“裂变”征兆。

二、范例分析——世纪之交的智能馈赠

根据国际多领域专家的研究,21世纪对各门学科、特别是对其中4027门学科的共同要求是:在以往的高度分化中走向高度的综合;最具创意的理论探讨与实际应用的最佳结合。它对世界人才素质的共同要求是,开掘人的巨大内在力量,激发创造力。

从智能馈赠度角度解析人才素质“裂变”现象,人们还会发现素质结构失衡的其他层面的原因。以国际战略视野检阅世界人才流程,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恰逢杰出人才的“低谷期”。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实施超前教育 20 年的战略,致使与时代相适应的人才未及批量性出现;而某些领域人才在岗延拖近一个周期,致使青年缺乏厚实的基础,中年没有及时受到高层次洗礼。从世界科学发展角度观察,正如钱学森教授所阐明的,这个时期处于交叉学科的时代。钱三强教授认为,从科学内在逻辑上说,科学发展前锋受阻,必然导致智力的横向转移,或是“回采”老学科,从而引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学科群。对跨世纪一代来说,往昔老学科更多的是制约其智能扩张,而有益于智能扩张的新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现实状况与未来要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而加重了青年人的智能贫穷。杰出人才贫乏,说到底还是来自世界性“教育危机”,来自国际上最严重的赤字——“人才赤字”。

历史是流动的现实。人们通过历史范例的解析,有可能感知世纪之交的智能馈赠。为了简洁而切中要害地理解问题,我们依据 21 世纪人才素质的世界性要求,通过三组实例,分析“创造要素”、“推进途径”和“方法特征”,探讨智能运行的方向。

首先,解析“创造要素”。一般地说,这里所涉及的“创造要素”,它要具有依次相连的三个环节:一个是构建体系,一个是要有震撼力,一个是要有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三个环节要一环套紧一环才有可能全方位地展现“创造要素”的本质势能。

第一个环节是构造体系。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创造要素通常都体现在体系的构建上。其中最杰出的范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我在美国两年期间,发现那里课堂中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教室里总是坐无虚席,听者兴趣甚浓。我从与师生交谈中得知,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容了当时的全世界,自然为全世界所注目;而其理论体系则是划时代性的创造,即使是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诸多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经济社会的走势的重大的新学

科,它们的中枢线性进展仍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

1981年,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参加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堂讨论。有位美国教授开宗明义地说:“在信仰上,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在科学概念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他认为,仅就当代经济学中的“计量系统分析”来说,尽管马克思著作里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但在《资本论》里却早已内涵这一要素。美国许多专家指出,当代西方世界某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其诱因也来自《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91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专家。不读马克思的书就不能成为有洞察力的经济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麦克马纳斯汇总了西方学术成就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在西方学术成就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个世界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许多论点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多棱镜分析的,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来描述的。”

在一切为了人、一切决定于人的时代,一切理论体系都要深置于人民大众的母体之中。海尔布罗纳认为,“资本主义不具有道德基础”。美国《洛杉矶时报》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责任的遗产仍然充满着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它作为对我们的智能馈赠之一是,构建体系是基于人,因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开掘其创造力。马克思不仅通晓当时人类最有代表性的多色彩成果,而且还以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军事科学与文化等多学科知识为创新的丰厚基础,这也是创建理论体系的智能支撑。在当代世界,不是为了人的理论当然不为人们所需要,而来自一孔之见的“理论”当然也不会为全世界所注目。

“创造要素”的第二个环节是震撼力,就是对全世界文明具有理论体系的张力与渗透力。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与大千世界多色彩民众紧密相关的生命线,并转化成或将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自近代以来的世界,这般震撼世界

的理论体系,就是马列主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杰出人物中,列宁著作使用过的词汇为 37600 个,在世界出版物上,列宁的“个人用语”最丰富。列宁著作在全世界共有 401 种语言的译本,居首位;其次是《圣经》,286 种;第三位是马克思的著作,196 种。在全世界出版物的排位中,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占了两席,难道这不值得我们自豪吗!大家知道,《圣经》至今已约有 3300 年,尚且如此,可见马列主义的传输张力之大。

“创造要素”的第三个环节是“良性运行机制”。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已有多方面的表现,并在改革中又有新的创造。

人们要获得“良性运行机制”,务宜捕寻更优的启动势能,为此要注目于推进途径。在世界人才素质生成与升华上,一般认为,基辛格博士的成才之路,具有世纪之交的智能馈赠性。

在基辛格博士成才的社会助推上是“三级火箭”依次推进。第一级是克雷默为其规划方向;第二级是埃利奥特为其造就智能,激发创造力;第三级是洛克菲勒使其问鼎国策,并走向世界。

人们通常说成名成家。台湾一位学者对成名成家有自己的识见。他认为,成名是造就自己,使自己享用快乐;成家则是造就众人,使大家分享这一快乐。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这一内涵。这位教授认为,基辛格的《一个失而复得的世界》是为自己而写作,就是为了训练自己;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则是为他人而写作,就是对他人的有所启迪。同时,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深居简出,几乎“泡”在图书馆里,特别是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甚至研究了与核武器相关的广泛的自然科学与兵器技术,取得了广博的知识。基辛格的多层面实践,为他以后展现智能进行了超前的存储。

历史令人明智。说到底,基辛格是在对 19 世纪历史的依次追踪中捕寻到了对 20 世纪的现实具有借鉴作用的东西。

世纪之交的智能馈赠的吸纳,还要权衡方法特征,那就是全力地走向全方位的高度综合。而日本人则认为“综合就是创造”。在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破译日军的“紫色密码机”与英国破译德军的密码“英吉格玛”的方法组成几乎雷同,即几乎用相近的人力、时间与文理多学科的综合优势,获取了高于敌对国的情报优势。

世纪交汇处智能馈赠捕寻网络主要集中在五种能力的有机合成上,即勤奋的自学力、准确的选择力、独特的组织力、理论上的创造力与实践中的决策力的优化合一。

三、构建跨世纪的思维空间塔楼

世界人才学阐明,思维活力是人才要素的核心。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尖锐挑战,人们势必寻求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这里所说的构建跨世纪的空间通道,也就是思维的现代化,即“立体思维”。当代青年,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乃至某些中青年教师要谋求思维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级依次的推进过程:第一,要把自身推进到“通才”的基石上,走向文理交叉的世界前沿航程;第二,与大千世界演进同步,大幅度地更新观念;第三,强化形象思维训练,构建思维活力的空间性结构。

未来的巨人要站在通才的基石上,当代青年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大志,就要从通才做起。目前,我们奉行的是专才教育,它与教育最高战略目标呈反向运动。通才教育,乃至文理合流,并非是什么当代的“新”创造。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预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将是一门科学”。早在1914年,列宁就预见,20世纪将会出现由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问题在于,我们长期没有实践这一理论,大多是在专才的盘山道上缓行。事实上,我国老一代世界史专家,大多通晓中国史,有的还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但是,我国某些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大多不懂中国史,反之亦然。研究方向越来越窄,多是学术上的坐井观天。综观美国几所大学,日本的松下学校与企业管理大学等,不仅实施通才教学,而且已步入21世纪大门。通才通达

21 世纪,专才教育只能是 20 世纪的“次品”。不懂自然科学的文科大学生与研究生与不懂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工医农林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充其量是“半成品”。

我们关键性的落后是观念滞后,为此要大幅度地更新观念。我们更多的是农业文化负面因素的“回头望”,而缺少商业文化正面因素的“向前看”。变“回头望”为“向前看”就需要大幅度地更新观念。近年来那种“制造”大学生与研究生,甚至是“制造”教授,并不是更新观念的物化,而是农业文化负面因素效应下的迂回性状,是某种陈旧观念的回潮。多领域的浮躁思潮,不间断地制造轰动效应,从不同方位冲击社会与人群。对诸如此类性状,既不要惊慌,也不要随波逐流;因为它是一种“过程”,有作为之人不要为它所折服。实际上,80 年代成为“东南亚明珠”的新加坡,当时也出现了“精神危机”。“治学,思一夕成名;营商,图一夜致富;从政,想一步登天。”长期赤贫的公众,一旦有了致富的脆弱空间,便顷刻间引发短期突爆的心态,并转化成东奔西突的行为。

观念更新是个漫长的吐故纳新的进程。审视农业文化,权衡商业文化,走向科学的政治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所谓现代化,就是既要在实质上创新,又要在升华中顺应民族文化的要求。

在信息社会,思维的贫穷才是根本的贫穷。有鉴于此,有志于素质变位者,在更新观念的进程中,宜强化思维科学的训练,并从深处开掘自身的巨大内在力量。

长期以来,我们信奉单一思维,尽管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弊端仍是层出不穷。从单一思维走向立体思维,首先要借助形象思维。钱学森教授一再强调,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它也是在思维方式上解冻思维僵化,进而助推人们捕寻生机、觅求活力和开掘创造力的思维前提。同时伴之以行之有效的抽象逻辑思维的训练,捕寻灵感思维的灵光,进而走入思维科学的殿堂。

在科学研究的起点上,要努力构建思维的空间塔楼,精心运营

思维活力的空间系统,宛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头脑中建筑房屋,它将助推研究者进入别具一格的境界,赢得史无前例的心态,获得撞击心灵深处的特异感应。进入这般意境,才能谱写出生命与智能凝聚的时代交响乐章。

四、超越自我——三步到位地强化意志品质

信念是统领智能到位的核心要素。恩格斯一再倡导“意志自由”。经验、知识、教育形成意志,意志还是心理与生理因素的高度综合。因此,实施素质变位,首先是战略意志问题,是“意志自由度”对信息社会的张力效能量的问题。

在学习与研究中,我们主张超越自我,三步到位强化意志品质。我们强调意志,因为意志还是国家实力的一项关键性指标。英国著名战略家罗伯特·汤普森认为:“国家实力等于人力加可用资源,乘以意志。”这里所说的“三步到位”,是指对青年在三步走的进程中,要相应地强化意志品质。第一步,包括硕士学位研究生在内的高校学生,其学历与知识是人生的奠基,重在打宽厚坚实的基础。第二步,这些人毕业后走进社会,这是人生的真正起点,应确立雄心大志和从基层做起的人生哲学,这才是事业的起点。第三步,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在观念、思维、能力与方法上与世界同步运行,这是人生的创造期。我们在这三步进程中,不但要以意志来牵引,而且还要在依次进程里强化意志品质。

与强化意志品质的时代性要求相比,我们某些青年不仅有巨大反差,而且甚至多有“先天不足”。它集中地体现在某些人既无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没有相应的综合性知识结构。一种思潮袭来,如果社会引导不好青年,往往是青年控制不住自己。非但不能超越自我,反倒随波逐流。

跨世纪一代在军事战、经济战与知识战三大战略交叉区中崛起,就要有特定的综合素质要求。按照我的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

主要之点:第一,在高科技、高物质时代,人们的精神心理对物质的战略系数为3:1,也就是说,在高科技高物质时代,人们的精神力量相对于物质因素,发挥的作用更大。第二,置身于文理科的交叉线上,与新学科、边缘学科一道成长。有关这一点杨振宁博士多有倡导。第三,汇总古往今来的治学之道,新方法与新学科共进。第四,在超越自我中,扩张立体思维的结构性功能,用以开掘自身的最大潜能。信念强度统领智能到位,新兴学科引导智者入轨,新方法提高效能,而立体思维则是开拓性研究的通道。

我们时下的问题是,许多年轻人在人生奠基期内却幻梦于“一步到位”,而少于勤奋攻读,要一步登上百层大厦的顶端。这首先是意志品质不到位所致。某些毕业生就想到大城市,进大机关、大公司。美国“白宫训练班”与日本“松下学校”等著名的学校,其毕业生都要到“基层”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提出,“在战略上,通过漫长迂回的道路往往是达到目的最短之路。”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人生哲理。从青年时代起就投入世界大潮之中,我们就会不间断地赢得创新的契机。青年人只有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才能高强度地展现智能,这里有意志因素。因此,我们要强化意志,优化过程,时时处处超越自我。

吉林大学教务处供稿 略有删节 本人审定

【编者絮语】不同的时代,对人才的素质有不同的要求。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时代,它要求的人才的知识结构是既专用且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篇演讲稿站在较高的战略高度,分析了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并对如何达到这一要求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青年人在设计自己的成才之道时,不妨多参考一下王教授的意见。

刘书林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谈跨世纪青年的素质要求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很荣幸能参加今天晚上的人文讲座。前几天,我从你们学校编写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中,看到杨叔子校长引用外国物理学家的一段话:“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获取知识,重要的是发展思维的能力。素质就是把所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所留下来的东西。”这就给我们理解“素质”奠定了一个朴实的、很深入浅出的定义。它就是一个人思维的素质、思想的素质,它是一个人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能力素质。这六个素质中,今天我来讲的重点是思想素质,为什么呢?我觉得思想方面的素质若得到提高,其他素质则很容易跟上去,这一方面搞不好,其他的即使上去了也会垮下去的。

当代青年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要在本世纪末走向社会,下个世纪的初期和中期成为国家事务的决策人和各个行业的骨干力量,面临这一伟大的转变,思想素质的影响太大了。那么,当前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情况怎样呢?我觉得要全面地进行分析,他们优势有四个方面:第一,知识广博,思想活跃。当今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信息、通讯、交流十分频繁,十分方便的社会当中;生活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变得越来越大的一个时代当中;生活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社会环境当中;生活在一个开放式的社会之中。他

每天每时得到的信息远远超过前几代青年人同样时间得到的信息的十几倍、几十倍。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思想活跃是当代青年最突出的优点,它总比保守僵化、沉默好,它也是社会时代赋予我们的优势。第二,主张求实,厌恶形式主义。这是当今青年的突出特色。求实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究实际效益,讲究实惠,这也是当今社会所赋予的。因为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正是各行各业在意识形态上集中力量批判“假”、“大”、“空”的时期,所以对形式主义很厌恶。第三,参与意识强。当今这一代在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中,比任何一代青年都有更强的积极性。例如,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不少人对亚运会的效果作出的估计不是很乐观,因为在开幕式日益临近的时候,运动会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未完成。再加上“八九风波”刚过不久,社会思想并不很稳定,整个国家的氛围还不太振奋。这种情况下,让大批的青年人去参加工作,确实是不好估价。但是,党和政府还是把这一任务大胆地、爽快地交给了青年。亚运会90%左右的工作其实是广大青年团员干的。结果如何呢?正如中央的一位领导所说的几句话那样:真没想到我们的青年热情那么高;真没想到我们的青年政策水平也是那么高;真没想到我们的啦啦队啦啦得那么好;真没想到我们的接待工作是那么的圆满;真没想到涌现出那么多志愿者……这么多的“想不到”,原因何在?一句话,发挥了青年的参与精神。第四,求新意识强。这种意识的产生也是改革开放赋予我们的。提起“当代”,我们都叫它“新时期”,因为它不断有新问题、新局面、新举措、新成果出现,需要人们对它们不断地进行新的概括。在这一时期成长的青年,求新意识当然很强,如果拿不出新内容、新招法,如果找不出新角度,青年是不欢迎的。传统的内容虽然还很有价值,但传统的方法是不受欢迎了。总之,当代青年的这四个优点是不容否定的,是值得去大加赞扬的。看不到这四个优点,就否定了当代的青年。

但是,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并不是很“清洁”的,是有过“一手

硬,一手软”时期的,是有过思想教育失误的时候的。这种复杂的环境,也给当代青年带来另外的一些负效应。第一,思想理论方面的困惑很深。理论滞后,理论与实践有较大的落差。前苏联和东欧巨变的冲击,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等等原因,导致青年的教育环境不太健康,困惑产生也是很自然的了。第二,实用主义思潮在青年中广为蔓延。讲实用并非不好,但信奉实用主义未必恰当。实用主义用来判定真理的标准有两条:对个人有利的即为正确;眼前看来对自己有用处的,也为正确。这种主义与我国的社会教育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只关心自己的得失,没有全局观念。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讲一下思想素质建设。

首先,建立辩证思维。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其中,辩证法的地位又尤为突出,它在当今社会的意义也十分重要。在学习西方与尊重民族传统的关系上,有不少青年人无视辩证法,走上极端的道路。一谈到西方,有人便认为中国处处比不上西方,甚至主张搞全盘西化。但一谈到反对西化,又认为中国如何如何的强大,如何如何的富强,看不到与西方的差距。在强调市场经济与必要的计划的关系时,也常走极端。过去强调计划性,就把市场看成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一旦强调市场,就又认为把计划丢得越远越好。但是,大家别忘了,我们民族也是一个富有辩证法的民族,“物极必反”、“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等辩证法思想几千年前就有了。因此,我们广大青年应该继承这一思想,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因为改革时期是会有变动的,但变动如果在走极端思想的指导下,很容易给我们国家带来损失。因此,加强辩证法教育是很重要的。

其次,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修养,这也属于世界观。列宁说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绝对前提就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观察。评价一个人、一件事都要遵循这一原则。那么提高个

人的历史唯物主义修养,首先要学习历史知识,同时要学习历史方法。江泽民总书记一上任,第一个突出的举措就是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并且是以个人名义写的,其内容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小學生,要让他们懂得历史,了解国情,热爱自己的祖国。江总书记的这一指示,不是无的放矢的,是对具体情况有所了解后所做出的正确决定。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1993年5月,杭州地区搞了一个“杭州小姐”评选大赛。当主持人向进入决赛的八位小姐问及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时,其中竟有七位茫然不知,另一位只说出了一个,并且还把“火药”说成了“火柴”。可悲、可叹呀!对历史的无知竟然达到这种程度!看来加强历史唯物主义修养,学习历史是势在必行了。

第三,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属于人生观方面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人生价值观的核心。现在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人生价值观的重心向自我倾斜。首先,自我利益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社会公德。邓小平同志就曾经对此做了批评,他说:“雷锋叔叔现在不在了,公共汽车上没有人让座了。”是呀,这么一点小事,就是一个社会风气的缩影呀!为了摆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要遵守一条规矩,它就是集体主义原则,它是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总原则,它包含三层意义:一要以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二要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时来发展个人利益;三在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维护集体利益。集体主义原则在当今社会并不过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在书的封皮上有一段李光耀的语录:“我们新加坡无论在过去的苦难时期,还是后来的繁荣时代,我们从来没有把个人利益摆在社会利益之上。这是因为,社会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我想这就是我们东方人从极大的苦难之中能够解放出来的价值观念。”

第四,正确对待金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作用现在是越来越大,但金钱能不能做人生价值观的核心?金钱在

经济领域里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步,它比人情说了算、比自己的权力说了算要进步。但是,金钱一旦越出经济轨道,介入它不该介入的社会其他领域,就会产生腐败或社会丑恶现象。因此,不能把它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要正确对待金钱。特别是青年,我认为受点穷,钱少点,吃点苦,有好处!只要精神不倒,将来社会会加倍地报偿你。相反,一旦吃点苦,精神就没有了,那真正成为“穷人”了。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杠杆,奴隶社会是以占有奴隶的多少来显示自己的价值;封建社会是以等级和特权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以金钱和商品的占有量来作为价值的标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只能看一个人的贡献大小来衡量他的价值。因此,正确对待金钱,多向别人贡献一点,是我们当代青年应该做到的。

最后,关于理想问题,它也是思想素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杨叔子校长不是常向同学们教导:“君子不器”吗?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高水平的人,不应该被当作别人的器皿。但是,现在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他就仅是一个“器”而已,像个茶壶、茶碗一样,像一个没有蜡烛的灯笼一样,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亮光。只有有了理想,他才可能有丰富的内涵。

总之,思想素质只有从这五个方面着手加以提高,才是一个全面的、成功的、跨世纪人才应该具备的思想素质。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整理人:潘玉良

【编者絮语】思想品德素质是最根本的素质。其实,思想品德素质,不仅仅是指政治素质,同时,也包括作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对民族和祖国的热爱、责任心、爱心、健全人格的养成等,做好人是做好事的前提和基础。当代青年在着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知识的同时,切不可忽视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素质。

陈建新 华南理工大学社科系主任 教授

21 世纪呼唤软科学人才

[在华南理工大学讲演]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21 世纪呼唤软科学人才”。讲三个问题：一、21 世纪是全面软化的时代；二、软科学的特点和功能；三、人才软化的途径。

一、21 世纪是全面软化的时代

80 年代以来，关于“软”的议论大家并不陌生。什么“软件”、“软环境”、“软着陆”等等，这些都是社会软化的表现。正像同志们所知道的，它们都是从计算机科学中的“软件”概念借用而来的。

其实，软的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或者说现实世界中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软硬两个方面、软硬两种因素。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来看，软与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现实的客观世界。

系统的要素、零部件是硬，它们之间的结构联系是软；生产过程中，厂房设备等是硬，工艺流程、工人的技术水平及相互协作是软；投资环境中，当地的经济基础、吸引资金的能力是“硬环境”，政策法规、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是“软环境”。

国民经济建设中，建设项目、生产产品是硬，经济体制是软；但

经济体制相对于政治体制是硬,政治体制是软;政治体制相对于党风、政风是硬,党风、政风是软。软与硬在这里相互转化。

谈恋爱,对象的长相、身材、衣着是硬,涵养、情趣、风度、气质是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西施”就更是软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了,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西施观”。

一般说来,硬的方面是构成事物的基础,是事物的物质承担者,是“实在的”、“有形的东西”;软的方面侧重于事物的属性、关系,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虚的”、“无形的”、“超然物外的”因素。在事物发展的初级阶段、低级阶段,人们往往只看到硬,不见软,见物质不见精神,见外形不见内涵,软因素的作用往往不受重视,被人忽视,甚至被鄙视。在我国的习惯用语中常常把“软”与不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指责在敌人面前经不住考验,当了叛徒是“软骨头”;评价消磨人们意志的黄色音乐是“软绵绵的”;形容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背后搞鬼为“软刀子杀人”。现实生活中,欺软怕硬就更是常事。

但是,随着事物向前发展,软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事物软的方面,除了与硬的方面协同互补外,还对硬的方面起协调、辅助、增益和导向作用。到了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软因素的作用超过硬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事物软化的必然性。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先是从硬件的换代开始,机械式、继电式、电子管式、晶体管式、集成电路式等等,然后软件的开发比硬件的换代就显得重要。发展到专家系统技术,就主要是程序和语言等软因素革命。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力中的软因素——科技、教育、管理等,相对于生产力中的硬因素机器工具等更为重要,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看重长相、身材等外在美,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谈恋爱;注重知识、修养、气质等内在美,才是一种高水平的谈

恋爱。

人类社会的软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软硬消长的过程。大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硬的方面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以前的技术革命都是由材料、能源等引起的。大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化的大生产突出了组织管理的重要性,社会活动与交往频繁,社会联系加强、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软因素的重要作用逐步显示出来。可以说,大工业社会使硬性社会达到了顶峰,同时社会的软化初露端倪。到了本世纪中叶,我们的社会受到软潮流的猛烈冲击,开始出现社会的软化。社会的软化通常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工业的发展为基础,以 1956 年作为人类社会软化的象征性里程碑。这是因为 1956 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从事物质生产的蓝领工人人数的情况,美国的工业社会开始让路给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

所以说,信息化是社会软化的第一个标志。材料、能源、信息是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材料、能源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的东西,信息则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的软的东西。社会软化的另外几个基本标志是非标准化、多样化和自组织化。

大工业社会把硬性社会发展到了最高峰,机器生产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标准化。各种生产产品、生产流程乃至社会都按一套严格划一的规范运行。整个社会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乐,分工明确,但又行动一致。首席小提琴、打击乐、铜管、木管、弦乐等在指挥的统一指挥下演奏。但在软化的社会里,生产主要是在信息流的作用下由工业机器人操作柔性生产系统进行,它使企业全部活动达到高效益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社会的进步把人推进到更富于创造性的劳动过程。这种生产方式反映到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电脑进入寻常百姓家,信息高速公路把地球村的每个角落紧密地连接起来,

足不出户,就能知道、处理、参与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这种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人类生活,自然将使人摆脱标准化的束缚,而表现为非标准化。社会的管理方式发生变化,改变了过去工业化社会依据标准的硬性管理,而代之以非标准化的“情感化软管理”。

非标准化也意味着多样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随之趋向多元。但是这种看起来非标准化、多样化的社会并非一盘散沙,支离破碎,它是通过高度的自组织化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技术越发达,生活越进步,就越需要组织与管理,对组织与管理的技术和技巧要求也越高,或者说,只有在一个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真正的组织与管理才成为可能。它经过特殊设计,综合利用人、规章制度、体制和技术诸因素,以使社会中各要素产生和谐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自组织过程。如果说,大工业社会是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的话,那么软化的社会里,各个部分各自是一曲优美的抒情小品、小夜曲、欢快的波尔卡,但它们汇集起来又成为一部和谐乐章,就像圣桑的“动物狂欢节”一样。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软化是随着社会生产,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和发展悄悄降临的。它虽不像卡拉 OK 那样,伴随着迪斯科的舞步,喧闹着来到世界;也不像航天飞机那样横空出世,气势磅礴令世人刮目相看,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普遍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的今天和明天。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它的到来,它都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对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以断言,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全面信息化的社会。也可以说,21 世纪是全面软化的时代。特别是 1993 年 9 月,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或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响应,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络运动蓬勃兴起,这无疑会加速和深化全球信息化的进程。这场跨越时空的全球信息化革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的冲击都要大得多。社会

经济形态将加快由物质型经济向信息型经济的转变;社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都将发生朝向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科研方式、教育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心任务是解放人的脑力,扩大人的智力,以便更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更好地开发利用材料和能源资源。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预言:21世纪,全球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信息网络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汇集到一起,多元互补,异彩纷呈,争奇斗妍.....

二、软科学的特点和功能

软化的社会无疑需要软化的科学技术为之服务,以往偏重研究硬的方面的科学技术已不适应了。软化的社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全球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信息和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必须对信息的本质、知识增长的规律以及人才问题进行研究;

在软化的社会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越来越突出,必须进一步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反思,研究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以及同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问题;

网络化的社会中,人类活动的系统性更加明显,系统联系加强,各种不同类型的软系统出现,必须对系统运动的特性、规律加以研究;

.....

软科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召唤下应运而生。软科学是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经济协调关系的,有关战略、政策、规划、决策和管理等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科学。它大多是综合性研究,其研究对象一般是较大型的、宏观的和跨学科研究系统。软科学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发达国家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才兴起,但其广泛的应用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已显示出辉煌的前景,可以套用一句广告语的格式说:软科学领导未来科学新潮流。

上述对软科学的概括,只是一种描述,不能算作定义,对于发展中的概念和理论,很难作出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开展软科学研究较早的美国相应有了“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日本人称之为“一门综合性科学技术”。我本人曾专门撰文对软科学的特点、分类和功能发表了看法。

严格说来,把软科学划归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都是不够准确、全面的。软科学研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中诸多学科交叉、汇融并联合成整体的科学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软科学是一个科学群。综观软科学发展的历史,不是某一门或某一类学科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也不是诸学科无规律聚集的过程,而是软科学群生成的过程。软科学研究以管理科学为母体,围绕管理决策这一核心研究对象,及时吸收和消化相邻学科和新学科的营养,移植和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孕育了同群学科中其他学科的生长。软科学研究的科学群特点,可以从对软科学群的分类中更清楚地看到。

元科学类软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学、技术学、系统学等学科,主要研究软科学群的基础理论问题。元乃“基始”之意。科学学、技术学,分别研究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影响。系统学本来是系统科学群的元学科,由于软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尤其注重研究科技、经济与社会等复杂大系统,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系统科学方法,软科学群本身也是有内部结构层次的学科体系。因此,系统学的研究,是研究软科学群的基础理论必不可少的。

管理决策类软科学研究。包括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政策科学、领导科学、行政科学和战略科学等,这是软科学群的主导学科。软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经此类学科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技术,也就是万里同志所说的:“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软科学研究的根本

目的,是为各级各类领导制定政策、组织管理、知人用人提供依据,因而,要花大力气搞好这类学科的建设 and 研究,突出开发研究,以适应改革形势需要。

咨询预测类软科学研究。包括信息学、咨询学、情报学、未来学和预测学等。任何一个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都离不开情报信息的咨询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软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正是在于通过情报信息的收集综合,能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和再现各种宏观和微观的过程,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代价,预测出事物的发展变化。

斡件类软科学研究。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学、行为科学、工效学、人才学、创造学等。“斡件”概念源自“斡旋”一词,国外又称“组织件”(Orgware),研究在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如何协调人、自然和社会内部及相互间关系,使有效管理和科学决策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工效学运用生理学、心理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知识,使人与机器及操作环节相互适应,创造舒适和安全的环境条件,以提高工效,它侧重研究人的自然本性方面。行为科学对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它侧重研究人的社会性一面。思想政治工作学、人才学和创造学研究知人用人,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问题。注重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是我国软科学研究的突出特点。

方法类软科学研究。包括系统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方法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方法论三大类。系统科学方法不是狭义的系统方法,它包括系统分析与综合、功能模拟、信息反馈、结构分析、网络分析以及非平衡自组织理论提供的诸种方法,它是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是由软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特点决定的。我国系统科学的旗手——钱学森在 90 年代以来极力倡导的研究复杂系统的系统集成方法是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最有效的方法。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建立自然科学理论,创造技术成果的途

径和手段,其中很多方法可为软科学研究借鉴。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方法虽不甚完善,其中投入产出分析、可行性论证、价值工程和反求工程等,已在软科学研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软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其科学群的特点更加突出。软科学研究成为迄今为止容纳学科门类最多,跨越领域最广的一个科学群,它的学科队伍还会继续壮大。现阶段的软科学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重心的偏移,由管理偏向于决策,由对生产单位组织的研究偏向对整个“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二是研究方法“软”“硬”兼施。软科学研究方法引进了硬的技术手段——电子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与 Internet 网联接,加强网上运作,软科学研究就更是如虎添翼、如鱼得水、效力大增。这是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突出表现。目前,软科学研究最活跃的三大领域——管理、决策、发展战略研究都在朝着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环节,与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借助信息高速公路,采用系统工程等新的科学方法的全自动化、高智能化方向发展。总之,软科学研究更具系统观念,软科学研究的科学群特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软科学研究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群,还在于它的功能必须由科学群实现。软科学研究也兼具自然科学认识自然,社会科学变革社会,工程技术调控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大跨度综合功能,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有科学认识功能;(2)作为应用性的社会技术,有科学管理和决策功能;(3)作为思想库,有科学咨询的功能;(4)作为研究未来的理论和方法,有科学预测功能。显然,这样多方面的系统性功能,绝非某一门或某一类学科所能胜任,只有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学科的软科学群才能具备。

三、人才软化的途径

一谈到软科学研究和软科学人才,总是更多地谈到美国的兰

德公司、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其实,中国的软科学研究历史最为悠长。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活跃着一群常在君主左右出谋划策,协助处理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务,主要靠出售自身的智慧以求得君主和社会的接受的文化人,即所谓军师、谋士、策士等,如诸葛亮、苏秦、张仪、张良等,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的软科学人才。综观中国历史,在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和军事斗争异常紧张激烈的时代,无论是战国争雄、楚汉逐鹿、三国鼎立、元末纷争,都有一批活跃于风口浪尖上的谋士人物。他们或是驰才呈辩于唇枪舌剑的外交战场,或是刻骨铭心运计谋于帷幄之中,无不殚精竭虑,竭尽腹中之谋,献出全身之智。一部《孙子兵法》堪称中国古代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软科学学术专著,一部《三国演义》更是记载着大批杰出软科学人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史诗。令人悲叹的是,中国古代的谋士大都辉煌一时,最终命运悲惨,难以逃脱“敌国灭,谋士亡”的结局。这恐怕是因为硬性的社会难以容纳软性的人才的缘故吧。

然而,历史毕竟向前进步了。21 世纪的社会开始走向全面软化,软化的社会呼唤软化的人才。在座的都是学理工科的,你们之中不乏擅长在某个领域里攻关的专家,或者说像法拉第、爱迪生式的人才、将才。但是 21 世纪更需要的是玻尔、奥本海默式的科学帅才。他们是大科学的战略家和组织家,通晓科学技术总体发展的规律,懂得人才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合理地组织安排科学工程的各个环节。他们是软硬兼备的人才。

软科学人才的群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智囊团、思想库,强调群体的整体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具有合理的知识和智能结构。就知识结构来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各占适当的比例。美国兰德公司是世界著名的智囊团。其知识构成为:工程技术人员 28%,物理学 12%,数学 14%,计划统计 9%,经济学 15%,社会学 6%,运筹学 4%,其他 12%;就能力结构来看,注重理论研

究与实际操作、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以及高、中、初级科技人员的优化配置。此外,在年龄结构、性格结构等诸方面都做到合理配置,才有利于智囊团整体作用的发挥。可以说,就人才群体来说,对软科学人才的整体协同互补效应比对硬科学人才的要求要强得多。

对软科学人才个体的要求,也不同于传统的硬科学人才。有人从对动物的习性分析,研究了软科学人才的性格素质。猪,好吃懒做,不适宜于做软科学人才;狗,在主人面前奴颜卑膝,仗势欺人,也不适宜做软科学人才;驴,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未见到外面的世界以前,夜郎自大,一旦见到外面的世界又“黔驴技穷”,更不适宜做软科学人才;牛,专业性强,吃苦耐劳,刻苦精神,实实在在,是很好的硬科学人才。唯有马,既有较强的综合性,能耕种、拉车,还能演马戏,还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所以,从性格素质来看,马是最适宜从事软科学研究工作的。软科学人才也就是真正的“千里马”。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和肤浅,但还是说明了一定的道理。

软科学人才的知识结构,就是通常所说的“通才”、“杂家”。但这种“通”和“杂”并非“莠莠并存”,没有主次之分。对于人才知识结构类型研究有一种“图钉型”知识结构,我认为是软科学人才的最佳知识结构类型。图钉尾部表明软科学人才应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图钉的针部表明应具有某一方面过硬的专业知识,图钉的针尖表明对某些问题有特别的长处和造诣,具有相当的钻劲和韧性。国外有些专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对一个优秀科技人员的要求,第一要解决“会不会做”的问题,第二要解决“值不值得做”的问题,第三要解决“可不可以做”的问题,第四要解决“应不应该做”的问题。第一条主要是能力问题,后面三条都涉及到效益和价值的评价问题,已

经包含了对人才的软化的要求。

软科学人才的品德修养,重在求实。软科学人才无疑要有超凡的胆略和积极进取的心理素质,这些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古今中外,软科学人才较多地要为君主或领导出谋划策,但软科学人才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不是秘书班子,更不是奴才。因而,要保持软科学人才在学术上和人格上的独立性。只有保证这种独立性,才能真正做到求实。近年来,知识分子“经商”似乎是一种时髦,有人把这种现象也看作是人才软化的表现。我认为既已“经商”,就失去了学者的特质,更谈不上什么“软科学人才”。但软科学人才又必须广泛地接触社会,要走出书斋和象牙之塔,深入地参与社会。所以,我很欣赏这样几句话:为上不唯上,学洋不崇洋,参政不从政,促商不经商。这样才能保持软科学人才的人格和特质。此外,对于软科学人才能力方面的要求,信息灵通,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尤为重要。

前面我们从各个方面谈到了软科学人才的特点。那么如何培养软科学人才,或者说如何成长为软科学人才呢?首先,我要表明一个观点,真正的软科学人才,一个优秀的软科学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别看现在高等院校也已设置了一些相应的软科学专业,但那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未必就能成为真正的软科学人才。我这一节的题目讲的是“人才软化的途径”,即已经成了“人才”,再“软化”成为软科学人才。既然业已成才,然后再到社会实践中锻炼,软化成软科学人才,可以说途径很多,条条道路软化成才。我这里主要从知识的软化角度讲两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由“硬”而软。先掌握一门或多门硬科学的专业知识,或为某个领域的专家,然后再软化。如我国著名的软科学专家王慧炯先生,原来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后来在工程实践中转而研究系统工程和系统工程方法论,并转而主要从事社会经济系统的软科学研究工作,后来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长,主持完成了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软科学项目“2000年的中

国”研究。像钱学森、宋健等大师,更是在已经成为蜚声中外的大学科学家后,又成为同样享誉海内外的软科学大师的。由硬而软,具有较强的韧性,较高的效能性,避免“清谈”,“坐而论道”,软科学也有硬功夫。

第二条途径是由“博”而软。努力扩展知识视野,这样成长起来的软科学人才,具有较好的延展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但在追求广博的知识同时,首先要学好哲学和数学这两门重要的基础知识。哲学和数学可以说是两门知识的晶核,在其周围生长起来的丰富的知识,才能很好地融会贯通,用于分析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问题。搞理工科的同志,往往鄙视哲学的作用,这是很肤浅的,也是很可悲的。从事任何工作,如果不愿只是做一个平庸的工匠,而想有所创造、有所建树,不具备良好的哲学素质是不行的。一位哲人说得好,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哲学家不会越来越多,但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的人会越来越多。

最后,我想借用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来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束语: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也产生了巨人——在工作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年轻的朋友们,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奋斗,你们都将成为21世纪的卓越的人才,成为未来时代的巨人。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顺着演讲稿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说,知识是“硬”的,素质是“软”的。“硬”与“软”相互支撑,也可相互转化。“硬”是有形的,“软”是无形的。在人才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软”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决定着“硬”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向。作为面向21世纪的人才,我们当然要注重“硬”的一面,但更要注重“软”的一面。

林权圣 中国管理研究院武汉分院教授

白领之路从今日开始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大家晚上好！首先，我声明一点，我只是把我工作 40 年的经验提供给大家作个参考。

今天我讲的是“白领之路”，但我想提醒大家，不要一开始就想着马上走上“白领之路”，而要学会放下身段，否则，“白领”是穿上了，身段放不下去，你的工作却没有了。我感到各位同学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各种的舆论、各种政策告诉我们：计划经济是一种生产导向，市场经济是一种顾客导向。大家都喜欢去“麦当劳”，不是因为那里面东西更好吃，而是坐在里面感觉不同，情调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开始就是大家观念变革的新开始，与之相适应，做事情时，也不要凭着经验去办事，而是凭着观念去办事。

走上“白领之路”，亦即迈入“白领之路”，首先要有创造力。例如：我在 16 岁时，初中刚毕业，那时我在夜间部读书，白天在一家洗衣店干活。每天把顾客送来的衣服钉一块牌子，然后再把它送到工厂去，洗好了再从工厂提回来。不久，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件事情——顾客越来越少了，这会影影响我的收入。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跟老板讲，为了把顾客固定下来，我把洗完的衣服送到各自家里去，顺便把下下次要洗的衣服统统拿来。老板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这样干了，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经过了

三个月以后，效果相当不错，但我却对老板说，我不干了。老板就很着急，整天睡不好觉，因为这些衣服是从哪里收来的，他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就是创造力。所以，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个满足需要的世界，而是一个创造需要的世界。再如，武汉的汉阳商场大家可能很少去，因为那里面跟你的调调不相符。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正在接管这个商场，几个月后你们就应该去了，因为我们要把一个现代化的百货公司进行商品整合，改变过去商品组合单一所造成顾客购物的种种不方便。由此可以得出：未来就是要创造。大家毕业以后，不要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也不要说，我要根据兴趣选择工作，不符合自己的兴趣就不去干。假如你的兴趣是画画，那么兴趣应把它当作副业，除非你有天才，工作是不应由此而改变的。选择的是什么？也不是大企业，大企业分工越细，你提升也就越难。例如，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幢大楼建好了，经打听，才知道准备租给某些银行办公使用。我当时觉得很可惜，因为它地处繁华地段，于是我就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上写：东区某大楼即将完工，征求合作对象，于是很多人来了，我就询问他们这座大楼应该做什么使用，把他们所有计划写出来变成了我的计划。然后，我就去找那个老板，告诉他，这个地方应该干什么用。当他问到谁来投资时，我就把那些人名单拿出，让他知道有这么多人愿意合作。三天后，他就对我说，这些计划他统统都做了，并让那些人当经理，当问及我时，他说：“你当然是副总经理啦！”

关于创造力，还举一个例子。19岁时，我要考大学的前几个月，我在一家电影公司里工作，我的工作管理道具。有次拍的是警匪片，需要我去找20个警察做“道具”。于是我就到警察局去找，但警察借口没时间推辞，并且连制服也借不出。这可急坏了我，没有警察那就拍不成警匪枪战片了！那怎么办呢？我又想了个办法——找警察学校。我告诉他们，为了报道你们警察学校训练有素，在电影里将介绍你们的成绩，宣传你们的事迹。学

校校长一听，二话没说，立即拍板同意，并且还让学生自己带饭盒，车费自理，听从导演安排。这一点就证明，当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钻牛角尖，天下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出的点子。

迈入“白领之路”，还要有反应力。人的反应，要看具体场合。如果老板在开会，你却说：“对不起，BP机叫我，我要去打电话。”这种反应就糟糕了。记得我在一家百货公司当总经理时，董事长夫人拿来一件貂皮大衣，价格：100万，硬要放在自动扶梯前面，穿在模特身上。这时，董事长来了，说这样放不对，要换个地方放，怎么办？于是我就说，把它拿走。放在这儿，顾客会把烟灰弹在上面的，那么100万就“报销”了。这样按我的吩咐，那件衣服被放在大橱窗里，明码标价：Only one: 101万。不久便被顾客买去了。所以，同学们以后如果在一些企业里工作，特别是些外资企业，不要总想外资企业薪水高，发展空间大，而要想到它可以增强你的事业感，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到外资企业工作，当老板问你要多少薪水时，你不要回答：随便，等等，而是说：我先做一个月给你看。不要先想别人能给你什么，而应想到你能给别人什么，这才重要。

还有一次，我到一家公司应聘。这里讲一些应聘的技巧。如果公司登报，要把你的资料寄到哪里哪里，最好能自己送去。拿破仑说过：“比别人早到五分钟就好。”履历表要设计好，不要按它的规定去写，要把照片放在中间，把你的名字等用潇洒的字迹一一写清楚，若没法亲自送到就用挂号信寄去，而且要直接寄给董事长，董事长一收到，找到人事科，让人事科拿去。人事科一看，这可不得了，是董事长拿来的，肯定另眼相看。我那次就是这样，口试的时候，让我11点去，我9点就到了。我就坐在外面，等他们每一个人出来问他们被问的题目，心里就有了底。等我一进去，我就说：“董事长，你要问我的问题我都知道，你不要问了，现在你给我五分钟，让我讲我为什么到你公司来。你

给我这个机会，你绝对不会失望的。”另外，应聘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服装、仪表，这一点千万要注意。因此，反应必须要快，要懂得“消遣自己，赞美别人”。掌握这几个字，你将会在团体中受到欢迎。

上面我讲到创造力和反应力，那么市场经济以后整个市场的导向到底跟你的工作有何关系呢？我先从武汉市分析。武汉地区可以说是一个商贸中心，虽然只有河运而缺少海运，但是这并不能表示它不能发展。武汉现在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沿海地区的原因，不是在它的都市的形态，不是在它的硬件软件不够，而是观念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假若你跟某个人说，××商店的东西太贵了。但还是会有人去买，因为武汉每月收入超过一万元的有一万人。没有这些人，KTV包房、卡拉OK会被迫关掉，但这并不表示贫富问题，而只是需求的问题。所以未来是创造需要去代替满足需要。假如说，20世纪是一个科技发达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生活大改善、大变革的世纪，因为科技发展到某一程度，人的需求就会改变。在国外，譬如说，我住在一家五星级饭店，我可以在这家饭店的就餐卡上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应有尽有。但在武汉早上就是热干面，由不得自己去选择。这里就显示：你让顾客来，进入“卖方的市场”，事实上，未来将是一个“买方的市场”，这就不同了。所以武汉并不是落后，而是观念还没有跟上来，假若做一些调整，武汉一定会繁荣起来，这就决定于你们以后的工作了。

“白领之路”的开始，还应具备组织能力。比方说，你是在一个营业部里面担任组织工作，上司让你写一份营业计划，如果你想找经销商、找代理商、找经销店再交给顾客，即先找到市场的道路，再找到市场的据点，最后转到消费者，那么你这种思维模式注定你会失败。你必须反过来从消费者开始，不要首先就想怎样推销自己的产品，而要想到怎样让消费者喜欢上我的产品。再比如，让你写一份人事管理计划，如果你是按照把它分为新进

人员的应征，新进人员的口试、培训、升迁……等几项的思路，那么你也不会成功，你要首先研究人的因素是什么。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在报纸上登载招考助理，资料看过后，通知他们 10 点在会议室集合。大概有 40 几个人安排是 10 点报到，十点半口试。我当时就和这 40 多个人坐在一起，和他们聊天。其中有一个说，他明年托福要考上了，就到外国去等等。聊完之后，要口试了，服务员小姐叫了一声一号。我就进去了。过两分钟，二号进来，他一看见我，差点没昏倒：原来刚才和他们聊天的是口试官。我就问他话，问完后又让他坐在我的位置上对第三号进行口试。如果他连我问的什么问题都记不住，我也不会要他，况且，要应征 40 多人，我一个人主考，那还受得了。

因此，办事还要讲究个方法。举个例子，1966 年我在一家公司经营超级市场。当时，我发现面包生意很好，但老板就是不肯采纳我的意见。为何我坚持做面包生意呢？因为超级市场的利润很低，假若面包自己做，利润就会提高。一个超级市场如果拥有自己品牌的产品越多，那么它的利润就越高。看来我的建议不会改变老板的态度。一天，来了一位美国人，在超级市场看了以后，说要见老板，对老板说：超级市场里面的一些缺点、不足。老板听了后，立即召开经理大会，研究具体方案，并对我说：“面包的事情赶快做！”生意兴隆之后，我找到老板要他给我 2000 元钱，并对他说：“那美国人是我在师范大学中文系找来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抓住了老板相信外国人却不相信中国人的特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人，不能拐弯抹角，做事情有时是需要拐弯抹角的，要想办法去办通。

人只能把工作当作乐趣，在单位里、公司里，不要去争功劳，而要去争工作做。我在亚洲信托工作时，它开了一家环亚大饭店，五星级的。开始时聘请了一位美国人当总经理。五星级饭店有个规定：大楼中间那一层是总经理的办公室，还包括总经理的住室，有 200 平方米的房间。但董事长不肯，因为他自己还没

住这么好的房子。于是便找到了我，我说我不要这么大的办公室，他又问我要多少薪水，我说不谈，职务也不谈，先做 20 天再说。20 天后我找到他，我说，是他给我聘书还是我给他辞职书，他表示给我聘书，我又问他，让他看我的能力，是一个经理的能力，两个经理的能力，还是三个经理的能力，他回答说三个经理的能力，我紧接着让他给我三个人的薪水。

武汉的服务业有待提高，所以前景很好。如果同学们以后对服务业有兴趣，那么你们要注意不是先投入资金，而是投入你的智慧，投入你对市场的分析。不要想我开这店一天可以做多少钱的生意，我的成本是多少，那么我一天的利润又是多少，这样规划是会失败的。而应该想到顾客对象，想到顾客对象在哪里，有多少，需要什么，最后想到你能给顾客什么。21 世纪，生活、事业将会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它需要你有文化，懂经济，懂工商。在台湾，有四个年轻人，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经过旧货市场看了看，回来后，找到我。我根据他们的见闻，让他们每人办了一个“瓶瓶罐罐”店，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旧瓶子、破瓶子统统集中在店子里面，装上泥巴，种上花，结果很多年轻人购买回去，放在办公桌上、家里，特别有情调。到现在，他们只好去“制造”旧瓶子，因为旧瓶子都差不多被收完了。

告诉各位，在任何时候，等待就不如去创造，机会不一定会老跟着你，运气也不一定好，机会的含义就是机运到来的时候你要会用。假如给你一个总经理，你说你不能当，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这个总经理的位置不能给你。那么怎样才能拥有能力呢？我认为就是学经验，你若准备走上服务业，你就可以同服务业的人聊天、接触，这样就会学到许多新的东西。不能认为与你无关的就不关心，而要自我去培养能力。现在要对你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下调整，外面的工作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要有一种危机意识，时时鞭策自己进步。在工作上要注意防止一些陷

阱。目前，开放得很快，智慧型的犯罪也越来越厉害。传销也好、直销也罢，都不是一种正常手段，不能看作一种事业。大家要做的是一种投资性公司而不是投机性公司。30岁以前付出多少将来才能得到多少，30岁以前应该是学一些做人的方法，而不是先去学要赚多少钱，假如你用这种心态，贪心之下必有所失。

我想今天不是演讲，也不是讨论，今天只是把我个人的一些点点滴滴想法告诉各位。好了，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潘玉良

【编者絮语】表面上看来，这篇演讲谈了“白领之路”上很多细节问题。然而，往往正是这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之处，也正是容易出新、出创造、以至于胜人一筹之处。人们常说，于细微之处见精神。能否处理好细微之处，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之一。

传统与现代

季羨林 北京大学教授

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在广州讲演]

“希腊人有一只眼睛，中国人有两只眼睛”

现在是世纪末，再过几年就进入新的世纪，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应考虑何去何从。数百年来，主导全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今天我们很多的光辉成就的确是由于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西方文化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几乎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个“但是”是个很大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末，很多问题就发生了。首先一个是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国、包括联合国都注意到环境问题，环境、大气污染、臭氧层的破坏、淡水资源匮乏、生态平衡的破坏……举不胜举，这可说明，西方文化发展到了今天，暴露出很多弊端——这些弊端引起了各国政府、人民的注意，但注意得还很不够。如果人类克服不了这些弊端，人类的生存将受到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最根本的要从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去认识。东方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这个区别早就有人发现。公元7世纪在当时的伊朗、阿拉伯国家流行几句话，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只有中国和希腊有智慧，而中国和希腊的区别，他们很形象地讲，希腊只有理论而没有技术，中国是只有技术没有理论。此话并不尽然，中国技术有八大发明，希腊尽管出了那么多大哲学家、文学家，但科学技术发明一件也没有。说中国没有理论，不能同意，就拿先秦诸子——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等来说，能说没有理论吗？不管怎么说，后来，他们还是得出个结论，认为在全世界民族中间，希腊人有一只眼睛，中国人有两只眼睛，其他民族全是瞎子。这个比喻很形象。说明当时在伊朗，在阿拉伯，人们感觉到东方与西方的不一样。

西方文化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三段论法，对一切事物重研究分析，西方沿袭至今。现在哲学界有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就是物质能不能永远分下去，是否永远可以分析。有两派意见，一是认为物质永远可以分析；另一种意见认为物质可分，但有一界限，现在的界限已经到了，到了原子对撞机都不能分的界限。西方什么都分析，要一清二楚。什么叫综合，东方的综合，可用一现成的词——“天人合一”来概括。“天人合一”实际是讲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到世上来成为人类，这人的一生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大自然给的；二是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要解决人的内心情感、思想矛盾的冲突或是统一问题。这里只讲第一个问题。对待自然，东西方文化存在不同看法。

用东方思想纠正西方思想

西方文化体现的是征服自然。征服，就是把大自然作为敌我

关系，结果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大自然不会说话，但会报复和惩罚。如现在广州天气几十年来没有这么暖过，北京也变暖，全世界都变暖，为什么？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天气变暖无疑与欧洲工业发展分不开，所有弊端来自于欧洲对自然的征服。东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是一体，表现这个思想最清楚的是宋代的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其实不限于张载，诸子百家、汉代的董仲舒等对这一观点都有不同的表述。我们中国人认为大自然与人不是敌我关系，而是一家人。如果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工业革命时为世界人民所接受，那么今天，我们一方面可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必需的幸福，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很多弊端。

中国建设晚了一点，也有它的好处。早期盖工厂不讲究废水处理，废水往河里海里流。据《参考消息》报道，渤海、黄海现在污染得很严重。如制止不了，海里的生物也不能存在，人类自然受到威胁。现在北京、广州建工厂，首先考虑到污水怎么处理，这是晚走一步的好处。20 世纪末，我们人类应该总结一下经验。过去 100 年，人类、中国所走过的路，哪是正确的？哪是不正确的？如果今天的弊端我们还视而不见，这就危险了。就目前而言，各国对环境保护很不够。应该根据东方的思想来纠正西方的思想，不是把西方的打倒。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文化今天出了毛病而电灯、电话都不要了。我们是要继承西方创造的非常光辉的、给人类带来很大福利的文化，改正其缺点，向前发展。有两句话很辩证，也很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明天底下万事万物，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21 世纪，人类要是聪明的话，应该用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扫除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否则，人类就非常危险。应该宣传、发展我们“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的成果，一方面吸取东方文化的精华，形成一个新的文化。1996 年 11 月 25 日，《光明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会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吗》的文章值得看

看。作者根据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的观点，即世界科学中心曾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一个世纪变一变的“汤浅现象”，推测 21 世纪科学技术中心将移到中国。以上变动的根据和条件是：一、文化震荡；二、社会的变革；三、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新学科群的崛起；五、科学家的集体流动。

中国得了“失语症吗？”

下面，我想谈一谈中国语言的模糊性问题。鲁迅、胡适之都讲过这一问题。有人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语言模糊，说明思想模糊。实际上，中国语言是否模糊？如果是，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模糊不能不承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提出“境界”说，提出诗中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王国维评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我看这不能叫“无我之境”，如果翻译成外文，必定要有个主语，那么“谁”在采菊，“谁”在悠然见南山？是“我”，中国语言可以省略掉主语，王国维应该纠正一下，不是“无”我，而是“忘我之境”。不是没有，还在，忘掉了。现在研究汉语语法是根据英文的那套办法来研究的，驴头不对马嘴。因为汉语与英语截然不同，汉语本身不能变化，英文变化多端。元代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可以找出两个动词，“下”与“在”。这种情况在西方很难想象。曾有一位美国诗人受中国影响用中文办法作英语诗，于是光讲名词不讲动词，他的诗在美国流行了一阵，后来不行了。因为我们这种没有动词的语言是模糊的。是好是坏可以判断。当今美学著述不少，分析越来越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说，谁也不服谁，越分析越不清楚。我们对“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句，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谁都感觉得到一个人离乡背井，深秋时节，思乡情浓的意

境，充分自由，模糊，如果清清楚楚，像西方办法，那就限制了我们的幻想和享受。“枯藤、老树、昏鸦”一样，都是一个个东西，随你罢，极大自由，极大的美感享受。模糊不是坏东西。

现在美国有两门新学科，一是数学的模糊学，一是混沌学，兴起于七八十年代。后来产生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模糊心理学等。在我国，有家工厂利用模糊理论制定生产计划，制造冰箱。混沌学是20世纪人类创造的第三个伟大科学，第一个是相对论，第二个是量子论，量子力学，第三个是混沌论，比模糊还模糊。北京发生事情影响纽约，这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吻合。“天人合一”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普遍联系，整体概念。从人体而言，西方把人脑袋算一部分，中间分一部分，下面一部分。中国医学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大宇宙、小宇宙。西方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的头痛可以治脚，因为脚底有穴位通头部经络，这就是中国的综合思想，一个人作一个整体。混沌就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西方有识之士感到他们的思想有问题，在无意识之间向东方思想靠拢。有了整体概念，有了普遍联系，这是好现象。语言学像当今中国这样研究，只有死路一条，应改弦更张，要用比较综合的、模糊的方式去研究，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清清楚楚的。又如历史研究，应该说有成绩，不能否定，但对各历史分期的研究一直吵到今天，没有结论，怎样分？历史学家要是懂一点模糊理论就不至于争吵了。文艺理论的争吵也很厉害，有多少美学家就有多少个流派，每人一派。中国研究文艺理论，不能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当今我们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语言学一样。全世界看来，语言理论不知出了多少？中间没有一个是中国的，大家感到很憋气。文艺理论也一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月”，西方许多文艺理论稍纵即逝，千奇百怪，非常有天才的民族，为什么到了今天，语言、文艺理论都没有我们的理论。有人发表文章说，中国得了失语症。西方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一下到今天，文艺理论借

助分析形成许多概念，越说越糊涂。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过去中国也不是没有文艺理论，有的。如杜甫评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诗飘逸豪放。评杜甫诗也有沉郁顿挫之说，有人说这个不科学，失掉西方术语。实际上，西方也失语。开个玩笑，如果有人把“池塘生春草”翻译成英文，会变得很荒唐，但这在中国是千古名句，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应该给一个博士学位。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年大彻大悟，感觉到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艺理论没有失语，清新俊逸，飘逸豪放，神韵，境界，这些都是我们的术语，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评，还有《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等，希望搞文科的同志多看几遍，非常有意思，特别里面论到人物用的比喻。如论一个人如“泰山之松”，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为什么好，好在何处，一千多年来，评论有八个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精妙之极。我们将来真正想成为一个体系，发出我们的声音，文字、语言理论研究，必须改弦更张，不能让西方人牵着鼻子走。

原载 1996 年 12 月 8 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文化时报》旬刊 录音整理：周建平

【编者絮语】关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近两个世纪的热门话题。在 20 世纪末，这一话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大师季羨林先生的这篇演讲站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世界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立足本民族文化，整合东西方文化，是我国现代化历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杨振宁先生说过，他是得到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好处。其实，无任是人文社科领域还是科技领域，现代学术大师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学贯中西，在他们身上，中西文化、人文与科技，得到了很好的整合。可见，人才的培养也少不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杜维明 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哲学历史学教授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在华中理工大学的讲台上，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的问题。

人文精神、人文传统、人文关怀、人文主义及人道主义等都是近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知识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属于我所研究的范围。特别是对于文化中国，近年来研究得比较多一些。

所谓文化中国，不仅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等第一个意义世界，也要包括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华人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同时，文化中国还包括一批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说文化是要通过创造、自觉奋斗方能获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资源，那么一个外国人士是可以对某国的一些现象通过长期努力而获得一些该国学者所难以获得的资源。如研究法国大革命，最突出的学者当中就有英国人；研究美国种族冲突，特别突出的是一位瑞典学者；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先生。因此，外国的一些人士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形成与中国血肉相联的关系。他们也因此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看，人文学有特殊意义。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在广义的文化中国，面对 21 世纪，精神资源比较薄弱，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而且价值的领域比较狭小，也是在知识分子群。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长期考虑的一个问题。在现阶段，世界上有两股大潮流，这两股大潮流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都会遇到。它们互相冲突矛盾，但又同时并存：一股是全球化潮流——我们通过信息、金融、旅游、环保、甚至疾病等，都可以了解到，全球化趋势非常明显；另一股潮流是本土化、地域化潮流——以前从事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并未注意到这一点，而现在却对此越来越重视。那么什么叫本土化、地域化呢？具体分析，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问题：如族群、语言、性别、地域、阶级（贫富不均）、年龄和宗教。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不同的种族对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发生种族冲突的问题。美国若不能处理好种族关系问题，特别是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问题，美国将来能否成为 United States（联合政府），就可能成为问题。美国有学者认为，若不能处理好种族问题，就会导致美国的分裂。语言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在印度比较突出。在印度，有 16 种政府规定的合法语言。在加拿大，法语地区和英语地区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导致矛盾冲突。在比利时，两种语言的冲突，甚至导致了欧洲著名的卢旺（音）大学一分为二，两校互不往来。性别的问题就是女性主义问题，这是一股重要的潮流。在美国，近二三十年来，各种人际关系、权力运作关系、职业分工关系，甚至一般的生活家庭关系，都因为女性主义而发生冲突。这个重组过程对社会会带来许多新的可能性，也会提出许多新的挑战。另外，地域问题常和主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在夏威夷，美国印第安人就有主权的斗争。阶级问题就是南北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以前认为南北问题是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现在则发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也存在这一问题。年

龄，以前认为 30 年为一代，现在看来，每隔十年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如大学一年级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就差异很大，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对于宗教，以前我们担心宗教之间的冲突，而现在所担心的却往往是同一宗教内部之间的冲突。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化潮流使得世界越来越小，大家休戚相关，希望出现新的整合。而本土化根源性的突出使得世界虽然有地球村的说法，而这地球显现的并不完全是整合和谐，还有矛盾和冲突、斗争乃至歧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现象，面对 21 世纪，任何现代社会必须要掌握很多不同的资源，才能面对这样的挑战。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只走全球化，而把根源性的问题取消；也不是回到根源性的原初性的联系而不顾及全球化。这两方面必须兼顾。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把这两方面兼顾起来的困难性。假如我们要现代化、全球化，把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一下子抛弃，进入一个国际社会，这是空想、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说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因为文化中国的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深受一种特殊心态的影响，我叫做“启蒙心态”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讲启蒙心态与近十年来的辩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也不是指一种历史现象，即在西方 17、18 世纪出现的“启蒙运动”，同时与西方许多学者，如哈贝马斯提出的“启蒙计划”也不一样。这个“启蒙计划”认为，“启蒙运动”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许多价值至今尚未全面落实。我讲的跟这些观点也没有多少关系。我所讲的是指一种心态、一种心灵结构、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心态，不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接受。这种心态有几个特别的价值动向：例如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面对世界，这是从西方启蒙思想发展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渊源，即西方的启蒙心态反对神权，要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冲突的，所以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和西方启蒙运动紧密联系的。再例如，

它突出工具理性，其理性是和工具性连在一起的。所有的事情有没有价值，就看它有没有用，而有没有用，往往是和富、强联系在一起的。若不能使我们富、使我们强，它就是没有用的，从工具理性来看，它就没有价值。因此，它并不注重目的理性。另外，它还是强烈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它们基本上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竞争的模式下来了解世界，这种心态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潮流。当然，西方启蒙运动还有其他的潮流。如西方启蒙运动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法国的启蒙，一种是英国的启蒙。法国的启蒙突出大革命，反对神学，同时特别突出反传统，要重新再造世界；英国的启蒙突出经验主义、渐进主义、怀疑主义，对宗教问题不太重视。法国的启蒙和英国的启蒙是不同的。中国从五四以来所接受的启蒙基本上是法国模式。那为什么说有这些属性的启蒙心态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有关系呢？这正是我所要论证的问题。因为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反宗教的，征服自然，突出人类中心主义。物质性的东西比精神性东西重要，实用性东西比无用的东西重要。科学——不是科学家所研究的科学，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我称之为科学主义——的力量十分突出，进而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这类意识形态使很多应该在现代文明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精神资源被边缘化，甚至被削减。面对族群、语言、性别、地域、阶级、年龄、宗教等各种不同的挑战，甚至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把许多其他资源削减，只突出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及实用主义，这是不够的。这种人文精神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创造了非常多的价值领域。现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的价值领域都是这种力量所开拓出来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企业组织，法律、医疗组织等，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人的尊严等价值观，也是由这种力量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么重要的人文精神，我们学习都来不及，

为什么还要说这种心态反而对文化中国的文化精神资源有边缘化的负面作用呢？

要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说明，面对 21 世纪的现代社会，我们面临下面的几种考验：其一，除了经济资本外，我们必须培养社会资本。什么叫社会资本？我理解的社会资本有特别含义，即通过沟通理性，通过谈天、讨论、辩论而发展出来的虽看不见但明显感觉得到的一种重要资源。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在任何一个大学，假如系与系、院与院之间，除专业外，没有任何有关理想、价值等文化价值方面的沟通，这个学校肯定是一个不很活跃的学校。美国很多大学，之所以在学术上很有发展动力，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讲座、讨论和辩论，有很多的横向沟通。这些沟通可能与你的专业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它本身就不是为了实用，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狭隘的技能，并不是为你将来谋取职业而提供某种信息，而是为了培养人。如果沟通不够，就会破坏社会资本。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专门研究意大利社会。他发现，意大利社会民主化程度不一，有好有坏。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水平，或其他的什么技能，而与社会资源的状况有关系。在意大利，他发现，男声合唱团多的地方，社会资源也多，反之则较少。说起来好笑，实际上却很有意思。参加合唱团的唯一条件是要嗓音好，只要你声音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穷人，富人，工人，农民，道德高尚的人，还是道德低下的人，都可以参加。合唱团每周活动两次，除唱歌外，自然会产生许多横向联系，它使有不同政治观点、道德理念的人得以沟通。在印度，有个叫“格拉格”（音）的地方，近二三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种族冲突（大家知道，印度的种族冲突是很严重的）。其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与职业分布与其他地方也一样，但为何这个地方不出现种族冲突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沟通。不同宗教的领袖每周都要聚集在一起喝茶、谈天，不为其他目的，就是单纯的喝茶、谈天，各界人士都可以参加类似

活动，而且社会鼓励大家参与谈话，沟通。这样，即使出现暴力，他们也很容易化解。这就是社会资本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所积累的这种社会资本到底够不够？或者是不是因为商业大潮的发展，使原本很雄厚的社会资本变得薄弱了呢？

其二，在发展科技能力时，还必须发展文化能力。文化能力的发展不能通过工具理性，因为工具理性让你的手段和目的能够很清楚地联系起来。比如说，为了完成别人交给我的任务，我来到图书馆，就去找那本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而不会去找其他的书。而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上图书馆，逛书店，常常是无目的的，就是去浏览，去参观。但常常就是浏览、参观，你就知道了你应该知道的，而且是按照工具理性你永远也无法知道的领域。文化能力的培养，如果用传统观念来说，就是体验致知，我称为“体知”。在中文里，这个“体”字很有价值，如体味、体察、体觉、体证，均说明要把你的身心性命投入才能吸取。一位音乐家不通过体知，不可能变成第一流的钢琴家；一个画家，不经过体知，不理解自然，他就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画家。这种认知只能靠自己亲身经历，这种亲身经历所掌握的资源是文化资源。无任何捷径可寻。你的资讯系统再完备，如果没有你自己的体认，你就不可能增长你自己的智慧。就像你骑自行车，尽管你了解了很多关于自行车的知识，如果你不上去反复地亲身体验，一上车你还是会摔下来。这是一种“内化”的技术。但我们这里讲的还不是技术，而是讲人的智慧，讲你对自己的理解，讲帮助你认识人和做事的能力。而这些，现代西方意义下的大学不会教你，这不是大学正课的任务。所以，一定要通过课外活动来实现这些。假如一个大学不能为同学们提供很多的课外活动，各种不同的讲座，不同的讨论，关于音乐的，关于文化的……那你就无法发展文化能力。假若一个社会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富、强这二个标准的活动上，其他问题都没有价值，完全通过技术官僚的方式来处理一切问题，那么，它绝对没有办法来

发展文化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我们很突出智商，现在美国许多学者都在谈论 emotional intelligence（有学生说：“情商”）“情商”？这个说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通的。但是，ethical intelligence，伦理意义上的智商，而不是高科技意义上的智商，是我们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所必须拥有的社会资源。假如社会的伦理机制被破坏了，那将是很危险的。在传统社会，真正储聚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不是皇帝发的谕令，也不是乡村学校、政府的国子监通过一些经典的阅读来传达的。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作过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传到下一代，最重要的角色是母亲，即母亲的身教。在知识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一个人的文化高低与他的识字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一个人，不识字就会被视为没文化。但是不要忘了，人们可以通过口传身教，来传递深刻的道德理念和文化价值。传统社会有一大批没有文字能力的母亲，成为中国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代代相传的传递者。17 世纪中国有位儒者，在年幼时，他的母亲就告诉他，希望他要向历史上的两个无父之子学习，一个是孔子，孔子 3 岁丧父；另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孟子。从宋明儒学的传统来看，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无一例外的是受到母亲的身教的影响，这种累积的资源在一个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社会是非常宝贵的，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累积是非常困难的，而要破坏却是很容易的。

再者，除了创造物质条件外，还必须发展精神价值，否则社会本身就无法储备足够的精神资源以面对复杂的 21 世纪的挑战，特别是面对全球化和各种原初联系和根源联系所带来的挑战。

最近，李慎之先生在一篇纪念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三个观点，与我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 5000 年渊源流长历史的民族，而为什么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如此薄弱，也就是近 100 年来，中华民族都发生一种

“集体健忘症”：一方面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只有短暂的“历史记忆”。这就造成一种严重的冲突。举个例子：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与五四时期的北大是不同的；五四时期的北大与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的北大是不同的；军阀割据时期的北大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大是不同的；解放后的北大与解放前的北大是不同的；“文革”时期的北大与改革开放后的北大也是不同的。如果你在北大想要了解其历史，要把“文革”时期的资料找出来就非常困难，所以北大的现代“记忆”是相当短暂的，尽管有100年的历史。而100年的历史，在现代文明看来，是非常年轻的大学，比贝克莱大学还要年轻。哈佛大学是1636年建立的，相当于中国的明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间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国共对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10年一大变。而从1949年到1979年，每5年一大变。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历史“记忆”变得非常短暂。哈佛大学有300多年的历史，差不多每年、每月、每日发生的事情都有完整的记录。上次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到哈佛访问，想了解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在哈佛念书的情况。我们不仅找到了汤先生从1915年到1920年在哈佛念书的时间，他的成绩单，也找到了所有给他讲过课的老师名字。同时，还找到了材料，表明他是从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学校转学而来的。在这个小学校，我们还得知，汤先生来美留学的介绍人、原因以及前后经过，甚至来美的交通工具。尽管汤先生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但在中国，这段历史已很难找到，已经荡然无存。相反，在美国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

第二，中华民族最突出价值观中有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但是看看近几十年、几百年来，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吗？是人与自然能够神交、神会，还是说把自然看作一种可

以随意歪曲、控制、改造的完全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物质世界？这是值得注意的课题。我还记得 1972 年（“文革”中）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在瑞典召开，主持环保大会的主席是被称之为“环保之父”的莫维·思托（现在还是主席）。会议上经过讨论，认为生态环境对人类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球的共识，不要让生态环境再遭破坏了。为了形成这个共识，会议签署了《世界环保的基本宣言》。因为罗马俱乐部已经指出了人类的发展是有限制的，科学技术是有限制的，这些内容写入大宪章。唯一拒绝签字的就是中国代表。中国代表拒绝有两个理由：一、资源是无限的，发展是无限的，只要努力，人定胜天，我们可以一直发展下去，绝对不会有问题。二、科学是万能的，怎么能说“科技有限”？当然，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很不正常的时代，但这个很不正常的时代所体现的基本的、狭隘的科学主义事实上是根深蒂固的。

另外，李慎之先生也提到“仁道”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价值。“仁道”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由“不忍”到“仁”，这是“仁道”。不忍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父亲、孩子受饥、受冻、受饿而我觉得不忍，这个“不忍”叫做恻隐之心，这是最珍贵的人类感情。从这个“不忍”慢慢推广开来，把对父亲、母亲、孩子的感情逐步推广，推到人、自然、动物乃至世界，这是“仁”。从“己所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广出去，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可是，从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化世界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受到启蒙心态的影响，是一种从“不忍”到“忍”的一种意识形态。怎么叫“忍”呢？你要摧毁你的敌人，你一定要“忍”，要“狠”，这叫狠打落水狗，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出自鲁迅时代，假如不这样的话，“温情主义”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是，对于你所熟悉的人，如果他不能够真正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你也要“忍”，跟他们划清界线。再如很亲近的人，如父母、孩子，如果他们的观念、意识形态有偏差，你也要“忍”。所以从开始

“忍”一直到你不能“忍”，你还要“忍”。这个潮流的发展与传统中国儒家所谓从“忍”化解为“不忍”（人的仁爱和恻隐之心的向外扩张）是绝对不同的两种心态。这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这样说来，一个有 5000 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现在的“记忆”那么短暂；一个对自然一直保持和谐，不仅是道家、儒家、甚至荀子都提倡的精神，在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正因为有这样大的改变，所以我认为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被边缘化，被消失殆尽。所以我觉得要发展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的发掘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五四以来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一个信念：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西方科学的不多，所以要向西方学习。中国有“民本”思想，有许多可以促进民主的思想，但是没有西方现在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结构，那种理念和人生观。中国有各种科学技术的先进发展，但是从 17、18 世纪以来西方的科技发展是遥遥领先于中国。所以，科学和民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薄弱环节。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向西方学习。我们如果用这两个薄弱环节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一个判断，当然糟粕何其多，精华何其少。什么传统的资源是精华呢？譬如说对伦理学、对美学、对宗教哲学、对人的充分自我发展的一些精神价值、修身哲学，在道家、法家、儒家各种学派中所提出的经世致用之学……有很多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一定是完全符合民主或者科学，但它是资源，它可以培养人的文化能力，可以培养伦理的智商，可以培养我们的人文价值，可以培养我们的精神价值，可以培养我们人格的素养。培养了之后，不仅不会反对民主反对科学，反而使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做为后盾。但是我们用非常狭隘的、来自西方的一些价值——启蒙心态的价值来对传统文化作整体的批判，结果是使我们文化中间的很多资源边缘化。

最后我想提这样一点，即从 1993 年开始，在世界各地，都

在讨论全球伦理的问题。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地球村”出现之后，不仅不是一个整合的形象，它还有矛盾冲突。这个矛盾和冲突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根源意识——族群的、语言的、性别的、地域的、年龄的、宗教的——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考虑有没有一种能够符合全球任何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使它能够真正地在全球得以体现。

在 1993 年，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宗教议会，基督教、回教、佛教和各种不同的民间宗教，乃至日本的神道，各方面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有一个工作小组，就是讨论人类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则。最后得到了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我把它归结为儒家原则，也就是说，可以用儒家的语言来概括。第一个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己所欲，施于人”。第二个原则叫人道原则，就是把人当人，即使是敌人，即使是完全的他者，即使是完全认为他没有价值，即使他是属于落后的社会形态，你还是以“人”待他。这个原则如果翻译成儒家的语言，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一个是恕道原则，第二个是仁道原则，这是两个基本原则。

经过 1972 年的世界环保大会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几次有关环保的大讨论，有一大批学者正在筹划签署一个《地球大宪章》。他们讨论的是人与地球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的问题，由此而提出了一个“深度生态学”的概念。也就是说，不是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等等，而是要通过人的基本态度的改变来重新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此来解决生态问题。其中，有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汤姆斯·多利。这位先生对宋明理学下的功夫多一些，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差等的爱”，一个是“一体之仁”——如何能配合的观点。差等的爱，不是兼爱博爱。所谓差等的爱就是我特别爱我的父母亲、爱我的孩子，但这并不表示我不让其他人爱他们的父母亲、爱他们的孩子，这也不表示因

为我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我不能把那爱心慢慢扩展。这就叫“差等的爱”。如果一个人完全自私自利，但他还能爱自己的家庭、父母，这种人总比那些不爱自己的家庭、父母的人好。儒家伦理就是从个人扩展到家庭，由家庭扩展到社会，这就是一个同心圆。但常常是这个同心圆不能扩展开来，到了家庭就停止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是，“仁者与自然天地万物为一体”，叫做“一体之仁”。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矛盾冲突的。如何使这两个原则统一起来，是现在讨论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政治领袖在讨论签署《责任宣言》的问题。这些人当中有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还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等。他们讨论的原则，实际上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仁道原则”与“恕道原则”。

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讨论“世界文明”，也就是普遍文明、普适文明的问题。他们最近开了两次会，一次在巴黎，一次是在那波里。在会上有很多讨论，就是关于如何把我们刚刚谈的那两个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各种不同宗教传统中落实，如何在基督教的传统，在犹太教的传统，在回教的传统……在其他各个方面的落实。

所有的这一切发展，都促使我们现在考虑，我们不应该回到启蒙心态所代表狭隘的人文精神，工具理性的、物质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文精神，而是要走向更宽广的人文精神。宽广的人文精神至少有四个侧面必须注意：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天道。怎样让个人和群体，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如何能取得一个健康互动；如何使得人类和自然有新的和谐；如何使得人心和天道能够互相并重。我们中国是天生人诚，这些观念怎样得到落实？在这个背景下，人文就是四方面都展开了人文精神，就是不反精神文明的。

同时不要对自然进行掠夺，而是要跟自然保持和谐。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所要谈的课题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管属于哪一个专业，假如我们要有人文关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取向，这些课题我们是不能不顾及到的。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李德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传统文化与哲学批判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大家知道，近几年关于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甚至世界都形成了一股浪潮，有的人甚至非常乐观地预言：21 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等将会拯救整个世界。中国人在落后几百年之后，我们又要能再次扬眉吐气，去领导世界文化的潮流了。当然，对这种现象，文化界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种“乐观”的预言是西方人的看法，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点。因为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极限的状态，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文化存在着很多矛盾，很多弊端，他们想去改变这些弊端，克服自己的弱点，所以才把眼光投向了东方文化。他们认为东方文化里面的一些东西是西方文化所缺少的，是可以补充他们自己文化不足的。因此，把这个当作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

东方文化的一些优势能够补西方文化的不足，这对西方是件有意义的事。但对我们东方文化又有何作用呢？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欣赏自己原来的那一整套文化，不再思进取，就可以坐享领导世界文化潮流的那种地位了呢？有些学者对此就提出了异议，也作出了批评。打个比方说，别人吃了多年的肥肉，现在觉得应该吃点素好，因此就赞美素食，而我们从来就没有吃过肥肉，只是吃素食长大的，也跟着别人去赞美素食，而不想吃

肥肉了。这种行为就叫麻雀跟着蝙蝠飞。麻雀是白天活动的鸟类，忙了一天，晚上该睡觉了，而蝙蝠却是晚上活动的动物，它出来起飞了，让麻雀看见了，它认为，现在新潮流是晚上飞，于是又接着跟蝙蝠飞。这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们如果要学习别人，应该是以我为中心的，以自己的需要为坐标来思考。西方当需要东方文化为补充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除了我们已拥有的东西以外，还缺少什么，不是再津津乐道于我们曾经或者已经有了什么。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就发起了怎样看待传统文化的三场论战。一场是由文学界掀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在中国是否失落的讨论，另一场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被中断的问题，第三场是关于一个较具体问题的讨论——在当代的中国道德是正在滑坡，还是正在爬坡。这三大争论都涉及到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以后的发展是要继续往前去，还是回到、恢复以往好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要肯定这些讨论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民族在世纪之交如何再次振兴起来所面临的问题，讨论是我们民族文化自我反思的过程。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各种不同观点，实际上是同一个头脑之中的不同念头、不同感觉而已。我们不要把这种争论看成是某些个人间的意见分歧，甚至看成是意气之争。

说到此，大家可能可以听出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什么了。我对传统文化热基本上是持一种批判性态度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以及现在的弘扬传统文化热的现象，从搞各种学术研讨、编写著作，一直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行为出现，我们都要从哲学的角度加以理性的思考、分析，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简单化。因为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思想如何才能获得开拓，获得解放的学科。哲学的批判性不仅仅表现为批判别人，更重要的是要勇敢地批判自己。从哲学的批

判思维功能来研究一下我们当前的文化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前提追溯开来，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文化，因为现在的传统文化热我觉得有两个误区，如果不认真地思考，是很容易误人误事的。第一个误区认为传统就等于过去，一说到传统，人们就去找过去的东西；另一个误区是把文化等同于文献，等同于文章典集。这两种做法往往都是在不言之中被人们所奉行着的。但是，究竟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文化呢？按照科学的定义，传统就是把过去和现在连结起来，就是过去发生的，现在仍然保持着的東西。过去有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传统，过去有的，因没有生命力，现在已不复存在的東西，它就不是传统。从哲学角度看，文化就是人化，人类使自己产生、发展所创造的那些东西，沉淀起来成为一定的思想行为的方式，反过来再用它来武装人、装备人，使人成为一个有文化、符合人的意义、人的标准的一个人。这样理解文化，可知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不仅仅是文章典集。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生存、生产、生活的方式及其内容本身。而文章典集只是纪录它，表现它，反映它和议论它的成果。文章典集和文化之间可以说是“言”和“行”的关系，文章典集是文化之“言”。而人类实际怎样生活，怎样思考问题，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怎样对待自然界，对待一切事物，这些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文化本身。这两者有联系，但决不是能够等同的。因此，传统文化绝不是翻一翻古代的文献典集就可以弘扬的了。

传统不单纯是指过去存在的東西。传统就是我们，传统就在现实。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活动方式的特点流传已久，就体现在现代中国人身上。过去有过很多东西，发生过，但它们没有生命力，就消亡了。比如，裹小脚、留长辫子是过去就有的。可是你能说这些是我们的传统吗？过去有的东西，它是不是我们的传统？你到哪里去验证？我认为，在现实中就能找到，看看它还存在不存在，还

起不起作用，它发展变化了没有，变成什么样子了，看看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特征等方面的共同点。比如说，最近有一类书出了很多，把古人的道德格言加以归类，整理出版。浏览一下，便知全是从古书中翻出来的。我觉得，这问题就比较多了。首先古书中说到的东西，当时的中国人是不是做到了，如果它仅是说过而没有去身体力行，也就不能称之为传统，那只是一个传统说法而已。因为古往今来，很多学者、思想家往往发现现实社会上越是缺少什么，越是爱写什么，提倡什么，而我们读了这些古文献后，发现某一个人所做的行为，就以为那个时候的人都这样做，这就上当了。用这种方式去弘扬传统文化，就等于给现在的人造了一座祖墓，让我们去跪拜、去请示。我想，这是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本身是相违背的。所以，传统不等于过去，文化不等于典籍，传统文化不能仅仅从过去的书本中去找，更重要的是要在活的历史当中，在现实之中去理解，去把握。

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般来说，从过去到现在活下来的文化在我们现在人身上或深或浅或隐或现起着作用。在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他不能彻底脱离这个文化。比如，五四时代出现了一个“反传统主义”浪潮，他们主张抛弃传统文化，迎接新文化。其实，经过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那些“反传统主义者”往往在思想、灵魂、感情的深处比所谓“传统主义者”更传统，更保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因为从这个营垒中来，情境看得分明，所以反戈一击，就易致敌于死命。”因此，反传统主义者他们太深地了解中国的传统，他们全身渗透着这种传统，所以对这种传统给自己带来的不利之处感受很深，又总摆脱不了它，只好用非常激烈的态度去反传统。相反，跟你传统完全不同的人，他倒对你的传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看待。比如近代洋人到中国来欣赏我们的大辫子、裹小脚、马蹄袖、吸大烟，因为这些跟他们无关。而传统保守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本身都是基于同一个传统土壤生长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态度。鲁迅就是很典型

的。他本人说他反传统很彻底，说全部二十四史就是两个字：“吃人”。当一些青年找到鲁迅，让他建议青年们读些什么书，鲁迅就写了“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以后就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意思》。因为鲁迅先生本人国学功底极为深厚，这些大家都是很敬仰的，但你怎么能不让别人来学国学。鲁迅先生后来也写了一篇文章作答，题目是《是这么个意思》。他说，“因为我是又喝酒，又抽烟，并且时间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劝现在的青年不要喝酒，不要抽烟。我就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反传统是因为他生长在传统之中，可谓“爱极而生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另外，传统并不都是单一的。有些人说中国的传统就是重义轻利，而且对重义轻利的传统人们宣传得比较厉害。但是，你看看一些中国人的实际行为表现，传统里也有非常不重义的。比如说，中国人很重视信仰理想，这是一个传统。但中国人也有一种很不重视信仰的传统，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认真的、严肃的信仰。那些神呀，佛呀，在中国人眼里面都只是些工具，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严肃信仰过什么。家里想抱个孙子、儿子，就供个送子菩萨，这是佛教；想升官，就供个孔圣人；那么等到想要发财的时候，就供个赵公元帅——财神，这又是道教。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把三教的教主都供到一块了，即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个人和平共处，用得着哪个，就敬哪个。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之道。

从前面的分析看，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少喊些空洞的、大而无用的口号。因为，有些口号当然是不会错的。比如“一个民族不能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问题是，具体地说，那个传统是什么？什么是传统与怎么做才好，两个问题是不是一致？我觉得，传统就在现在，传统就是我们，强调我们现在人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有权力按照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方向去选择，不受过去已有框架的束缚。我

们也有责任去承担按照这一原则去做的后果，不要把一切都推给老祖宗。所以，在怎样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我最终的结论实质上就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认真的反思我们自己身上所固有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怎么承担起我们现有的权力和责任，好好地生活，好好地探索，好好地创造。用我们自己的辉煌来继承先人的业绩，而不是躺在先人的成果上去睡大觉，去坐吃山空。如果我们到了 21 世纪，因为很多人相信那时的中国将会富强起来，如果那个时候，有人来问我们，我们的思想文化是什么，如果我们还只能说是儒学，是孔夫子，那么，我想孔夫子会跳起来骂我们不孝，没有出息。因此，我们要做传统的主人，认识我们对传统的权力和责任，搞好自己的事业，振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切围绕这个中心，就是最好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整理人：潘玉良

【编者絮语】 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本书而言，几篇演讲的观点也不尽一致，有的侧重于挖掘传统文化中能为今天所利用的资源，有的侧重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这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其实这恰恰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之一。正是由于有了众多的不同的见解，构成了思想的丰富性。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张力，也激活了文化的创造力。

王玉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

世纪之交的文化发展态势

[在华中师范大学讲演]

人类就要告别 20 世纪了。回眸人类历程，如果可以把历史像切葱一样切成一段段的，每百年为一段，那么我们会发现：20 世纪是人类最伟大的世纪。站在世纪之交的桥头，许多人都在进行 20 世纪的总结和反思，这种“世纪之思”已成为一个文化潮，它承前启后，推动着人类前进。

这里，我要论列的是世纪之交的文化发展态势，大致有三个动向：

一、文化多元发展与文化对抗

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格局。就文化层面而言，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就文化的时空和内容而言，有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科技文化与社会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文化划分成不同的文化元。在诸多的文化元中，中西文化已经成为时下讨论最多的问题。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上有四大古文明，即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1889 ~ 1975 年）提出世界有六大文明母体，即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克里特文明）、玛雅文明、安底斯文明、中国文明。

由这六大文明派生出 21 种文明，如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正教文明等。这些文明有的停滞，有的流产，有的充满活力。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极具活力，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当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或文明？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或文明有光明的前途。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英国思想家罗素（1872～1970 年）到中国考察，回国后写了《中国问题》一书，提出：以科学及其派生出来的工业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朝气蓬勃的发展之后，其人道主义的理想正在萎缩和消灭，现代战争有可能毁灭西方文明。中国人爱好和平，有沉思的智慧和忍耐精神，如果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西方文明中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中国文化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有机发展。汤因比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世界崛起是有可能的，未来世界不在于军事，而在于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而不断结晶扩大，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将在人类统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面对中国文化的崛起，有些西方人恐惧不安，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 1993 年的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诸文明冲突》一文，提出了所谓的中西文明冲突论。他认为：21 世纪有四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日本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东方文明（包括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儒教文明会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对抗西方文明，宗教信仰最容易激化冲突。科学发达、经济繁荣不能缩短人们心理差距，精神因素比物质因素更能引起文明冲突。世界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建议：应开展一场无硝烟战争，对非西方文明采取隔离封锁，或贸易促变，限制儒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合作，防止西方衰落。

亨廷顿的观点绝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旨在为美国

提供外交理论依据。他摆出救世主架势，鼓吹西方文明至上，鼓吹在全世界搞美国式的国际政治，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的新动向。对此，中外舆论界都很关注。美国学者在 1994 年秋季号《外交季刊》发表《向亨廷顿质疑》，驳斥亨廷顿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一些刊物，如《外国问题研究》1994 年第 2 期、《人民日报》1994 年 6 月 29 日、《世界知识》1995 年第 9 期、《国外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发表了驳斥文章。

但是，亨廷顿的观点是有市场的，步其后尘者大有人在。1997 年，美国出了一本新书，名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该书宣扬“中国威胁论”，罗列种种事例，甚至称香港回归中国、中国部队进驻香港都是严重威胁美国。该书的作者建议“美国至少 100 年在亚洲都有一个贯彻始终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一个国家控制这片地区”。显然，该书旨在激化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煽动美国的霸权野心。

不仅是美国人，一些欧洲人也耽心中国强大，提出了“中国强大后会干什么”的问题。一次，到华中师范大学学习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语系学生杰克琳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夏朝、商朝的版图很小，而现在的版图很大，是否意味着中国有扩张的传统？中国将来是否会扩张？”在我身边的几个研究生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都被搞懵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认为这个外国留学生是单纯的，但提出的问题却关系到大是大非，所以很和气地向她解释：“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现状不太了解。诚然，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有过好大喜功、发动战争的经历，但是，中国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如隋炀帝末年对高丽征战，人民起来推翻了隋朝。统治者的对外战争不得人心，所以难以进行。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人民安土重迁，讲究宗法和伦理，厌恶战争。相反，周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迁徙，一当遇到灾荒，就要内扰。他们甚至在中原建立政权，但最终被同化在中华大民族中，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莫不如此。少

数民族带来的嫁妆就是版图，如满族把东北以外到库页岛的土地都带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汉代、唐代、清代的版图都比现代中国的版图大，版图由大变小又该如何解释？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绝不会违背民意。何况，中国现在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比发达国家的国力尚有较大差距，根本不存在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不仅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会称霸。”

反思外国人产生“威胁论”的原因，不外四点：其一，外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他们学习中国史或中国文化，一般都是用外国人写的书，而不是用中国人写的书。中国人几乎还没有为外国人写书的意识，外语不过关，写作风格不适合外国人阅读习惯，出版渠道闭塞，这些都限制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其二，外国人见到中国这些年确实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公司和高楼多如牛毛，以为中国已经是很强大了。其三，有些中国人夜郎自大，自诩未来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只有中国才是最了不起的。这类言论误导了外国人，也引起了外国人逆反心理。其四，极少数外国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出发，散布耸人听闻的胡编乱造的舆论，造成极坏的影响。

针对这四点原因，我建议：第一，我们今后要让中国人写的图书发行到国外，不能让外国人只读曲解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图书。第二，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当前的成就应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切忌自吹。第三，对居心不良的“威胁论”应展开回击。第四，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对话，推动文化繁荣和进步。

二、文化趋新与文化逆返

趋新是人类的一种进步现象。如果人类固执守旧，社会就会窒息。历史上，日本人向中国学习，“大化改新”促成封建制度；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趋新使日本由闭塞的弹丸岛国而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从明清以来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徐光启向利马窦学天文、历算，康熙帝向传教士学英文、数学，他们都是趋新的表率。甲午战争前，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是自然科学知识；甲午战争后，中国引进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勇于趋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

文化趋新表现在许多方面，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物质文化的趋新。由长袍马褂变成西装革履，由算盘变成计算机，由马车变成汽车、火车，由煤油灯变成电灯，由烧柴变成用煤气，传统的器物和技艺过渡到现代高科技，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

第二是制度文化的趋新。社会在进化过程中，要求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法律规范。近代以来，康有为醉心于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倡导五权分立制度，毛泽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都是在制度文化方面的趋新。

第三是精神文化的趋新。学习和了解新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西方人向东方学习，东方人向西方学习，都是趋新。以前，有人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是趋新，其实不然。最近，有许多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的伦理道德、园艺思想、气功养生、唐诗宋词，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很新，可以补西方精神文化的空虚和不足。以前，还有人认为西方以物质文化见长，东方以精神文化见长，这也不对。东西方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上各有所长，可以互补。

在趋新的同时，人们的行为文化出现了一些逆返现象。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厌恶新的、先进的东西，热衷于旧的、甚至是怪诞的东西。试举日常生活的例子予以说明：

衣着方面：西方的青年把西装看成白领阶层的工作服，认为穿西装太拘谨、太累。他们愿意穿休闲的衣服，特别是牛仔衣，故意把牛仔衣磨白、剪成破洞，显得很古朴。更有甚者，大学生野炊、打沙滩排球时，常常一丝不挂，以示“返朴归真”。美国的三藩市每年 10 月要举行一种集会，男女全裸，丝毫不以为羞，相反却认为是回归自然。

饮食方面：富裕国家的一些人厌恶肉、蛋、牛奶，耽心吃了高营养的食物会发胖，所以，市场上的蔬菜价格比肉类贵。令人震惊的是，有人为了炫耀富有，把金箔碎片放在酒中招待客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返行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社会节奏太快，人们感到工作和生活太累，需要放松。在发达国家，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就到歌舞厅去宣泄，或者到大自然中跋涉，以便解除疲劳。同时，由于生活条件太优裕，人们缺乏正确的生活导向，所以就别出心裁地消费。20 世纪的物质文明发展太快，往往出现一些弊端，如交通拥挤、火柴盒式的建筑林立、空气污染，这些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勾起了人们的怀旧情结。因此，逆返行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一种挑战。它以“反文化”方式向文化主流提出了抗议，实是逆向式的趋新，虽不值得提倡，但值得反思。

三、文化融合与文化泛滥

文化的多元、趋新，必然导致文化融合。人类文化的融合如同火车起动，先是沉重而缓慢，其后是加速，再是不断提速。提速后有一段匀速，匀速之后又是加速。人类的童年是沉重而缓慢的，现在已逐步趋向成熟，是最有活力的阶段，用“一天等于 20 年”之语形容现在和过去，不为过份。中国猿人经过数百万年才在 4 万年前进入氏族社会，又走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才在 5 千年前进入文明门槛。外国学者一般以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 500

年为上古文明，500 年到 1500 年为中古文明，1500 年到 1900 年为近代文明，1900 年至今为当代文明。可见文明的阶段性越来越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应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文明的阶段性短了，文化的融合加剧了，这是时代的特征。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区都已不再是系统论所描述的“黑箱”或“灰箱”，而是敞开的系统。特别是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使人类七大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现在的世界已经变得像中古的一个自然村那么小了，时空高度的凝聚，文化瞬息万变。

在文化万变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快了融合，出现许多新兴的跨学科，数学、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内部都分化出几十门学科，新学科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打乱重建，形成新功能的学术系统，现代学者只有跳到学术前沿，特别是敢于在交叉学科中弄潮，往往才能有所建树。近几年，中国正在开展“三代（夏商周）工程”，为的是要探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拨了 2000 万元，之所以要下大力气，是因为这个工程需要多学科集团型的学术力量才能完成，涉及古天文、古地质、古生物、古文献等学术领域。以前，我们培养的人才，文科学生不懂自然科学，理工学生不知文史哲，在知识结构上是畸形的。这种现象，到 21 世纪非改变不可，时代需要的是综合素质极佳的通才。

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有人以为文化万能、文化可以有百般效应，这是值得注意的。近几年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想就收效欠佳。许多县市耗费上百万元举办文化节，请歌星影星前往表演，沸沸扬扬的闹三五天，签几个意向性的经济合同，在电视或报刊上宣传一番，实际上没有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老百姓意见很大，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而把走穴的所谓文化人请来潇洒，让官老爷风采了一阵，太不像话。”事实证明，文化与经济有联系，但未必能处处挂联在一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举办空架子式的文化节是一种浪费。

文化融合使人们视野扩大，学术走出了狭窄的圈子。但是，文化在无边际的发展中，出现了泛滥的趋向。不论什么事、什么物，统统都当作文化来炒作，诸如豆腐文化、厕所文化、乞丐文化、狗文化……无所不是文化，这就使得文化没有了严肃性和规范性。如果文化被人任意捏塑，那它必将消失在庸俗的泥浆中。

作为一名文化学研究者，我建议同行的学者都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中。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有专节论列，指出：“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为在世纪之交初步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而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世纪之交，文化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出版，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文化大争论。演讲者总结了世纪末文化发展的三种动向，这三种动向都呈现出矛盾互动的特点。其实，正如文化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互动一样——越是本土化，也就越是国际化，文化的矛盾互动使得文化在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进而使得文化的发展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王殿卿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 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在曲阜师范大学讲演]

21 世纪即将到来，为什么还要倡导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究竟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还是一种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还能否成为塑造 21 世纪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一种教育资源？对于以上似乎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我讲几点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文化 道德 传统

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人类为了生存、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套生活方式。自有了人类，就有了文化。人类的起源，就是文化的起源。人类以自身的创造智慧，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利用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就是文化。文化，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形态文化、人与自身和人与社会关系的精神形态文化，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只要和人类有关的一切，诸如，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思想观念、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态度……都属于文化范畴。

道是道理。德是德行，人行正道而心有所得（德）。道德是明是非、辨善恶的一种行为准则。道德不仅是内心价值观念的认知，而且是外在的一种行为表现。

文化包括了道德，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道德的躯体，道德是文化的灵魂。文化需要道德去充实，文化缺少了道德，就会变质；没有灵魂的文化与没有躯体的道德，都是难以存在的。

传统，是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传统是历史的产物，也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和变化。

传统有落后于时代的成分，但传统不等于落后；传统有其凝滞性，但传统不等于保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传统不等于封建。

传统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其力量都是巨大无穷的。

传统，既有空间的局限性，又有超时空的无限性。它是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在不断向现实靠拢、并不断为现实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

对待传统，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笼统地、盲目地反对一切传统，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它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集中体现。

传统文化，是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每个人。

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也就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全人类的文明，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魅

力，有不朽的生命力。它有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雄伟辉煌的建筑，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这是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5000 多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传统文化又使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每个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中国人。

中国传统文化同世界任何一种文化一样，都有其精华，又都有其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也是任何一个有生机的民族，都要坚持的文化方针。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宝库，培育子孙后代民族魂的教科书，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赖以生根的沃土，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浸透了所有中国人、所有海外华人的心田；它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是全世界华人，认祖归根、异地同心的灵魂；它具有比血更强的凝聚力，把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心联在一起。21 世纪的新一代中国人，应当继续强化这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学习和借鉴一切有价值的外来的文明成果，也是中国人的一种优良传统。在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点也不要忽视面向世界，学习和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在公元之初就有了佛教的传入。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东汉班超西延“丝绸之路”为公元 100 年罗马商团到达洛阳奠定了基础开始，中经

唐代玄奘西行取经、成吉思汗与元世祖忽必烈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到清代“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历史上，我国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吸收。当代，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方针以来，使东西方文化的接触、沟通与交流，更加空前广泛和深入。我们是在更加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培养 21 世纪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两者不是割裂的、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是前者在当代的集中体现。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应当厚今薄古、古为今用。

是动力，还是阻力？

100 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学家们关注和不断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要说明中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精神动力？还是以西方的文化为动力？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动力？还是一种精神阻力？一句话，就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走中国自己的路？走东方的路？还是走西方的路？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是全盘西化？

应当说，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至今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的观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就有了，当时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并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阻力。

这种阻力论的发明者之一，是德国近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

伯（1864～1920年）。他在1905年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西方新教伦理，是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动力。进而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宗教伦理，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韦伯，是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德国看中国，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评判中国、审视东方、衡量世界。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体现。

韦伯，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把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归结于儒家伦理，是不公正的。它必然减轻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政治制度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同时它也掩盖了西方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过。

韦伯的“阻力论”，尽管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却被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并逐步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真理”。进而，这种“真理”又被殖民主义者内化为殖民地人民的一种不容置疑的殖民地意识。

应当说，近百年来，这种殖民地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它压弯了中国人的脊梁，它使一大批中国人，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如西方，甚至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月亮圆。直到本世纪80年代，仍有人用《河殤》鼓吹西方的“蓝色文明”，否定东方的“黄色文明”。这是殖民地意识的变种，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可见，肃清殖民地意识，至今仍需努力。

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在近20年的飞速发展，都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也都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巨大历史潜力。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现实社会现代化的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而真正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因素，应当是“西方

中心论”所演化而成的殖民地意识，以及当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韦伯这一代学者，是在法国 1789 年大革命之后 100 年才问世的。他们没有认真学习过 1789 年以前的 100 年历史。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的，“对中国了解的程度，18 世纪的法国人，比 19 世纪的法国人要多得多”，更何况韦伯是个德国人。在 17~18 世纪那 100 年，是欧洲学者、乃至整个欧洲相继出现“中国文化热”或称之为“东方文化热”的 100 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一代思想家、伟大的启蒙学者，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非常革命的、进步的启蒙思想。在这伟大的启蒙思想当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662 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了《大学》——《中国的智慧》

1663 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了《中庸》——《中国政治道德学》

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当时“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这个时期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兹、霍尔巴赫、魁奈、歌德、克斯奈……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也正是他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使中国的儒家思想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 ~ 1778 年）认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是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罗伯斯庇尔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大字，写进了 1789 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法国重农学派的权威魁奈，不仅从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中受到了启示，而且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他们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体现了教育平等的思想；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

校，重视教育，“学而优则仕”和“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点，就成为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他们在 18 世纪，就按照“中国的教育模式”，倡导和推行了法国教育的世俗化和普及化，这对于 19 世纪法国教育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由此，可以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也曾经充当过举足轻重的一种精神动力。令人遗憾的是，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到了 19~20 世纪，新生的两代西方人，把这一段历史给忘掉了。到了韦伯这一代，背靠西方列强的日益猖狂，面对中国的日益衰败，举起“西方中心论”的旗帜，开始教训西方的老师——中国人了！

代价论与历史代价

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此种观点始于西方，确使西方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此种观点正在流行于东方，东方是否也要付出与西方同样的代价？

社会现代化的确给人类带来了文明与幸福，同时也确实招来了现代愚昧与罪恶。

伴随社会现代化而来的道德失落，世风日下，盗窃、抢劫、凶杀、赌博、吸毒、卖淫、嫖娼以致于黑社会等丑恶现象日益蔓延。这些社会现象似乎已成为所有国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逾越的“红灯区”。

当今，各国的青少年犯罪都在走向低龄化、少女化。

当今，西方吸毒的恶习，继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再次传入亚洲、传入中国。据 1995 年 6 月 26 日报纸公布的消息，我国已有 38 万人吸毒。

当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的国家，家庭解

体的速度都在加快。美国在 1994 年，离婚率已达到 40%。我国在 1994 年，离婚率已达到 7.1%，在北京、上海、辽宁等离婚率较高的省市，已达 10% 以上。

家庭解体的速度加快，造成破损家庭子女的群体迅速膨胀；家庭解体，导致家庭对子女启蒙教育功能的消退，给学校教育、给社会治安都带来巨大困难。

在美国 18 岁以下青少年中，有 27% 的人与未婚妈妈生活在一起。在所有美国的少儿中 30% 的是非婚生子女，在美国黑人少儿中有 68% 的是非婚生子女。

英国在 1994 年，已有 25% 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到 2000 年将达到 50%。

我国，目前在一些大城市，也有 8% ~ 10% 的小学生是破损家庭的子女。

日本，在 1991 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 77.7% 的犯罪青少年属于无父母，有 25.9% 的犯罪青少年生长在单亲家庭，只有 1.4% 的犯罪青少年生活在完整的家庭之中。在美国的监狱中的青少年犯罪有 57% 是来自单亲家庭。可见家庭的结构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

家庭解体，已经不仅仅是夫妇之间两个人的私事，而涉及到子女教育、社会安定、未来民族整体素质等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维护家庭的稳定，不仅有利于每个家庭成员的发展，家和万事兴；而且是民族凝聚、国家安定的基础。维护家庭的稳定，是东方的文化传统。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and 地区，都十分注重维护家庭的稳定，新加坡在近些年，把巩固家庭作为一项国策，在住房制度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国际社会已把保护家庭作为人类发展战略的一部分。1994 年第 44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 1994 年为“国际家庭年”，以唤起各国政府对家庭问题的关注。以便促进“家庭和睦与进步”。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引用孔子

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得出结论说：没家庭的参加，发展将一事无成。

当今，艾滋病正在全世界迅猛蔓延，它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的“癌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1990 年，有 817.6 万人；1992 年，有 1300 万人；1993 年，有 1400 万人；1994 年，有 1700 万人；到 2000 年，将达 3000 万~4000 万人。

在美国自 1981 年艾滋病蔓延以来，已有 40 万美国人染上此病，其中有 20 万人已经死亡。

在非洲，据 1995 年 6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巴黎发表的一项公报说，非洲已有 1000 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在全世界死于艾滋病的 300 万人中，有 200 万人是非洲人，使 100 万儿童失去了父母。更加严重的是，有 40% 的非洲孕妇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到 2000 年将有 1000 万不到 10 岁的孩子因母亲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

在泰国自 1984 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人以来，10 年后，1994 年竟达到 150 万人。这与其全国 4000 万人口相比，是个很大的比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它与性混乱、性泛滥、性商业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我国自 1985 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的病人以来，10 年后，1995 年初达到 1774 例，到 2000 年将达到 10 万人。

1994 年 6 月，世界卫生组织推定，世界各地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西欧 50 万人以上；东欧、中亚地区 5 万人上；北美 100 万人以上；南美 200 万人；北非和中东地区 10 万人以上；中南非洲 1000 万人以上；东亚 5 万人；南亚和东南亚 200 万~300 万人；澳大利亚 2.5 万人。世界合计 1600 万人。

全世界 50 多亿人口之中，有 1600 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约有 13 亿~15

亿人口的地区，只有 5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不能不说，与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性文明，传统的家庭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过去 30 年中，西方“性自由”、“性解放”的现代新观念，曾经风靡一时，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牺牲原有道德的一种体现。这种牺牲的社会代价，就是今天西方的性解放，性混乱，性犯罪，性商业的泛滥成灾；就是家庭解体速度加快，独身少年母亲的增多，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和艾滋病的飞速蔓延。

面对这种“疯狂的岁月”，西方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开始对“代价论”进行深刻反省和自我批判，在饱尝历史苦果而又束手无策的时候，又怀念起传统价值观，呼唤“传统价值观的回归”。近两年，由美国前总统里根政府的教育部长威廉·内特编著的《道德读本》大为走俏。全书分为“自我修养”，“关心他人”，“责任”，“工作”等十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记有普通家庭平时说给孩子听的古典道德佳话。作者对从每个佳话中可以获得的什么启示都作了评论。

布热津斯基在他 1992 年著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美国面临十分严重的 20 个大难题：（1）债台高筑；（2）贸易赤字；（3）低储蓄和投资；（4）缺乏工业竞争力；（5）生产率增长速度低；（6）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7）低质量的中等教育；（8）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衰败现象；（9）贪婪的富有阶级；（10）爱打官司走火入魔；（11）日益加深的种族歧视和贫困问题，（12）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13）大规模的毒品流行；（14）社会上绝望情绪蔓延；（15）过度的性自由；（16）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风；（17）公民意识下降；（18）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抬头；（19）政治制度出现上下脱节现象；（20）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他对此得出结论：“美国既成不了全球的警察，也当不成全球的银行家，更做不了道德家……美国由一个自由人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拼凑的社会，

这不仅会引起美国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且会使整个社会凝聚力进一步丧失，以至造成新的混乱和分裂。”他呼吁：“美国需要长时间在哲学上反省和文化上的自我批判。”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 1994 年联合国大会上，不仅公开引用了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而且把希望的着眼点定位于中国。他断言：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成功，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

一部世界近代史，已经表明，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的社会现代化，的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不应具有历史的普遍性。

当今，世界上已经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和正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国家，都在自身的实践中，都在痛苦的体验中，共同意识到：21 世纪呼唤东方优秀传统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动力，绝对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代价。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中国文化的精华与西方文化的精华相结合，要坚决反对用东、西方文化糟粕混合物，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

本人供稿

徐久刚 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

[在山西大学讲演]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开拓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为伟大人物提出了历史性的课题，为伟大人物成就为伟大人物提供了历史舞台，伟大人物则在回答历史性课题的活动中在时代上烙下了自己的印记。我虽然比诸位年长 30 余岁，仍有幸和你们共同生活在以伟人邓小平名字命名的、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新时代。这是一个以改革开放为特点、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时代。

—

黑格尔说过：“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当经过了 10 年动乱，在 1976 年金秋 10 月一举清除“四人帮”，结束了是非颠倒、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今后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如果说，当时少数人鼓吹全面否定毛泽东、中国不要社会主义的谬论因其赤裸裸的反动性，而易于为人们识破庐山真面目，那么，当时党和国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以“两个凡是”为口号，不分是

非、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却很能迷惑一些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尽管他当时由于“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尚未恢复工作，仅仅是一个普通党员——凭借他敏锐的深邃的洞察力，深刻地认识到，沿着“两个凡是”之路，民不得富，国不得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他责无旁贷地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科学体系，而不能满足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提出要把经过实践证明的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错误区别开来；提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出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沿着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的这些观点，不仅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且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思治、思富的心声，凝结了时代的意志，进而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航向，带领和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新时期色彩斑斓的历史，就是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逐步转化为现实的历史。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历史人物就是在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意志印记的人物。他是伟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他首先提出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任务，并最能致力于满足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社会需要。伟人是伟大历史任务的发起人，他的愿望要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能把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紧迫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能把先前社会关系发展进程中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加以指明，他担负起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发起者的责任，率领人民群众，冲破社会发展中的重重阻力，阔步前进。邓小平正是这样，他最先倡导中国进行改革，其愿望比别人更强烈，其态度比别人更坚决，他郑重声明：“不改革开放，只能是

死路一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而且描绘并规划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制定了实现这个蓝图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远大目标，而且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他不但经常提醒人们要防“左”反“左”，而当实践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右的东西干扰前进方向的时候，他也毫不迟疑地开展反右的斗争，始终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而今，改革开放已成为人民的自觉行动，已成为深得民心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邓小平提出了改革，邓小平推动了改革。改革大潮搅动了中国，中国震动了世界。曾被拿破仑比喻为睡狮的中国而今正在醒来。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升值，中国人在升值。中国，中国人，在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一切，都和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

二

当我们说到邓小平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我们务必不能忘了他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在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当时，此语一出，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为什么多年来我们崇尚于计划体制，对市场经济视为畏途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思想上形成了教条的羁绊，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机械地搬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来，奉为经典，坚信不移，坚定不移。由于邓小平的多次倡导，反复阐明，现在，人们才弄明白，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不过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计划和市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本质区别。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才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大大推进了我们的改革事业，给时代留下了特别鲜明的邓小平的印记。

当我们说到邓小平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我们务必不能忘了他的“猫论”、“摸论”和“富论”。

说起“猫论”，人们马上想到这是指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句话并不是邓小平在新时期说的，早在1962年7月他就说了，而且在语言表述上也略有出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上写的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严格说来，邓小平对此语也不具有知识产权，他是借用刘伯承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也不是刘伯承创造发明的，而是四川老百姓的一句俗语。当时邓小平说这句话，其实只是打个比喻，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公有制形式，无论是大队核算，还是小队核算，还是“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只要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多打粮食，提高生产力，就是好形式。邓小平的这句话含有生产力标准及重视实践结果的务实精神，但在“左”的思想占上风之时，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由于新时期之初，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又强调生产力标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当年他讲过的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猫论”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说明了什么呢？其一，说明邓小平认为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并不因挨批而放弃，这体现了坚持真理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其二，新时期的改革大思路和邓小平60年代初的“猫论”思路一脉相承，特别是农村改革更有着邓小平显著的个人特色。

“摸论”，即指“摸着石头过河”。其实，《邓小平文选》第1、2、3卷中并无这样的字句，笔者也没有见到邓小平在新时期讲这句话的任何资料。但实事求是地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邓小平确是有的。他在改革中对改革措施的出台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反复强调“走一步，看一步”，强调“要善于总结经验，

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他在 1992 年初南方谈话中说的“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等，都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本来，“摸着石头过河”是当年延安进行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时在干部中流行的一句俗话。流经延安的延河是一条小河，枯水季节有个别地方汇成不太宽也不太深的潭，河中间搭成石墩，人们便可跨河而过。胆子大者急踏而过，但难免有失脚落水或墩翻落水弄得狼狈不堪的，稳妥者先看石墩稳不稳，不稳者弄稳后再把身体重心移过去，如此逐一而过，虽慢一些，但不会出大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只是一种工作方法的比喻。鉴于新时期改革困难重重，风险很大，邓小平提出改革的措施要先试验，后推广，胆要大，心要细，因而有人便把邓小平的这种改革方法同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联系起来。若从比喻的意义上理解，并无不可。据闻，也有人借此批评邓小平是经验主义，这就没有道理了。

“富论”，即指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这个观点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很有邓小平特色，并且还由此而成为一条很重要的改革政策。旧中国，小生产汪洋大海，“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思想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毛泽东搞了 20 多年的社会主义，也未能摆脱这种平均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观是同平均富裕、同步富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实践证明，搞平均富裕、同步富裕，根本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平均主义的政策，只能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勤的变懒，懒的更懒，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鉴于过去的历史教训和深刻的理性认识，新时期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条重要的政策提了出来。近 20 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这项政策大大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下去。当然，在坚持这项政策的时候，务必要防止

贫富差距过大，特别是防止两极分化，要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也是邓小平讲清楚了了的。

当我们说到邓小平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住，正是邓小平为我们这个时代树立了一面旗帜，确立了新的形象，指明了新的方向。这面旗帜，这个形象，这个方向，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且对这个理论下定义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先在一处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另一处又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后边又特别提到：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1995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由中宣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把这三段话组织到一起，第二处的话调到前面，第三处的话作了简化，成为对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完整的定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定义在讲到这个理论的内涵时，加了一句“它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句在十四大的报告中是没有的。邓小平去世后，党中央等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

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几天后，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段话，因此，可以把这段话视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的最权威的定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在对邓小平理论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作出科学概括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把这一理论确定为全党的因而也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精髓，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国情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这个核心内容集中地体现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

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被人们称为邓小平时代，最根本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并以此而和以往的时代相区别。这是一个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仅以邓小平理论为宏观指导思想，而且以其提出的大政方针政策为实践依据的时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足以表达了我们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

解决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历史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特殊的伟大任务。不是别人，

又是邓小平为解决这个历史任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且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香港，还有澳门，定能按照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顺利回归祖国，百年数百年来的国耻很快得以洗雪。台湾的和平统一虽然困难重重，但最终必定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实践，也是邓小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卷上留下的精彩篇章。

三

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我们之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时代的需要而外，还由于他自身具备了成为时代伟人的主观条件。

比如，他的阅历十分丰富。自他 1927 年初从苏联回国后，经西安、武汉短暂停留，先在上海党中央任秘书长，而后去广西独挡一面，领导左右江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1931 年回中央苏区任县委书记，1933 年初挨整后，差不多有 20 年时间在部队的不同部分、不同级别从事政治思想工作。1943 年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1945 年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书记，1948 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1948 年底任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统一指挥二野三野进行了胜利的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后，又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不仅军事方面文武双全，党务、政务、经济工作、群众工作也很熟悉。1952 年调中央工作，1956 年党的八大后任党中央总书记，成为毛泽东的助手之一，进入最高领导层。“文革”中第一次复出后，又一度成为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内政、外交都很精通。如此丰富的阅历以及所展示出的多方面的杰出才能，是一般人所无法相比的。

再如，他的“三落三起”的人生坎坷所展示的坚持真理、无

私无畏、刚正不阿、力挽狂澜的崇高品质和人格魅力也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信任。

诸多海外人士也曾分析过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时代人物的原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国人戴维·W·张撰著的、法律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的观点。他讲了六点，一是经历和地位，二是资格老年纪却不大，三是毛泽东考虑过的接班人，四是“文革”中邓小平复出后解放老干部，纠正冤假错案，广得人心，五是同“四人帮”的坚决斗争赢得人们的感激，六是他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及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政策。这位作者的结论是：“这些因素有利于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政治方向，并把此期间作为务实主义者的邓小平同毛泽东区别开来。”美国人阚哈什在纽约档案有限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认为：“邓小平明白而实用的施政方针（不论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取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他扣动了无数经历过文化革命岁月的人的心弦。邓小平属于他这个时代。”

邓小平作为时代伟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公认。美国有影响的《时代》杂志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把邓小平列为当年世界新闻人物。美国《成功》双月刊将邓小平选为1985年的“成功者”。美国《世界报》把邓小平评为该刊创刊10年（1978年至1988年）最代表时代精神的两大名人之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结束后，邓小平离开中央一线领导岗位，泰国《民族报》认为“邓小平给世界共产主义留下了他的印记”。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他把“10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直言邓小平“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前董事长

哈默的说法则是邓小平“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邓小平辞世后，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称赞邓小平是“思路敏捷的世界伟人”。几内亚总理杜尔认为“邓小平是一位了不起的世界伟人”。俄罗斯领导人认为，“邓小平在中国社会的转折时期为人民指明了道路”。保加利亚总统赞誉邓小平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俄罗斯《独立报》载文认为：“过去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被称作‘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是中国改革之父。”对于邓小平的去世，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安理会 15 个理事国代表集会悼念，孟加拉国也全国降半旗志哀，这也表明邓小平不仅是中国的一位时代伟人，同时他还是一位超越国界的世界性的时代伟人。

四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时代性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和作为毛泽东战友及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

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江泽民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有个叫莫里斯·麦斯纳的美国人在 1990 年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现在对邓小平时代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仍处于

一个实验的时期，因而不可能对其未来的路线和持续时间作出预言。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说，邓小平时代可能像其领导人所保证的那样，是中国社会主义再生的春天，也可能像毛泽东主义者早就担心和说过的那样，6年的改革热情将让步于20年的停滞和官僚惰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沿着基本路线指引的道路，又走过了胜利的七年，不知他而今对邓小平时代又将发表何种的意见？

一个和伟人名字相连的新时代的开始，总是和这位伟人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分不开，即和这位伟人的生存分不开。但是，这个时代却未必因这位伟人的辞世而结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邓小平时代。尽管邓小平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创立的伟大旗帜仍在高举，他的伟大思想被继承，他的伟大事业在延续，我们仍然处在伟大的邓小平时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已多次郑重表明，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要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习邓小平的革命风格，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仍然充满生机，前途光明，邓小平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春天！

在座的诸位青年朋友作为当代大学生，正在从时代汲取精神营养，茁壮成长。不用太长的时间，你们将先后走出校园，汇入到建设伟大时代的巨大洪流中去。人的能力有大小，各自的机遇也不同，因此，你们或许会成为构筑时代大厦的栋梁，或许会成为构筑时代大厦的砖瓦，或许会成为装点时代大厦的花草。这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我们是走在邓小平指引的道路上，只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做事要做“三个有利于”的事，做人要做“四有”新人，努力上进，努力奉献，你们就都是新时代的合格的建

设者，都是有益于时代进步的人，你们就都能坦然地说：我无愧于邓小平时代！我祝愿你们。

山西大学教务处供稿 本人审定

祝总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记》 导 读

[在北京大学讲演]

大家都知道,《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最优秀的史学著作,文学水平也很高。它的作者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位文学家和史学家。我今天来介绍《史记》,也要介绍司马迁,侧重在史学方面,讲四个问题。

先介绍两个知识性问题。一个是《史记》的名称问题。大家或许以为这本书一开始就叫做《史记》,其实不是。在司马迁以前,“史记”是一个泛称,凡是春秋、战国的史官记下了本国的大事,形成的原始史料都可以叫“史记”,秦国史官、魏国史官记的都可以叫“史记”。所以司马迁出书后差不多 200 多年中,有时叫“太史公书”,这是司马迁自己定的名字;有时叫“太史公记”;甚至于有时候叫“太史公”,并不叫“史记”。根据学者研究,要到 200 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开始叫“史记”,从此直到今天,“史记”这个名字就专属于司马迁。

第二个知识性问题是“史记”的存失问题。据《史记》司马迁自序,他说他写出来的书一共是 130 篇,今天的《史记》是 130 卷,正好吻合。但今天的《史记》是不是全是司马迁写的呢?并不是。经过学者们的研究,一般认为:绝大多数是司马迁写的,也有小部分遗失了,后人增补进去,所以今天仍有 130 卷。补写的部分有两类:一类是整篇地补,因《史记》有十篇整

篇地遗失了，比如说“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等，所以整篇地补；另一类是司马迁写的，但后来已有缺漏，故零散地补缺，如“匈奴列传”，在正文后补了几百字。是谁补的呢？大多数是西汉后期，元帝和成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褚先生”，是个博士，教《春秋》经的，由他补写的，文笔远不如司马迁，但作为史料，仍有很高价值。还有一部分是其他人补的，但不知是何人了。

下面讲正文。我的看法和很多学者以至教科书不完全一样，作为一家之言。

第一个问题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司马迁的经历。司马迁，西汉夏阳人（当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公元前145年（也有说法是前135年），死于公元前87年左右，这都是学者研究的结果，没有明确记载。他的祖先曾当过周朝太史，他父亲司马谈又当了汉朝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教育，20岁时到全国各地旅游，包括孔子的家乡曲阜，使他大大丰富了社会知识，开阔了眼界。当时正是西汉鼎盛时期，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强盛，和匈奴也打了三次大胜仗，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在当时是很辉煌的。同时，汉武帝推崇儒家学说，所以儒家学说日益得到尊重，所有这些都给了司马迁深刻的印象。司马迁最初做官时才20多岁，做一个小官叫“郎中”，大体相当于后代的九品官。官虽然不大，但任务是保护皇帝：皇帝宫殿的门户郎中要守卫，皇帝出去郎中也要跟着保卫，所以接近汉武帝的机会较多。由于司马迁才干出众，所以得到汉武帝赏识，曾被派出去到巴、蜀了解统治情况，反映出汉武帝对他的信任。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司马谈当了太史令。太史令是一个中下级官，大体相当于后代七品官，主要负责天文历法，同时掌管整理国家图书资料。所以司马迁得以大量阅读图书资料，给他后来写《史记》打下了雄厚基础，他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写《史记》，前后十几年方才完成。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

汉武帝，共 3000 年历史，52 万多字。司马迁在公元前 99 ~ 公元前 88 年，因替李陵说情遭受宫刑。李陵是一位将军，替汉武帝打匈奴，开始打了很多胜仗，后来救兵不来，矢尽粮绝，他就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听到后非常生气，他问司马迁怎么看，司马迁替李陵做了一些辩护，汉武帝生气，将他处以宫刑。执行以前，司马迁很痛苦，曾想到要自杀，但《史记》已经写了，还没有完成，死了轻如鸿毛，思想斗争结果，活了下来。后来他又接受了一个比太史令还要高的职位，叫中书令，大体相当于后代六品官，继续为汉武帝服务，直到死去。

下面讲第二个大问题：《史记》的指导思想。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想通过《史记》宣扬一个什么思想？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我以为，司马迁的指导思想有两个：首先一个是为了歌颂汉王朝。有不少学者认为《史记》是揭露汉王朝，揭露汉武帝的，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妥当。《史记》是歌颂汉王朝的，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言论，从言论中看他们为何要写《史记》。司马谈临死时叮嘱司马迁必须写一部史记，歌颂汉朝“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从中可看出司马谈对汉朝是肯定的。司马迁当时曾流泪表示：我虽然才干不高，但一定要把您收集整理材料细致完备地写出来。后来他又向别人表了同样的态，他说，汉武帝是明君，对汉武帝的盛德和一些王侯将相的功绩，自己如不能写史书记载下来，作为史官是没有尽责，作为儿子来说是违反了父亲的遗志，“罪莫大焉”。无论从司马谈或司马迁关于为何写《史记》的言论，都可看出他们是歌颂汉王朝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史记》内容。举两个例子。首先，在自序中，司马迁在提到为什么要写汉武帝本纪的时候，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汉武帝的年号，从刘邦到武帝是五世，这话是汉武帝功绩达到五世最高峰的意思。在此之前，司马迁给汉朝的皇帝都给了很好的评价，比如说，刘邦，“汉行功德”，所以打败了项羽。另外又提

到了文帝，也用了“天下归心”。现在说武帝，又超出了前几任皇帝，歌颂的意思十分明显。再一个例子，“封禅书”。“封禅”指皇帝有了很大功德，到泰山去祭天地。“封禅书”是八书之一。司马迁在其中首先表达了一个意思：自古以来受命的帝王都要进行封禅，而这种帝王在受命的时候就会有符瑞，即神秘的征兆，比如什么地方出现麒麟，什么地方出现龙，等等。这意味着这个帝王是天满意的，有大功德，可封禅。封禅书接着记载了自古以来封禅的情况，如周成王。下面讲到秦汉时，记载了一个鲜明对比的事，一方面说秦始皇很残暴，没有功德，硬行登泰山封禅，结果天老爷不满意，来了大风雨，遭到别人讥笑。另一方面对汉武帝则记载有符瑞：公元前113年，在山西出现一个鼎，宝鼎，有关官吏认为这是“受命”的象征。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无风雨灾”，天气很好，从此建立封禅制度。很明显，封禅书表现了对汉王朝肯定、歌颂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司马谈在封禅的时候很想去，但没让他去，结果一气得了重病，临死时抓住司马迁说：封禅是不容易的，上次封禅是周成王的时候，距今有1000年了，今天天子好不容易又去封禅了，而我不能参加，这是命啊！这是司马迁在自序里写的。很明显，这是司马迁肯定汉武帝功德的一个强证，否则，如果他否定封禅，否定汉帝，又这样来写他父亲，就是把他父亲拿出来充当一个愚蠢可笑的典型。因为在汉代非常重视孝道，皇帝死后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在这个时代，他这样写他父亲，表明他是决不可能否定封禅，否定汉武帝的。何况这是他父亲临死的遗嘱，谁也不知道，没有人强迫司马迁一定要写出来，如果他对封禅，对武帝的功德持否定态度，又何必把这话写出来呢？既然写了出来，在讲究“孝”道的汉代，就证明他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

有很多人如果说司马迁是肯定汉朝的，那么《史记》中有不少暴露汉朝君主、武帝的错误、罪行的，如何解释？我以为：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官如实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传统，后来班固给

他的评价是“不虚美，不隐恶”，把抱这种态度写下来的史书叫作“实录”。所以尽管司马迁主观上要歌颂汉王朝，但对皇帝的错误和罪行（如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穷奢极欲、迷信鬼神，以至于汉高祖刘邦的一些流氓行为）都如实写了下来。这里有一强证：凡是属于君主的一些错误和罪行都是在正文里，作为史料如实记载，凡表示司马迁自己的看法的，在“太史公曰”里面，都没有关于错误罪行的叙述，都是肯定汉朝的。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主观上司马迁是要肯定汉朝的，但又有先秦史官传统的影响，所以要如实记载，这正是一个伟大史学家的伟大之处，并不因为他想肯定汉朝而隐瞒罪责和错误。

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这和他的政治态度分不开，他的政治态度是一贯忠心于汉武帝的，有以下三点证明：第一，司马迁的家庭和汉王朝的利益是一致的，父子俩先后担任太史令，官虽不大，但西汉时官职不多，作为一般士人，能到这个位置就很满足了。这个位置有些特权，是颇为光荣的，比如：六百石以上的官，犯了罪不能直接判刑，必须上报给皇帝叫“先请”，如果皇帝对你有好印象，就可能减刑或免刑了。另外，出门坐车，车上可施幡，即装车耳，所以司马谈曾说：我死了以后你会当太史令的，这就可以“续吾祖”。这证明当太史令很光荣。这是一个证明。第二，正因如此，司马迁对武帝十分感激，曾说自己一直想通过拼命工作，“亲媚于主上”，取得武帝欢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对武帝的态度。后来为什么又得罪了汉武帝呢？据史载，司马迁和李陵并无深交，为何替他辩护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听到李陵投降消息后，汉武帝食不甘味，非常难过，无心上朝，大臣们不知所为，司马迁想给汉武帝一点安慰，表达自己一片愚忠之心，所以解释说李陵过去一直表示忠心于国家，这次打匈奴开始也立了很多大功，最后是不得已才投降的，将来有机会还是会报答汉朝的，意思是劝武帝多从好处着想，别太难过。谁知汉武帝认定他是给李陵辩护，将他处以宫刑，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

的。这是汉武帝的错误。第三，是不是从此后司马迁开始反对汉武帝呢？没有。事实上他又做了地位更高的官吏，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天天在汉武帝身边工作，前后七八年，直至死去。如果不是和汉武帝关系好，得到信任，不可能充当这么久的中书令。从中也可看出他和汉武帝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这是有材料证明的。如班固写《司马迁传》说他当中书令，“尊宠任职”，意思是工作很出色，胜任职务。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要他以古贤臣来要求自己，大力推荐人才。通过这一要求也反映当时司马迁在人们眼中地位不低。由于遭受宫刑，具有强烈士大夫精神的司马迁内心痛苦，但这没有影响到他在政治上继续忠心于汉武帝。据史书记载，他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如果他是反对汉武帝的话，而汉武帝晚年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把皇后和最大的儿子都逼死了，司马迁怎么能在他身旁“尊宠任职”呢？以上三点证明司马迁在政治上是忠心于汉朝，忠心于武帝的，很多学者把遭受宫刑作为司马迁对汉武帝态度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实我看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都和汉王朝结合在一起，从小受的教育也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忠君孝亲的人，他遭受宫刑的时候已经40多岁，思想已定型，虽痛苦，但不可能转变为反对汉武帝，思想上没有基础。何况不久汉武帝又拉了他一把，给他升了官，当的又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官。因为后来汉武帝觉得李陵的投降也是有点原因的。

《史记》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是为了体现、宣扬儒家思想，实际上也是紧跟时代潮流。因为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这也可从两方面证明：一方面，从司马迁的学术流派来看，虽其父是道家学派，但他本人基本是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受春秋公羊学派影响。史书记载，他曾向儒学大师董仲舒请教学问，有人认为他就是董仲舒的弟子，或是汉朝公羊学派的重要人物。司马迁在自序中极力推崇孔子，表示要继承孔子《春秋》的传统。为什么要写3000年通史？司马迁表示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成功或失败

的经验教训，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艺”，指经书。拾遗即收集古史中遗漏史料，补艺即弥补儒家经典不足之处。儒家经书发展到汉武帝时，数量很多，内容繁琐，多半是抽象、枯燥的原则，仁义礼智信之类，而当时的注释都是从文字训诂上解释，或是从“微言大义”方面注释，所以有些注释是越看越糊涂，很难被一般士人理解、吸收。而汉武帝又要广泛传播它，司马迁敏感地感觉到如果能在已有的史料基础上更广泛地收集一些史料，即“拾遗”，写出一部系统的通史，通过生动具体的史实，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可以更有效地宣传儒家思想，“成一家之言”即是此意。另一方面，从《史记》的内容来看，也是基本上贯彻儒家思想的，特别是儒家的“仁义”思想。举一个例子：比如写到西周代替商朝，在“殷本纪”里记载纣王如何残暴，如何违反仁义，又在周本纪里极力描写周文王如何推行仁义，“积善累德”，到他儿子周武王又接着推行仁义，结果推翻殷朝。这样，通过具体生动的事实，就使儒家思想更容易被人接受。不仅是周朝，而且是系统介绍了3000年的史实，这就是他的“拾遗补艺”。到汉代，他记载孝文帝如何废除肉刑，如何把“夷三族”的刑法废除了，评论说：“德至盛也，岂不仁哉”，对孝文帝是用儒家的标准去评价的，说明他在宣扬儒家思想，也是歌颂汉家君主。

说《史记》宣扬儒家思想也有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如被很多著作用来作为《史记》否定儒家思想的一个例子：在“游侠列传”序里，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前三句在庄子的原文里确是对儒家仁义进行讥讽，意思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什么仁义和公理，谁有权力就可以当侯，统治国家，可以自封为“仁义”，而如果没有实力，偷一个带钩就会被处死。庄子的思想是道家的，这话的确是讥讽儒家的仁义道德的，但司马迁引此句，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呢？根据上下文全面研究，我个人认为他本意并不反对仁义，而是用来说明他对“仁

义”的一个看法。司马迁对“仁义”理解得很实在，认为在别人有困难时（经济困难、政治困难），就进行帮助，这就是有德，就是仁义，别人也就会赞美他仁义。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司马迁认为，偷一个带钩的人只有他自己得到好处，别人没有得到好处，所以没有人支持他，他就被抓来杀了；相反的，窃国者，即推翻了旧统治，建立新统治，如周武王，在他“窃国”的过程中，跟随他得到好处的人很多，很多老百姓支持他拥护他，他就可以成为王、成为侯，成为统治者，这就是“窃国者侯”在司马迁理解中的意思。至于“侯之门仁义存”，是“窃国者侯”在道德上的评价，意思是夺取了政权以后，得到好处的人很多，原来受害的人得到好处，所以赞美统治者有德。对于这种大力给别人带来好处的人，司马迁是肯定的，“窃钩”、“窃国”只是一个比喻，想说明大力帮助别人就是仁义。在序里说这样的话，是和后面相呼应的，因为游侠就是这样一种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所以如果仔细研究这三句话，就可以知道司马迁不但不否定仁义而且是赞美仁义的。大家也许要说，那司马迁引用庄子的话，不是反其意而用之吗？是的，当时确有这种风气，在先秦和两汉，写史书和写诸子书很不一样，写法不同：写史书必须如实记载，不能歪曲，不能变动原意；写诸子书是表达思想，举个例子涉及到历史，也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歪曲的、捏造的，所以诸子书上很多记载是子虚乌有的，只是为了说明观点，只要观点被人接受就行了。这是许多学者、特别是清朝学者早已论述过的，这是当时的风气。所以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写本纪、列传，写正文时一点也不敢出错，而写序和“太史公曰”的时候，他在阐述他的主观观点，所以他引用别人的话、引用史实可以任意阐释，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写，甚至反其意而用之，这是允许的。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举了七个例子来表达他想写《史记》的思想，这七个例子并不都对，而且和《史记》正文就有出入。因是写信，信手写来也没有关系。

概括一句：《史记》的内容基本体现了上述指导思想。必须指出一个问题：当时的汉王朝是处在一个上升时期，儒家思想是为巩固统治服务的，所以《史记》宣传歌颂帝王将相和儒家思想，丝毫不影响它的伟大，相反的，它是高度评价《史记》的一个前提。应看到：司马迁主观上是想歌颂肯定汉王朝的，但客观上又如实地暴露了汉王朝的错误和罪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伟大，更不容易。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也即《史记》的杰出成就，分四个方面来介绍。

第一，创立了中国史学中的纪传体体裁。这一体裁的最大特点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编写历史，即：首先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一年年的大事编成本纪，“纪”是纲的意思，“本”是根本，指的是当时皇族中最根本的一支，亦即帝系。本纪记载的内容是全书的纲，围绕这个纲，再用“世家”（记载贵族、王、侯）、“列传”（大臣），“表”、“书”四种形式（“表”是排列时间的，“书”是记载典章、制度和政策的）记载具体细致的部分，这在后代被叫做“五体”。这五种体裁在司马迁之前都有萌芽，如“禹本纪”。司马迁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五体集中起来，创造了纪传体。从政治上说，是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适合大一统国家的需要；从史学角度说，既用“本纪”突出了全国的大事，又用“列传”等等按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记载下来各种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细节，容纳的内容相当广泛，而又不流于繁琐，比编年体更适合需要。因编年体全部是按年排下来的，在一年当中不仅记一些大事，连一些具体小事也都记进去，缺点就是有些繁琐。现在则很好，本纪把大事列出来，列传、世家等记具体、生动、形象的事，相互配合。这就是为何 2000 年都用纪传体作正史的原因。

第二，记载下了全国范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 3000 年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著作中是第一部。在司马迁的时代，社会经

济文化比起过去是进步了，但实际上还很落后，全国的交通联系非常不易，所以流传下来的古代史料相当少，零碎片断，甚至相互矛盾。少数民族的史料更少。要以一个人的力量，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写一部 3000 年的通史，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这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在司马迁时代没有一个学者敢于提出做这项工作。司马迁以无比的气概，给自己提出了这一任务（他父亲交待给他的任务主要是让他写当代史，而他自己向上延伸，成为 3000 年通史）。经过司马迁对史料广泛地收集和天才地考证、鉴别，《史记》成为信史。如“殷本纪”，记载的世系（当时司马迁并没有看到甲骨文，金文也很少见），今天用甲骨文和金文来对照，只有很少的出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须知，那还是个用竹简的时代，写作困难极大。

第三，如实地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对秦始皇这样一个被推翻的君主是什么态度？当时朝野上下都认为他特别坏，所以秦朝不久灭亡了。光讲其坏，不讲其好。司马迁不否认秦始皇的残暴，并用大量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如焚书坑儒等，但他又如实记载了秦国和秦始皇统一全国各方面的巨大功绩，赞扬秦的一些好的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对待项羽。司马迁一方面根据儒家思想指出项羽的失败是由于暴虐，记下了他烧杀抢掠大失民心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记下了他与士卒同甘苦、勇冠三军，一次次打败秦军的汗马功劳。“巨鹿之战”写得非常有声有色，体现了对项羽的感情。他写项羽用了最高规格的“本纪”，这也不容易，因为项羽是被刘邦打败了的人物，现在他不仅记下了项羽的暴虐，也记载下了他的功绩，表明了他对项羽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在西汉，和三国以后不一样，“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载君主罪行，在当时政治压力并不很大，司马迁写《史记》便是如此。在西汉时代，从来没有人认为他记载了汉武帝错误有什么不对。因为先秦史官直笔的影响还存在。而且和后来，特别是纸张出现、印刷术出现以后不一样，史书传

播很少，影响不大，当时统治者还没来得及考虑抓这个领域。和后代，尤其是明清写史书所受的政治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把司马迁和后代史学家相比抬高司马迁，贬低后代史学家是不妥的。当然，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肯定司马迁敢于记载皇帝和王侯将相的错误是了不起的。

第四，文学造诣非常高，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很高地位。《史记》很多地方文字非常生动，语言精练，刻画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这也加强了史学效果。举一个例子：如楚汉相争时，刘邦曾派韩信独挡一面，韩占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形成强大势力，在楚汉之间举足轻重。司马迁记载：这时韩信派了一个代表回来见刘邦，他请求封他为“假王”，并说他占领了这么大地方，如果没有王的名义，就不能有效地统治这一地区。当时刘邦正处在困难之时，项羽刚派人射伤他，所以他就骂道：“我正困难的时候你不来帮我，反过来要当王。”本来他下面要拒绝封王的，可这时陈平踩了他脚一下，意思是提醒刘邦，这时韩信力量已很大，如不封他为王，他去支持项羽，刘邦就要失败了。刘邦很机警地意识到这个问题，马上改口说：大丈夫要当王就当真王，当什么假王，立即封韩信为齐王。这段描写从他开始的态度到陈平踩脚，具体生动，给人印象很深，许多细节加在一起，突出了刘邦的形象。文学水平高了也就加强了史学效果。司马迁之所以是古代有名文学家，正是因为《史记》文学水平非常高的缘故。

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采用纪传体编写的3000年的通史，这部史书史料翔实、丰富，文笔优美生动，紧跟时代潮流，力图歌颂汉王朝，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的帝国服务，但又实事求是，成为后代史学著作的楷模，所以有人评价它是我国史学著作中光芒四射的明珠，是史学史上光辉的里程碑，从此以后我国古代史书中才有纪传体，才有3000年的通史。

第四个问题，即《史记》中的某些非正统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是很简单很单纯的，是复杂的，司马迁也不例外。比如他有肯定追求利、追求财富的思想，集中表现在《货殖列传》里，这思想本来是先秦齐国法家倡导的。在战国纷乱动荡时，追求利和财富基本符合各国统治的需要。因为让老百姓通过商业或手工业富起来，各国税收也会增加，有利于进行兼并战争，去统一天下。可是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特别是西汉文景之治后形势不一样了，这时汉王朝的首要任务已不是战争，也不是恢复经济了，而是如何维护大一统帝国的统治秩序，如果继续宣扬追求利、追求财富，让百姓经营商业、手工业，农民就会大量涌入城市，统治秩序难以维持，所以汉王朝大力宣扬要“重农抑商”，在思想上倡导“安贫乐道、重义轻利”，遵守儒家道德规范，强调“义”放在“利”的上面。司马迁写“货殖列传”，鼓励人们通过手工业、商业去追求利，他也说经营农业最好，这是“本富”，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是“末富”，但又说末富最容易富，甚至于认为盗墓、赌博是“奸富”，也是动了脑子赚来的钱。最好是“本富”，“末富”也行，“奸富”他也不反对，而对于贫贱，他则轻视，所以这和正统儒家“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思想相抵触，因而后来就受到正统儒家的指责。

第二个非正统的思想就是赞扬钦佩一些游侠讲究义气、言而有信，肯于救济帮助别人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基本是持赞赏态度的。这种游侠也是先秦分裂动乱社会的产物，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些豪强势力、集团，重视义气，称为“游侠”。各国统治者在先秦时也是给予默许的，希望能支持自己，害怕他们和敌国勾结反过来威胁自己。一度社会上对游侠的赞许也是普遍的，这是那时的社会风气。可是大一统帝国形成后，游侠越来越和当时秩序格格不入了，因为这些游侠讲义气，但缺乏国家和法律观念，所重的是私人恩怨，讲究义气，他想要帮助庇护谁，不管他是否触犯法律，所以一些逃犯也可以

庇护，危害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如果和谁有仇以后，不是请求官府来处理，而是自己私下去报仇。根据史料记载，有时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可以去杀人甚至灭族，无视官府的存在。对于这种游侠，大一统帝国越来越不能允许，曾给予打击。“酷吏列传”主要记的就是打击地方豪强。正统儒家宣扬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包庇罪犯和随便杀人，生杀大权要掌握在官府手里，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秩序。就在这个时候，《史记》写了“游侠列传”，对这种游侠高度赞扬，表示钦佩，因此也受到了正统儒家的指责。

能不能因为《史记》中有这么两个非正统的思想就认为司马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西汉王朝和儒家思想呢？不能简单下这一结论。就宣扬追求财富、追求利来说，要仔细读《史记》，可看出司马迁动机：原来他的意思是只有大家富了，才有条件推行、接受儒家的仁义思想，还是归到儒家思想上去的。所以他明确地说：君子要富了呢，“好行其德”，即便于推行儒家道德规范。他还举了例子：陶朱公是经商的，三次因为手段高明而赚得千金，每次都分给亲友，救济穷人，推行了仁义之道。可见他宣扬赚钱，意思是只有有了钱，才能救济别人，推行仁义。在“货殖列传”里又说，小人富了，“以适其力”，即恰当使用劳动力，不至于去犯法，也是归到能接受仁义思想。他说，追求利要“不害于治，不妨百姓”，即以不妨害统治为原则，可见还是考虑到汉王朝利益。另外，从他赞扬游侠来说，其动机是宣传仁义思想，他认为肯于帮助救济别人，言而有信，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就符合仁义思想，应加以推广宣扬，所以他寄托了感情和赞许，但对游侠随便杀人，触犯法网也是反对的，他也是考虑到了汉朝的统治。《史记》的非正统思想主观上丝毫没有想要反对西汉统治，而是力图体现宣扬儒家思想。只不过汉朝的形势已和先秦不一样了，而司马迁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先秦某些法家思想的影响，在新形势下没改变过来，在这一方面跟不上形势，因此和后来的正统儒家思想无法接轨。但这毕竟是在拥护汉朝和儒家思想

的大前提下发生的，而不是要反对汉王朝和儒家思想，评价这个问题要全面，不能因此说已站在汉王朝的对立面，必须全面地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化而走入误区。 北京大学教务处供稿

王正毅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创新：

法国奏出的二重曲

[在南开大学讲演]

今天，我向在座的各位所做的报告的题目是：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创新：法国奏出的二重曲。

关于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关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关心的课题，也是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有思辩传统的德国，还是有浪漫传统的法国，还是只有 200 年短暂历史的美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这不但是一个世界性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多学科关心的问题。在座的如果有学政治学的，可能关心这个问题；学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的，如果你们回过头来看看你们自己的学科，从 50 年代开始的学术领域中大多数都有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多学科课题。

在我们中国，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古老到什么程度呢？古老到可以和美国的历史相比。美国建国只有 200 多年，我们中国关注这个课题也将近是 200 年，即大致从 1800 年开始。但我们说它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 60 年代日本经济起飞，70 年代“四小龙”以及随后东盟国家经济上的跃进，到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所有东亚国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如何在继

承传统的同时在现实中有所创新，不做西方文明的附庸？我今天主要谈一谈法国是如何处理传统和现实两者关系的，我想这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法国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法国是如何继承传统的，同时在现实中又是如何创新的；第三个是，我想作为重点特别讲一讲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我们的传统，如何在现实中创新。

一、法国与西方世界

我讲第一个问题是法国如何处理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的。

初看起来，法国在西方世界并不起眼。就领土面积和人口而言，它的领土面积也就是 55 万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是 5800 万。而与法国在人口规模和面积大致相当的国家，在其近邻有好几个：土耳其人口是 5900 万，面积是 78 万平方公里；英国人口是 5600 万，面积是 24 万平方公里；德国统一以后人口是 7700 万，面积是 35 万平方公里。我举这些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把法国与英国、德国、土耳其这些国家来比较？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地理上相邻近。当作这么一个比较时，你丝毫看不出法国的独特性。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是和西方国家比，因为法国是西方国家。你必须首先承认，法国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

就法国在西方世界体系的地位而言，法国一直没有达到它想要达到的地位。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第一个向海外扩张的国家不是法国，第一个成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不是法国，第一个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的也不是法国。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法国也没有在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中成为霸主。而与其相比，17 世纪中叶的荷兰，19 世纪中叶的英国，20 世纪中叶的美国都作过西方世界的，乃至全球性的霸权国家。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说法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国际体系中一直存在。大家都可能记得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说，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随处可见，今天流行于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精神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精神对世界的影响完全可以和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起源于美国的信息革命相媲美。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也借鉴了这种精神吗？那么到了 19 世纪英国处于霸权地位的时候，法国怎么样？法国也在进行它的殖民统治，非洲基本上是处于法国的统治下，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也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与英国对殖民地的掠夺主要是物质掠夺相比较，法国对殖民地的掠夺更多的是精神掠夺和统治，关于这一点，你只要去参观一下法国著名的卢浮宫里的东方展厅就会有这种体会。那么，处于美国霸权时代的法国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 20 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霸权体系，但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一时期法国的行为，你就会发现，在西方第一个向美国提出挑战的是法国。在美国努力营造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立时，1960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改变了过去和前苏联完全对立的态度，提出“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思想；1967 年，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法国提出撤出北约。在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完全对立的时候，有谁敢从任何一个体系中撤出来？法国，还有一件事大家也许不会忘记，在 60 年代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运动中，法国的“五月风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那么冷战后的法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首先是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然后是希望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还在其他国际事务中不断扩大法国的影响。你看法国这么一个地理面积和人口都不太起眼的国家在西方世界体系中的作用是多么独特（与西欧地理面积和人口相近的其他几个国家相比）。

二、法国的传统和现实

第二个我要讲的问题是法国的传统和现实。

如何继承自己的传统而又不固步自封？如何关注现实又有所创新？这是当代许多国家都在关心并不断探索的问题。以上我们谈了法国在西方国际体系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这一问题。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法国是如何继承自己的传统的，又是如何在现实中不断创新的。

一个民族现在要谈传统，我想尤其在当今国际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那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传统在当代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也是非常大的。今天，当我们谈论法国的传统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关于法国的传统，你可以列举出种种的特征，非常具体的特征。根据我自己的亲身观察和分析，法国的传统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我想我谈的这三个方面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我相信是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文学和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和艺术，但法国的文学和艺术却是非常独特的，尤其是艺术。我说一句话可能大家都会同意的，我说法国尤其是巴黎是世界艺术的汇集地。所有的世界最新艺术思潮主要来自巴黎。我不懂艺术，但我亲身体验到巴黎是艺术的天堂。法国人在继承艺术传统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自己这方面在世界领先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只要游览一下遍布巴黎的博物馆就能体会出来。在这里，我只向大家介绍三个博物馆。第一个就是著名的卢浮宫，它有七个展厅，这七个展厅的内容大致上是 19 世纪以前的艺术史。也就是说 19 世纪以前的艺术精品几乎全部在里面。第一个展厅叫东方展厅，那是关于东方古代的；第二个展厅叫古埃及展厅，第三个展厅叫希腊罗马展厅，第四个展厅是油画展厅，第五个展厅是

雕塑，第六个展厅是装饰，最后一个展厅是素描。东方展厅这里我再说一下，我看到那里把大块大块的砖垒成一个城墙，中国的古城墙。我说那个城墙在北京有，西安可能也有，但法国在入侵中国时却把它带回巴黎。此外，还有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和文字碑、罗马和希腊的雕塑，等等。所以，你到了卢浮宫，如同回到了 19 世纪以前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说法国的侵略，和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重视商业非常不同，它非常注重文化。比如法国来到柬埔寨的时候，就在柬埔寨建立了法国远东学院。法国在 1954 年撤出柬埔寨以后，远东学院就迁回巴黎。从中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油画，盛行的油画、装饰的艺术以及素描，都可在卢浮宫发现，诸如令人着迷的《蒙娜丽莎》。第二个博物馆是著名的德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如果说卢浮宫是 19 世纪以前世界艺术的汇集地，那么，德奥赛博物馆就是 19 世纪世界艺术的汇集地。为了使巴黎成为 19 世纪世界艺术的汇集地，法国政府专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卢浮宫展 19 世纪以前的艺术，德奥赛博物馆专门展 19 世纪的艺术，它虽然比卢浮宫小一点，但我把它叫做第二卢浮宫，你在这里可以领略到整个 19 世纪艺术思潮的进展。它有五个展厅，第一个展厅是折衷主义和现实主义展厅（Eclecticism and Realism）；第二个展厅是现实主义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第三个展厅是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第四个展厅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Naturalism and Symbolism）；第五个展厅是关于 1900 年以后的绘画。作为一个东方人，而且从来没有学过艺术，参观完德奥赛博物馆，我就大致上对 19 世纪西方的艺术史有一个梗概的了解了。参观完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展厅，对“当颜色是最充足的时候，形式是最丰满的”这句哲理便有了深刻的理解。第三个博物馆是著名的蓬皮杜中心。为了搜集 20 世纪的世界艺术，法国在蓬皮杜总统执政期间，建造了一个形状非常怪的博物馆叫蓬皮杜中心，它的占地面积很小，它的造型也非常怪，全部是玻璃。这

里主要展览 20 世纪世界的绘画艺术。

以上所讲的总括起来就是，法国非常重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传统，也非常重视传统的教育。如为了教育儿童，法国政府规定，14 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下的儿童进所有的国家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这是法国传统教育的最好方式，它的这种免费参观，使得法国的儿童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是什么。

法国在继承和保护传统的同时，也非常注意现实的创新。大家可能都知道 20 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法国一方面想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驱动中心，另外一方面又不想破坏巴黎市的传统建筑的优美布局（比如，街道两旁到处是舒适的咖啡店，如果建高楼大厦，就会破坏其布局），于是在巴黎市区的外围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群叫做 La Defense。在那里，你可以明白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涵义，感觉到现代大都市的气息，就如同到了纽约和芝加哥。这样，既保持了法国的传统建筑，又使人感觉到后现代主义的气息。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

我现在介绍法国传统的第二个方面，这就是法国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大家都知道法国在服装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我在这里说它在社会思潮方面也是非常独特的。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西方的历史就会知道西方的思想进程，有的学者将西方的思想进程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智慧的时代；中世纪黑暗的时代；17、18 世纪启蒙的时代；19 世纪理性的时代；20 世纪分析的时代。19 世纪理性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是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进入 20 世纪，英国人对德国人构造的历史体系的最大反应是强调实证。为什么强调实证，因为英国人从 17 世纪开始就有科学实验的传统，所以英国人进入 20 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理性主义。欧洲其他国家也从 20 世纪初开始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美国也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反对 19 世纪的理性主义。法国不同，法国是从关

心人自身，关心社会这个角度来反对理性主义。其中最具世界意义的是两大理论，一个是存在主义，一个是结构主义。我想在座的各位，不管是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不管你是哪个年级，很少有不知道萨特的。法国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以及加缪，他们两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那么你看看他们的作品，你看看他们作品的名字，你就会知道在英国人从实证、经验的角度来反对 19 世纪德国的理性主义的时候，法国人是如何来反对理性主义的。我们先来看看萨特的成名著作：《苍蝇》、《肮脏的手》、《存在与虚无》、《呕吐》、《魔鬼》、《善良的上帝》；你再看看加缪的成名作：《瘟疫》、《堕落》、《陌生入》。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生以及人类所生存的社会意义。人生的意义不是理性主义所说教的那样，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以及你自己的创造。在 60 年代，法国又出了另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就是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没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是融贯的整体的一部分，并且具有它的意义，人一旦知道了生活的真实结构，就有可能去改进它。这种力量来源于下意识。这种观点与理性主义所说的结构是非常不同的。结构主义的大师还有后来的富科和阿尔图塞。所以，我们说，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是法国对 20 世纪社会思潮的最大贡献。从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法国的社会思潮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法国人更多的是思考人类自身和其所生活的社会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对人以及社会反思的延续。

法国传统的第三方面是对历史的重视。从研究学术的方式来看，特别是研究历史来看，法国的学者与美国的学者似乎有点不同，美国学者喜好“机械化”大生产，即一本书的最后总要附上许多参考书目，好像不这样就不严谨。而法国学者在谈到历史时，如谈起那些年代，谈起那些事件，如数家珍，很少有参考书目。这并不是说法国人不重视历史，其实，法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比如我去的法国人文科学院（Masi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e)，就是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它所创立的学派叫做年鉴学派。法国人不但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重视自己本国以外的历史。比如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探讨了这期间所有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进展，探讨了法国在这个时期先进的地方，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指出了法国在15到18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中哪些是领先的，抓住了哪些机遇，同时指出了法国哪些方面失去了发展的良机。法国人这种对历史的看法与法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密切相关，即法国人认为法国就是世界，法国史就是世界史。这种对历史的看法与我们长期以来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割裂开来的历史教育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中国的传统和现实

下面我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讲一讲法国对传统和现实的态度对我们中国的启示。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不但世界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所以传统和现实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继承传统这一点上，我自己认为我们目前不管是一般的民众还是知识界一直陷入两种思想误区。第一种，我把它叫做欧洲中心论，总看到我们的不足。这种观点从1840年以来就有，最早的“中体西用”，看到西方的兵器好就学西方的兵器；后来严复翻译出8本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看到西方的社会科学好就学西方的社会科学；一直到了本世纪30年代出现一种全盘西化论，这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第二种，我称之为民族中心论。比方说儒家资本主义，认为我们的发展与你西方的不一样，我们东亚的发展是以儒家为基础。我经常想这么一个问题，你说自己是儒家资本主义，为什么是在本世纪70年代发展，为什么不是在1840年就发展呢？为什么不在本世纪40年代发展，而直到本世纪70年代才发展？这里就涉及到如何

对待传统的问题。简单地抛弃自己的传统以及完全固守传统都是不可取的。

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许是非常有益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致上经过几个运动：第一个运动，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 1860 年的洋务运动；第二个运动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戊戌变法运动；第三个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个辛亥革命使朝代国家转变到民族国家；第四个运动就是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辛亥革命是从政治上开始改革，那么胡适、陈独秀提出要从文化上开始改革。最后一个运动就是 1949 年以来，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当然这个运动还可以再分，分成 1949 年到 1958 年，1958 年开始到 1978 年，1978 年到现在。你可以分，但大致上共同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这是对历史的回顾。

我刚才讲，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我反对全盘西化，但是我也不赞成民族中心主义。法国对待传统和现实的态度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继承传统时，我自己认为要加强三个方面的教育：第一个就是国学教育。我经常想大学为什么进行四六级英语考试，不进行国学考试，为什么不进行汉学的评估？我经常想，为什么不在统考英语四六级的同时考古汉语呢？我说这句话，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你要继承传统，你连古汉语都看不懂，连断句都断不开，如何谈得上鉴别中国的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我给大家从学术的角度举一个例子。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多的学者，如果我问在座的大家，中国科技通史，你最佩服的是哪一本？我想，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答“李约瑟”，这岂不是笑话吗，中国人的科技史，怎么让英国人来写呢？我们经常说英国人因为种种的偏见不了解中国的传统，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写七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呢？你说我也写啊，可你写了人家不认你。中国学者自己写的科技史有的是，可为什么李约瑟写的中国科技史，不但西方人叫好，中国人

也叫好呢？我曾经通读了李约瑟的科技史，我发现他克服了许多多的汉语难关。当然这与他的夫人有关系，与他的学生有关，但李约瑟本人的古汉语确实很好。据我自己的体会，凡是对中国传统有深刻理解的人，都是在古汉语上有很深的造诣。我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要教育自己的后代，让他首先精通古汉语。这个工作应该从中小学抓起，大学里应该进行统考，像英语一样，比如英语是六级，那么古汉语可能就是八级十级。第二，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的大国应该建更多的博物馆。博物馆应该对青少年实行免费参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博物馆不应该收费。你既然进行传统教育、历史教育，你就应当让人们心情愉快地接受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一进门，门票就是好几十，我想很多人即使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也会因囊中羞涩而止步的。第三，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度不能没有思想家。我不是指专门家。著名经济学家，著名政治学家，著名的这个家那个家，都是专门家。中国更多需要的是思想家，像孔子一样，庄子一样。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家。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学术要站在国际的殿堂上，不是单单的学别人，也不是单单的传播自己，站在国际的殿堂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对话。所以需要创造出大的思想家，这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这个民族产生出成千上万的思想家。继承传统应该从这三点着手。不要以为我是中国的，你是世界的，我是东方的，你是西方的，不要抱着这种思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中国的思想，就是世界的思想。唯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不断创新。

南开大学教务处供稿

【编者絮语】提到法国，大家首先会想到巴黎的时装、法国世界杯等，对法国有所了解的人还会想到卢浮宫、启蒙运动、1898年大革命等等。法国文化确有特色，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气质的浪漫民族，同时又不缺乏理性的思考。在处理传统的继承与

现实的创新的关系上，它也有独特之处，值得我们借鉴。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

[在北京科技大学讲演]

近年来，关于地域文化话题比较热，尤其是关于北京文化、上海文化、广东文化。之所以是热门话题，原因有两点：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地域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了，经济先发达的地区，同时开始注意自己的文化形象。第二，每个地方的人对自己的传统、历史、特色、个性本身有着浓厚的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先从城市民谣说起。尽管我们在地域文化比较研究上起步晚，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已对不同地方的文化和人有各种归纳和认同，比如：“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又比如：“东北虎，西北狼，南方人是只大绵羊。”南方人犯罪是以智力性为主，如诈骗活动等等；东北人是刺刀见红。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别是有历史渊源的。历史上北方多是慷慨悲壮之士，南方则多风流儒雅的秀才小生。

中国历史上南方有两个含义，一是江南，二是岭南。江南是长江三角洲，岭南是珠江三角洲。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京派和海派，它们背后的差别就是南北差别，南北文化冲突。

下面讲讲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文化差异。中国文明的中心产生在西北黄河流域即陕西一带，重心逐渐由西向东移动，移动到洛阳、开封一带，最后到北京。又从北向南移动，中国文化的主流

发生在北方而不是发生在物产丰富的南方。中国历史上北人南迁，有三次大的变动，第一次是南北朝；第二次是“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宋代。通过三次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南方得到开发。为什么富饶、温暖的南方开发得最晚？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是有限的，在寒冷的北方传染病更少一些，所以人类只有在近现代，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在南方生存。

在所有国家，南方都是富裕、繁华、温暖的同义词，北方则是代表着寒冷、落后等概念。到明清以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实际上都移到了南方，20世纪以来更是如此。这样我们看到上海和北京在20世纪南北冲突中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人说京派和海派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南北冲突，实际上是中心冲突，即上海作为一种新的城市代表着新的文明，北京则代表着本土文明。

北京和上海做为城市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冲突是怎么样显现的？城市在英文里面是一个词汇，在汉语中，城和市则是两个概念。人们通常说北京城，但没人说上海城。城和市的区别在于，城是一个中央政府派出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它的主要功能是行使地方的行政权力和防御外敌。所以在中国最偏远的大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有一个高大的城墙。与之不同，南方的市、镇是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聚集区，开始叫集市、集镇，最后发展到小的市。它的功能是在商业活动中作为商品流通地、集散地而形成的聚集点。它的形成背景与城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南方的市，像江南的米市、茶市，都是这种商品的集散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南方的市镇，最后发展成大规模的城市，像苏州、杭州、南京，直至上海。上海开发起来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整个江南的最大的繁华城市，把几百年前就非常繁华的苏州、杭州、南京都扔到后边去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遇造成的。所以有人说北京与上海的比较很像中国和美国。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像一位威严的老人，北京城市年

龄是 3040 年，建都历史 800 多年；上海仅有 100 多年的历史，和美国历史差不多。在威严的天朝中心、800 年古都的北京面前，上海是很难扬眉吐气的。但近代以来，从 18 世纪 60 年代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运输中心，到本世纪 20 ~ 30 年代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亚洲其他都市。到 30 年代时，中国形成了北京和上海这南北两个文化中心相互对峙的局面。北京做为传统文化、政治中心，“五四”后成为新文化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第二个十年转到了上海，鲁迅等人都到上海了。所以到了 30 年代，上海已成为同北京并驾齐驱的、尖锐冲突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北京同上海发生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化论争，两地文人互相指责、互相鄙视。为什么出现这种尖锐的文化差异呢？主要因为这两个城市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功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首先代表着官方主流文化，其次代表着士大夫的知识分子文化。因为中国封建时代它的官员是经过科举制度产生的，都是“研究生”水平，高学历。京城里的京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在从政的同时发展出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文化样式，包括审美趣味，如书法字画、京戏等。另外，北京还有民间民俗文化，如：隆福寺、天桥、厂甸、“骆驼祥子”等，这些都是老北京的文化。北京文化是上下分层的、大雅大俗的、反差强烈的文化。因为北京有一个庞大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它的上层与下层不沟通。必须用两个称呼来表示北京文化，把前者雅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称为京派文化；把后者民间、民俗文化称为京味文化。

这种大雅大俗的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譬如说，北京的建筑，一方面是宫殿王府，金璧辉煌、雄伟高大；另一方面是昏暗、低矮的四合院，反差很大。又如，北京饮食一方面有非常发达的贵族菜肴，如满汉全席、仿膳等；另一方面是卤煮火烧等。在旧社会前者是为贵人服务的，后者是为穷人服务的，缺乏中间层。

相反，南方的面点是价廉物美、雅俗共赏的。它的消费对象是从普通市民到资本家都可以吃的，都消费得起，这是上海市民文化的特色。所以，北京的文化是上下分层大雅大俗。这种特点至今还存在着，譬如北京的书摊很有特色，既有很雅的书，又有言情武打书，雅俗共赏；在上海、广州，书摊上绝不卖学术著作、工具书，全部都是通俗小说，分工明确，而北京则是融为一体。

我们用更大概念来概括它，我们可以把京味文化和京派文化统一称为古都文化。因为它是北京 800 年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另外，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大批描述怀念老北京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城南旧事》等等，他们所描写的老北京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即 20 ~ 30 年代的北京，这段时期是北京历史上很特殊的时期。这段时期为什么特别令人怀念？因为 1928 年以后，首都南迁以后，北京空前绝后地成为文化本位的城市。当时北京教育产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它没有工业，靠大、中、小学来维持着文化古都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子，成为服务业的主要的支柱。当时北京帝王之都的蛮霸之气消失了，五四新文化带来了清新的民主、自由的气氛。这段时期的文化令人回忆。

上海的文化用一个大概概念称呼，则可称为洋场文化，教课书称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它的文化形态与内地、北京相比完全不一样。做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文化产出是什么类型呢？第一位是工商业文化，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企业家的精神、冒险家乐园、经营管理等一整套。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文化、工商业精神都是那时在上海建立的。其次，上海是仅次于北京的文化中心，20 年代以后上海形成超越北京的文化都市，因为当时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气氛沉闷，所以大批知识分子流向上海，使上海成为最大的文化中心。不过，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样式和产出、追求、定位与北京也不

一样。回顾一下，会发现中国现代所有的文化样式都是在上海发源的，如流行音乐、话剧、版画、漫画等等。因此，上海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奠基学说和发展学术，而在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另外，有一种由市场导向的、满足于大多数人需求的文化趣味，这也是一种商业化的制作机制，所以上海的电影、流行音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归纳起来，上海的文化是雅俗共赏一体化的横向传播的文化。

市场造成的这种社会流通和社会平等，使人们感到在金钱面前平等，只要有钱都能进舞厅，不讲究身份，所以过去的上海工人也跳舞，也听说书。上海的生活服务、生活质量是均衡的，你在市中心南京路与郊区买的蛋糕是一样的价格。北京则不同，二环路以内还能享受到大都市的生活气息，商品价格便宜，三环路买的东西贵，消费场所少，北京城市的发展是不均衡的。

1949年以后，北京重新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它原来政治中心加文化中心的功能。但是新中国对北京的期望远远超过了过去，我们还希望它成为经济中心。北京的命运变化是从这里开始的。在50年代初，围绕北京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称为毁城之争。北京古城还有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否需要把旧城墙都拆了，发展经济。当时，一些建筑学家主张保护旧城，开辟新城，他们认为北京的古城，做为人类历史上共同的文化遗产，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它剩下只有一个使命，作为城市博物馆。为了满足新首都的行政功能，可以建立一个新区。这个方案后来被否定了。后来采取见缝插针，遍地开花的方式来改造旧城，所以古都风貌在我们眼前逐渐消失了。同样，再过若干年，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四合院了，只能去老北京微缩景园去参观，这是很遗憾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变成全中国最活跃的文化中心，而不仅仅限于官方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发源地，按城市功能本来应是在南方，但现实却是在北

京。原因是北京的人才机制，在建国后计划体制下，北京作为首都能源源不断地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到北京来，而其他城市如上海就不可能了。随着户籍制度建立，上海变成人口不能流动的城市，上海人流不出来，外地人进不去。所以，文化活力萎缩了。北京是唯一凭借政治、文化的特权，源源不断吸收人才的地方，这是移民化的活力。

北京出现了新的文化空间，也就是说，北京不仅有体制内的官方主流文化，又有体制外的文化空间，使得众多歌星、演员、艺术家、导演、制片人、自由撰稿人能够云集北京。在上海没有这些个体文化人。北京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在新北京建设中老的京味文化渐渐消退。老北京人指建国前来到北京的，新北京人指建国后到北京的人。1949年前北京人口156万，1988年北京人口突破1000万，现在1250万人。最新的世界统计，世界各大城市人口数上海排第五，北京排第八。北京市的人口由一百多万发展为一千多万，变化很大。在老北京文化消退时，90年代北京有一种新文化发展了，新京味文化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王朔们把奄奄一息的京味文化注入了当代的精神和营养，成为重新能在社会上流通的地域文化。这种情况上海人就没有发生。

北京文化变化是有得有失，有些消亡了，有些生存下去了。上海更有戏剧性，建国时叫做资产阶级大染缸，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后来又成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60年代中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司令部搬到北京来了”。由于上海的人口流动停滞，城市文化创造明显衰退了，曾经是中国半壁河山，到80年代成为了“地方队”，无论思想、文化、艺术，上海市民文化的根基传统割断了。上海在实行计划经济40年后，变成为计划经济守法户，冒险家后代变成“模范丈夫”了。现在上海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已成为经济中心，但上海文化还没有复苏的信号，可见文化复兴比经济复兴要困难。

老舍通过《四世同堂》、《茶馆》，使人们领略了老北京人的

风采。老北京人受旗人文化影响显得温文尔雅，有教养，有文化；另一方面又有古典的美、颓废的美。北京人喜欢称“爷”，如“款爷”、“倒爷”等；另外称“老”，“莫斯科餐厅”叫“老莫”，戈尔巴乔夫叫“老戈”等等。老北京人安分守己，顺从忍让。新北京人则不一样，他们不是从胡同里长大的，而是解放后打进来的，带有军旅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传统，主体生活在大院里，这些人是当代北京人的主体。他们第一个特点是关心国家大事。在外地人眼里，北京每个出租车司机都好像都是政治局委员，海湾战争时期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有一套解决海湾战争的方案。广东人、上海人都惊讶，北京人水平真高。第二是喜欢干大事、挣大钱——能否挣来是另外回事，习惯宏观思维。搞经济研究北京人搞宏观的多，上海人搞微观的多。第三是喜欢侃大山和幽默。在幽默上有新京味、老京味之分。新京京味的调侃是以时事政治为主，老京京味的幽默是以自然景观、生活现象为主。比如，新北京人说某个人瘦，脱了衣服像张反动标语，旧社会长大的；老北京人则说他瘦得像个牙签。

北京人有特长也有毛病。第一盲目优越感，居高临下，到了外地就像中央首长一样；第二官本位严重，重视社会地位、门第、学历，轻商。广东人到北京很不自在，有很多地方不许进出，不让停车。另外，北京人说的比做的好，想的比做的多。北京服务行业基本上全被外地人占领。北京人不愿干小事，不愿挣小钱，轻商，这既有价值观念上的问题，又有行为能力方面的问题，缺乏踏踏实实做事的能力。北京人好高骛远，吃不了苦。所以有人说：北京人怕苦不怕死，南方人怕死不怕苦。另外北京群体人格变得粗俗了。老北京人非常温文尔雅，新北京人发展出了一套市骂。北京人的人格也缺乏现代性的因素，如契约精神、时间概念、效率的观念、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职业精神差。很多南方商人跟北京人谈判很容易，履约困难，而与上海人谈判困难，但履约顺利。

上海人的人格特点，是理性主义的，是在 100 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半殖民地统治情况下逐渐养成的。最近对租界的作用有许多新的认识，过去只讲它坏的一方面，现在也认识到它对中国人现代意识的培养，人格现代化，有着一定的作用。因为第一代城市人都是农民，第一代工人也都是农民，从传统的农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市民这个过程必定是漫长的。当时租界里对中国人陋习有非常多的规定，规定非常之细，包括夏天不能赤膊、挑粪桶要加盖、不许随地大小便、不许动手打人等等，建立了一套市民的规范。上海人到现在只动口，不动手，东北人三句话就动刀子，一种传统的养成是漫长的过程。上海人是理性主义的，是经过利益算计的，过去认为这样不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看来，算计也不是缺点，也是必须的。经过算计生活更有效，最小的成本可获得高回报，生活质量好。花同样多的钱上海人可以比北京人生活得好。有人说：北京人敢于生活，上海人善于生活。

在婚姻态度上，上海人浪漫的婚姻比北京人少。上海姑娘重在选能过日子的好丈夫，而不是可供审美的男子汉。上海人在谈恋爱时要了解对方家庭的所有情况，父母收入有多少等等，然后做出选择。北京人不考虑这些，比较浪漫。上海婚姻比北京稳定一些，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婚前解决了。另外，上海人比北京人更重视秩序和规则。上海人吵架过程是漫长的，要讲理，动口不动手，以至看热闹的人失去耐心，不欢而散。最后，上海人比较容易把合理的东西变为现实，而北京人却很困难，在社会管理上是很迟钝的，显而易见的问题都解决不好。

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差异很大，但我们要讲当代的城市文化问题，必须要引入另一个新的坐标——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突出的地域文化是广东文化，或称岭南文化。广东做为改革开放的先头地区，其文化同它的经济一起向北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它替代了过去海派文化的所有功能，即工商业文化的功能。所有新

的生活方式如厨房革命、居室革命等都是在广东发源，从南方北上。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港台音乐从广东登陆北上，包括走私物品。广东文化在 80 ~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传播是很重要的现象，说广东话成为时髦，港台音乐遍布全国。

但是广东文化北上，做为当代中国的通俗文化主要样式，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广东文化不是原创的东西，是港台文化的复制品，尤其是香港文化。香港和上海显然有相似的历史和相似的城市功能，但是它们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形态是非常不同的。80 年代以来新的流行文化以香港文化为主，包括武打片、言情小说、录像带、流行音乐等，我们往往认为这些是香港文化的全部，实际上不是如此。香港也有精英层，也有它的上层，传到大陆来的都是下层文化。香港上下层更是阵线分明。香港的下层与上海、北京是无法比拟的。香港下层文化素质不高，下层文化是给他们消费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城市面貌香港化，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无论北京还是其他城市，问题是一样的，把我们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的传统文明、传统建筑都取消了、破坏了，盖了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立体交通等。绍兴是水城，把它的河流填平，铺上柏油马路，把具有民间特色民房推倒了，盖不伦不类的建筑。这些现代建筑寿命不会超过 100 年，因为没有什么美学价值，都是粗制滥造。北京这样的建筑很多，长安街中华第一街风貌丧失殆尽，70 年代盖的北京饭店就是第一个败笔，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这种现象遭到建筑学界抨击。北京的古都风貌是要保存的，城市建筑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艺术性。

最后，北京和上海在 90 年代发生了新的变化，上海随着 1992 年浦东开发，重新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前沿地带，这正与 19 世纪 60 年代情况很相似，1863 年上海开放，在此之前，广州是最先对外开放的口岸，开放 20 年后，上海外贸出口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城市 and 外贸基地，上海的荣耀

一直保持了 100 多年，直到 1986 年广州外贸出口超过上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广州和上海一直处于竞争状态，上海上次是后来者居上，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它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它背后有着一片长江腹地，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是无法比拟的，它的辐射能力是无法比拟的。

但是上海能不能成为和北京同样重要的文化中心，这就另当别论了，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迹象。这是什么原因呢？文化的建设和积累是更为复杂的过程。很多人认为文化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达了文化就会发展上来的。但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我们常讲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但香港人不服气，认为香港教育程度那么高，文明水平那么高，怎么成为文化沙漠呢，北京倒成为绿洲了？我们讲文化不仅仅是指文化水平、修养，而是指高雅文化的生产能力。市场经济发展不可能自动产生出较高的文化，否则，就谈不上文化创造了。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它并没有做出与它经济实力相等的文化贡献，至多输出了相扑和茶道，在科学和思想理论上仍不能与欧美抗衡。文化的发生是非常缓慢的积累过程，不是有钱就有一切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不要说成为文化大国，成为经济大国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经济立国，这是正确的，同时要意识到文化立国的重要性，最终一个民族能否自立，能否强盛，还要看它是否有凝聚力，是否具有现代性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文化的功能平常好像是看不到的，但它实际上起一种深层、稳定的作用。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童志军

【编者絮语】京派与海派之争，由来已久。但系统而完整地研究北京和上海两地地域文化，却始于演讲者的专著《城市季风》。这本书便演讲者享誉知识界和读书界。从此为代表，甚至一度形成了一个城市文化、区域文化研究的热潮。城市，是人类

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文化建设也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本篇亦可与第一卷中舒乙先生的《北京城的文化走向》一文参照阅读）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的人学观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1997年4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人学研讨会，参加者有120多人，其中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各大报刊的代表及各单位各企业的代表，还有很多全国一流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这表明，人学的研究已引起哲学界内外同志的强烈关注，而且证明了人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股思潮。那么，人学是如何兴起的呢？

应该说，人学的兴起并已形成思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

一个是人学研究的队伍已经基本上形成。现在国内哲学界很多老一辈学者在人学领域中挑大梁、关注着人学的研究。一大批中青年成为人学研究的很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都表明人学研究的队伍已经形成。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全国各地报刊对人学的问题非常关注。《光明日报》对黄楠森教授就人学问题做了一个专访。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以及《哲学动态》、《文史哲》、《学术月刊》等都开辟了人学的栏目，刊载了一大批研究人学的文章，《新华文摘》几乎每期都转载了人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

还有，就是在大学里有很多系都开设了人学课程，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都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人学课程，专招

人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另外像首都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央党校等也有类似的举动。

人学学术团体的纷纷成立，这也是标志之一。1995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人学研究中心。之后，一些省市也成立了各自的人学研究会。1996 年 5 月，中国人学学会宣告成立。

另外，国家也投入很大的资金资助人学的研究。如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有一大笔资金赞助人学研究。

从以上这些方面看出，人学在进入 90 年代后，已成为学术界、哲学界研究的一个兴奋点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思潮。

一、人学在我国兴起的背景

首先，有其世界历史的背景。西方思想界关心现实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负面的东西，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人的物化问题。第二个是自“一战”、“二战”爆发后引起的人性问题。另外一个是全球性问题。这三个方面，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人的生存、发展和未来前景问题。他们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是要寻求目前西方社会走入困境的原因并力图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面临的困境在很大意义上是文化的困境、价值的困境、人性的困境。因为一切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都是由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而人的实践活动又总是受一种价值观的支配，也就是说，实践效果是与实践活动的方式有关的，而实践活动方式又是与价值观有关的。所以，当代西方学者非常注意从价值观方面来找原因。进一步来看，他们之所以关心价值观问题，即人性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决于对人的理解。当代西方学者首先关心的是“人是什么”，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的效果。当代西方学者

通过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提出对人的生活世界及人本身的关注，由此引发了人学问题。所以进入 20 世纪后，当代西方哲学有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开始转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其理论表达即为人学。可以说，这种转向对中国今天人学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其次，有其现实的历史背景。进入 80 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是紧随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的发展。80 年代初，哲学界掀起了一场“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这与 1978 年文学界“伤痕文学”的崛起有关，这些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戴厚英的《人啊，人》、卢新华的《伤痕》等，它们的共同倾向是描述“文革”十年对人性健康和人的身心的伤害，并提出深层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人性是什么？有无共同人性？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是否更应该强调人性？这些都是“伤痕文学”提出的很突出的问题。哲学、人学、文学、现实有着这样的关系：文学是以形象思维方式直接描述现实中的问题，文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剖析人的内心情感、诉说人生、揭示人性，文学中的很多问题是有人的问题。人学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人性的问题、人的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靠抽象哲学思维来解决。西方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之一在于描述当代西方社会现实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人学、哲学理论作支撑。80 年代初，“伤痕文学”通过描述叙说十年“文革”的现实，提出了有关人性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人性问题要靠哲学来解答。因此，80 年代初掀起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是与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有很大关系的。1984 年以后，我国改革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特别是扩展到企业以后，人们发现改革过程中很多问题是与人有关系的。比如我们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却无法应用与操作，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素质无法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设备相适应，人的素质问题制约了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问题在这

个时候就被提出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 1985 年开始，展开了人的现代化大讨论。这个讨论同样与我们改革的进程有关。当改革进行到 1988 年时，我们越来越发现改革的发展遇到了更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何方？从哲学角度来分析，来自人的消极性及自身素质问题，这时哲学界对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讨论。1992 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哲学界开始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问题，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问题的关系。

总之，我国哲学十幾年来的发展主线是人的问题，每前进一步都与改革实践息息相关，所以我国人学的提出是有很深厚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大背景。

第三，与整个人类的思维有关。人类的思维在童年时，是指向人以外的对象而不是人自身。科技发展证明人的力量强大，人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这时，哲学也由研究人之外的世界转向研究人本身。我觉得，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英国哲学家休谟、卢梭说过，关于人本身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因为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人得以开展的，而且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人，所以是最有用的。但又是最不完备的，因为人类思维在童年时是关注人以外的世界的，是由内向外，后来才转向关注人本身，由外转向内。所以今天人学的提出，也反映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

最后，人学的兴起还反映了科学史发展规律。一般来讲，科学发展最早是关注自然科学，然后是社会科学，再到人文科学。进入当代，则是人学。因此它符合科学史发展的规律。

二、我国人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我国人学的发展，从 1980 年到现在，已有 17 年了。我认为，人学的历程大概可分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80 年到 1984 年。讨论与研究的主题是“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80 年代初，全国参与讨论的人、文章、领域都很多，讨论的规模也很大。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性、共同人性和阶级性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共同人性？这是针对“文革”的理论基础提出的。因为“文革”把人与人的关系视为阶级关系，因此要讨论人性是否等于阶级性，有没有共同人性。由此又引出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有异化，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都有异化存在；另一种则针锋相对地认为不存在异化。这两种观点都试图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依据。第三个问题是更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政治色彩越来越浓。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是一种新的最彻底的人道主义；第二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人道主义水火不容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排斥人道主义的；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温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有一定联系的，后者只是前者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可以发现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在这种情况下，1984 年，胡乔木同志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的几个重要问题》。此文的发表，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此后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暂时告一段落了。但人们对此的兴趣并未消失，而是转入到对另一个问题的关注，即进入 1985 年后关于“文化变革与人的现代化”的大讨论。由此标志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 1985 年前后。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变革与人的现代化”，由此引出了几个大的问题，包括价值观念变革问题；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问题；人的能力发展问题；健康人格问题，等等。

第三阶段是 1988 年左右。人学进入到 1988 年，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人的主体性与哲学变革关系的问题”。这个时期，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关于主体性、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已成为哲学界的一个焦点问题。

第四阶段是进入 90 年代后。这个时期人学向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在实践层面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的问题，另一个是在理论层面研究关于人学本身的基础理论问题。

三、人学讨论中的几个代表性问题

首先，从实践层面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的问题，重点集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的塑造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认为人自身的塑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项基础工程，而且人的塑造应根据市场经济对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来进行。具体来说，人的塑造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展开的。

第一，在价值观念上，要求我们由过去对钱本位的追求转向对人的能力本位的追求。能力本位的观点是我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是有其深刻根据的。首先，它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依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竞争”，也就是优胜劣汰，它的实质是能力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能力经济，它要求我们从过去对权力的追求转到对人的能力发挥的追求。其次，能力本位也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两句关于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从主体要素来说有三个：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在这三个因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劳动者能力的发挥。所以马克思说，劳动者能力的发挥

是最大财富，是最大生产力。后三句讲的是生产关系范畴，实际上就是共同富裕与公平分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要有相对平等竞争的起点，第二在分配社会财富时，应该按同一尺度进行分配。当前有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看来，并不在于分配结果的不公，而在于分配尺度上最大的不公，比如说，有的人就靠批条子、找关系，一夜之间成为富翁。这两个前提实际上要求我们做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们要做到合理分配，其前提是“各尽所能”，故后面三句话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要求生产关系能够为我们能力的发挥提供好的机制。再次，能力本位也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多，其解决思路无外两条，一从数量上讲是计划生育，二从质量上讲要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能力，要做到人人“各尽其潜，各尽其能，各尽其用，各尽其才，各尽其长”。把人口多变为人口财富和现代化建设的动力。第四，能力本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趋势。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自然环境，再一个是动物世界。原始人的能力、知识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原始人必须组成公社。原始社会奉行原始能力本位的价值观，神话传说都非常推崇英雄，而英雄正是能力的象征。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奉行的是宗法等级本位，人的价值由其出身、血统而定。而在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最推崇的是权力本位价值观，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高于一切。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在我看来，有两种核心的价值观，一是金钱本位，一是能力本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多资本家是十分注重效率的，非常注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这就自然涉及到提高效率和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方法问题。这个方法，在资本主义思想家看来，就是分工。通过分工，就可以把劳动者分配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上，使劳动技能得到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就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来提

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在他看来，方法就是分工。分工也就成为这本书的基本范畴。分工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能力的问题，通过分工，使人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这是能力本位问题。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能力本位服从于金钱本位。马克思正是针对这两个原则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他一方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对人的统治，金钱对人的统治；另一方面他又看出了能力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他在《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资本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以后未来的社会中，最理想的原则，是每个人的能力能自由平等全面地发展，实际上就是能力本位原则。意大利有个出版商，要求恩格斯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出一段最能代表马克思思想的话，作为一本书扉页上的一段格言。恩格斯经过思考后，从《共产党宣言》中选出了一段话，这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经过发掘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个思想中就包含了人的能力的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本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现代西方人由单纯对物质方面追求，转而越来越看重创造力的发挥，能力本位原则应是未来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能力本位原则也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趋势。最后，能力本位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西方思想史中，关心财富问题先后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三大流派，它们分别把流通领域、土地和劳动者视为财富的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格言，叫做“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一方面认为劳动主体能力的发挥是最大财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财富应分为物质财富和人本身的财富，而人本身的财富才是根本的，物质财富是人的能力的对象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实际上包含着能力本位的精神。最后，能力本位原则植根于人的本性。人与动物不同，动物靠自然的恩赐获得财富，而人必须靠自己的创

造能力去创造自己的世界。

能力本位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呢？简单地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力本位无非是指一切活动、一切关系、一切追求都要围绕如何充分正确发挥人的能力来运转。当能力与金钱、权力、人情、资格发生冲突时，后者都应该让位于能力。第二，能力本位要求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组织、政策和方针、路线要围绕着如何充分发挥人的能力来设计、来运作，要建立一个能力社会。第三，能力本位还要求我们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做到“人尽其潜，人尽其能，人尽其长，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对我们的人格有一个设计，就是要做圣人，就是做有道德的人。我们的传统要把道德人作为一个前提，但忽视了对人的能力的塑造。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把道德的人与有能力的人结合起来。我认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忽略对能力的追求。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是塑造圣人的文化，道家文化则是出家的文化。它们都忽视了人的能力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墨家代表劳动者利益，比较注重能力，因此墨家文化可以经过现代转换，使之更具有当代意义。第四，能力本位还要求我们在自身的岗位上发挥能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专门人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一大批专门人才，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文化建设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门人才的培养”。社会发展要求我们成为某行某业的专家，因为分工越来越细，每一个分工领域对科学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专家、专门人才。第五，能力本位一方面批判过去的旧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要确立一些新的价值观念的基础。能力本位是批判旧的价值观念的一种武器，又是树立新的价值观念的基础。树立能力本位价值观是对社会的一种改良与启蒙。

在实践层面上来研究市场经济中人的问题的第二方面是能力

水平的内涵方面，由对经验、常识、习惯的注重转向对个人专业技能提高的注重。

第三个方面是精神状态上，由我们过去的消极保守转为现在的开拓进取。

第四个方面是在道德品格上，要从对个人的不尊重转向现在的对个人的尊重，而且要求我们要有个人自立意识。

第五个方面是在社会心理上，由对人情关系的注重转为恪守社会规范。

第六个方面是在思维方式上，要由过去的主观主义向健康理性思维方式转变。主观主义主要有感觉主义和教条主义等表现形式。对主观主义的批判，就是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理性思维，它不仅能驾驭我们的感情，带来理性的生活，还能用理性思维来分析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人学进入 90 年代后，除了在实践层面有了发展外，同时还在理论层面研究人学本身的理论基础问题。下面就从理论层面来看看人学界讨论了哪些问题，有哪些代表观点以及人学研究力量的分布。

首先是人学与哲学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把哲学看作人学，认为哲学研究对象是人的世界，哲学研究的内容是对人或自我的一种理解，哲学的本质是对人的自我理解的一种理论，哲学史就是人对自我理解的发展史。

第二种，认为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人学和哲学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为人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哲学研究的是整个物质世界。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人学。哲学没有一个适用一切时代的一般哲学。其依据是哲学随实践、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研究对象，改变自己的形态和重点。哲学在古代主要是对本体的关注，对自

然的关注。近代哲学则是关注认识问题，已从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到了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对实践的关注。而马克思之所以关心实践，关心物质生产，更深刻的意义是关心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劳动者。所以，对实践的关注，也包含着对人的关注。当代西方学者通过对实践活动效果的反思来对实践后面价值观念加以反思，然后再对价值观念后面的人性进行反思。所以当代哲学转向了人学，人学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这并不排除认识的问题，并不排除实践的问题，但要以人学为核心来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理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前面已经讲过，根据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由内向外，转为由外向内，因此，西方学者非常关心人的选择，关心人的主体性，关心人的自我。所以当代哲学发展的形态是人学，也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

其次是人学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学是研究完整的人及其主体，但它对它所说的人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第二种观点是我提出来的，即人学的研究对象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与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依据是：

首先，社会历史最终是每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史，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其次是关于对人本身理解的依据。人有三种形态：人类、群体和个人，在这三种存在形式之间，人类和群体无非是实体个人间的特殊关系，都不能作为实体而存在。只有个人才是一个实体，而群体、人类都是依附于个人的，在个人身上包含了人的个性，人的集体特性、人的内塑性。第二个依据就是由现实出发，今天的中国，塑造人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健全的个人。在西方社会，他们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要塑造一个健全的个人。西方文化的原则是个人主义，非常强调个人，但个人主义在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要用新的方式来挽回损失，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把个人原则放弃，他们要塑造

一个健全的个人，使他具有合作的意识、集体的意识，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另外，从学科建设来讲，我们对人类的研究有人类学，群体研究是社会学比较关注的，唯有完整的个人还没有哪一门学科专门对它进行研究。

再次，就是应该明白人学是怎样提出来的。“人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8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从人的研究到人学》中。人学是针对整个人类科学提出来的，人类科学就是对人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学科群，它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生理学、生物学、解剖学等等，而人学是在综合人类科学提供的不同侧面的知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个关于人的完整图景，这叫综合人学。再从综合中提升出关于人本身的一套哲学理论，叫做哲学人学。我们现在讲人学，主要是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但更侧重于哲学人学这个层面。如果给人学下一个定义的话，人学就是在对人的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基础上而提出的一个关于完整的个人及其存在的研究的学科。这是我对它下的定义。就这个定义而言，不能把所有与研究人类有关的科学都纳入到人学中来，把它泛化。人学泛化的一天，也就是人学消亡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学一定要有一个定义、一个框架。

关于人学基本理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这门学科应该研究的基本内容。它主要有三大块：人的存在论、人的发展论、人的价值论。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关于人学基础理论的四个问题。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人学应该说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而且发展前景在我看来也比较乐观。现在人学研究的力量主要分布在吉林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我们之所以要建立这门新兴的人学，就是要求我们大家要关心我们每个人素质的提高，培育每个人的个人意识，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来实现自身价

值，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今天我这个讲座的精神！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何益民 何立群

尉天骄 河海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水”的历史人生意味

[在河海大学讲演]

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是学水的。水与人生的关系可以说是太密切了。从实用方面看，水是生命之源，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从科学角度看，关于水的知识、学理、规律很复杂，我们河海大学不是设了那么多的专业来研究水吗？而以审美的眼光来看，水的形象能够唤起美感，让人愉悦，水在文学艺术中是频繁出现的审美对象。我们河海大学不是有个口号吗？叫做“学水，爱水”。我感到，我们所说的“爱水”，应当是全面的、丰富的，既要珍爱水的实用价值，也要学会欣赏水的审美意味。水利工作者的劳动对象是水。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告诉我们，劳动者在劳动对象上发现了美，感受到美，这是劳动者的幸福，也显示了劳动者的修养。关于“水之用”、“水之理”，同学们了解得比我多，今天我在这里想谈谈“水之美”，就是从审美角度对中国文学中关于水的描写作一点赏析，希望能够唤起大家“爱水”的兴趣。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水是作家笔下的一个“传统意象”（traditional image）。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当然还有很多，像大家所了解的太阳、月亮、山、云、松柏、彩虹等等都是的。不过从美学意义上看，它们似乎都不如“水”这一意象蕴含丰富。而且“水”的丰富含义又具有一定的规律。再具体一点说是这样的——文学中对水的描写数以万计，从美学含义上看，这些意象大

致可以分成这样几大类别：

一、长流不已的水蕴含着深邃悠长的历史人生意味。

二、浩瀚博大的水象征着伟大崇高的境界。

三、秀美的水具有温柔多情的灵性。

四、清白的水标志着纯洁无瑕的品格。

五、与“土”对应的水成为另一种生存领域。

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审美的“一水分流”。

很有趣的是，具体到某一个作品中的关于水的描写，不管是作家的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吻合，“水”的意象总是能跟民族审美传统“对接”，呈现出或这一类或那一类的美学含义。而读者呢，往往不需要注释也能体悟出其中的美学含义。这大概就是审美传统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吧！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在这里先谈谈第一类美学含义的“水”。

从审美意识的发展来看，水以自然事物进入文学作品，标志着人的审美视野的扩大。《诗经》里就有了许多描写河水的诗句，比如，《伐檀》里的“河水清且涟漪”、“河水清且直漪”、“河水清且沦漪”，同学们都很熟悉，中学里学过的。另外还有，像“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等。不过这些描写，主要还是为人、事作比兴，水还没有成为直接的、独立的审美对象。直接对水抒发感受的话，我们也能想起很熟悉的来，例如《论语·子罕》论述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还把水的流动与某种类型的人联系起来，所谓“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后来解释说，孔子称赞水，所取的就是水的有本源，滔滔汨汨，昼夜不停。流动，本来是水的自然特征，在人的审美感受中，自然特征化作了生命特征、性格特征，流水成为人类生命、人生历史绵延不断的象征，物质的水具有了哲学、美学的意味。前边提到的孔子的这几句话很简短，但是不要小看了它，它

可以说是对于水的审美价值的经典性阐发。后代由水引发的关于历史、人生的体会，大都是从孔子的语意中派生或者衍变出来的。

这些体会、感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感类型：

常见的一种体会是面对水而唤起生命的历史意识，甚至是进取精神。唐代张若虚著名的乐府长诗《春江花月夜》，历来被文学家称赞。我们来看诗中对于月下江水的描写——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
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
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
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

这首诗的精华在哪里呢？是描写月下江畔景色优美生动吗？是抒发相思别离之情的细腻吗？应当说，它是有这些优点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六朝宫体诗中，这方面的例子也能找到很多。光凭这些，《春江花月夜》没有多大的了不起。按照唐诗专家闻一多先生的分析，这首诗胜过六朝诗歌的根本之处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宇宙意识”。诗中的情绪也带点感伤低徊，比如“江水流春去欲尽”这样的句子。但是总体看来，诗人面对浩浩江水产生的那种深邃的历史人生之感，是六朝诗歌里很少见到的。正因为这样，闻一多先生才说《春江花月夜》洗净了一百多年来宫体诗“那份黑暗的罪孽”，成为“诗中的诗”。在这首诗里，江水不是抒情的喻体，也不是偶尔用来渲染、点缀气氛的，它就是诗人的直接审美对象。用美学的术语说，江水在这里成为“人化的自然”。诗人笔下的江水，渗透了对于历史、人生、青春的感受。

杜甫有两句诗很有名——“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两句诗，是描写眼前的实景，也是抒情的寄托。前一句暗中比喻大唐帝国每况愈下了，自己也风烛残年了，境界和格调

都显出灰暗、消沉。后一句用滚滚不停的江水比拟人生社会的生生不息，一往无前，意境猛然转变为开阔、雄浑。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长江的句子大家都很熟悉吧——“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滚滚滔滔的长江水，不光是历代英雄豪杰的见证人，也是英雄精神的呼唤者。在这里，诗人跟历史学家的感受有所不同。在历史学家看来，长江只是历代英雄活动的场所，是他们演出历史剧的舞台。用诗人的眼睛看，长江本身就是英雄，是一条“英雄河”，充满阳刚之气，崇高之美。小说《三国演义》“诸葛亮草船借箭”是很吸引人的一回，故事就发生在长江上。小说里插入了一篇《大雾垂江赋》，这样描写长江：

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北带九河。汇百川而入海，厉万古以扬波。至若龙伯、海君，江妃、水母，长鲸千丈，天蜈九首，鬼怪异类，咸集而有。盖鬼神之所依凭，英雄之所战守……

这段文字，说到了长江的源远流长，浩荡壮阔，这好理解。那么，说长江中有那么多的水神水怪，是表现长江的恐怖吗？（有人答：不是的。）对，不是说长江恐怖，是表现它的神奇、粗犷。如果借用法国美学家狄德罗的说法，可以说这样的长江就不再是“生糙的自然”，而是“经过教养的自然”；不是“平静的自然”，而是“动荡的自然”。长江在这里放射出一种英雄气魄，跟诸葛亮等三国英雄们的豪气互为映照。

元代关汉卿的杂剧《关云长单刀赴会》，是一出三国戏。关羽船到大江中流，先用道白慨叹：“看了这大江，是一派好水也呵！”接着唱：

大江东去浪千叠……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去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檣櫓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段唱词历来脍炙人口。听起来都铿锵有力吧！关羽的“情惨切”是不是畏惧、消沉？当然不是。他是英雄重临旧战场，岁月流逝，当年很多英雄人物都不在了，不免让他心生苍凉。但是看看长江，滚滚滔滔流的是英雄的血，唤起了人的慷慨、悲壮之情，所以关羽还是赞叹“好江景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英雄本色！关羽身上洋溢着“长江气魄”，长江也“关羽化”了。英雄的胸怀跟水的美学意蕴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了。

中国文学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下面想着重谈谈当代青年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

这篇小说写到了北方的几条大河，刻画很生动，体验也很深刻。主人公没有具体姓名，就叫“他”。“他”是插队新疆的北京知青，“文革”后考进大学，毕业分配时放弃了留校和回北京的机会，决心考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生，一边准备功课，一边实地考察北方的河。“他”一口气跑了四条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黄河，加上“他”插队时非常熟悉的额尔齐斯河，见过的白龙江、洮河、伊犁河、内蒙古的锡林河、青海的通天河，还有“他”梦中向往的黑龙江，几乎包括了北方所有的大河。“他”去看这些河，想这些河，不是为了温习知识，而是为了寻找一种情感，一种精神，那就是他所追求的雄浑阳刚之气，这种精神是城市生活中缺乏的。在他心目中，这些本来没有生命的北方河流现在都是具备情感、意志、性格的，成为他追求和向往的生命精神的象征。

额尔齐斯河：流淌着阿勒泰山的雪水和哈萨克的真挚情歌，浩浩荡荡奔向北冰洋。在“他”心目中，额尔齐斯河“是坚强、忠诚和敬重诺言的”，它“稳稳前进”，“胸有成竹”。“那是一条被酷暑严寒的哈萨克草原养育得自由自在的大河啊，原来它把喝过它水乳的人都悄悄地改变了”。“他”的恋人背叛了“他”，起先“他”想报复她，后来压抑下了这种狭隘、毛躁的念头，大度、宽厚、侠义地送她去奔前程。“他”心里很清楚，“（那时的）

一举一动都是由于额尔齐斯河的缘故，那条自由而宽阔的大河重新塑造了你”。在这里，河成了人的生活导师。

湟水：“浑黄的浊流哗哗淌着……自然而平和”。这里有许多历史的文物和遗址，唤起了这位年轻人关于民族、历史、人生的深深思考，“他”的血液中好像流入了湟水凝重深沉的波浪。

永定河：“他”原先从书上知道这条河放浪不羁，任意迁徙。但是当“他”真的站到永定河边时，有些失神、失落，因为永定河太貌不惊人了，简直可以“捉襟而涉”，可怜巴巴的。但是“他”很快又发现自己“以貌取河”的错误。这条河看起来能一跃而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一道屈辱的驯服的浅流”，扔块石头入水，“那声音里饱含着深沉的艰忍和力量”。这条河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干瘪和轻狂”，“只会在顺利的时候充满自信，得意洋洋”。永定河用自己的品格激励“他”走向沉静、含蓄、宽容。

黄河：这条中国北方最伟大的河，是主人公心目中的“精神父亲”。我们通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张承志也许感到这个比喻突出了黄河的宽厚可亲，但没有能显示出威力和刚健，他就有意把黄河“雄化”，描绘成“父亲”的特征——倔强、激情澎湃。在主人公年轻的眼睛里，黄河里流动的不是黄水、波涛，而是燃烧的烈火：

他看见黄河又燃烧起来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熔入了那激动的火焰。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轻唱着的一团团通红的浓彩。

大家都感受到了，这样充满热量和激情的黄河，难道还是地理学、水文学意义上的河流吗？黄河具有了鲜明的性格，它象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小说中的“他”，我们那位年轻的主人公，最为自豪的就是别人称他是“黄河之子”。这仅仅是表现“他”个人的志气吗？显然不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代中国青年的豪气！

黑龙江：这篇小说对黑龙江的描写是以往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美学境界。黑龙江是主人公梦中时常浮现的一条大河。漫长的冰冻扼杀不了它的内在生命力，而只是为它积蓄力量。一旦它苏醒过来，很快形成了一种震天动地的气势。请听听张承志的描写，真有震撼心魄的力量：

一声低沉而喑哑的，震人心弦的巨响慢慢地轰鸣起来。整个雪原，整个北方大地都呻吟着震颤着。迷蒙的冰河开冻了。坚硬的冰甲正咔咔作响地裂开，清黑的河水翻跳起来，拥推开巨船般的冰岛。在同一个刹间，雪原上长长地拂来了一股暖流。积雪融化了，汨汨的细流渗透着，在凹地和低处汇成了清亮的雪水溪，朝着大河欢乐地奔跑。河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条发亮的微黑的水道，正在庄严的音乐中朝着下游平稳地起程。而整个一条河流的上下却仍在连声炸响着，冰排、冰洲、冰块、冰岛在漩流中愤怒而又惬意地粗野碰撞……这河苏醒啦，黑龙正在舒展筋骨……黑龙江解冻了，黑龙就要开始飞腾啦。

这哪里是写河，分明是描绘一种生活理想呀！前边说过，黑龙江是主人公梦中经常出现的大河。尽管有的作家评论说，张承志把黑龙江写得那么传神，他肯定到过黑龙江的。但是在小说中，作者还是把这条大河的壮观气势放在主人公的梦境之中。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体现了对于理想生活的呼唤。前边我们说过，“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时代、社会，尤其是代表了当前的青年一代。把全篇小说联系起来看，可以这么说：在湟水中，我们找到了血脉；在黄河里获得了人生精神；额尔齐斯河、永定河塑造着、完善着我们的性格；而黑龙江，显示的气势和景观就是我们的前途。张承志这篇小说是1984年发表的。主人公的梦境象征的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对于自己前途的热情讴歌。

这篇作品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作家、评论家一

致赞扬小说中关于河流的描写和抒情是精彩动人的。这几条北方的大河，它们的地理学意义几乎完全隐退了。我们感动的，不是某个地方的某一段河水，而是它们的“河魂”。“北方的河”有情感，有意志，有性格，又有魄力和魅力，这些东西就活跃在我们的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里，活跃在时代的心灵之中。可以说，《北方的河》是最具有时代精神的“水之颂”。王蒙当时有过预言：至少三十年内，写河流不会有人超过张承志啦！这不是夸张。从1984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写河流的作品还没有能跟《北方的河》相比的。我们当然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同时，也更能体会到，从河流中写出深邃动人的历史人生意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现在，让我们看看流水引起的另一类历史人生感受，这主要就是人生易逝、青春难返的悲凉甚至是悲观。古代文学中比较常见。水流不返，人的生命不能往复，这二者是相同的。但是，人生有涯，流水无尽，这是不同的。古代的文人常常在这种对比中产生出低沉的咏叹。他们抒发个人身世、生命的悲凉，总喜欢拿流水作比喻。孔子“逝者如斯夫”的话里就含有忧伤成分。宋玉的词赋里不断出现临水的悲情，对孔子感叹中的忧伤发挥得比较多。南朝谢朓的诗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抒发的是仕宦生涯中的悲苦。李白写过很多雄壮的水，但到不得意时也要慨叹：“古来万事东流水”，无非是说人生无价值。虚幻感不就流露出来了吗？南唐后主李煜，国破家亡，哀叹“落花流水春去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象征富贵荣华的消失，滔滔江水都是愁情化作，不可阻挡也不可挽回，他叹的是个人身世，其中也包含着历史、人生的悲痛。就连苏轼这样旷达的人，消沉的时候也会伤感：“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意思是说，一切像“春”一样美好的事物，青春啦，才华啦，富贵啦，功名啦，到头来不是归于尘土（腐烂了！），就是如流水一样去而无踪。“流水”，在这里成为人生无价值的象

征。电视剧《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吧？每一集开头都唱那首词《临江仙》，那是小说《三国演义》的篇首词，明代文人杨慎写的。上阕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开头两句脱胎于苏轼的词“赤壁怀古”，但是基调比苏词低些，流露的情绪是人生空幻，只有天地流水永恒。英雄短暂，跟长流不已的江水比起来，微不足道。长江流水在这里好像化作了那些带点道家色彩的老人，就是下阕里说的“白发渔樵”。用旁观社会人生的超脱心态，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里的历史回味挺悠长的，不过，它总是多少带着对现实人生的失望和疏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我们理解这样的感受有它的社会原因。但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也应当明确看到，这样的情感往往不通向积极进取和有所作为。我们应当尽量减少与它们的共鸣！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对水的历史人生意味只能这样粗略地赏析一下。还有其余几类美学意义的水，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最后，我还想说：水之美是个很丰富的话题，我们经常跟水打交道的人，不光要学会欣赏水的美（从现实中欣赏，从文学艺术中欣赏，都可以），还可以用我们的笔来表现它。古人、别人写了那么多水的好作品，为什么河海人就不能呢？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到。

只要去爱，就会有发现；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借用意大利著名学者维科的术语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充满“诗性的智慧”的文化。主客一体，天人合一，从自然对象身上来体悟生命智慧、人生的哲理、甚至社会的法则、伦理的规范等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老子》五千言，可以说，充满了“水”的智慧；《周易》六十四卦，无不是从对纷纭变化的自然现象的体悟来显示社会、人生的变化。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后体之，行之，儒道文化都体现也这种“诗性和智慧”。

科学与文化

钱学森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北京讲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都对这一论断作了充分论述。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一定要加深理解并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在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讨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章很多，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了问题，看来是属于对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认识上有差异。所以我想讲讲有关的背景材料，供大家探讨 90 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时考虑。这些话实际是我今年 10 月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仪式上发言，最后一段话的扩展。

一、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

我最近看到国家科委办的《中国科技论坛》1991年第5期刊登了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同志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研究科技史的同志，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系认识并不一致。国外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比如，前几年，苏联只提“科学技术革命”，不提产业革命；在美国，又有人高唱什么“第三次浪潮”。我认为，我们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

刘振元同志在文章中讲了产业革命，那么，我们也就从产业革命讲起吧。什么叫产业革命？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因为有人不用产业革命，而用“工业革命”这个词。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产业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我们可以搞清“产业”一词的含义。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分析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由于蒸汽机的出现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等的变化。所以“产业”一词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事业，如工业、农业，而是指整个物质生产的事业，其影响涉及全社会。在上古时代，当人们还是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时，是谈不上物质资料生产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出现了农牧业。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开始出现商品经济，即人们不再单纯为个人的生存、个人享用而生产，开始为交换而生产。这在中国，出现于奴隶社会后期，即公元前约一千年。第三次产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出现，这是大家熟悉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出现在19世纪末，即生产不再是以一个个工厂为单位，而是出现了跨行业的垄断公司，也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讲的情况。第五次产业革命即目前正在发生的，国外有人叫信息革命，全世界将构成一个

整体组织生产。

以上我所讲的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产业革命，就是刘振元同志讲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革命。我之所以提出五次产业革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的，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到整个社会发生飞跃。我认为这样分析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产业革命是怎么引起的呢？推动产业革命的当然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又是什么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呢？当然是生产技术的大大提高。这就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概念是毛主席 1967 年首先提出的，并指出蒸汽机、电力和核能核技术的出现是技术革命。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即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技术上的飞跃叫技术革命。按这样的理解，应该说，在古代火的利用，即人类掌握发火、引火、用火的技术，就是一次技术革命。造纸技术也是一项技术革命。在现代，半导体的发现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等，都是技术革命。如果拿这个观点来衡量，预防医学的出现也是很了不起的，属技术革命。系统工程在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技术革命。

这样看来，可以说每次产业革命都是由一项或众多的技术革命引起的。那么又是什么引出技术革命的呢？我们认识到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飞跃，但人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先认识客观世界。在古代，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表达为由总结实践经验所得的感性知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时现代意义的科学还未出现。所以在古代是实践经验引发技术革命。

在西方世界，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引出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即人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飞跃，即科学革命。按照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日心说”的提出是一次科学革命。后来牛顿力学的创立，氧的发现和燃烧理论的提出等都是科学革命。在本世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同时还有量子力学的创立也是科学革命。应该指出的是，人认识客观

世界的飞跃，不限于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中同样有这样的飞跃，也应该是科学革命。按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属科学革命。目前正在孕育着的科学革命有物理学上的超弦论，超弦的尺度比基本粒子还小 10^{-19} 次方，而且所用的时空是 10 维的。这个理论一旦建立，将把目前发现的 100 多种基本粒子统一起来，把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电磁力、引力这四种力统一起来。

综上所述，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这也就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有了科学发现才有跟上来的社会发展。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的飞跃

关于产业革命，马克思曾用过一个词，叫社会形态。马克思用德文表达的“社会形态”这个词，其含义是十分清楚的。经济问题是社会形态的一个侧面，马克思说，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我国老的《资本论》版本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译作“经济社会形态”是比较准确的。后来的版本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从德文到俄文，变成了“社会经济形态”，于是我们也翻成“社会经济形态”，这种译法不很确切。我建议还是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表达方法，即“经济社会形态”。这样的用词，说明经济是社会形态的一个侧面。社会形态的另一个侧面是社会中的人们的意识，按我的认识，可以叫做“意识的社会形态”，而不用“社会意识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可以叫“文化革命”，毛主席早在 1940 年就用过这个词。16 世纪在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文化革命。社会形态的政治侧面可以叫政治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政治革命。人类社会发展，从原

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其初期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政治革命。我们目前进行的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这不是政治革命。归结起来说，社会形态有三个侧面，分别叫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三个侧面都会不断发生变化，飞跃式的变化即革命，分别是产业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物质文明建设，这属经济的社会形态侧面；精神文明建设属意识的社会形态侧面；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属政治的社会形态侧面，可以叫政治文明建设。按照这样的归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分属社会形态的三个侧面，可以叫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环境是地理环境。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比如，据历史考证，西藏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的活动，这与中原地区差不多，但为什么后来发展那么慢？艰苦的地理环境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人对环境也会有影响，人可能破坏环境，也可能建设环境，建设得更适合人类生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地理建设（现在我们的文件中称基础设施），如交通、铁路、水利、通信设施等。据此，我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地理建设问题。那就是说，除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以外，还要加上个国家环境的社会主义的地理建设。

三、人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即科学技术体系

过去人们对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发展到今天，20世纪末期是否还适用？比如，在马克思以前，社会科学不成其为科学，到马克思时代，才把社会科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国家

目前对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是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以分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还有一个艺术研究院。近几年出现了所谓软科学，国家科委有软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什么叫软科学？因为国家科委在国务院各部委职责分工上不能管社会科学，但工作中又遇到一些社会科学问题，怎么办？于是提出个软科学的概念。这都是人为分块建制造成的。

在国外，这种混乱情况更为严重。搞什么政治的、经济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派别很多，一点也不科学。不久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办的《哲学研究》上看到美国的一位大专家叫 George J. Klir 写的一篇文章，叫“二维科学系统”。他说的第一维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理论、推导、实验等结合起来的方法；第二维是信息，即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说法无法统一，只好作为社会信息输入进来，从事他的系统理论研究。我看这位 Klir 教授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乱出点子。

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毛主席就曾说过，我们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也就是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才能搞好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讲得更多，他说：“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由此我们应该站得

高一些，总揽全局，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各种不同对象，有不同的科学部门。而且我们要认真地思考时代的特征。今于离马克思时代又有 100 多年，世界发展了，科学技术大大发展了。我们还要展望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

这样，我们的科学技术体系就不能像老一套那样，只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一个大体系：第一个部门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第二个部门是社会科学；第三个部门是数学科学，因为不管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运用数学手段，因此，数学不能只属于自然科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第四个部门是系统科学；第五个是文艺理论；第六是思维科学；第七是军事科学；第八是行为科学；第九是人体科学；第十是地理科学。这十个部门构成一个体系。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即从这个部门的科学研究成果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它要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通过这一桥梁来指导这个部门的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数学科学的桥梁是数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哲学概括是系统论；思维科学的哲学概括是认识论；文艺理论的哲学概括是美学；军事科学的哲学概括是军事哲学；行为科学的哲学概括可以叫社会论；地理科学的哲学概括是地理哲学；人体科学的哲学概括叫人天观，即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

每一个科学部门又分三个层次：自然科学技术部门最高的层次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实际应用的是工程技术；在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是技术科学，如应用力学、电子学等都属这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自然科学经过 100 多年发展形成的。我认为这十个大部门都应该有三个层次。比如，社会科学的三个层次怎么分？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都是理论性的，这恐怕不行。社会科学也要形成三个层次的概念，其他几个

部门也一样。唯一例外的是文艺，文艺恐怕只有理论的层次，到文艺创作就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艺术。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构筑的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系统，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或者还不成其为科学，而只是一些经验性的论述性的东西，都无法纳入这个系统，只能放在这个系统的周围。对于这个系统周围的东西，我们并不排斥它，凡是发现有用的，都应吸收进来。所以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断演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内容会发展变化，会有新的大部门出现。所以构筑科学技术体系是长期任务。

四、用科学技术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说的“科学技术”就不只是自然科学技术，而是我以上所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包括十个大部门，每个部门有三个层次，一座桥梁，通往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我这么理解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例如，1991年2月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理论成果。这就是说，社会科学也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由此可见，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科学技术绝非只是自然科学技术。

最近我学习了《陈云文集》，也读了马寅初先生的论文集，^①才知道马老原来并不是学经济的，而是学矿冶工程的，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后来才转到经济学的，所以他一直是联系实际的。他的博士论文不是讲一般的经济理论，而是讲纽约市的经济情况。解放后，他搞经济研究，一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如

他谈人口问题，就是到浙江调查了许多农村后写出的，是从实际中来的，所以是比较客观的、正确的。陈云同志也是一直坚持联系实际，作调查研究，提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和在调查中要“全面、比较、反复”。陈云同志讲的、马寅初同志讲的都很好。但是我感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可能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即用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方法，当然也没有电子计算机这个极为有效的工具。如果我们用我上面所说的，由十大部门组成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技术体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就用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在过去差不多十年时间内，航空航天工业部的 710 所在宋平同志的支持下，用这种现代新方法，也就是把实际调查的材料和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起来，并用电子计算机计算达到定量判断。他们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国民经济中的问题，所得的结果，经过实践考验总是比其他方法更为准确。因为国民经济中的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因此一定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要用电子计算机。所涉及的参数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 100、200 个，计算量相当大，光靠人脑是不行的。所用电子计算机，前几年是每秒 100、200 万次的，这还不够，今后要更高运算能力的机器。现在我们国家有每秒几亿次的计算机，国外近期可以做出每秒万亿次的计算机。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加上这样的所谓巨型计算机，国民经济中的复杂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胆地说，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可以研究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科学决策的方案。

根据这样的想法，前几年我曾建议成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¹ 这是中央作决策的参谋班子，用上述科学方法²开展研究工作，向中央提出咨询建议。我们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对党和国家负责的，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思想库，那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他们将永远死死拽住政治家的衣袖，焦虑地徘徊

在政府与大学之间”。³

五、关于科学技术业

150 多年前，一些生产发达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是先从轻纺工业开始的。42 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没有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是审时度势，看到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世界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明显分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格局更加显明和突出。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想尽快摆脱落后状态，显然不能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在工业现代化方面，首先要大力发展重工业。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明智的。

42 年以后的今天，世界有了很大的发展。面向 21 世纪的挑战，我们的战略决策是什么？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际间的争夺，主要依靠的也是科学技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工作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而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并不弱，而且中国人聪明，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建议建立我国的一种第四产业——科学技术业，作为今天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因为总结过去，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了“两弹”，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组织得好。现代的重大科学技术都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干成的，甚至不是一两个单位能干成的，要靠组织，所以组织工作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美国人现在就自感组织工作不如日本。我们目前也存在一个有效组织的问题，科技界单项成果不错，但集体力量的发挥就不够。为了解决科学技术工作散的问题，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我建议请中央考虑建立科学技术业。科学技术业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等，而是

要把他们的成果组织起来，而且用组织起来的手段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个手段就是组建科技业的公司，它在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负责全国的科技发展工作，是垄断性质的公司。比如，在半导体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建立一个总公司，这个总公司通过合同手段协调全国半导体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而合同的招标、签订，按竞争的原则办。科技公司的成果是出新技术、技术专利。这些公司属国家所有，享受国家大、中型企业的政策待遇，其成果不仅面向国内，而且面向国际。去年，我国科技成果出口创汇大约 10 亿美元，还不到世界科技成果出口的 1%，所以这项事业是大有可为的。

要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使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得到应用，仅有各个领域的科技公司还不够，因为每一个单项技术要应用到生产中去，还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它根据工厂的需要，吸取可用的成果，将一项项单个成果综合设计成生产体系；并负责培训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前几年我曾就此事向航空航天工业部提出建议，最近他们设立了一个航空航天系统工程中心，就是做这种转化工作的。

归结起来讲，今天当我们面向 21 世纪，面对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体的办法就是建立科学技术业。科学技术业包括：（一）我国现有的科技力量，包括各种科研院、研究所等；（二）为了进一步将这些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建立各种科技专业公司，组织开发各种新技术，出技术成果，出专利；（三）为了将这些新技术成果尽快在生产中得到应用，要建立各种综合系统设计中心，或者由各部门现有的设计单位承担这一任务。这是我关于建立科学技术业的具体建议，请中央考虑，下决心把这一事业建立起来。

六、关于人才培养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讲到学习的重要性。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 70 周年的讲话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强调了提高干部水平的重要性。对此，我完全拥护。关于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据我所知，西方发达国家是到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才开始有培训工程技术人才的学校。美国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建立的。它实行四年制，培养工程师。前两年学科学的基础理论，包括物理、化学等；后两年学专业技术，毕业时作毕业设计。经过这四年的学习，培养出一个能到工厂去负责技术工作的工程师。这样的工程师与瓦特那样的工匠不同，他具有基础理论知识，能适应新的发展并能创造性地工作。这套教育体制后来流行于全世界。我过去上的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就是实行的麻省理工学院这套教育制度。后来我到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在交大作的实验都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

到本世纪 30 年代，这套教育体制的缺陷就逐渐显示出来。当时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用麻省理工学院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很难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而从本世纪初，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开创了所谓应用力学专业，将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联系起来，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后来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发展完善了这套教育体制。具体作法是适当减少了一点工程课程，加强基础理论的教育，而且将学制延长到 7 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科学知识的基础要坚实得多，各种新的发展都能跟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教育思想已被普遍接受。

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到今天，世界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我们要面向 21 世纪，加州理工学院这一套教育制度还能适应今天的形势吗？我曾经向中央领导建议要培养科技帅才，那套老的教育体制能培养出帅才吗？我认为是不行的。所谓科技

帅才，就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专家，他要全面指挥，就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要能敏锐地看到未来的发展。怎样培养帅才？我提出五点建议：

（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帅才要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真正下点功夫。

（二）要了解整个科学技术，即我前面所讲的十个部门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情况，即要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态。杨振宁教授最近提出到图书馆去翻翻，我看这很重要。多到图书馆去看看，从中发现新动向，然后组织人去研究，帅才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要了解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情况。

（三）要学习世界的知识，如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等，要了解它的起因、历史，等等，这样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战。

（四）当今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竞争实际上就是打仗，所以要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也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

（五）学点文学艺术，它可以培养一个人从另一角度看问题，避免“死心眼”和机械唯物论。老一代革命家文艺修养都比较高，是我们的榜样。

当然，帅才还要身体健康。

最后我要说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艰巨事业。但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总结世界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切应当在 90 年代有个良好的开端。

【注】

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10．16

刘振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认识与探索．中国科技论坛．1991（5）1～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版）．人民出版社，1991：696

钱学森，孙凯飞，于景元．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学研究．1989（5）1～10

于景元，王寿云，汪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理论和系统工程．科技日报．1991．1.21，23

G．J．克勒．信息社会中二维的科学的出现．哲学研究．1991（9）44～52

列宁全集．（新版）第39卷，298～299

钱学森，吴义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

人民日报．1991．2．24

①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 钱学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党和国家的咨询服务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2）10～22

2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1990（1）3～10

3 世界各国的思想库．参考消息．1991．10.21，22，23，24，25，26

原载《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讲演时间为1991年11月5日。

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供稿

杨振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在南京大学讲演]

1400 年以前，中国科技领先于欧洲，科技交流的主体是从亚洲移向欧洲的。这是所有研究科学技术史的人所公认的史实。1405 年至 1433 年间，郑和曾七次下西洋，当时用了 60 只船，最长的一只有 440 尺长。明初的造船技术能否有如此先进，西方一些历史学家有所存疑。到 1962 年，南京发现了一只舵轴直径 1.25 尺，高达 36 尺，这么大而粗的舵轴发现后，国际上便一致公认：15 世纪初年，中国科技超过了西方。

15 世纪以后，中国没有发展超过自己过去的科学技术，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后还受了这么多的屈辱，中国科技为何如此之弱？到了 20 世纪中国科技有什么新变化？21 世纪又会如何？这些都是我在这里所要阐述的主要话题。

一、15 世纪以后的 200 年间，欧洲科技勃起，中国大大落后

15 世纪以后的 200 年中，欧洲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像培根、笛卡尔等，他们为科技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在中国同期的思想家中，最突出的要数王阳明了，然而他对于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却远远小于西方思想家。

1993 年，我在澳门看到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当时我感慨

万千。因为到了明末，中国科技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了。明朝皇帝为了抵御清军入关，到澳门去找葡萄牙人，邀请葡萄牙人教明代军队打造火炮。这 200 年间，中国古代科技远远落后。

二、17 世纪初，近代科技产生

现代科技的产生不是一两个人的贡献，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经过了几个世纪累积起来的一个崭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大发展。

而 1687 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无疑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从这本书开始了近代科技的发展。这本书里有一章：System of the World（宇宙的系统），讨论了太阳系的结构：行星是如何围绕着太阳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诚然，行星绕太阳以椭圆形轨道运行不是牛顿最早发现的（开普勒是第一个发现者）。然而，却是牛顿引用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三大定律、牛顿发明的微积分将行星轨道运行规律变成了三个方程式。这是对人类历史有巨大影响的杰出事件。它告诉人们，自然界有非常准确的规律，这规律可以用非常准确的数学语言加以描述，掌握了这些语言之后，可以作最精确的预测。

牛顿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如在引理“椭圆”一节中，他是用平面几何的形式陈述的，书的结构是公理、引理、定理、证明、推论，可见牛顿深受《几何原本》的影响。

凑巧的是，同期的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接触到《几何原本》。1607 年，明末的徐光启，与利玛窦已经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在他们翻译的《几何原本》上有“泰西利玛窦口译，吴淞徐光启笔述”的字样。

再看汉译《几何原本》及其序言，以及徐光启的另外一些文章，你会发现徐光启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

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三似三实”：“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意思是说，几何里的东西，不要被表象迷惑，抓住精神实质就会很容易。这种讲究秩序的推理方法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没有的。徐光启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这表明他非常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精神。他在一些文章中还说，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就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

可惜徐光启与利玛窦未能将全书译完。他在序言中不无遗憾地写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也。”

这一等就等了 250 年，直至 1857 年，清朝晚期李善兰与 A. Wylie 合作方将该书后半部分译完。

这 250 年是人类发展史上关键性的时代，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工业革命在欧洲产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力。而中国却大大落伍于世界发展。

三、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公认的有这么四条：

第一，中国这些年中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思想完全为皇帝政府所控制。第二，传统思想中没有出现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发生正面兴趣）。第三，中国长期实行的科举制度对科技发展极为不利。最后，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系统。

我认为至少还有其他原因：

其一，不能够接受西方人及其学说。清初士大夫中盛行的“夷夏之辨”便是典型的例证。

其次，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到中国不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而是传教。这一点，中国士大夫很清楚。因此，他们对传教士很排斥。

第三，因为传教士本身不是科学家，他们接受过一些西方教育，可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西方科技。因此，不同的西方人引进的天文有时是彼此冲突的，而这些冲突令中国天文学家怀疑整个西方科技的可靠性。

这里有一个抗拒引进西方历法的例子。明末清初，有个“钦天监”（政府管天文的官员）叫杨光先，他有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在他的参奏下，康熙曾判了传教士汤若望死刑（后没有执行）。到了1846年，有个叫钱乙的学者对杨先生下了这样的评语：“正人心，息邪说，孔孟之后，一人而已。”这说明杨光先那种思想在士大夫中有很大的市场。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科技冲击时要改变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还有一种“西学中源”的学说，也阻碍了西方科技进入中国。清代数学家梅文鼎“几何即勾股论”，以及“推知欧罗言，乃与周髀同”等均为这种学说的反映。

此外，大学者俞樾的“西技乃奇技淫巧，只求道而无根基”，中华文明能“以巧制拙”，在当时有普遍性。还有一些怪论，像汉民族“种族退化论”，“取消汉字汉语论”，则反映了在西方科技面前的自卑心理。

四、20 世纪前 50 年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技

20 世纪前后 10 多年，有几件事对中国科技发展有重要影响：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培养、造就近代科技一流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学堂；

同年，中国选派留学生去了日本；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这对改变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结构、知识结构有重大冲击力；

1907 年，中国许多学生踏上去欧美留学的征程。至此，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已愈万人。

在留学生中，第一批去欧美的人在国内都没有接受过西方科技，到国外多年没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教育培养了第二批人。第二批人中已在国内接受了近代科技的人到了国外读到硕士、博士，回国后对科技引进影响更大。

中国最早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有三位：王守俊、周培源、吴大猷，后两位是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我是有中国血统而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第 16 位。

综上所述，20 世纪头 50 年，中国两三代留学生高速引进了西方科技，其中有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沿。

到此为止，西方近代科技是否已经在中国本土化，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时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还很少。50 年代初，我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当时才 30 个人参加。尽管与会者有的已达到世界前沿，但人数太少，不成气候。而且当时引进的科技前沿还不太多，何况，中国当时还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来支持尖端科技。第三，战争导致了经济动荡，生活不安。这不利于稳定科技研究。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中国科技达到世界前沿，但本土化尚未完成。

五、50 年代至今，中国科技达到世界前列

1950 年以来，中国训练了大批人才，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并在许多领域雄踞世界前沿。50 ~ 60 年代，中国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解放前，西南联大是最好的大学，物理系只有 10 ~ 20 人，而 50 年代，中国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已有 2000 多人。这表明中国政府是有远见卓识的。没有这批人才，不可能在 1964 年爆炸了原子弹。1971 年我访问了新中国，对中国 26 年间造就的大批优秀人才深为赞叹。回到美国后，我

将名字的缩写 C.N.Yung 改成了 Zher ning Yung。我担心中国再有一个 C.N.Yung，与我的名字混淆。

尽管中国大陆目前很多硬件还不尽如人意，浦口校区（指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编者注）的电梯也没有美国学校的好，但要以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且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科技还是史无前例地发展起来了。

与之相应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在科技上的自卑感没有了。外国人也不敢小觑中国人。国防武器的成功震惊了世界，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这些成果给西方人的震惊，也不是在座的年轻人所能完全理解的。此外，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杰出表现令美国人侧目。先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留学生，改革开放后是内地的留学生，在美国高等学府总是被众多师生赞叹，赞叹他们勤奋、刻苦、聪明。

六、我对 21 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中国有数不清的可以造就的优秀青年。

儒家的传统，注重人伦、勤奋、忍耐与教育，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努力的青年。

儒家传统中的保守性所造成的封闭现象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科技的热忱。有了这个热忱，中国科技前途光明。

中国的台湾、香港、内地经济发展，是 20 年来举世公认的奇迹，到 2050 年，大陆与台湾的 GNP 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

以上四个条件是科技发展所必备的。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有了这四条，我对中国科技在 21 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中国大陆正面临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这令人头痛；中国尚存在着 1 亿多的文盲；

祖国尚未完全统一；西方对中国虎视眈眈，等等。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我的回答是：只要看中国在 20 世纪的发展，就可以明白了。中国在 20 世纪碰到很多问题：先是推翻清政府，然后是民国各派军阀混战；接着日本人又侵略了中国；解放战争爆发；解放后又经历了各种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些对中国发展都有着致命性伤害。可是在这些困难面前，中国科技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道理很简单，科技发展只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经济支持，这些中国都具备，因此我对中国科技发展抱极其乐观的态度。

南京大学教务处供稿

黄新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 探讨近代中国科技落伍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作为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同时作为对民族、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爱国者，杨先生对此有自己的思考。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未来。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使得中国的科技事业得到飞速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的发展，除科技自身的因素外，还要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重理工轻人文，最终可能连理工也不能发展好。

徐利治 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

科学文化人与审美意识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一、科学文化人的一般涵义

人类社会已经处在由工业社会快速地转变成为信息社会的历史时期，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为这种转变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是创造和发展物质技术条件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具有发明创造才能的科技工作者群体，而这个群体的成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怎样培育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科技工作者便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所谓“科学文化人”就是泛指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科技工作者。显然，大学理工科学学生和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应该是作为较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来培养的，因此在文化素质的塑造上也就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关于“审美意识”的素质要求更具有重要意义。

二、审美意识的重要性

所谓“审美意识”，就是人们感受、鉴赏，乃至创造各种美好事物的一种自觉的心理状态。它是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要关心

的问题。我觉得还要强调指出，它也是教育家和一般科学家都必须重视的问题。

显然，人们感受和鉴赏美好事物的能力因事而异，也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审美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对象领域不同，审美意识和能力也大相径庭）。

例如，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如果一点也不懂中国的草书艺术，那末他对中国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书法就不可能产生审美意识，但是如果乐队指挥懂得并能鉴赏中国书法的话，则对其指挥水平之提高或能有所借鉴帮助。又例如，一个雕刻家或舞蹈艺术家，如果很缺乏数学知识，那末他也不可能领会“数学美”。

事实上，数学美和文学艺术美确有不少相通之处，大凡具有创造性精神和发明能力的科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数学和文学方面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正因如此，就培养有创造性的科学文化人而言，上述审美意识的培育就有其特殊重要性。

当然，美好事物一定要具备某些美的特征才能让人们感受其美，鉴赏其美，那末，什么是客观上的“美的标准”（美的特征）和主观上的“审美准则”呢？一般说来，标准和准则应该是一致的，特别是对数学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而言是如此（当然，在艺术领域与人文科学领域会有许多“例外”情形）。

这里不妨略举数例，借以说明审美准则与美的标准的意义。

例如，一般人常常会惊叹一个困难问题的简易解答，或一个极复杂问题的极简单答案，并把它称之为“漂亮的解法或优美的结论”。所以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简单性”与“简洁性”可以说是一条公认的审美准则。

人们往往喜欢（喜爱）种种对称性的图案、建筑物、衣服式样、家具及装饰等等，这表明事物的“对称性”（包括客观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对称性规律）也是一条符合审美意识的重要标准。

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性，人们总是喜爱那些具有和谐性的、有规律性的事物，而对于混乱不堪的、杂乱无章的一些事物，往

往希望去理出一个头绪来，或是乐于从中发现出某些具有普遍性或统一性的秩序和规律。这说明“和谐性”、“秩序性”、“规律性”与“统一性”等，也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审美标准。

人们去野外山地游览时，偶尔发现一堆奇花异草，或是去海滩散步时捡到几块（光泽色彩极美）的贝壳或石块，会感到美不胜收。这又说明“奇异性”也会带给人们以一种美的感受。

综上所述，凡是事物所呈现的某种简单性、对称性、和谐性（秩序性）、统一性与奇异性等特征，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都是符合美感的属性，也往往是人们在生活与工作实践中喜欢去追求或是去创造的东西。

进而，作为反映客观事物关系与规律的人脑思维（包括形象思维、概念思维与逻辑演绎思维等），其本性也总是自觉或半自觉地力求按照上述美的标准（或审美准则）去完成所希冀的“思维产品”。弄明白这一真理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古代的欧几里得（Euclid）会自然地想到采用公理化方法去写出他的不朽作品《几何原本》；

17 世纪的牛顿（Newton）会想到引力定理和三条力学定律（公理）去完成他的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近代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Einstein）会成功地想到去引入“光行距度量时间”这一极简单而自然的物理公设（公理）去建立他那符合真、善、美标准的《狭义相对论》；

还有，现代的宇宙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竟会想到通过某些简单而自然的假设，力图利用统一性的观点，去阐明从大爆炸到黑洞的宇宙演化的物理结构规律，还写出了驰名全球的读物《时间简史》。

这些例子表明，欧几里得、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无疑都是具有极高水平的审美意识的人物。他们的贡献和成就，反过来又足以证明审美意识对寻求科学真理的重要作用。

三、创造能力与审美意识

上面，已经初步点明了创造发明能力和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包括自然界以及人类通过劳动创建的世界）是处在有规律、有秩序的普遍联系之中，其本身就具有种种优美的、和谐的、统一性的或是奇异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化规律，因而科学家们要去探索、发现并通过思维去表现其规律时，也就必然要遵循“美的准则”才能有济于事。这样，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科学家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力和审美意识直接相关的必然性。

一个人的审美意识越强，其审美能力就越高，从而其创造发明（发现）的才能也越高。我们还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如此说来，多年前我和隋允康教授一篇合作文章中讨论过的“创造力公式”（见1987年出版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第三期，题名“关于数学创造规律的断想及对教改方向的建议”）：

$$\begin{aligned} \text{创造力} &= \text{有效知识量} \times \text{发散思维能力} \\ &\quad \times \text{透视本质能力（抽象分析能力）} \end{aligned}$$

就可精化为下列形式：

$$\begin{aligned} \text{创造力} &= \text{有效知识量} \times \text{发散思维能力} \\ &\quad \times \text{抽象分析能力} \times \text{审美能力}。 \end{aligned}$$

大家知道，本世纪初叶德国心理学家斯特恩（Stern）和美国心理学家推孟（Terman）曾相继提出并研究了“智商”（IQ）的概念，后来还有比纳—西蒙的“智力测验表”。我这样想，如果把“发散思维能力”简单地归结为“联想能力”，把“抽象分析能力”代之以“概括能力”，那末上述创造力公式右边的第二第三个因子项便可通过某些智力测验表，对特定条件下特定对象（个人）测量其数值；第一个因子项（有效知识量）也是不难测定的，看来只有“审美能力”这个因子很难测算其数值。这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记得多年前辽宁教育学院的王前教授曾和我研究过“数学美”的量化问题，我们的观点是，“美的程度（量级）”是和某些属性的“反差”成正比的。因此建议用反差的大小程度来作为美的程度高低之划分标准。那末，什么叫做属性反差呢？

比如，问题的难度很大，而解答却十分简易，则就表明两者的反差很大。再如，在一堆极平凡的事例中却发掘出某种很奇异的对象或性质，则表明其反差也是很大的。一般说来，属性的反差越大也就表明“奇异美”的量级或层次越高。

显然，只有高品位的审美能力才可能辨认出或选择出高层次的“奇异美”，反过来，又可通过对不同层次“奇异美”的辨识能力（选择能力）的测试来判定一个人的审美能力的高低。

看来如何去编制出反映各种“反差”的测试方案作为度量“审美能力”的工具，应该是实验创造心理学领域中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只要这项课题研究获得了好的成果，则前面所说的创造力计算公式就会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四、培育审美意识的途径之一——发挥数学的美育功能

由于数学是一门十分抽象的纯理性科学，尤其是高等数学，有它特定的一系列符号表现形式及远离日常生活的抽象术语，因而使许多人都误以为数学是一门枯燥无味而严酷的学科，似乎与美育无关。实际上，数学是一门最美的科学（19世纪的大数学家高斯（Gauss）就说过“数学是科学中的皇后”），它对于塑造优美的人性来说，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与功效。

早在16世纪末担任过伦敦市长的英国数学家兼教育家比林斯利（Billingsley）就发现了数学具有美化人性的功能，他说：“许多艺术都能美化人们的心灵，但却没有哪一门艺术能比数学更有效地修饰人们的心灵。”上一世纪欧洲的一些知名的教育家

和哲学家还发现“数学具有制怒的作用”，“数学教育能使粗心的青少年变得细心，能使性格粗暴的人变得温顺起来”，“数学还教会人们客观地、公正地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数学能杜绝人们的主观偏见，还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并能增长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毅力”。

人们早已发现，数学中的美的标准和一般美好事物的一些美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表现为或归结为简单性、统一性、和谐性、对称性、奇异性等等。大家可以从徐本顺、殷启正合著的《数学中的美学方法》（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和卢锷、尹国敏合著的《数学美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两本书中看到关于数学美学的详尽而深入的论述。

正因为数学的理论和方法往往高度地、深刻地反映出美的特征，所以很自然地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并能使人们在学习研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遵循数学的审美准则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人们学习和研究数学，最能有效地去增长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欧美的传记作家有时喜欢将数学家和诗人以及艺术大师相提并论，无疑也是从他们都有高度审美意识的共同点来考虑问题的。

由上所论，可知数学具有重要的“美育功能”，因此理所当然地数学教育必须成为培育高素质科学文化人的最重要手段。更何况数学本身还具有“技艺功能”，它还是科学文化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得力工具。

五、培育审美意识的最佳途径——文理结合与文理渗透

现代的人们都已很清楚，人的大脑两半球有着不同的思维功能。左脑主管收敛思维，即逻辑分析、抽象概括、推理演绎等理性思维；右脑主管发散思维，包括想象、直觉、猜想、审美等形象思维。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又常常称之为“左脑思维”与“右

脑思维”。

一般认为，理科教育能开发和提升左脑思维的能力。而文科教育和艺术教育能开发和增长右脑思维能力。一个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要全面地开发和提升，显然只有通过文理科结合与文理科相互渗透的教育、学习途径才能达到目的。不幸的是，现代大学理工科教育与文科教育的全面分离，使大批青年人都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全方位开发和增进大脑功能的机会。

事实上，高素质、高水准的审美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是需要依靠大脑功能的全方位开发才能有效地实现的。对人们来说，尤其是文学艺术音乐的爱好和熏陶，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审美意识的深层次发展，而有助于科学创造发明才能的增长。

从科学史上我们可以到处见到，凡是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还有数学家，大都是文理兼通的人物。例如，笛卡儿 (Descartes)、巴斯卡 (Pascal)、牛顿、拉格朗日 (Lagrange)、哥西 (Cauchy)、高斯、维尔斯特拉斯 (Weierstrass)、庞卡莱 (Poincare)、希尔伯特 (Hilbert)、爱因斯坦……都是能写出一手漂亮文章的人物。他们都喜爱文学，有的人甚至对诗歌音乐还有很高的造诣。无疑，他们之所以能对人类文化作出不朽的功绩，都和他们左右脑思维功能的全面开发和高度发展有关。这些人物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极高水平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他们的创造性成果都闪耀着美的光辉。

记得我小时候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圆内接任意六边形的三双对边的延长线的交点共线”的巴斯卡定理时，曾感到惊奇不止。后来我又读了巴斯卡小传，十分好奇地得知，这位科学家（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竟然在法国的文学史上还有点重要地位。真是意想不到！

在大学时代，我学了“哥西积分定理”，感到其美无比。后来我读了哥西传记，又一次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数学家的哥西曾在意大利的一所大学讲授过文学诗词课，并且出版过一本

《论诗词创作法》的小册子。原来哥西的文学造诣也是很高的。

为什么文理结合与文理渗透特别能促进人们创造才能的提升和发展呢？除了可以联系大脑功能的全面开发说明其理由外，我想另一重要理由是，因为文学艺术的审美和数学的审美都需要相应的直觉、想象和形象思维，故两者具有相互间的比拟及暗示作用，且审美能力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不妨将数学创造与文学创作略作比较：数学构造事物关系的“量化模式”或“模型”；文学塑造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典型故事或“文学典型”。前者采用符号术语及逻辑演绎形式；后者采用语言文字及形象化的描述形式。两者都离不开关系直觉和形象思维。数学模型和文学典型都是经过从具体到抽象过程的某种抽象思维的产物，它们都遵循相似的审美准则，它们都来源于实际又高于实际。

数学模型的构造，往往需要科学归纳和分析；文学典型的塑造，也需要从实际生活中进行观察、归纳和分析。它们都需要通过特征分离、概括等思考过程，故两者在方法论上也很相似。

文学创作中还需要美好的情景和理想的意境，数学创作中同样需要优美的意境和理想的图景。这就说明为什么数学中的重要成果也常常显示出艺术美，因而使数学家能享有艺术家同样的乐趣。关于这一点，庞卡莱就曾说过：“一个名符其实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工作中体验到和艺术家一样的印象，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同样伟大的东西。”

如果同意如上的论述，就使我们更加确信，受过良好的文科教育的科学家，或者是爱好文艺的科学文化人，将比一般科技工作者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为人类社会做出美好的贡献。

上述论述自然会使我们获得这样的结论：只有文科、理科、工科高度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才是最有利于培养有创造发明才能的科学文化人的理想环境。由此还可以预言：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里，世界各国必将有更多的文、理、工、商、法、医、农相结

合的综合性大学建立起来。年轻一代无疑会看到这种即将出现在新世纪里的新的历史现象。

六、审美意识与德、智、体的关系

前面已经指出，审美意识是科学文化人应该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这种素质表现为审美能力，直接关联到创造能力。因为创造能力的培养是“智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审美意识的培育也就构成“智育”的重要环节。

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有助于人们去辨识并且寻求真、善、美的事物，而且会在情感上很自然地去热爱并珍视美而好的事物。因此，审美意识的培育显然是和“德育”相辅相成的。一般说来，人的审美意识的水平越高，则其德性和悟性也就会越高。反过来，很难想象有严重道德缺损的人，能有真正健康的审美意识。

事实上，审美意识植根于人们最深层的灵魂部分，从而部分地支配了人们的情操、道德价值观念和精神境界。

下面我想探索一下审美意识的培育及其发展为什么有益于人体健康状况的增进和保持，也即要说明审美意识与长寿的关系。

因为审美意识联系着右脑思维活动，它和人们惯用的左脑思维活动构成了交互为用的“平衡互动关系”，这就大大促进了全方位的大脑机制的健康运动，又由于存在这种长期维持着的脑神经系统的均衡运动，从而也就延缓了整个大脑的衰老过程。既然大脑是全身的控制调节中枢，它的健康和活力的恒久保持，也就相应地保证了全身健康的恒久保持而不易衰老。这就是为什么一贯兼用左右脑思维而富于审美意识及创造精神的科学家常常能享受高寿的原因所在。

此外，审美意识还有助于科学家对于不断获得的美好科研成果的“自我鉴赏”而自得其乐，这是促进长寿的另一原因，它成

为与长寿有关的“心理因素”。

以上我们就健康与长寿问题分析了大脑机制活动的“生理因素”以及与精神状态有关的“心理因素”，从而全面地阐明了审美意识活动和人体健康长寿的因果关系。

为了佐证上述论断的合理性，我曾翻阅了已故数学史名家梁宗巨先生于 1990 年赠送给我的著作《数学家传略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发现有许多杰出的近、现代数学家的寿命都是 80 岁以上。有一批著名数学家还享寿 90 岁以上，例如阿达玛（Hadamard）、瓦莱普桑（Vallee-Poussin）、罗素（Russell）、维诺格拉多夫（Winogradow）、范迪维尔（Vandiver）、赛格（Szego）、波利亚（Polya）、内隆德（Norlund）等等。这些数学家无疑都是左、右脑思维特别发达且极富于审美意识的人物。其实，在我们中国享寿 90 岁以上的老一代数学家也不乏其人。例如，最早将“拓扑学”引进到中国来的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数学家江泽涵先生，还有最先将“泛函分析”移植到中国来的对“希尔伯特空间算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曾远荣先生都享寿 92 高龄。又最近逝世的中国“复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卓越数学家李国平先生也享寿 86 岁（如果不是因为早年抽烟喝酒太多，享年 90 也是不成问题的）。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曾于 1991 年送我一本《李国平诗词选》（又名《海青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老一代最著名的几何学家苏步青老先生（年逾 94 岁）还曾为李先生诗集写了如下的颂诗作为代序：

名扬四海句清新，文字纵横如有神。

气吐长虹连广宇，力挥彩笔净凡尘。

东西南北径行遍，春夏秋冬入梦频。

拙我生平偏爱咏，输君珠玉得安贫。

此诗多美啊！这表明苏老和李先生一样，也是一位文才出众的数学家兼诗人。

还应提到的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已故的老师之一华罗庚先

生，他不仅在数学的多个领域有卓越贡献，而且他的诗词和科普文章也是第一流的。可惜他曾在 14 岁时患了一场几乎送命的伤寒病，严重地伤害了心脏，以致只享年 75 岁就过早地逝世了。如果没有早年的不幸，无疑也会享寿 90 岁以上。

听了以上的介绍，相信大家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具有审美意识的数学家和画家、艺术家很相似，在正常情况下大都能享受高寿。当然，我们并没有忘记数学史上也有好几位短命夭折的数学家（如 Abel, Galois, Ramanujan 等），但他们都是在特定的不幸环境中才有那样的意外遭遇。我们在作一般性论述时，自然可将特例除外。

张国杰整理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 演讲者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在自然科学家中，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美最多。当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按照美学的原则去修改公式时，他们惊异的发现，越是符合美学规律，也就越真实，越符合失误的本质。这一现象，美学家称之为“以美启真”。由此可见，加强审美修养，对科技工作者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因为审美修养的高低，不仅是一个人的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科学研究中必备的素质之一。

钱学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学森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新见地

[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演]

千百年来，科学与艺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互相促进、丰富、创新，像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滚滚向前，谱写着人类文明的壮丽诗篇。

科学与艺术的结缘或分离，涉及科学与艺术自身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钱学森教授几十年来，不仅为火箭和导弹腾飞、人造卫星上天奉献着心血和智慧；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等诸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奋力开拓；他还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提高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而认真探索，思绪翩翩，时常有一些高识远见，在他的著作、文章、书信与谈话中闪现。

现就我所搜集到的和能够理解的部分，略述其一斑，并向大家请教。

一、文学艺术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教授总结 20 世纪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成果，特别是一大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他认为把它们全部都简

单地归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科学门类已不适宜了。于是，他提出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构想，目前暂包括 11 大科学技术部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文艺理论”，包括文艺创作、文艺活动及其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美学，如下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认识客观和主观世界的科学														哲 学
性 智		量 智												
		文艺活动	美 学	建 筑 哲 学	人 学	军 事 哲 学	地 理 哲 学	人 天 观	认 识 论	系 统 论	数 学 哲 学	唯 物 史 观	自 然 辩 证 法	桥 梁
			文 艺 理 论	建	行	军	地	人	思	系	数	社	自	基 础 理 论
				筑 科	为 科	事 科	理 科	体 科	维 科	统 科	学 科	会 科	然 科	技 术 科 学
			文 艺 创 作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应 用 技 术
实践经验知识库和哲学思维														前 科 学
不成文的实践感受														

(注：此表系钱学森 1993 年 7 月 8 日绘，1995 年 12 月 8 日略作修改，1996 年 6 月 4 日增补。)

这是一个各门科学技术（包括文学艺术）互相贯通、相互促进、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各门科学技术知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深化，不断丰富、提高，永无止境，日益趋近于绝对真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涵盖的科学技术部门也将不断扩大。例如，最近钱学森教授看

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新兴城市纷纷崛起，来势迅猛，城市规划与建设亦喜亦忧，任重道远。他主张建设“山水城市”，并且提出把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建筑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大科学技术部门建立起来，列入体系，指导我们的未来建设。

把文学艺术归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作为一个相互关联、难以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并不是随意而定，随手划入的。这是由于客观世界本是纷繁复杂、变化多端、日新月异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运动形态、矛盾特殊性。然而它们又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形成各种系统交织在一起。各门科学的差别，无非是我们从研究问题或看问题的方法或角度之不同来加以区分的，其实，它们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艺术的研究对象）都是统一的、同一的，即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和人化自然在内的整个客观世界。

艺术与科学一样，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客观世界，积极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认识，又反作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但是，艺术作为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审美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与科学似乎又有很大区别，不仅其形态、风格、手法可因创作者不同而千姿百态，气象万千，而且艺术注意的侧面也往往是在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能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具有各种审美特征的具体生活现象。即使是对大自然景象的描写，其角度和意义也往往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家走到野外，注意的是地质、地貌、动植物的生态特征；艺术家走到野外见得山花翠谷、溪水清流，正好借景寓情。但是，如果艺术家也有一些地质、地理、生物科学的知识，那他的观察与体验会更深，他的创作定将景更美、情更浓。

文学艺术固然是侧重以人为研究对象，用真善美塑造人的灵魂的，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与整个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息息相通，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的经济发展

状态、动乱与兴衰，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健康、精神与情感。因此，钱学森教授认为：一位艺术家要对人民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引导，就“必须对人民所在的现实世界有所认识，要认识现实世界就必须学习全部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正确的哲学）”。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大概也是指出，文艺人要有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才能写出好诗吧。

因此，钱学森教授把文学艺术归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作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肯定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大部门；又揭示了艺术与科学一样，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需要有正确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也指出了科学与艺术在本质上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不难设想，钱学森这一重要的科学思想，定能为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为祖国的文明建设照亮航程。

二、科学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方式

从科学家与艺术家的思维素养上来看，科学与艺术原本就是难以分离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文学艺术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虽有其特点和特殊的地位，但其内容、思维方式与科学技术是互相贯通、互相促进、融为一体的。

钱学森教授认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最后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科学与艺术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统一的，科学与艺术是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以不同手法，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理。

从前面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图中可以看到，钱学森教授借鉴老哲学家熊十力把人的智慧分为“性智”、“量智”的观点，加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与发挥。他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

种文艺活动归为“性智”，把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十大科学技术部门归为“量智”。

“量智”侧重在科学技术方面，是研究事物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所获得的知识，并掌握其“临界点”或“度”。“性智”侧重在文化艺术方面，主要是从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上，从事物的“质”上入手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所获得的成果和知识。钱学森教授十分重视“性智”的培养，他强调说：“大科学家尤其要有‘性智’”。

从思维方式来看，“量智”——科学技术思维，往往侧重于逻辑思维，即具体分析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各个层次及其互相关系，加以严格、冷静的逻辑推理、科学试验、综合集成，去把握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发展规律；“性智”——文学艺术思维，往往侧重于非逻辑思维，即通过直观感受、灵感、潜意识等，运用形象思维和丰富的情感，去领悟、去想象，形成对事物完整的认识，从光怪陆离、变化莫测的现象中，探寻出深刻的本质。

科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虽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不是相互隔离的。只注意逻辑思维，埋头于细节，易犯机械、片面的毛病；只注意非逻辑思维，仅仅跟着感觉走，浮于幻想，易犯主观、表面、抓不住本质的毛病。必须自觉地把它们结合起来。钱学森教授曾以自己与艺术家夫人幸福生活的感受为例说，40多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教授一贯注意把科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这恐怕与他的良好的文化素养有关。他不仅具有渊博的

科学技术知识，心中有一个广阔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拥有一个绚丽多采的艺术世界。他倘佯在科学与艺术世界之中，因而，思路广阔而灵活，思维之花长盛不衰。

当他进行科学研究遇到难题，单靠逻辑推理百思不得其解时，转而靠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去思考，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音乐的梦幻、绘画的神韵、诗歌的意境……往往渗入他那缜密的、科学的思维之中，送来一缕活泼的灵气、新奇的启迪，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去年，钱学森教授对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作了具体而精采的分析。他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半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科学家在运用理性的逻辑思维进行创造发明的过程中，其丰富的想象力、对客观世界敏锐的洞察和独特的视角，以及从灵活多样的途径捕捉真理、表现真理的方式和执着求索的热情，无不与艺术的修养、艺术的形象思维相联。同样，艺术家在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之际，如果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先导，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与科学分析，进行逻辑思维，其艺术作品也难以显示出崇高的精神境界与无穷的魅力。曹雪芹的《红楼梦》、贝多芬的交响曲、精美的传统手工艺品，以及东方的园林、现代的工业美术等等，无一不是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结合绽开的鲜花、结出的硕果。或许可以这样说：科学思维 + 艺术思维 = 创造性思维。

三、科学与艺术结合——群星之路

钱学森教授时常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外历史上以至当代，许多学者、科学家不仅热爱艺术，而且是位艺术家；许多艺术家在科学上也有很深刻的理解和成就。他们往往是集科学、艺术、哲学于一身的“大成智慧”者。钱学森教授赞赏他们由于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和艺术修养，能够把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结合起来，因而能够找到智慧之源、创新之路、成功之奥秘，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例如：

东汉的张衡（78～139年），为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的代表。认为宇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极限的，“元气”这种客观物质是世界的本源，他描述了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他在132年制造出的世界第一台测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科学而精美。还制造了指南车、记里车等。著有数学名著《算罔论》。所作《地形图》流传到唐代。而他又颇具文采，他的《二京赋》、《思玄赋》、《归田赋》、《四愁诗》等诗赋，抨击宦官专政，抒发内心情感，对后世影响很大，为承前启后的汉赋家。又为当时著名的六大画家之一。

南宋的朱熹（1130～1200年），是颇具文学修养的哲学家、文艺评论家，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其许多诗文杂著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影响深远。亦是位博学慎思的教育家。主张做学问“要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还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成果，他对于宇宙的结构和演化、天体的运行、气候与气象、潮汐变化、日食、月食以及动物、植物、医药学等方面的具体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鲁迅（1881～1936年），现代文学家、思想家。早年学医，懂得科学。为唤起民众，他弃医从文，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许多杂文：《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

由书》、《且介亭杂文》等 8 个集子中，鞭笞封建制度与礼教、抨击对外不抵抗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科学与民主，振奋了民族精神。他的杂文是政论性（科学性）和形象性相统一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郭沫若（1892～1978 年），现代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学习时，就写出了诗集《女神》，成为新诗歌的启明星。此后，他在戏剧、考古、文艺评论、历史研究，以及书法艺术等文艺领域里都有着惊人的突破。郭老作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对于科学有很深的理解，在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各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近 30 年间，一直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科学与艺术的实践，从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人民所敬仰和怀念。

外国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不仅是大画家，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名作，还是位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生物学、光学、地质学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自觉地把艺术想象与科学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数学、透视学、解剖学等原理应用到艺术实践，从而也激发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广泛兴趣。他发明了各种纺织机、切削机、独轮车、降落伞、蜻蜓式飞行器等。达·芬奇还设计改造了运河灌溉系统，设计了军用云梯、攻城武器、弩炮、撒弹炮、初级的装甲车、战舰等，是近代科学与艺术的先驱。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有丰厚的哲学著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不仅对文艺、美学很有研究与见地，而且是有重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他所著《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及其康德—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自然形成的星云假说，超越了牛顿的自然观，第一次打开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捍卫了科学，打击了神学。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 年), 德国作家、世界文学巨匠, 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 他对绘画、音乐也都曾涉猎过, 而且他对自然科学也有极大的兴趣, 研究过植物学、解剖学、光学等等。著有《颜色学》, 还是一位自然哲学家, 认为自然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不断进化的整体。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 ~ 1955 年), 德国出生美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具有惊人的创造性才智,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理论: 揭示物质与能量的相当性; 赋予时间、空间、引力以新的科学观念。他的《广义相对论基础》(1916 年) 突破了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局限性, 推动了物理学的革命。他的质能方程 $E = mc^2$ 表明物质粒子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一威力已由原子弹、氢弹得到证实。爱因斯坦反对战争, 热爱和平, 对哲学和艺术亦十分钟情。他从 6 岁起就学拉小提琴, 13 岁时又爱上了几何学和康德哲学。此后, 科学、艺术、哲学交织在一起, 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和智慧源泉。在艺术中, 他最热爱音乐,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常使他沉醉。他几乎每天都拉小提琴, 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他常常和好友普朗克演奏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拉小提琴,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弹钢琴。两位推动 20 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大科学家, 经常共同演奏动人乐章的故事, 至今传为美谈。

爱因斯坦还喜爱文学, 莎士比亚、歌德、海涅、陀斯妥也夫斯基等文学家的作品, 他都十分推崇, 认为有些文艺作品比任何科学家给予人们的都多。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写道: “照亮我的道路, 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 是善、美、真……要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远也达不到的对象, 那么人生在我看来就是空虚的。”

四、文学艺术发展的广阔天地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且可以改进文艺的表现方式和传播载体，开辟文艺驰骋的新领域。就此而言，钱学森教授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机械文化阶段，（2）影视文化阶段，（3）信息文化阶段。

（一）机械文化阶段

这是时间最长、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阶段。自古以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以石壁、竹木、泥土、甲骨、贝壳、丝、麻、绢帛、草纸、玉石、金银、铜铁等物质为载体，通过手工劳作、绘画、笔写、刀刻或简单的机械印刷、加工、熔铸等方式，把创作出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商代的方尊、东汉的奔马踏飞燕都是精美的青铜制品；汉唐的敦煌石窟是彩绘在石壁上的艺术宝库；丝、竹、管、弦传播着东方音乐的神韵；竹简、绢帛、草纸记录了我国 5000 年的悠久文化，使那些美妙的诗、词、歌、赋、文学名著等等，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稀世珍宝。

（二）影视文化阶段

近百年来，由于物理学革命、电磁理论的建立，各种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电灯、电话以及电影、电视、电子琴、录音伴唱（卡拉 OK）、光盘、电子计算机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大大改变了文艺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文学、诗歌、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等艺术创作，皆可借助这种电子器材表现出来，图文声像并茂，还可随意选择与调配，组成综合艺术形式，直接快捷地诉诸人们的感官，使人们得到更为深刻的印象和丰富的艺术享受。人们不需捧着书本秉烛夜读《西游记》，而可以通过电视或光盘中犹如真实的影像，坐

看孙悟空在云端，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和全部《西游记》故事，它生动、具体，完全是另一番感受。

同时，电子琴、录音机、录音伴唱、光盘磁带，可以代替几十人、上百人的乐队，根据作曲家的意向演奏、录制出各种乐曲，为音乐的创作、声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甚至可以借助电子乐器或计算机的加工改造，制造出超过常人声域的声音、发出各种神秘的“宇宙音”。

进入 90 年代，新型的歌舞厅、戏剧院、娱乐城等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利用电子计算机、激光、自动控制等技术，调节舞台、歌厅的灯光、音响、场景变化，已大大超出了过去简陋的手工操作方法，而可以使之流光溢彩、明丽神奇，走入崭新的艺术天地。今天的舞台技术是包括建筑、电子、声学、光学、化学、机械等多学科的综合技术。

（三）信息文化阶段

透过新世纪的曙光展望未来，未来不仅是生物科学、人体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而且将成为微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深入发展的信息社会。人们通过计算机终端、互联网络（Internet）、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y）、遥作技术（Telescience Technology），特别是灵境技术（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形成人机交互作用的系统，以此为载体，既可以随手调集古今中外有关信息，集智慧之大成，创造性地从事各项工作；也可以主动选择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艺术精品于眼前，犹如身临其境地进入美妙的艺术空间，参与其中，打开你的思路，敞开你的心扉，去体悟、去遐想、去接受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艺术精华。因此，这种高科技与载体为提高人们的审美力和艺术的创造力、发展现代化的科学与艺术，展现出无限广阔的前景。人们再不会感到“此中有真意，欲书却难言”的困惑。这种交互式综合艺术形式的诞生，带给我们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据悉，美国迪斯尼乐园近年来利用灵境技术等编排出各种惊

险有趣的文艺节目，请游人参与。由于亦真亦幻、演员与看客难分，常常令众多游客神思飞动，乐而忘返。目前，全世界都在努力探索灵境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我们国家也在认真学习与研究，竭力赶上去。

钱学森教授近年来十分关注电子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互联网络，特别是灵境技术的发展。他认为具有较高文艺素养、拥有广博科学技术知识的人群，如果经常人一机结合地进行工作，将使人的智能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大大提高人的创造思维能力，甚至可以出现智能革命，他曾说：“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撼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他并且亲手绘制一图表，说明灵境技术与人的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创造思维，与科学、文艺大发展的密切关系。

钱学森教授纵览科学与文艺发展的历史，深刻地指出：“往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又往往不是自觉地为文艺工作者所利用，常常倒是其他人，偶然发现了这种可能性，从而开拓了文艺的新形式、新文艺。这种蒙昧，在 150 年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已经懂得了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并且应用到人类社会现象，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自觉地去研究规律，而且应该能动地去寻找还有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文艺家所利用，使科学技术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我们也要在这个领域走到世界前列。”

钱学森教授深切地盼望文艺人能更主动地利用高科技的成果，发扬思维传统，创造新文艺。他说：“我经常收到有关文艺、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而其中除美学理论外都是：(1) 骂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2) 发牢骚；(3) 论中国古代的文艺辉煌。但就是缺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

“回顾本世纪的历史就看到这是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老毛病。电影出现了，是自生地发展；电视出现了，也是自生地发展。录音伴奏（卡拉 OK）出现了，有些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惊惶失措、骂娘！这怎么行！被动呵！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人、文艺理论工作者，他们应该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一切可以为文艺活动服务的新高技术，并研究如何利用它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繁荣新中国的文艺。所以这也是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要研究的课题。当然，不忘中国 5000 年辉煌的文艺传统，但我们在 21 世纪要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个文艺传统！”

五、科学与艺术的社会功能

几十年来，钱学森教授一直奋力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发展、普及鸣锣开道，这并不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出于对祖国建设、人民未来的无限期望与精心设计。

他对科学与艺术的社会功能，有着深刻的理解。科学包括技术，如马克思所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因而，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强大的杠杆。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成为当今改变整个世界的主导力量。21 世纪的国际竞争主要是“科技战”、“智力战”。因此，我们的“科教兴国”是英明的战略决策。科学技术不仅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

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在社会实践以至科学试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既是作者自我价值的实现，带有作者的个性特色与品格，又有一定的普遍性内涵，具有社会性或科学性。艺术作品往往通过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途径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应高扬时代主旋律，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反映时

代精神。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可能比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给予更多的人以更多的东西。人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提高了，自然于国、于民大有裨益，就此而言，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是很了不起的，如钱学森教授所说：是“一本万利”的。

由此，钱学森教授强调，科学家应该学点艺术，艺术家也应该学点科学。他特别提倡艺术工作者要与科技工作者多交朋友，要了解科学技术，了解科学家，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写出好的作品。不然，中国当代伟大的科技工程如何能表现好？写出来的科学家，也不太像。

他常常以无限崇敬和深切关怀的心情，谈起那些几十年如一日战斗在风沙大漠，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射，而不怕苦、不怕死的航天人；谈起那些为了祖国建设，长年在深山野岭奋斗不息的“三线”人；谈起那些用血和汗筑起葛洲坝、三门峡、红旗渠，以及建设铁路、公路，架起桥梁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千百万民工。

他盼望文艺工作者能深入实践，体验和了解广大科技人员和工农兵群众的工作、生活、思想、情感，努力用各种艺术形式，把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成年累月战天斗地、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表现出来，激励战士，鼓舞人民，记录下我们民族这段光辉的历史和不朽的精神财富。

同时，他强调，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也期待着文艺工作者的参与、合作。他觉得，每个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独特的世界图景：五彩缤纷的繁星宇宙、复杂莫测的物质结构、奇妙有序的生命奥秘……如能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物质载体，将其一一表现出来，通俗而生动地传播给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将会逐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精神，推动社会前进。

钱学森教授曾生动地指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常看到的一个。科学家心目中还有几十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于表达能力的各种艺术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像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我们引向高处，引向深处，引向远处……”

钱学森教授与蒋英教授的日常生活充满艺术情趣，他们努力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培育出朵朵小花，献给人民。音乐艺术家蒋英教授对科技事业、科技人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一连好几个月的疲劳，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每当她的学生演出时，她也竭力把所有认识的科技人请来欣赏、同乐。钱学森教授对音乐、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刻、书法以至建筑、园林、工艺美术等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会拉小提琴，会吹圆号，音色沉静柔美。画也画得很好。这位导弹、火箭的总工程师，1980年曾兴趣盎然地为上海科影厂设计《向宇宙进军》的片头。他说：“开头，是对于太空美好的幻想。我设想，一开始，就是发射卫星这个场面，很雄伟，很壮观，喷出火焰，声音很响。火箭发射后，变成小点，越来越小，声音也越来越轻。然后，出现古代的幻想，配上古典音乐、古筝，引入古代的文物，无非是画、诗，诗情画意，但是要按时代顺序来排。”“第二部分着重讲各种应用卫星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卫星能起什么作用。”他一一形象而生动地给大家介绍起来，令人至今难忘。

钱学森和蒋英两位教授喜欢徐迟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穆青的《两张闪光的照片》等等，认为这些写科技人动人事迹的好作品，也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科普作品。

钱学森教授始终认为：“科普的一个目的是要使群众掌握科学技术，从而使群众变成实现现代化的巨大生产力，因此科普的

对象是人民群众。”^① 其内容不仅要以生动、通俗的方式普及一般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要普及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赋予人民科学精神！当然也还要有“高级科普”，即为了科技专家们了解非各自领域的新发展，以开阔思路用的。

对于“高级科普”工作，钱教授对科技人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希望科技人员多有一些文学艺术素质。他最近还说：“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不在行、不懂行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是很需要的。但是许多很有学问的人为什么做不好呢？一般说是口才问题，实际上是不会用非本行人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易懂的比喻，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你要说的科技问题。”他赞扬：卢嘉锡副委员长作为分子结构专家，讲科学技术方面的事总是讲得很好。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诗作已为大家熟知，他 1979 年率团去原联邦德国杜市访问，离开阿康饭店时，提笔赋诗：“西来处处挹繁华，杜市阿康是我家。中德人民长友好，不愁前途有风沙。”沟通了两国人民的情感，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物候学家竺可桢教授，在他的物候学研究中，引用了一些古代诗词作证：例如在介绍长江、黄河流域海拔 4000 米以上四季皆冬时，引用李白的《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把物候表述得很生动。

钱学森还常提起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高士其、汪德昭、汪德熙、吴阶平、许国志、李政道、贝聿铭等等，赞扬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上，而且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钱学森教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极善于把一些艰深复杂的科学命题，用风趣、幽默、通俗易懂的语言或生动的比喻说清、说透。他做科普工作，年年月月，乐此不疲。他曾向老一辈党政

军高级领导讲解火箭、导弹、卫星技术、高速飞行问题；他曾在中共中央党校，连续几年向全国各地党政领导干部讲解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大学生尤其爱读他的文章，爱听他讲话，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教授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毫无准备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大学新闻系学生喜爱的范文和教材。他这样惊人的才智从何而来？除了勤奋，恐怕还是来自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六、结 语

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巨大社会功能，已逐渐成为国人共识。然而今年85岁的钱学森教授仍情系祖国，壮心不已。不久前，他又秉笔直书：“要把文艺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放到与科学技术同等的高度来认识。”他建议：“我们国家不但要建立并发展科学技术业，即第四产业，还要建立并发展经营文学艺术活动的第五产业”。¹ 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注】

钱学森．关于哲学、建筑科学、学术民主的思考．科技日报．1996．7．14（2）

钱学森 1996 年 5 月 29 日致刘为民的信．

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10．17

钱学森 1995 年 11 月 5 日致刘为民的信

灵境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等使人感受到一种虚拟的现实世界。目前，还需要戴上设计好的头盔和手套。头盔中有投影三维图像双（视）频道屏幕，使用者头部转动时，计算机跟踪其位置变化，并立即相应地改变观察屏幕上的图像。同时，手套可以将手的姿态、动作所表达的主观意图输送给计算机，参与其中。

戴上这样的头盔和手套，利用灵境技术，你可以坐在家里“巡游”法国的卢浮宫每一幅精美的绘画、“走入”悉尼歌剧院，和世界歌星同台献艺、“触摸”万里长城、“感受”塞外清风，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钱学森 1994 年 10 月 10 日致戴汝为等 3 人的信。

钱学森．《艺术科技》卷首语．艺术科技，1990（2）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91

①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26

1 钱学敏．钱学森的科学观与方法论初探．国防大学学报，1996（2、3）：14

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供稿 本人审定

陈 赫 中南工业大学校长高级顾问
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 教授

理工科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今天，与其说我是来作报告的，还不如说是回母校交作业的。不过，这个习题大点儿，它牵涉到一名理工科教师对做人和做学问的追求，牵涉到对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关系的探讨；这个习题做的时间长点儿，从我毕业算起，已经做了 35 年。尽管如此，还只获得了阶段性成果，只要一息尚存，这个大作业必将不停地做下去。

一、人文素质对理工科大学生的重要性

良好的人文素质对形成大学生优秀的综合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理工科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下列四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语言及其记录符号——文字，是表达人的思维、交流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对这种表达，有四个层次的要求：起码的要求是要把话讲明白；其次是要要求准确，不致引起别人的误解；更高一点的要求是要精练，假话、大话、空话、废话都不要说；最高层次的要求是，语言、文字要有文彩，有艺术性。

第二个好处，有利于保证我们撰写的实验报告、学术著作的准确性、条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以上两个方面基本功的培养，本来应该在高中时基本完成。遗憾的是，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导致在中学阶段过早地文理分家，引出许多不良后果。

第三个好处，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逻辑思维。

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往往又容易被人忽视。所以，我将它扩展为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细讲。

第四个好处，一个人美好精神风貌的形成、高尚道德的建树、伟大人格的升华，无不得益于人文素质的培养。而一个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对塑造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语》《公冶长第五》之二十六中，孔夫子与其弟子们一段精彩的对话，对于学生们远大志向的培养，至今仍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夫子这三句话，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时下，国人对“性”和“钱”两个字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

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

有两种选择，不能不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选谁——做商品或做奴隶？

不得已而选当奴隶的请举手（少数人举手），不得已而选当商品的请举手（人数多一些）；不是不得已，就愿意当商品的请举手，没有。

你们放弃了一次与我争取平等的机会，应该有一个“子路”问我：“老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选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不能不选的情况下，我愿意选做奴隶（听众中有人哗然），逗号，我愿意做斯巴达克斯！奴隶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人，逼得受不了了就会造反；商品被人卖来卖去，就是没有造反的冲动和意识。我自己坚守一个信条——决不把自己当商品，尽管有时候可以卖得好价钱。

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余德利有一句名言，那就是，“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现在流行甚广。这句话出自电视剧中一位特定人物之口，对塑造余德利这个形象是再恰当不过的，但国人若引以为座右铭，则大谬矣！“虽然……，但是……。”这样的语法结构，被强调的逻辑重点在“但是”后面，因此，余德利绕了一个弯子，表达的还是“金钱万能”的意思。我宁愿把这句话倒过来说：“虽然，没有钱是不能的，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你们看，友谊、爱情等珍贵的感情，都是靠金钱买不到的；而人格、国格等人类的尊严，又是绝对不能出卖的！

我有个好奶奶。我初通世事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讲“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她说：火神奉天帝之命要去烧毁柳下惠的房屋，火神听说柳下惠是一个正人君子，就想试他一试，于是变化成为一个绝色妙龄女子，装着生病要搭柳下惠的车，坐在车上还不够，硬要坐在他怀里。柳下惠看是一个有病的弱女子，就让她坐吧。这女子对柳下惠百般挑逗，柳下惠纹丝不动。结果，火神显出原形，对柳下惠说：这么一位正人君子我能烧你的家吗！我宁愿触犯天条受处罚，也不烧你的家了。这故事还附带告诉我们，你如果能真正做到“坐怀不乱”，不受美色、金钱的诱惑，家中都要少灾难哩！

你们知道孔雀开屏的本意吗？用现代时髦的语言说，那其实是一种性挑逗！好多人不明白，说：“哎哟，它看你穿着花衣服

就冲着你开屏！”其实，它是想对你进行非礼！当然，这是一种拟人的说法。其实，这只是一种动物的正常的本能。现在很奇怪，有些人变了，分明是东方中国式的樱桃小嘴，却偏要画成方型厚嘴唇，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金斯基的美嘴”，再问她美在哪里，她说“性感”！我们那个年代，谁要说一个姑娘性感，她会认为你是对她的侮辱，现在却自卖自夸地说自己“性感”，哎呀，这真是不得了啦！

因此，我想送给大家两句忠言：一是莫把自己当商品，二是要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千万别只剩下动物的本能。

二、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有助于科学技术的逻辑思维

李政道博士每年的5月、10月在北京都要召开两次很特殊的、别开生面的会，叫做“科学与艺术研讨展示会”，请许多画家来画他们对高科技的想象。李政道博士讲：“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这个硬币就是文化。”

与会者都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是为了追求普遍的真理，都是为了开发人类的创造力。人类的创造力包括形象的创造力和逻辑的创造力。

法国文学家福楼拜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而科学也要艺术化。科学和艺术在山麓分手，又在顶峰会合。这种会合，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而且，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有人提出“艺术科学化、科学艺术化”的主张。他们认为：科学中有很多美丽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中的美”。有不少科学成果，就是在追求科学中的美这样的过程中取得的。有的艺术家提出：艺术要向科学靠拢，科学能帮助我们的头脑有序化、思维有序化。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创造潜能，调动每个人的创造力。

还有一个事实支持我的论点，那就是古今中外的大科学家

中，人文素质高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决不是一种偶合。举我们熟悉的两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先生作了他有生之年最后一个报告《科学的春天》。在报告中他提出：科学既需要异想天开，又需要脚踏实地。这里，他只不过是用艺术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科学家成功的道理之一，即，搞自然科学既需要有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又需要实干家执着的追求。文艺也好，科学也好，最终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解放全人类，使人得到彻底的解放和自由。

工程控制论和中国系统工程创始人钱学森先生，有着很浓的艺术情趣和很高的艺术修养。当他对一个科学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往往先放一放，在蒙蒙胧胧中，有一种灵感、一种顿悟和直觉——这当然通常是一种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得到启发，打破过去束缚思想的框框，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当然，机遇和灵感，只帮助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要不，在众多的挨过苹果或其他什么果子掉在鼻子上的人中，只有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所以，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对科学技术的逻辑思维的帮助，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滋润，是人一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会有立竿见影之奇效。

老一辈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经赠了一幅对联给我们这一辈数学家侯振挺先生，上联是：“君镇长沙非贾谊”，下联是：“我游六国——”请同学们想一想，下面三个字应该是什么？（不少同学答：“似苏秦”）好！这说明你们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都很不错。这幅对联表达了苏老先生对侯先生在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的赞誉和自谦。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国志先生是我国运筹学和系统工程创始人之一，是事理学的倡导者，作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前任理事长，

对年轻的系统工程工作者关怀备至，要求也极严。1994年在清华大学开年会时，曾赐赠我两首诗，对我有很深的教益。现将许先生原诗和我酬答的两首诗一并送给大家。

许国志先生原诗：

自 嘲

退居和尚德平庸，未悟禅机乱撞钟。
饕欲养成罗汉腹，虽无点墨酒千钟。

赠陈赫

坦荡真君子，文章见性灵。
士人争艳羨，模范好家庭。

我的酬答诗是：

许国志先生赐诗步原韵奉和

调和系统道中庸，提掖青年律鼎钟。
大度能容贤相腹，金秋收得粟千钟。

我是真孺子，先生教化灵。
运筹明事理，拾履续黄庭。

老先生对我们年轻一辈的爱护和要求，年轻人对先生的景慕和敬仰，两代人对发展共同从事学科的接力赛中的责任感，尽在这些诗中了。

在我自己35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也从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中获益匪浅。

运筹学中的排队论和动态规划，历来被学生认为是最不容易学的两部分。于是，经常有初学的学生问我：“老师，运筹学那么难学吗？”我说：“世界上没有不咬人的蛇。”学生又问：“真的这么难学吗？”我说：“世界上没有打不死的蛇。”我以艺术形象入门、从经济意义入手，较好地完成了运筹学的讲授任务。我认为，没有听不明白的学生，只有讲不清楚的先生。这里除了学术水平外，就是授业的艺术性了。

我的合作者罗声求教授，接到一个环保部门通过湖南省科委下达的纵向课题——《重金属废水治理综合分析的初步研究》，罗教授邀请我参加课题组，为她做系统分析，主要是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环境评价和预测。然而，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所能获得的权威性原始资料只有 1984 ~ 1985 两年全国环境普查时一个时点的数据，即在同一历史横断面下分布在不同空间的数据，不能形成有效的时间序列，预测就十分困难。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我把课题暂时放一放，而是到哲学、进化论、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去神游。直觉和类比把我带到了一种顿悟的境界，请注意下列事实：

(1) 生物进化过程中，从单细胞动物演进到人类，经过了多少万年；而在母亲子宫这一特定环境中，则被“浓缩”为九个月左右。把我们见到过从受精卵到分娩前的胎儿演化过程各个阶段的胎儿标本，与生活在当今历史横断面的单细胞动物到当今人类胎儿各进化阶段的标本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竟有惊人的相似。

(2) 当我们的共和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50 年代的西藏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大凉山某些地方则还处于原始共产社会。

(3) 在我们评价某种产品的质量时，常常使用“达到（或相当于）先进国家 $\times \times$ 年代的水平”。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有一类参数，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同一历史横断面上分布在空间不同点的数据或属性，具有时代（或年代）的特征。当我们找到一种与被预测参数相关的时序化因子后，通过某科运算，就可以将同一历史横断面下空间分布的数列成功地展开为时间分布序列。这一思路和“数学操作”，反映在我们的论文《历史横断面数据的时间序列化》中。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有些学者对它赞誉有加，有的则说没有科学依据，而更多的人认为，不必去追求它的普遍意义，而应着力去分析具备什么样条件的系统适应于这一模型，即去研讨

哪些系统具备使用这一模型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又如，我们从不少学者在使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时产生的困惑中跳出来，运用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悟出关于系统“模型的数学机理”与“原型的行为机理”的两个概念，对上述生产函数应用时出现的一些怪现象和悖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虽然，我们这些成绩，比起科学大师们的成就，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对在座的各位会有借鉴的价值。

三、自然科学家的思维习惯对文学艺术的回赠

也不总是自然科学家沾文学家、艺术家的光，当自然科学家涉足经济、社会、人文学科领域时，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使用自己长期习惯的思维和熟悉的工具，他们经常出其不意地从严谨推理之路踏进诗意浪漫之门，以人们以意想不到的成效给文学艺术以丰厚的回报。

近几年来有一个令人玩味不已的现象：许多过去被认为思想落后的自然科学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反而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过去极“左”路线的反科学实质，他们既像正直的革命家和革命的文学艺术家那样憧憬着共产主义美好的前景，同时又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崇高而科学的思想体系来看待。

遗憾的是，当今社会上也有一些相反的现象。

几年前，一位刚退休的干部非常严肃地质问我：“老陈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左’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过去反右，你说我右；现在的基调是“既要防止左、又要防止右，但主要危险是左”，你怎么又说我“左”了呢？！这一次我很快地清醒过

来。于是，我在地上画了一个坐标体系（见第 248 页图）。

纵轴用双箭头向上，表示共产主义正确方向，横轴原点的右边标上 +1, +2, +3, ..., +10, ...; 原点左边标上 -1, -2, ..., -10, ...。我说，当年我在 +3 处，您在 -10 处，您不仅看我右，您看正确的也是右，因为您当时极左；多少年来，我苦苦地追求共产主义，即我的运动轨迹是以纵轴为渐近线向上运动，无限靠拢共产主义正确方向，而您，一下子从 -10 跳到 +10，变成了极右，您不仅看我左，您看正确的方向也觉着是左了。总而言之，我是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者，而您却是一个典型的风派人物。这位先生看我认真了，连说：“对不起，我是开玩笑的。”我说，您千万别在最愿意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自然科学家面前开政治玩笑啊！“圣人非所与嬉也！”

确实，文学艺术讲究浪漫主义，科学技术当然讲究现实主义，但是，如果把丰富的想象与顿悟渗透到严谨的推理当中，把诗意的浪漫也溶化到科学的研究当中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在第二大部分已经讲过了。然而，不少事例证明，如果把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反过来回赠给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经常也可以收到不可言喻的效果。

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到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之中。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给学生作青年修养报告每学期平均不下十场。在这些报告中，我都使用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习惯思维和熟悉的工具，有时候甚至使用了数学工具，开始是情不自禁的、无意识的，后来发现效果颇佳，就变成有意识的了。

我有一个报告，题目是：《人为万物之灵新探——人类行为的系统学解释》，就使用了模糊数学和系统工程中整体优化观念。

1951 年，我念初中一年级时，有一门课叫做“社会发展史”，其中有一句名言：“劳动创造了人类”，对此，我深信不疑。到了二年级，我学会了查大型词语工具书，查到“劳动”条目，

书中说：“劳动是人类为了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这就麻烦了——是先有劳动，还是先有人？

本人生性愚钝，对别人来讲，这可能不成问题，但却困扰了我近 30 年！直到 70 年代后半期，我自学模糊数学，才从模糊集合及其模糊隶属度中得到了自圆其说的解答。

首先，按一般的集合概念，做了一个正方形。其中，横坐标表示“人”，纵坐标表示“劳动”；“0”表示“非人”和“无劳动”，“1”表示“是人”和“有劳动”。按照前面提到的两个命题，从 $O(0, 0)$ “非人、无劳动”状态，不可能经 A 到达 $C(1, 1)$ “是人、有劳动”状态；同理，也不可能从 $O(0, 0)$ 经 B 到 C。这是对我前面提到的困惑、或曰“悖理”的数学描述。

原来，人类的祖先从树上下来直到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是一个沿图中“S”型曲线从 $O(0, 0)$ 到 $C(1, 1)$ 的渐变过程。最先从树上下来的古猿，当他们有一点像劳动的味道时，他们就有一点像人了；当他们像一点人了，就会有更像一点的劳动了……这些“阶梯形”的变化，对多少亿年的全过程来说，是那样的细小，以至于看起来是一条光滑的“S”型曲线。我把这种从“非人”到“是人”、从“无劳动”到“有劳动”过程中，“像人”和“像劳动”的程度，用模糊隶属度 μ 来表示，它们是 0 到 1 中的某一个数，而 $\mu < 1$ 的人，则称为“准人”，对应的劳动，称为“准劳动”。

那么，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沿着这条“S”曲线变出“人”来呢？直到我较深地学习了系统工程之后，才悟出内因的条件是系统的“整体优化”。也就是说，当年——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当年，那些“想”变成人类而从树上下来的古猿，总是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合目的有目的地服从系统整体优化原则、模式和进程，才区别于那些死守在树上的“弟兄们”而在地上安家的。

进一步研究得出，在人类——这个巧妙的大系统整体优化的

过程中，人类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了“十大灵性”，它们是：群体性、献身精神、责任感、希望一代胜过一代、互补性、希望有一个指挥、劳动的自觉性、劳动的创造性、仁爱之心、自尊心。

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现代行为科学创始人、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获得者康罗·洛伦兹有一本重要著作——《攻击与人性》。书中详述了动物的种种本能，并将其与人类行为进行对比。他认为低等动物的攻击行为对其生存有利，人类的好战行为有其先天性基础。在整本著作和他的思想体系的表述中，充满着对“人类的攻击性是合理的”的暗示。

而我们认为，人类从人的模糊隶属度为 0 的人进化到隶属度为 1 的人，正好是他们在共同的准劳动中有意无意地逐步削弱内部自相残杀的攻击性和逐步增强对外部（包括生物圈和大自然）的攻击性（索取性）的结果，也就是逐步发展和完善人类的十大灵性的结果。人类在这种一致对外的整体优化的同时，也优化了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格局，人类遗留在个体身上的某些动物的本能是必须、而且是自然而然地保留下来的；而残留在个体中的另一些动物的本能，比如攻击性，则恰恰是阻碍、至少是妨碍人类的群体、即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人类个体的攻击性削弱得更多一些，以十大灵性为特征和主要内容的融合性发展得更快一些，人类社会将会发展得更快、更美好。

孔孟的仁爱，墨子的非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博爱、平等，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实质上都是为了削弱人类个体间的攻击性，而共产主义所追求、共产党人所为之奋斗的世界大同，则使得这一主张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看，多么有趣，我利用康罗·洛伦兹的材料，却得出了与他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是我和他之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所致吧。

我还有一个报告，题目是《营造一个可爱的家》。在这个报

告中，我谈到男女青年的结合有三种需求：一是生理的需求，二是“情外之物”的需求，三是感情的需求。这三种需求的格局直接影响着婚姻、家庭的质量：如果只注重第一种需求，那与动物无异；如果强调第二种需求，淡漠第三种需求，又不放弃第一种需求，那可能比动物还不如；还有一种人，在一个性伙伴那里获取第二种需求，而在另外的性伙伴那里获取第一种需求，而不知有第三种需求，那就不仅比动物还不如，还会给社会添乱。人，不能只剩下动物的本能，因此，我们应该特别珍视和珍惜第三种需求，淡化第二种需求，却并不像苦行僧和禁欲主义者那样去放弃第一种需求，这样的婚姻和家庭才可能是稳固的、幸福的。我们的家庭就特别稳定。

这里我还想讲一讲关于爱心的概念。爱心不是西式蛋糕，因为蛋糕切一块就少一块——如果你切一块去爱祖国，切一块去爱党、爱事业，切一块爱父母，切一块爱子女，切一块爱同志、朋友，就可能引起爱人不高兴；爱心应该是中国式的千层饼，第一层是一个完整的圆，去爱祖国，第二层也是一个完整的圆，那是爱事业的……该有多少爱的对象，就有多少个完整的圆，把它们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爱心。这样，就不怕分不匀了！

这是一个在数学上不成立、但在精神上成立的等式：

$$\sum_{i=1}^N 100\% = 1 =$$

我还有许多类似的报告，都是情不自禁地用自然科学家的思维和工具去诠释社会、人文现象的。比如，在《信仰与追求》中，我就用数学工具证明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的逻辑归宿。

我还有一个关于古体诗词的报告，在作了十几年、几十场之后，率先形成了一门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公共选修课《现代青年与古典体诗词》，正式进入教学计划。

请允许我赠送你们一首小诗，作为我这次演讲的结束语：

咏 笋

破土尖尖嫩笋芽，鞭根涂扎遍山崖。

他年遂得凌云志，倚定青峰不着花。

谢谢大家！

本人供稿 有删节

【编者絮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人文修养，这一话题我们已谈论了很多。这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文科大学生也要想理工科学些什么？编者以为，至少有两点是文科大学生要注意认真加以学习的：第一、实证的研究方法，第二、注重合作的团队精神。

袁正光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技术与社会

[在北京科技大学讲演]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我用的这个词是新词，因为我们刚刚开过第五次年会，大家还在争论这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专业，抑或是其他。

大家知道，60年代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并行发展，但两种文化相互之间不能够沟通理解，产生隔阂，犹如一道鸿沟。但是有一部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却将此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举个例子，英国有个叫斯洛的物理学家，在24岁时写小说并获了奖，成为英国比较著名的文学家。正是由于这种结合，便逐渐产生了科学与社会的学术领域。60年代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其后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在美国有100所大学开设这门课程。我国在80年代由一批学者将其引入，迄今已成立了STS学会，开过五届年会。今晚，我想就自己研究的问题，给大家介绍四个观点。

第一，科技不仅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且深刻影响着其发展方向。

从一方面来讲，这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难以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预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例如，1994年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认为美国经济年增长潜力是2.5%，经济增长3.2%。他认为经济增长过快，所以一年之间7次提高利率，由百分之二点几一直提高到百分之六几点，结果年底经济增长不是2.5%，

也不是 3.2%，而是 4%。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 1993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 6 万亿美元，增长 4% 就是 2400 亿美元，数目巨大啊。更有意味的是，按传统经济理论，年增长 4% 将导致通货膨胀，但恰恰相反，美国那年的经济增长出现“一高二低”，就是高增长率非但没有引起高通货膨胀，反而出现低膨胀，低到零售价格上涨 2.4%。还有一个就是低失业率，1994 年美国失业率是 6%。这是 14 年以来最低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用传统经济理论不能预测。

1991 年美国经济曾出现负增长，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出现下滑。但我通过 STS 研究认为，这正是美国也是世界经济出现增长的一个新起点，经济在未来 10 年将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因为美国乃至世界都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我通过研究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都使经济发展步入黄金时期，而从 1991 年开始，世界将经历一场“数字化信息革命”，就是我们看到的以“信息高速公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变革。所以说，在技术发生新的革命，经济增长开始新的飞跃，社会经历新的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的经济理论就很难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

以上是第一个观点，其次，我要说，一次技术革命就是一次最大的机遇。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了三次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给错过了。第一次是乾隆年间，那时的朝廷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完美无缺的，对新技术不屑一顾。第二次在慈禧晚年，因为战争又给丢失了。第三次是“二战”以后，新中国刚建立，由于新的国家刚刚诞生和国际政治局势等原因又错失了。

去年有一个世界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 200 周年”的报告，那里面讲 200 年前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排名位于英、美之前，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我国落后到了第三世界国家靠后的位置。由于

丧失机遇，拉大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如果我们不急起直追的话，那么，目前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拉大距离。

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是科学技术使人类进入理性社会。科技对人类的贡献不仅是提供了知识和产品，以物质力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是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这就是理性精神和规律意识。

我们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有 6000 年，但其中 5700 年人类都是在农业社会中缓慢地爬行。仅是把圆形的轮子作为运输工具的一个零部件就用了人类 20 万年时间，不就是圆心到圆周距离相等这一个简单的原理吗？大约又过了 5000 多年，人类才又发明了蒸汽机推动了这个轮子。为什么人类只有在近 300 年，准确地说是近 200 年，尤其是近 50 年才以超级加速度发展？原因就是因为在以前的 5700 年中所历经的是非理性的社会。

在几千年前，人类不明白为什么有日月星辰和风雨雷电，为什么有朝代更替。在那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年代，人类把精神寄托在一个超自然的力量——神的身上。“神本位”的观念体现在自然科学中就是地心说，体现在社会科学中就是君本位思想。那时，人们认为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地球是上帝的骄子，所以上帝造万物时把地球放在正中，日月星辰都是为了照耀它而存在其四周。到了 300 年前时，这个说法遇到了麻烦，人们发现建立在地心说基础上的历法总是不准，所以人们就想以自己的眼睛看看天空。哥白尼发现金星和水星总是在太阳两边晃动，于是设想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理出顺序后，历法问题迎刃而解。所以他认为历法不准的根本在于体制错了，行星不是围绕地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这样出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上帝”的位置在哪里？上帝创造了地球但地球却成了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之一，那么把“上帝”摆在哪里？于是科学家们纷纷遭到宗教迫害。

这一时期的科学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从哥白尼到伽利略，到

牛顿，把太阳系里的自然秩序搞得井井有条。科学家们的一系列伟大发现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通过概括，就成为了科学理论。运用理论指导人类行动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所以说借助现代科学诞生的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作为科学精神的核心，并没有停留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而是震撼了 16~17 世纪，特别是 17 世纪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使得社会学家觉醒。

牛顿的莫逆之交，社会学家约翰·洛克深受牛顿的自然科学观念影响，提出一个观点，即为什么自然世界如此有规律有秩序而人类社会却如此混乱？人类社会是否有其自身规律？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说，第一个用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观察人类社会的人是约翰·洛克。他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如此混乱不是因为无规律，而是因为有规律却没有遵循，因为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一个非理性观念、陈旧观念的基础上，这就是“君本位”、“神本位”的一种体现。

洛克用了一个特殊的说法，讲“上帝就其定义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中心是人不是神，人的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从此，正如哥白尼把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一样，洛克把君本位观念逆转过来创立现代文化的价值观，把上帝赶出了人的政治社会，使上帝只存在于宗教社会之中。

洛克的观点影响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后来又有个叫潘恩的人把洛克的思想传到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人以潘恩的思想——实质上是洛克的思想——为核心写了《独立宣言》。这个《独立宣言》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后来又藉此制定了美国的宪法。

因此我尤为强调的一点就是现代科学给人带来了规律意识和科学精神，不仅物质社会有规律可循，而且人类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都有规律可循。按规律办事，国家就昌盛，经济就发展，否则就会导致经济落后，人民贫穷。

马克思曾评价说，约翰·洛克的哲学成为了英国政治经济学一切观念的基础。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亚当·斯密开创的市场经济理论。亚当·斯密以后，从瓦尔刺斯到凯恩斯以及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派，都是属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范畴。如果说17世纪洛克发现了政治生活中以人为中心的规律，那么18世纪亚当·斯密则发现了经济社会中的规律，他的理论是政府经济，即政府把资源和财富集中起来搞经济项目。但由于政府行为多是考虑政府利益而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会压抑人的积极性；再就是政府间会由于相互矛盾而用高关税进行贸易保护，阻碍经济交流，所以亚当·斯密又在“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基础之上，提出了“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生产和消费，经济就会井井有条”的观念。当时有人反驳，认为这样会导致世界大乱，但我要说这种反驳的看法是有误解的。

这里的“个人”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注意，它背后的涵义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满足必需的前提是满足别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社会机制。亚当·斯密说：“诚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生产，但是社会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它必须满足他人的需求，这种需求并非本意，但它确实比那些口口声声说要为工作做贡献的人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他当时没有提出“市场机制”的概念，而“一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这个含义。所以沙弥逊（“二战”后主流经济学派创始人）如此评价：“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就像牛顿抓住了天空中的自然秩序一样，抓住了经济社会中的自然规律——市场机制。”

我个人将此“人文”化了一番，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的三大原理。

首先，现代社会是以人为中心，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

础，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必须以保护个人利益为起点，否则就会一塌糊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当时实行公社化，伤害了农民积极性，所以出现了“自留地都好，公家的地长草”的情况。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了农民个人利益，给农民土地使用权，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

但我今天要重点给同学们讲的是第二原理，即个人的利益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求、为社会做贡献才能实现，而且贡献越大个人利益实现也就越多。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它随时受他人利益的制约。美国农民在 17、18 世纪就明白必须和伙伴联合起来，让自己的伙伴获得利益，自己才有可能获得最大利益。

为什么社会现在会以超级加速度发展？也许是大家都明白了要联合起来。现今世界上 500 家大企业的产值基本上占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30%。若是搞个体户独立经营，根本不可能！美国的汽车年产 1500 万辆，90% 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公司生产的。

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人的利益是多层次的，当物质利益的需求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利益的满足。按马斯洛所讲，精神需求分为安全感、爱和尊重、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等几个层次。

现在欧美日普遍出现股权分散的情况，这也是多层次利益需求的结果。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70 年代股东有 300 万人，而个人股只占 1%；松下幸之助生前在其企业中的股份占 2.6%。

具体讲来，西方为保证每一代人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保证每一代人的素质都提高，而设立了高达 50% ~ 70% 的“继承税”。如果一个资本家的股份是 100%，继承给儿子后就是 30%，到孙子手里就会连 1% 都不到。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用本田公司总裁的话来讲：“本田的高质量是全体职工创造的，本田的财富也是属于本田全体职工的。所以本田的财产我既不继

承给妻子，也不继承给儿子。如果把财富给了孩子，宠坏了他会有什么好处？”他认为留给子孙最大的财富就是自立于社会的能力，而不是金钱。邵逸夫在许多大学都捐资建图书馆，这也是一种想给教育做贡献的高层次追求。

我们把话头扯回来，可以说市场经济不仅导致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促使了现代企业文化的诞生。这种文化的核心有四个因素：其一是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争取最好的利润和效益；其二是将利润返还给股东；其三是将利润返还给职工；其四是对消费者负责任，为社会做贡献。

我的第四个观点是科技进步需要一定的体制环境，它本身也有择良木而栖的特点。

凡是重大的发现，都出现在民主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为什么日心说诞生于当时的意大利？因为有文艺复兴。为什么牛顿的三大定律、法拉弟的电磁原理、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卢瑟福的原子理论都发生于英国？因为英国进行民主革命后实现了民主。为什么近代化学尤其是无机化学在法国首先兴盛起来？因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自由的空气。所以民主和自由的机制是科学成长的肥沃土壤。技术是由科学原理转化来的，所以科学发现层出不穷时，技术发明也是日新月异。

技术需要市场。科学转化为技术第一例是 1831 年法拉弟电磁感应原理于 1866 年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创始人西门子应用发明了自截式直流发电机。随后贝尔发明了电话，爱迪生发明了电灯，Westhouse（西屋）公司发明了交流电。这四大发明将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我深切地感到科学以技术为中心，技术以企业为主体。而我国的科技体制出了个大问题，就是在大学以外搞了一个庞大的中科院，在企业以外搞了 3500 多个研究所。中科院的流动性很大，而研究所开发的技术很少能够及时地转变为产品，时间一长就会过时，导致极大的浪费。

就机制而言，我认为美国企业有两个发明，一是经理，二是

总经理。

当资本家在企业规模扩大时发现单凭自己和家庭的力量进行管理不行时，就向外聘请中层经理人员。于是 1886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首先开辟了商学专业，其霍敦商学院至今闻名于世。1908 年哈佛大学建立起了商学院研究生院。现在美国有 260 多所商学院，每年向企业界输送 7.7 万名经理人员。

当资本家发现外聘的经理人员经营得甚至比自己更好，干脆把总经理之位也让出，于是出现了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管理体制。

一个资本家嫌自己力量薄弱，就三个五个地联合起来，于是出现了股份合作制；这样做还嫌力量小，资本家就向社会招股，将股票上市经营，导致现代股份制的产生，这便是个人产权的有效组合方式，它使产权能够分散到广大公众手中。美国证券市场上公众基金现在占 50.3%。也许外行看了不会留意，但我看后却大吃一惊，这说明资本在公众手中占 50.3%，说明社会在进步。

我认为，新技术的开发，大多是依靠具有相当大规模的企业进行的。怎样做到规模大而产权分明？就是采用现代股份制，美国实行的便是“职工股份制”。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卡尔森提出“双元经济论”，这一理论具有人文精神，很有深意。在他看来，职工为企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拿工资（单元收入）太不公平，应该在拿工资的同时也拿增值资本的一部分，这叫双元收入。后来路易斯·卡尔森说服国会进行立法，让企业每年拿出一部分利润通过“职工持股计划”转化为股份分配给职工，之所以说是“分配”而不说是“卖”，是因为职工买不起。逐渐地，美国职工股份制兴起并扩大起来。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有一家名叫“瑞飞”的公司，通过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所持股占 44%，加上部分职工自己出钱买股，达到了 66%（现代企业中职工股不能流动，只应占企业股份的

1/3 ~ 2/3, 其余应是社会股, 这样有利于实现产权有效结合)。1994 年持股的工人退还股份可以从公司拿到 15 万美元, 相当于在佛罗里达州任何一处买幢高级别墅的钱; 到 2000 年则可以达到 50 万美元。该公司总裁用“水涨船高”这一汉语成语形容职工持股后他的利润和职工利益相对状况, 非常贴切。

刚才讲了我的一些基本观点。最近我经常讲四、五、六, 三、二、一。“四”指现代科技的四个特点, “五”是现代科技的五大前沿, “六”说的是六个高科技领域。后面的“一”指一场技术革命, “二”指两个转变, “三”指现代科技发展的三个结论。

四个特点概括起来是指现代科技发展的高速性, 运用方面的综合性, 对社会各层面的渗透性以及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深刻性。

第一条是科技发展的高速性。这首先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挑战。一个大学生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充其量是其所要运用到的知识量的 20%, 有更多的知识要在走向社会后学习, 所以重要的是要在大学中学会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 掌握这种能力。我国现在的教育注重应试教育和灌输知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老科学家对我讲, 他们生活在苦难的 20 年代, 但是有一个幸福的学生生活; 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 却有一个苦难的学生生活。其实我们应当注重能力的开发而不是应试教育。

第二条是科技运用的综合性。这一点我想现在的大学生应该高度重视。因为现代科技发展不同于 18、19 世纪科技发展, 当前正经历一场数字化信息革命, 至少有半导体、多媒体、多媒体数据库、数据库压缩与编码以及信息传输等五大高技术综合发展, 相应就要求有较高的综合能力。今年 3 月我去澳大利亚, 看到他们的中学进行的是综合理科教育, 综合工业技术教育, 注重于培养人的能力。而我们留学生考试往往名列前茅, 但一到创造阶段就比较困难, 就是因为缺乏综合运用能力。

为什么科学源自于大学? 我认为关键是有二个生态, 一个是

老中青结合的年龄生态，一个是文理交融、理工并取的学科生态。爱因斯坦 15 岁时首先对康德哲学入谜，后来又对小提琴入谜，而且对几何学也非常投入，这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大学就应该为学生们提供良好的科学文化背景和人文文化背景，让理工科学生常听些关于莎士比亚戏剧、贝多芬交响曲的讲座，也让文科生经常了解自然科学最前沿的动态，这样学出来的学生就会大不一样。

接下来我再讲讲科技对社会各层的渗透和影响的深刻性。同 18、19 世纪不同，现代社会对科技有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不会放弃每个新技术，只要有新的科学发明，马上拿来运用。大家都知道在全球化工行业中居领先地位的美国杜邦公司，它在 30 年代发现了一名有才华的高年级大学生，他的关于“缩合理论”的论文使杜邦公司颇感兴趣。杜邦公司吸收了这位学生并待以厚遇，结果他在四年中发明了微尼龙，即人造纤维，二年后又发明了人造橡胶，贡献颇大。“二战”中美国制造原子弹，把铀 235 化学处理部分交给杜邦公司研究，杜邦公司要求的报酬条件是“成本加 1 美元”，一方面博得美誉，一方面借机揽来了一大帮科学家，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现在诞生了一种兼容性很强的 JAVA 语言，它具有处理信息和部分存储信息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发明的，拥有这项技术的“太阳”公司便在软件大军中迅速崛起。

回过头来，我还想将第一个特点深入阐述一下。在我看来，可以用科技前沿日益深化、技术领域日新月异来形容科技发展的高速性。

当今，物理学在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进入玄论时期，由探讨物质世界“是什么”转入研究基本粒子如何运动的“怎么样”的问题。天文学则根据“红移”现象开始了宇宙膨胀论、爆炸论的研究。

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在

其统治的 100 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创造的一切都要大。到了 80 年代，一位希腊学者说：“迄今的 6000 年中，人类近 30 年开发的知识、技术、信息的重量比过去 5970 年所开发的全部还要大。”而 90 年代，袁振光教授说了，10 年一巨变，一年一个大变化。

1991 年，我注意到美国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场新的革命——数字化信息革命，便初步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好转。果真言中。1993 年美国制定 NII 计划，1994 年又聚集 1600 名科技精英在洛杉矶专门研究信息高速公路。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将信息高速公路接到每一个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1995 年 internet 商业化后迅速进入了 155 个国家和地区，有 400 万用户。今天下午我来之前看到国家科委一份报告，说用户已达 600 万。1995 年美国有 1200 万人在家上班，部分时间在家上班的人达到 5400 万，这占美国劳动力的 $\frac{1}{3}$ ，很引人注目。现代科技变化程度之快是我们所能体察到的，就拿个人电脑来讲，从 386 到 586，以及笔记本式电脑，更新换代是多么快啊！美国有家笔记本电脑公司一次便将单价由 4 万美金降到 2 万美金。降价之所以这样大，就是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不断推陈出新，不降价就会积压。

现有 180 亿美元资产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 windows '95 如

开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作为世界最大的软件开发公司，我们对自个人电脑出现以来的任何一个技术发明都不曾忽略，但网络技术出现后我们却打了个瞌睡，结果一日千里，招致大错。”事实是网络技术出现后，一家新成立 2 年的公司把握时机，一举占领网络软件市场 80% 的份额。而微软公司只占到 7%。尽管微软在努力追赶，但短时间内还是难以缩小差距。

在 1996 年这一年，我可以历数出十多个先进技术。

比如说 JAVA 语言的出现与成熟。JAVA 语言可以在世界范

围内的网络平台上通用，所以藉此功能开发了“企业连锁管理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又由于其具有信息处理及存储功能，所以将来将用不着 486、586，甚至连硬盘都可以取消，进入 net computer 时代。现在 IBM、NEC 几家公司已拿出 NC 机样机，它可以比笔记本电脑更小更薄，因为它可以从网络中租用处理和存储软件。

再比如说巨型计算机的研究。我国的银河 Ⅱ 型巨型机每秒运算速度上亿次，银河 Ⅲ 型则达到十亿次，最新的曙光 1000 型达到 15.8 亿次。而今天美国 INTER 公司在加州安装了一台每秒运算速度达万亿次的超巨型机，8 月份 IBM 公司在华盛顿安装一台运算速度达每秒 3 万亿次的计算机。克林顿出席了该机安装时的庆典，他说：“这台计算机的功能令人惊讶，它 1 秒钟所做的工作相当于笔记本电脑 3 万年所做的工作。”现在世界前 500 名的计算机运算速度都在百亿次以上，前 5 名在千亿次以上。其中日本占 63 台，其余大部分都在美国。由此可见高科技集中在较少数的工业化国家，这点尤为引人深思。

现代科技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到了企业都不得不想把技术发展速度压下来的地步。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技术落后必然导致总体落后，所以企业又不敢放慢技术开发的脚步。如果几家公司联合起来把商品价格及技术发展步伐都压下来，就会因触犯了“反垄断法”被罚得倾家荡产，重则入狱。可见当前社会是高度信义加严密规则，这种机制下的政府可以裁判得公正严密，而且企业赚的钱政府不眼红，只要税收的一部分。所以它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和财富的获得，这是一个经济原理。

如此看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体，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市场经济机制是技术创新的最大压力和根本动力。六大领域的高科技迅速发展，也对现行体制提出改革的要求。也只有利用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才有助于我国缩短和发达

国家的距离，到那个时候，相信在座同学的才华会得到全面的发挥！谢谢大家。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魏绪明

罗汉军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

跨世纪的科学文化使命

[在广西大学讲演]

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形势下，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大大推动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跨世纪的中国科学，正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20 世纪以来，以达尔文进化论为胚胎，由相对论、量子力学拉开序幕，现代科学开始突破近代科学的范式。它以辩证法为“最重要的思维方法”，通过自然观的转换，科学的整体化、演绎化、社会化结构过程的发展，国际化、大众化、产业化功能程度的不断提高，横断科学与交叉科学不断创新，实验手段、数学语言、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化的突飞猛进，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兴起与激烈竞争，集中表现为逻辑实证主义、否认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唯物主义等西方科学哲学的相继演进和自然辩证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的趋向成熟。现在，又呼唤着一个使科学界动心、思想文化界动情的时代性主题：东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

科学界之所以动心，思想文化界之所以动情，是因为每种科学文化形态的理论思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有一定的局限，“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现代科学已经走到融合东西文化的关键时刻。中国科学在古代世界的领先地位，西方文化在近代科

学的支配地位，充分说明了东西方科学理论思维的长短同异。中国古代科学的有机自然哲学思维框架，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而且，以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向西方提供了“科学复兴的手段”，成为创造近代科学“最强大的杠杆”。相反，近代西方科学以严密的形式逻辑、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见长，突破了古代科学直观思维的局限，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工业文明；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西方烙印，走向唯心主义、科学主义和科学危机，最终导致现代科学革命。这就迫使人们用跨世纪的脚步，谱写融合东西文化的主题曲，走向信息时代。现代科学的代表人物，站在近代科学巨人的肩膀上，早已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东方。达尔文从中国明朝的百科全书中，汲取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思想，创立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进化论，最终把上帝从科学殿堂中请了出去。波尔坦率地承认中国思想对自己的影响，用太极图和“相反相成”的名言，作为自己家徽的主体。现代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例如普里高津、埃肯，都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热情赞美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科学价值。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更是注重对东西文化兼收并蓄。特别是汤川秀树，不仅自幼酷爱老庄，“原天地之美，以达万物之理”，而且，直接从庄子著作中得到创立中介子理论的灵感，成为亚洲第一个摘取诺贝尔桂冠的科学家。从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科学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进一步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以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近年以来，著名科学思想家卡普拉以“道”为核心来说明现代物理思想，把东方的生态自然观作为现代科学的转折点；著名历史科学家汤因比把21世纪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引人注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留学生鲁桂珍影响下，“皈依中国文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与写作，用大量史实证明，“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

念，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这部尚未最后完成的著作，改变了世界科学文化地图的结构，被人们誉为“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他的思想和工作告诉我们，跨世纪的机会、挑战和使命，正降临在中国人的面前。

当然，西方强国并不愿意看到中国把握机会，后来居上。他们也不甘心于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崛起，而想在第三次浪潮中，吸取东方文化，在高技术竞争中取得胜利。美国利用他们大量吸收中国、日本和东方各国留学生的机会，得到他们所急需的人才。德国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希望有朝一日，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领域，都能够取美国而代之。日本近年来步西方后尘，以亚洲老大多自居，竭尽全力，要在融合东西方文化方面领先一步，发展带有日本印记的现代自然观，在高科技的激烈竞争中出奇制胜。总之，所有工业强国都在千方百计应付这一场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不愿让东方雄狮轻易实现跨世纪的科学文化飞跃。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头脑清醒，应付挑战，把握时机，后来居上。首先，我们要摸清国内外科技文化发展的动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近代以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不惜洒热血、抛头颅，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近四十多年来，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现代经济体系和初具特色的科技、文化教育体系，有了把握机会、应付挑战、担负使命、后来居上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高举“五四”科学、民主的大旗，研究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引进和批判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融汇东西文化的时代潮流中，抓住现代科学整体化、演绎化、社会化的结构特点，充分发挥现代科学国际化、大众化、产业化的功能特色，加强科学文化各个方面特别是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就有可能扬长避短，一步步赶上西方工业强国，争取在本世纪末有好的成绩。只有这样，50年后才有可能与西

方并驾齐驱，一试高下。问题在于“积重难返”。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东西方科学文化理论和历史，至今还缺少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成果。目前，最完备的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还是由“皈依中国文化”的英国朋友李约瑟组织力量撰写的。理论研究的不足，反映在实践上，就是瞎子摸象，无的放矢，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国经济界与科技文化界联系松散，科学技术范围的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也互不配套，往往顾此失彼。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互不通气，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学术界、教育界、产业界缺少有效的联系纽带和动力机制。至今还有不少人，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用自己的近视眼看问题，轻视科技文化建设，轻视创造教育和职业教育，轻视中小学的素质教育，甚至用应试教育取代了素质教育，用形形色色的短期行为冲击民族科学文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失去机会，永远在国际高科技竞争中处于落后挨打地位。

其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要花大力气培养跨世纪的科技文化人才，特别是学贯中西，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领域的通才、帅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接受福泽渝吉的思想，培养了一批学贯东西的所谓“和魂洋才”，让他们担负起科技、文化、教育的使命。这些人一身多任，继往开来，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三波九折，终于把日本变成一个东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加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道理，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失误。如果说，五四前后，我国科技文化界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科学文化接触太少，了解不够，未能加以吸收、融汇、贯通，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问题却已经不同。当代青年科技人员（包括出国留学人员），对传统科学文化缺乏应有的认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吸收、融汇西方科学文化，实现跨世纪的飞跃。我曾

经有机会向李约瑟、鲁桂珍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留学生存在哪些不足？”得到回答是：“对中国了解太少。”真是一针见血。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派多少留学生出去，也不足以承担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政策，组织研究，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潮流中，改变我们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地位，必须有一点李约瑟精神，执着于东西方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充分肯定中国科学文化的积极因素，促进中国科学文化在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基础上完成跨世纪的使命。也就是说，要用辩证的思想方法，研究从庄子、墨子，到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以至普里高津、托姆、埃肯的历史发展，研究他们的科学思想、科学经历及其科学社会文化背景。在继承、吸收、融汇、贯通东西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提出新问题，发展新思想，探讨新方法，创立新理论，超越传统与西方，并使之上升为辩证的自然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科学方法论。大刀阔斧地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系统的改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现代科学结构的整体化、演绎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充分发挥现代科学国际化、大众化、产业化的功能，真正达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理想境界。最后，通过跨世纪的一跃，实现“五四”以来中华民族的世纪梦。

广西大学教务处供稿 本人审阅

沈清松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技对文化的冲击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来到贵校，跟大家谈谈科技发展和人文、文化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特别是科技发展对文化的冲击。

以前听说，贵校以理工科为主，但我看其规模，是综合性大学的规模，对人文和社会科学也相当重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一般而言，理工科大学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未来科技方面的人才，科技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必须得到提高。照我个人看来，当今历史正在依照两根轴线发展，一个是科技发展所带动的世界普遍化过程。各位看世界科技发展，各国发展的步伐尽管不一样（尤其是近现代科技），但从其工业化、信息化的整体面貌来看，有着一致性。因此，一方面是科技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推动着世界普遍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历史意识的崛起，由此而来是越来越强调人文关怀。每个人都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是我们能够顶天立地的力量所在，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发展，才能创造。因为就整个局势而言，在这个普遍化发展过程中，你一定要有特色，才能对整体有贡献。要不然就只有雷同。只有历史意识的崛起（包含对人文、对文化传统的关怀），人文资源的利用，才能使自己在世界的普遍化的发展过程中，对整体有所贡献，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过去有人说人文与科技，是 two cultures，两种文化。因为科技和人文这两种训练，在方法、学习内涵上的不同，造成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处事态度、方法的差异。过去认为这些差异是无法化约的，无法沟通的。今天看来，two cultures 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科技的发展只有多一点对文化的关怀，才能真正立足于文化传统，才能对整体有所贡献；而人文也必须了解世界科技的发展，否则不知道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空洞。相应地，科技如果不了解文化的发展，缺乏对人文的关怀，就不会深刻地意识到人的发展方向，就会流于盲目。一个要避免空洞，一个要防止盲目，这两者通过相互的学习，尤其是学习彼此的语言，就好像多打开一扇窗户，可以从不同角度看世界。两者相互尊重，可以彼此丰富，打破过去两种文化的界限。我们应该具备拥有开放的人文精神的科技人员。人文要多一些对于科技的认识，不要认为科技是玩物丧志，要看到科技中的方法对人文发展的促进作用。

单就科技来讲，未来科技人员也应该有文化的视野，并且看到科技的发展如何影响文化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必须把科技看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今晚演讲的主题。由于近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资讯业的发展，科技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化整合的一种力量，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整合力量的形成。因此，我首先谈谈文化的内涵，给文化下个定义，然后在文化中给科技定位，科学技术为何影响文化，以及对文化中的几个部门的冲击。

首先谈文化。对文化概念的解释有很多。例如，在《易经》里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这文化的概念本来是“人文化成”的意思，即透过人发挥其精神力量来转化这个世界，使之更合乎人性的要求。

a”(其本意是耕种)有关，在古罗马思想家那里，“文化”一词就含有“灵魂的耕种、陶冶、修养”的意思。人心必须经过陶冶，才能不流

于粗鄙。这个想法跟“人文化成”的意义比较接近。文化概念也跟 civiz 有关,西方有的哲学辞典中将 culture 与 civilization 合并,有

泰勒就认为,文化是你隶属于某一个团体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规范、信仰等。我给文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团体,它是发挥创造力的历程和结果。如果将文化当作一个系统的话,其中包含信仰、认识、规范、表现、行动等五个子系统。

我们来看看文化的五个部分。信仰,就是个人与团体认为其生命所在的基础,包含价值观,宗教信仰等。这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通常文化都以此为根基。现在的科学哲学也指出,信仰对科学的认知有影响。从信仰出发,个人或团体对世界、自己、社会的一些认知的方式就成为认识的内涵,由此构成认知系统。古代神话中就包含许多对世界、自然的认识。从近现代来看,科学是认知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形成了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的认识形成了人文科学。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些趋利避害、趋善避恶的一些规范,这些规范大体上包括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它是人们必须服从的、遵守的。这就是文化中的规范。至于表现,通常所说的民间艺术、文化都属于表现系统。我们将其定义为透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去表现你的信仰、认知与规范。大体上,我们的艺术,如音乐、绘画等都是这样。音乐是听得见的,绘画是看得见的。通过这些艺术对社会的反映,就可以了解所表现的信仰、价值观念。这即是文化的表现系统。文化中还有行动系统,这是文化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它指用切实的操作的方式将文化体现出来的过程。它综合了文化的几个主要部分,并加以融合、创新。例如科学,它以认知为主,但其中也夹杂着行动。它既要思考,也要有行动,像我们利用数学、逻辑来建构理论,这也是行动。

现代社会中的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

展，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科技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文化，也含有文化的几个基本内容，如表现、信仰、认知、规范和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化的各个内容都产生着巨大的冲击力。

科技对文化产生的冲击力，主要是由科技的本质及其先进的发展引起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和技术不断创新，可以利用到各个领域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先进。我们来看一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世纪初飞机的产生，汽车的逐渐推广应用等等，这些科技发展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当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改进，资讯化、网络化的发展，对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下面我来谈一谈这些冲击在文化诸子系统中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行动系统。大家一进入大学，接触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电脑，什么 internet，什么国际网络化，头脑之中一时涌现出许多以前未曾听说、未曾见到的东西。目前像台湾一些著名报纸的专业作者、作家，基本上都用电脑写作。还有克隆技术的出现在国际上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巨浪，同时也为“克隆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总的说来，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对文化的行动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些科学技术来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切身体验等。现在社会上打击黄色和非法出版物，那些非法出版的东西也是通过高科技制作而成。科技本身无所谓是非，如何运用就是关键性的首要问题。作为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我们应当正确地应用科技工具。

其次是对表现系统的冲击。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多了。无论是新科技产生的新材料还是创造的新形式，无一例外地冲击着表现系统。比如说哥特式的教堂，就受到建材及力学规则的影响。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建筑的形式可以发挥更多的想象力。由于产生了许多新的建材，就会产生许多新的形式。各位在电脑中作画也是一样。还有镭射，本来是一种工具，可是

现在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工具，同时也把它转化为游戏，这样，镭射艺术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还看到在音乐里面，过去演奏音乐受乐器的限制，现在由于合成音的出现，创作的领域就扩大了。在意大利有一个叫罗诺的音乐家，我听过他的演奏音乐会。他在前台演奏钢琴，同时在后台播放了一些经过处理的录音磁带。这说明音乐的演奏与科技相关，而且有些音乐，是把人群中发出的声音录制下来，把这些在各种场合录制下来的不同声音，经过制作、处理，就变成了音乐。它告诉你，音乐不是一个单独的世界，它跟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各种音乐的制作成为可能。由于电脑的介入，使电脑作曲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当我们把一种工具转化为游戏性的东西，它就会被归入表现，也就是艺术创作的领域之中。

从近现代艺术史来看，科技对表现领域的冲击很大。比如说照相机。自从照相机发明以后，绘画就必须转变，它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画人物肖像、风景、静物等为主，因为那些东西可以用照相机去拍摄。印象派在后半期捕捉光影、颜色和线条等，就不再画肖像、景物。在抽象画中，颜色和线条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各位看蒙得利安的绘画，它由黄、红、蓝的一些方块构成，是把绘画还原成它原来的东西；立体派、未来派都竭力表现事物的结构，不再去描绘世界的某个角落。你如果带着看世界某个角落的心情去看这些作品，你就会看不懂。可以说，绘画是受了照相机的影响。而电影的出现则使得读小说、听评书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许多青年人喜欢看录像、电影，想象故事的能力就被这些东西替代了。现在比较少的人去写长篇小说，看它不如看影像，这当然也有危机，我们说故事的能力和想象的力量开始萎缩。科技对文化的冲击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扩大了想象的范围，但另一方面说故事的能力，特别是与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说故事的能力和想象力缩小了。这就是科技的冲击的负面效应。

在表现系统中，最根本的冲击是对艺术的本质的冲击。艺术到底是什么？现在在艺术领域中，也有了各种科技工具。例如，现在的画具中有喷枪。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绘画创作会，一进门就放着各色各样的喷枪，每个人进去就拿起来挥舞几下。全部成员到齐了，一幅画就完成了，颜色可以淋下来嘛！最后会长宣布：这叫《淅沥沥的雨声》。因为有了喷枪，颜色会自然形成，把绘颜色用的喷枪转化成游戏性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用科技工具进行创作时，基本上都是我们构成的东西，科技越来越成为构成的东西，技术产品越来越是构成的东西，艺术产品越来越成为人造的、构成的东西，究竟它的真实性何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交往何在？这就涉及到艺术的本质问题。

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所产生的想象之中，尤其是在电脑创作中，存在许多形式重新组合的创作的可能性，真实却不存在了。艺术并不一定在呈现真实，艺术与真实的差距还很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代法国有一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叫尤塔，他谈到康德哲学中“崇高”——即当人们面对自然，面对星空，面对大海、沙漠，突然觉得它的无穷，进而发现人的渺小。这种感觉即是崇高、壮美的感觉。尤塔的解析是，我们经验到的一部分并不等于大海，并不等于真实。这种差距所造成的心灵上的感受，就是“崇高”。他说整个后现代艺术的精神就在此，也就是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表现出来的不等于真实，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设法表现那个不可表现者，不可呈现者。从尤塔对艺术的看法之中也可掌握某些艺术的精神。

以上是对科技的冲击下艺术的创作方向的分析。我们发现真实流失了，不再重现。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构成的时间里，生活在高科技的包围之中。

还有信仰的问题。如前所述及，信仰涉及到个人或群体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价值观的追求，甚至涉及到某些宗教信仰的问

题。信仰大体上可分为人文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人文的信仰基本上包括价值观、生命意义等，像人们对真、善、美、正义、自由、平等、无私等价值的追求，使人觉得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宗教信仰是对真、善等现实的超越，阿拉、上帝、神、佛都是超现实的体现。这是人文信仰与宗教信仰两种信仰的差别所在。

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信仰体系有很大的冲击。首先，它使原来的信仰逐渐失去其可信度，这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某些人文信仰。韦伯有一个概念叫除昧或解咒，这个术语说的就是科学与技术发展形成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原来的信仰就被冲击，不再被人们相信。这就好像原来的咒语逐渐解除。白雪公主被继母用咒语施了魔法以后，昏睡不醒。后来，王子披荆斩棘来到身边，亲吻了她一下，白雪公主才醒来。这就是解咒，是富有浪漫意义的解咒。而科技的解咒之后，许多意义就流失了。原来相信生命艺术的价值，现在不再相信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后果：科技越发展，思想越理性化，可能越会流失一些对生命有价值的东西。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启蒙运动强调科技，强调理性化，可越来越深的理性化使得理性本身变得越来越贫乏，譬如说失去生命值得奉献的理由，造成意义的贫乏化。当代的一些批判理论也是针对科技发展的，因为科技为了强调达到一个目的而不惜采取某种有效的方式或手段，于是工具理性发达了，而价值理性就越来越贫乏了。所谓后现代（post-modern）并不是现代的结合，而是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中产生了许多弊端，由此对现代化所提出的种种怀疑、否定，这就是后现代。它并不表明时间的先后，而是精神的延续与发展，是对现代化的质疑与批判。后现代中有一个倾向——虚无主义。在西方较为系统地提出虚无主义思想的是尼采。尼采提出虚无主义时是对当时整个西方文化的反省，认为西方文化在科学上追求理想的真理，道德上追求彼岸的理想，反而忽略了生命本身，造成了虚无的状况，因此必须反省，要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力量。因此，尼采的虚无主义有值得肯

定的一方面。而“后现代”中的虚无主义，我认为，反映的是只追求眼前的利益，它认为生命之中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理由，这是现代科技的冲击造成的结果。因为科技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构成的世界之中，远离了真实。随着科技的不断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异化。我们在台湾作过一些调查，在电脑化过度发展的一些单位，人际关系产生了疏离状况：人与人之间不必谈话，就在电脑里弄来弄去，就忘了去爬爬山，去散散步，跟自然接触。现在佛经、四书五经都输入进了电脑，可是一打开电脑，没有人会面对《心经》涵咏一番。利用电脑中的《心经》只是作研究。过去我们读书时，内心就有体会，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陶冶了内心。现在按一下键盘，你要的东西就出来了，获取的是资讯，可心灵的陶冶就没了。我想即使有人打开电脑发现唐诗三百首，他也不会涵咏一番，回去泡杯茶、抽支烟时也许还会朗诵一下，没有人会对着小小的屏幕朗诵。Information（资讯）不等于Formation（陶冶），“In”还具有否定的意思，知识的获得并不等于心灵的升华。可以说，资讯业的发展对虚无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失去生命的价值，失去人文的思考，这就是一种危机。理工科的学生在复杂的网络之中遨游时就应该注意这些问题，要注意人文素质的深化和提高。科技越发展，越是要注意培养更高的人文修养与视野，才能做科技的主人，而不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人文精神的丧失而使自己成为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

科技也预示着一些更开放的人文精神。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观察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科技对人文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提供新的创造性的道德规范；提供更多的材料与创造形式供艺术创作；它对于我们原来信仰的价值也有批判的一面，迫使我们不断反省，使得信仰的价值更富有人性，而且科技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宇宙，使人知道面对整个宇宙要谦虚。人固然非常重要，可是人不是唯一的存在，人相对于宇

宙而言是非常渺小的。对次于原子的结构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复杂、精微的构造。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说，科技的发展使我们重新定位自己，进而使我们拥有一个开放的人文价值观念。科技的进步使我们更有效地创造、行动，使我们的行动更有创造性。科技的发展可以使人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一方面要避免科技冲击中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有创造性的，而且可以为人的生命寻回意义的人文精神。科技本身对人文精神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科技人员也不可妄自菲薄，应该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伟大意义。既有正面推动，也产生消极作用，关键在于怎样弃劣扬优，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方向，具备一种开放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科技将扮演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科技也应充实对人文的了解。科技与人文相互丰富，共同合作，为建造和形成新的开放的人文主义世界作出贡献。

下面，对我今天的演讲作一个简单的归纳。“科技对文化的冲击”，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科技本身也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属于文化中的认知系统，技术属于文化中的行动系统。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对文化各个系统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作用。在这个新的发展过程中，关键在于怎样去扬优弃劣，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方向，构造一种新的开放的人文精神。科技与人文，这两种文化，应该相互丰富，共同合作，为建造和形成新的开放的人文主义世界做出贡献。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傅顺东

文学与艺术

吴小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牡丹亭》与中国戏曲

[在北京大学讲演]

我知道在座各位对中国戏曲，甚至对今天的戏曲都比较陌生。

我们这门课是个导读的课。将来同志们有兴趣去读《牡丹亭》的原文——当然那里面词句有费解的地方，不过，那也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看《牡丹亭》这个戏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它的价值、影响。在讲这以前，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牡丹亭》故事内容。除了这两个内容外，如果还有时间，我则附带地谈第三个内容，讲怎么看中国的戏，包括现在的京戏，怎么样去欣赏或是看懂现在的戏，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存在哪些问题。还有，《牡丹亭》要是演起来的话，在舞台上表演有什么特点，应该怎样接受或欣赏舞台演出。

首先，我应该告诉大家的就是，最早这《牡丹亭》不叫《牡丹亭》，而叫《还魂记》，是汤显祖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一。这“临川四梦”还有：《紫箫记》，后来改为《紫钗记》，所以，《紫

箫记》是《紫钗记》的一个稿本。这《紫钗记》表现什么呢？表现唐代一个妓女叫霍小玉的恋爱故事。原来唐代传奇小说有这个故事，应该是悲剧，但汤显祖写《紫钗记》就把原来的故事有所改变，但改变不是太大，改成一个团圆的喜剧，这是《紫钗记》。另外两个戏性质跟《还魂记》、《紫钗记》这两个是爱情戏的性质不一样，是讽刺世故入情的戏。一个叫《邯郸记》，它是根据唐人小说《枕中记》改编的。《枕中记》是说一个姓卢的读书人，出来旅行，走到店里吃饭，碰见一个姓吕的道人，给他一个枕头，让他睡时用。枕头有一个窟窿眼，他就从这窟窿眼进去做了一场大梦，梦到他在朝为官，这一辈子功名富贵什么都到手了，但最终由于受到小人诽谤，又失去了一切。这个戏写人世无常，有点消极思想在里边。另外一个叫《南柯记》，它是根据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改写成的。写一个书生跑到大槐树下，实际上到一个蚂蚁国当驸马，跟另外一个蚂蚁集团打仗，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最后，他梦醒了。所以，我们常说“南柯一梦”，就是源于此。这部戏讽刺封建社会你争我夺，跟蚂蚁打架一样，带有讽刺人情世故的意味。因为这四个戏，除《紫钗记》写梦境少外，其他三个都跟梦有关，汤显祖又是江西临川人，所以汤显祖这四个戏又叫“临川四梦”。

下面我们谈一下中国的戏是怎么形成的。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有戏剧，而我们中国最早则出现在南宋末年，真正中国戏曲形成比西方晚得多。直至元代杂剧才有整本整本的剧本出现。北方叫杂剧，南方叫戏文。今天传世最早的南戏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中国与欧洲的情况不一样，虽然正式的戏出现得较晚，可是戏曲当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很早就有了。早在《左传》里就有演出的记载，歌舞在周朝就有了。所以，我强调中国戏曲以唱为主，如评戏，河南、河北梆子，是靠声腔的差别来辨别的。中国戏曲有三要素：第一个是歌舞、音乐。第二个因素就是滑稽、讽刺，

对时局、统治者有所讥讽，以说笑话的形式对统治者或规劝，或讽刺。中国戏曲总伴有滑稽的场面。第三个因素是武打杂技。这三个东西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戏曲。我们到戏场看戏，有文戏、武戏，当然，也有个别的是玩笑戏。可这只是因素。我认为中国的戏曲是跟中国的小说同一源头，戏曲又跟诗词、中国的通俗文学有关系。

据现在可考的材料，唐代敦煌出土的变文材料表明，最早的戏曲雏形有唱段，又有念白，由民间艺人给观众表演。变文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民间的艺人在说唱故事时有挂图。关于这一点，唐诗里也有记载。但挂图是死的，必须讲一张又挂一张，太死板了。从变文出现后有“变相”来看，发展到唐末、北宋，除了讲故事有画像外，又改成木偶或皮影，即用傀儡、皮影来做可以活动的画面，旁边也有说书的人。观众可以看傀儡、皮影在那边的动作。这些最早是从图画变来的，由图画进而变为傀儡、皮影，用真人傀儡、皮影来代替真人，但这还不过瘾，于是就用真人来代替傀儡、皮影。比如在宋人笔记里说“傀儡、皮影皆有话本”，话本就是说书人的底本，说故事的人的脚本。可见，第三者在那儿说唱，不过用傀儡、皮影在那儿衬托。现在在故宫里还藏着一张图，那图很能说明问题：一块地毯，地毯中有大人、小孩在那儿表演，旁边有两个人在那儿说书。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演出有人专管表演，有人专管情节，表演的是真人，但不说话，说话的人是旁边做介绍的人。后来说与做的人合二为一，戏曲才形成了。所以，我们看中国的戏曲老有这样的场面出现，我们就不大理解。京戏、昆曲等地方戏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见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一般主要演员出来，先念引子。引子就是没伴奏的唱。我以《失街亭》的主角诸葛亮为例加以说明。诸葛亮登场，先念引子，词是：“羽扇纶巾，四轮车快似风云，阴阳反掌定乾坤，保汉家，两代贤臣。”这不是诸葛亮自己的词，是解说的人介绍诸葛亮的，

是旁白人的口气。这种自我表白实际上都是说书人替演员表白，后来演变为演员自己表白。小说里不叫读者，叫看官。看官者，是看表演，还有“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说书在紧要关头留下的扣子，是说书人的口气。

在戏台上，演员随时可以进入角色，也可以脱离角色。用“且住”——底下表的是心里的话。比如，占据宛城的张绣被曹操打败了，最后只好投降，但心里不服气。跟曹操对完话觉得曹操欺负他了。在台上，他要跟观众表示他的想法，就站起来用袖子一挡脸，“且住”——就是他从角色中出来了，说曹操怎么怎么不好，需要怎么把他解决了。这是告诉观众他心里想什么。“且住”完之后，又回身跟曹操对话。“且住”就是戏暂停。后台叫“打背工”，面向观众，说心里话。这就是戏曲的特点。它也是从说唱文学中来的。

京戏要给观众娱乐，就要有大段的唱、念白。如果要按情节来叙述就不好办了。比如《甘露寺》这个戏，讲的是刘备招亲的故事。先是孙权母不知道是计，所谓招亲，实际上是将刘备诓过来，扣为人质。后来诸葛亮通过乔太尉给孙权母通风报信，孙权母知道了很生气，在台上就晕过去了，被叫醒后，孙权就说：“不杀刘备，誓不罢休。”然后乔太尉又唱了一大段，说不能轻易地杀掉刘备，这对我们东吴也不利，咱们还是两边和好。乔太尉跟孙权讲理，说服孙权，把刘备那边吹了一大通。这些，老太太肯定听见了。到了甘露寺，刘备见了吴国太，乔太尉又在旁边介绍，说这就是刘皇叔，是刘备，是中山王刘靖之后，说怎么怎么了不起。说刘备有个结拜的二弟是关羽，三弟是张飞，四弟是赵云，有个谋臣叫诸葛亮。这大段地是念白，不是在唱，就是把唱词改为念白。

有人说京剧的节奏太慢，干脆将其压缩——出来就抢、就跑。这不行，节奏快慢应该是相对的。通过上面的介绍，同学们知道中国戏曲的大概特点，它是从说唱文学中派生出来的。下

面，我们就要从中国戏曲的发展的角度来谈爱情戏，看《牡丹亭》在中国戏曲史，特别是爱情戏曲发展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知道，在《牡丹亭》以前，中国流行最广的爱情戏是《西厢记》，除了杂剧里有《西厢记》，还有董解元的《诸宫调》。《董西厢》就是一个说唱的作品。北宋时的《鼓子词》中也讲述《西厢记》的故事的。在戏曲里不光元代杂剧有《西厢记》，后来到了明代南方把这个故事改编了，那就有了几种《西厢记》，甚至还有模仿《西厢记》的作品，也出一个小姐，一个丫环，与一个书生谈爱情。

对《西厢记》先不谈它的艺术性，我们谈它的思想意义。“文化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句话：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舞台。我说这话说得太片面。对帝王将相要一分为二，对才子佳人也得一分为二。《西厢记》是一个典型的才子佳人的戏，但它反对的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门当户对。过去的婚姻得门当户对，为什么崔莺莺的母亲就不同意崔莺莺嫁给秀才张生？就因为张生没有功名，没考中科举，没有当官，不门当户对。她让崔莺莺嫁给她的内侄，她的内侄也是贵族，是世族子弟。门当户对显然是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的要求。

在古代的剧本、小说故事里面，我们往往对受迫害者、对被统治者侮辱、损害的那个对象感到同情，其中有一条原因：这个对象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像《窦娥冤》里的窦娥，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个本身也博得作者和观众的同情，如果这张生长得奇丑无比，崔莺莺也长得挺难看，于是她母亲说：不许你们在一起！观众一想：这么难看，就算了吧！正因为张生是一个有才气、有学问、有仪表的读书人，崔莺莺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可谓才子配佳人，这样观众才同情。这么天生一对的青年男女的婚姻给老太太破坏了，拆散了，当然引起同情。而老太太拆散他们的理由

仅仅是门不当户不对，观众的心里自然对门当户对的观念起了反感。所以这对才子佳人有引导观众爱憎的倾向的作用。比如西施也是挺漂亮的，但东施就没人同情。可见才子佳人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积极意义。帝王将相也是如此，拿唐太宗与隋炀帝来说吧，隋炀帝荒淫无道，随便杀人，唐太宗毕竟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百姓宁可拥护唐太宗而不愿受隋炀帝的迫害。所以隋炀帝时百姓几乎全部造反了。而唐太宗一出来，天下逐渐太平了。为什么呢？帝王将相也有好坏善恶，所以舆论导向有时奇怪极了，虽同是统治阶级，但因为或多或少为老百姓做了好事，也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我们必须辩证地看问题，不能一概否定。

既然《西厢记》是以才子佳人来反对门当户对的，所以《西厢记》的影响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明朝，直至今天。故事也是家喻户晓。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出来了，一下子在戏曲发展史上取而代之。汤的《牡丹亭》也不是凭空构思出来的，他也有各种各样的依据，诸如唐人传奇、六朝志怪等，而《牡丹亭》剧中的杜丽娘这一人物在元曲中也有类似的雏型。

《牡丹亭》的故事梗概是这样：杜丽娘的父亲是太守杜宝，是一个学究先生，受宋儒理学的影响很深。他请了一个管家先生，是一个迂腐透顶的人。老师教杜丽娘念书，没想到她比老师的智商还高。杜丽娘趁父亲不在家，听说太守府后的花园景致不错，就跟丫环春香到那个花园去游玩。这便是“游园惊梦”的“游园”。小姐和丫环游园归来，小姐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书生来向她求爱，而且两个人幽会了……梦被她母亲惊醒，但她是非常留恋这个梦。第二天，杜丽娘心里不宁静。接着有一折戏叫“寻梦”，说的是她根据梦境又到花园里去了一趟，去了后她的心情很悲伤，回来以后杜丽娘就生病了。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也知道自己很美丽，她认为自己花容月貌，就这样死了，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的，辜负了自己的仪表，她为了让自己的青春仪表留下，就给自己画了一幅画，然后她就病死了。根据她的遗嘱，

画被放在遗体边，她的棺材就葬在花园里。后来父亲升了官。过了不久，又来了个读书人，这个人就是杜丽娘梦里的那个读书人，叫柳梦梅。他来这以后，杜丽娘就显魂了。而且柳梦梅在花园里也拾到了这幅画，一看这画上是一个绝代佳人，柳梦梅就把画挂在墙上整天招呼她。所以昆曲中有两折戏叫《拾画》、《叫画》。他也不知道这女孩是谁，就希望是一个真人而不是一幅画。终于杜丽娘的灵魂来找柳梦梅，最后打开棺材杜丽娘死而复生。汤显祖有个理论，强调人的“情”，这一思想是明代后期出现的反程朱理学、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的表现。汤显祖的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上的反映。汤显祖的理论是，如果一个人执着于爱情，那么这个爱情既可以让人死了，也能让人复生，所以杜丽娘死而复生，最后与柳梦梅结合。后来柳梦梅进京赶考，中了状元，柳梦梅在京城找到了已做大官的杜宝，说：我把你女儿救活了，已结为夫妇。但这老丈人相信死人不能复生，这是其一，其二，认为女儿败坏了他的门风，哪有不告而嫁，自己就结婚的呢？结果就认为柳梦梅是假冒的女婿。虽然柳梦梅当时是状元，还是被吊在府门口上，一顿毒打，老丈人打女婿打得简直是够呛。但是这里有一点，汤显祖写得很好，就是说不论你怎么打，我不改口：就是你女儿爱我，我爱你女儿，我们结婚了，我们就是这么回事，你再怎么说，这也是事实，抹不掉的。最后，官司打到皇帝那儿去了，皇帝做了和事佬，让柳梦梅和杜丽娘结合。皇帝赐婚，老丈人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接受，皇帝的圣旨不能不听。戏写得很细，尤其是最后一场。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老丈人和女婿始终没有调和，没有和谐，两个人的思想感情有距离。即使皇帝同意两个年轻人结婚了，老丈人和女婿的疙瘩还是没解开。剧本就是这么写的。

《牡丹亭》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梦里恋爱这个事情，不是从汤显祖开始的。在元人杂剧中，有个剧作家叫乔吉，他的号叫梦符，他有个剧本叫《金钱记》，是说一个书生在一个大官

家里教书，教的女孩子呢，就是这个大官的女儿，这个书生就爱上这个小姐了，当然这个小姐也对书生有意，也是很爱他的。那时两人不好表白，不像现在，他们到哪儿去见面，去谈情说爱呢？请注意，剧本写得清清楚楚，两人在梦中到牡丹亭去幽会。可见牡丹亭不始于汤显祖。我看了，它使我懂得一个道理：牡丹亭就是在封建社会想象中恋爱的男女幽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牡丹亭。这是从乔梦符的《金钱记》里得到的启发。有意思极了。在《金钱记》里好多台词，《牡丹亭》在《游园惊梦》里也用了，台词有类似之处，可见汤显祖写《牡丹亭》也受到乔梦符《金钱记》的影响。受影响不足为奇，我们写作品受前人影响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有一定的模仿，这也不是错。关键是不是你有创新，有新的意思在里面，而不是光是形式上模仿。在乔梦符的笔下，是那个书生做梦梦见小姐来找他，这个事情在封建社会当然也不算是合理的，但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封建社会的男性还是比较自由的，约束比妇女少得多，他可以做这样一个梦。那么我就要问了，一个深闺少女，有没有可能也做这样的梦呢？用现在的词来说，她是否也会向往嫁给一个她梦到的“白马王子”，尽管她还不知道他是谁？换句话说，她也很可能做一个与她的“白马王子”幽会的梦。但是，写作品的人很少把这一点公之于众。把少女内心深处的东西写在作品中，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不容易的。应该承认，当社会的大环境向个性解放这方面发展，即使是深闺少女也有要求爱情的渴望，但很难形诸笔墨，甚至她自己也不好说出来。汤显祖的了不起，就在于此，他不仅写出来了，而且还是以剧本的形式，以公开演出的形式，表现了少女的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才气，更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的表现，敢于展示深闺少女那种渴望爱情的心理，让杜丽娘这样一个形象来代表千千万万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深闺女性。仅此一点，我认为，汤显祖就突破了《西厢记》那种“才子佳人”的旧模式。尽管柳梦梅、杜丽娘仍然是一个才子，一个佳人，但这里

就有汤显祖的思想，就是说，理学的束缚紧紧缠在青年男女的身上，使得他们不能打破这个罗网，而汤显祖把这种斗争表现在舞台上，其意向表明：这种束缚是可以冲破的！所以，《牡丹亭》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就在于——它用情来战胜了封建礼教。汤显祖本人并没有起来参加革命，但反映在其作品中的这种思想确实是一种叛逆思想，十分的难能可贵。

读《牡丹亭》，就要看到作者怎样为受封建礼教压迫的青年女性呼吁。但是，请注意，汤显祖的突破也仅是到此为止，当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后，跟柳梦梅结婚了，柳梦梅还得去中状元，杜丽娘也做起状元夫人来。皇帝赐婚意味着这个婚姻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肯定的，这是因为柳梦梅的地位已经变了，已经上升到统治阶级内部去了，他与其老丈人的矛盾当然是情感方面的矛盾，但已经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以前缓和多了。这说明，《牡丹亭》自身是存在着局限性的，当杜丽娘死而复生后，它所表现的就是一个喜剧了——翁婿之间的矛盾不太突出了，也就是说，《牡丹亭》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也就到此为止。

在《牡丹亭》之后，出现了两个剧本：《桃花扇》和《长生殿》。这是两个长篇的大剧本，其特点表现为：发展了《牡丹亭》的爱情故事，将爱情与政治结合起来。《桃花扇》写秦淮名妓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他们爱情是产生在反对明末黑暗政治这一基础之上的。他们都有一种爱国的思想，这种志同道合的爱情在《牡丹亭》里是没有的，《牡丹亭》是同情反对礼教者的，而《桃花扇》就有了政治观点的志同道合了，比起《牡丹亭》来又前进了一步。《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讲的是政治与爱情发生了矛盾。《桃花扇》里是政治与爱情的统一。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爱情，建立在老百姓的剥削之上，老百姓不堪忍受剥削，起来反抗，他们的爱情也就产生了危机，最后杨贵妃自缢，唐明皇逃亡。可是，洪昇吸取了《牡丹亭》的特点，让李、杨二人在天上团圆了，这也就摆脱了政治

的影响。可以说，《长生殿》既受了《牡丹亭》的影响，但又不同于《牡丹亭》。真正意义上比上述三个剧本更加进一步的作品，不是剧本，而是《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继承汤显祖作品中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思想，同时，也达到了政治与爱情相结合的高度。《红楼梦》在这方面，确实是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前人思想、艺术上的精华，算得上一部石破天惊的作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牡丹亭》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它不但影响了戏剧本身的发展，还影响了其他体裁文学，如小说，的发展了。

掌握了上述论点，再去读《牡丹亭》，就可以加深我们对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的理解，收获也会更多。当然，《牡丹亭》也不是没有局限，其局限就在剧本的后半段，爱情成功了，戏就完成了了一半，礼教与个性解放的矛盾就不再那么尖锐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舞台上的《牡丹亭》就只是前半段，后半部只有“硬拷”这一出还保留着，就是老丈人打女婿的那出戏，至于什么“金殿团圆”之类就没人再演了。

关于《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价值以及影响，我极概括而又非常粗浅地给大家作了一个介绍。至于它的一些更深刻的意义，请同志们通过读剧本进一步深入研究。

下面谈一谈怎么看中国的传统戏曲的问题。仍旧拿《牡丹亭》作例子。《牡丹亭》最精彩的一出是“游园惊梦”，此后还有一个独角戏，就是杜丽娘的“寻梦”，她一个人在台上通过唱词表达心理思想；再有就是柳梦梅的独角戏《拾画》、《叫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戏曲（无论是昆曲还是京戏）的特点是在于突出主要人物。我认为，观众看戏，演员演戏，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作为演员，必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作为观众，唯一的目的就是盯准台上的表演，不得分散精力。所谓如何欣赏戏曲，简单来讲就是要达到上述的目的。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条，需要条件。首先，戏剧中的独角戏容易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果在《寻梦》一出里给杜丽娘配上十来个伴舞的，那观众的注意力就很难集中了，在这一点上，传统戏曲跟流行歌曲绝对不一样。当然，独角戏对演员本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一种戏，叫做“对儿戏”，就是两个演员。中国戏的特点就是这样，重点的角色一般不会超过三个；其实不只是中国，西方的芭蕾舞也是突出重点，主要人物至多不会超过三个。但是现在的舞台表演搞的是“人海战术”，这决不是艺术。其次，观众看戏是希望了解戏剧的情节、人物，而不是看热闹的。现在有人提“振兴京剧”，但追求的是让观众看热闹，是“关公战秦琼”式的舞台串演。我认为，这是“振兴京剧”的误区！应该避免。第三，现在的戏曲演员也不是在演戏，而是在搞杂技，一出来就翻跟头，显示的是“高难度”的杂技，绝不是戏曲表演。

如何“振兴京剧”？有一句话讲得好——“木必生腐然后重生，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挖自己墙脚的往往是自己人。前面提到的“人海战术”、“关公战秦琼”、“杂技表演”都是对传统京剧的践踏。真要为“振兴京剧”着想，就当戒除上述弊端。

北京大学教务处供稿

褚斌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诗 经》 导 读

[在北京大学讲演]

凡是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爱好中国古典诗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部最著名也是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这部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曾被儒家尊为经典，列为五部经书之一。所谓“五经”就是指《诗》、《书》、《礼》、《易》、《春秋》，其中的《诗》就是指《诗经》。“五经”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流传很广，现在虽然已不读经了，但今天看来，《诗经》这部书有很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一批优秀的诗歌作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以至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首先，就不能不注意到它。关于《诗经》，我们分两部分来介绍：首先谈谈《诗经》的概貌，即这本书的内容和结构；第二，谈谈《诗经》这部作品的辉煌成就。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并有着优秀的传统，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一部经过当时的乐师——乐师就是掌管音乐的官——编辑起来的诗集，叫做《诗三百》。大家知道先秦并没有《诗经》这个称呼，到了汉代，《诗三百》被儒家学者作为经典以后才有了“诗经”这个称呼。而所谓《诗三百》也并不是整整的300篇，而是305篇，称三百篇是采的约数，取整数。如果我们看先秦古代文献的话，就没有《诗经》这个名称，而只有《诗》，单独称《诗》或者称《诗三百》。《诗经》收录了我国西周初年到

春秋中叶之间产生的 305 篇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北方中原地区的民歌，是根植于我国古代古老黄河流域的艺术花朵，从它的内容来看是贴近现实的，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从风格来看，它是淳朴的。正是这一批以贴近现实、淳朴自然为特征的诗歌，一产生就广泛地受到了我国人民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园林中最早的硕果，是中国文学史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首先，我就《诗经》这部书的构成和它的有关内容作一个介绍。如果手里有一本《诗经》的话，我们打开一看就会发现，它是按照《风》、《雅》、《颂》来编排的，也就是说，它是按《风》、《雅》、《颂》来分类的。为什么这本书有这种划分呢？原来《诗经》中的诗篇有的就是人们口头传唱的诗歌，有的虽然是当时文人的创作，但也是经过乐师配乐以后供演唱的，所以它们都是歌诗。后来的诗歌已经和音乐脱离关系了，虽然说是歌，实际上已经不唱了。但《诗经》这部诗那时是每首都要唱的，我们管它叫做歌诗，也就是可歌的诗，也就是说，它是同音乐有关系的。因为这样一些诗，它的产生和来源地区不一样，它的乐调也就有所不同，歌唱时的曲调当然就不一样了。《风》、《雅》、《颂》乃是按乐调来划分的类别。

《风》又称《国风》，是当时各诸侯国所管辖的不同地区的作品，因为在周代除了周王朝中央统治以外，还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而《国风》就是指当时各诸侯国地区的作品。《风》包括十五国风，这十五国风有的是指当时的诸侯国，有的是指当时的地区；《国风》分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郑风、秦风等十五国风。它的地域相当于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区，从这也可看出《诗经》是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民歌。“风”诗在《诗经》中是最多的，一共是 160 首，占 305 首中的大部分。

《雅》是指当时周王朝国都附近地区的乐曲。古代有一种“雅言”的说法。什么叫“雅言”呢？“雅言”就是相当于现在我

们所说的普通话，因为国都是政治中心，所以当时就把国都附近的语言称为“雅言”。当时各地有各自的方言，方言方音不同，不统一，因此把王城附近的话当作标准话，称为“雅言”，同时也把靠京城附近的乐曲和乐调称为“雅乐”。《诗经》中“雅”这一部分又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是105篇。《雅》这一部分诗歌里面既有民歌，也有文人的创作，这一点与《风》的相对单一性不同。

《颂》是古代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因为它是祭祖所用，所以就非常严肃，因而曲调也比较平缓，与一般的乐曲不同，单列为一类。《颂》诗又分为鲁颂、商颂、周颂三类。一共有40篇。《颂》诗一般是周王朝的史官即掌管史书、掌管历史的官或者当时的巫祝所作，所谓巫祝应当是当时掌管祭祀活动的人。由此可知，《诗经》这部作品原都是音乐作品，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乐谱已经失传了，今天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部歌曲集的歌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我们之所以管它叫“总集”而不叫“全集”，是因为按中国古代一种分法，全集是与选集相对应的，而总集是和别集相对应的。《诗经》或叫《诗三百》，它不可能把当时所有诗歌都收集齐全，所以不是全集。总集是收集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集子；别集是单独的作家的作品的集子。我们现在管《诗经》、《昭明文选》叫总集，因为它们都是收集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别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居易集》、《陆放翁集》等。《诗经》里面的作品从创作年代来说，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作者来说，它包括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不同职业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性别的作者的创作；而作品的题材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有的写政治、农事，有的写祭祀，有的写狩猎，有的写行役，有的写战争，有的写爱情，有的写婚姻等等，不但题材多样，而且形象极为生动。我们谈《诗经》里的作品，就像看当时社会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一个精金美玉、杂收

并蓄的宝库，非常绚丽多彩，炫人耳目。这么多作品是由谁来收集和整理的呢？古代朝廷里设有采诗官，而且当时有相应的一套到下面去采诗的制度。根据古文献的记载，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朝廷就派一种官员——“行人”，即采诗官，据说他们敲着木铎，即一种铃铛，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收集起来，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周王朝里总的乐官叫做太师，太师加以整理，配好音律，就演唱给天子听。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记载，这样做一是为了“观民俗，知得失”，就是通过这些诗篇的内容来了解下面一些老百姓的情况，作为施政方面的参考；第二，是出于搜集乐章的需要，是为了制乐。实际上，这两种需要，后面一种需要是最主要的——我们料想，当时周王朝也没有那么积极关心民情，虽然为了巩固统治，会有一种了解下面情况的愿望——因为按当时的制度，凡是在一切祭祀、朝会、征伐、狩猎、宴饮等等场合，都要配合演奏乐章，那么乐官的职责就是专门来编制和教练各种乐曲，这些乐曲除了乐官自己来谱制以外，还要利用和参考许多民间传唱的乐调和唱词，所以采诗也就成为乐官们一项不可缺少的职责。实际上，《诗三百》这些作品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根据这样一种需要，日积月累地被搜集、编在一起的。这些诗里还有一些是属于贵族文人的作品，这就不是产生于民间，不是“行人”搜集起来的。因为当时还有一种献诗的制度，所谓献诗制度，就是一些贵族文人或臣子向周王进献诗篇。文人作品大概就是通过献诗汇集到朝廷的。总的来说，《诗经》这部书，它是由当时的乐师之手把它編集起来的。

由于《诗三百》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因而就受到重视。古时候，曾经把它当作生活的教科书。我们今天看来，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在古代它更重要。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多次教导学生，要读《诗》。孔子可以说是《诗三百》的第一个评论家，而且评价非常高。他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小子”就是孔子称呼自己的学生，不带轻蔑的意思。在孔子看来，《诗》的用途非常广泛：《诗》可以激发人们的志气，可以提高人们的观察力，可以锻炼人们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集体精神，还可以学到批评时政的方法，怨就是怨刺，所以说有“兴、观、群、怨”四大作用；不但如此，“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近呢，则可用来侍奉你的父母；远呢，可以用它来辅佐君王，帮助时政。最后他说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因为《诗经》这部书，特别是在《国风》的一些民歌中，就写到很多鸟、兽、草、木。《诗经》讲究“比兴”，它从大自然当中摄取了很多自然物来写作，所以你读了《诗》以后，单从知识来讲，你还可以多多地识一些草木鸟兽的名称。看了这一段话，可以知道，照孔子看来，《诗三百》篇无疑是一部文学、伦理、政治、博物的百科全书。另外孔子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这是跟他的儿子鲤说的，说你不学《诗》，你就不会说话。意思是说，不学《诗》的话，你就不能掌握语言的技巧，就说不出的优美、动听的言辞。从这可以知道，孔子对《诗》这部作品是相当重视的，所以他就把这部书当作教授自己弟子的教材。

正因为《诗三百》在语言技巧方面也很有成就，所以它在春秋时代还有一个特殊用途，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常常是用《诗经》里面的诗句来表达，一些言辞要用《诗经》的诗句来表述，所以当时进行外交活动时有“赋诗言志”的惯例。国君或者外交官们为了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就经常采用赋诗的办法将意见传达给对方，对方为了表示很有修养，往往也用赋诗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所以叫做赋诗言志。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鲁文公访问晋国，在中途遇到了郑国的国君——郑伯。郑国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当时处境非常孤立。他想请鲁文公给他牵线搭桥，跟晋国搞好关系。在宴会上，郑国的大夫就赋诗，唱了两句诗，是什么呢？是《小雅·鸿雁》篇里的两句诗：“爰及矜人，哀此鳏寡。”“爰”就是乃

的意思，“乃”可以当作加，即加上身上，“矜人”就是可怜人，就是希望把恩惠加在我这个可怜人身上。“哀此鰥寡”，本来“鰥”是指男子大而无妻，“寡”是指女的年长无夫，这里是指孤立无援的意思，就是你可怜可怜我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人的意思。《鸣雁》篇的本意是讲述当时的劳役之苦，当时统治阶级抓壮丁服兵役、劳役。他就把这两句诗拿来，意思是应该同情孤立无援的人，说明自己国力较单薄，希望鲁君来帮助他。这样，采用赋诗的方式，你赋两句，我赋两句，来表达情意。最后鲁国的国君就赋《小雅·采薇》里面的两句诗作为回答，他说：“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说是国势这么紧张，难道我敢安居？一个月我就要交战三次。《小雅·采薇》是描写出征战斗的诗，鲁君借此表示愿意为郑国和晋国的修好来奔走。当然在这种外交场合所谓吟诗、赋诗，一般都是“断章取义”。他们所用的意思都不是原诗当中的意思，都是采取了诗的某句或某几句的字面上意义。大家都知道在外交场合非常讲究机智和辞令技巧的，既要把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对方，又要讲礼节，不失国格和尊严，所以就需要用含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意思。由此可知，在古代《诗三百》被视为有多种用途的重要的书。按照孔子的话来说，它是可以当作美育、德育、博物的教材的，而且在外交场合还可以当成学习外交辞令的教材。

上面我们介绍了这部书在古代使用的状况和它的构成情况，下面我们讲一下《诗经》的辉煌成就。

《诗经》作为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我国古典文学辉煌的开始。因为它产生最早，又有广阔而丰富的内容，因此，它又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我们民族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诗经》里面的诗篇是不是有商代的遗存？现在还有争议，我们把它断代为西周初年。另一种意见认为《诗经》里面的《商颂》就是商代的作品。可也有人认为《商颂》里面的商，不是指

殷商时代的作品而是指当时宋国的作品，因为宋国的君主是殷商的后裔，所以它产生的一些祭祀商代先祖的诗是可以理解的。《诗经》中的作品，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是没有疑问的。《诗经》《大雅》里面还有一些古老的史诗，就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篇诗。这一组诗记录从周始祖后稷的诞生一直到周武王灭商兴周的历史和传说，是传唱在周初前后的一组史诗，因为它十分可贵地保存了一些远古历史的面貌，所以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过去认为中国好像没有史诗，都是些抒情诗，不像希腊，希腊文学一开始就有一些很著名的史诗产生了，比如《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这部《诗经》里也存在着“史诗”。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胜利的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它的内容主要是写英雄传奇的故事，包括一些神话传说。中国最古老的一组史诗就出现在《诗三百》篇里面。

《诗经》里还保留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祭祀诗，如《诗经》里面的三颂，即周颂、鲁颂、商颂。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于同等地位，他们视祖先的亡灵为本民族的保护神，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法制社会将宗教伦理化的特点。宗法制是指以血缘为关系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古代除了祭天以外，他们还要祭祖，就是非常重视祖先神。他们首先承认祖先神，这在世界的宗教里面是比较特殊的。在这批祭祀诗里有一部分是祭祀田祖，乞求丰收的诗。他们写的是祭礼，但也反映了古代耕、种、收、藏等农业活动以及相关的礼俗和农田管理等内容，这些诗在虔诚的宗教感情当中，透露出当时人们对农事的重视以及对宗教信仰和过部族安康生活的向往。

《诗经》里还有一部分诗叫做宴饮诗，这部分诗也是非常有民族特征的。它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独有的产物。周代的君臣朝会、宗族团聚、故旧相逢，都要举行宴饮。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宴饮之际要奏乐歌诗，不是光喝酒吃饭。而举行各种宴饮活

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礼记》记载：“非专为饮宴也，为行礼也。”实际上宴饮是为了礼仪，是为了“行礼”。所以在这些诗里面除了写酒食非常丰富以外，主要写宾主之间都是彬彬有礼，尊卑长幼有序，特别要表达人与人之间情谊的可贵。实际上是要在觥筹交错、琴瑟钟鼓的歌声中达到尊贤敬老、亲亲慕友的目的，达到伦理目的。所以《诗经》当中的宴饮诗，实际上是表达周人那种尚道德重教化的礼乐文明。

《诗经》里还有一部分反映王道兴衰、政教得失的政治诗，它们包括了美、刺两方面内容。所谓美就是颂美，刺就是怨刺。这些诗多出于当时中下层文人之手。大约是通过献诗的制度传到朝廷的。所以美诗就是对某些当权者、政治人物或英武杰出的人物的颂扬，刺诗则多写些愤世伤时之作，是对君昏臣佞的政治弊端、社会问题的一种揭露和讥刺，这些诗表达了当时一些进步士人关心国民的热情和对时代兴衰、民生疾苦的责任感。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一直影响到中国的后代、后世，被无数的进步诗人所继承，成为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应重视这些有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的诗。

作为诗集，《诗经》所反映的生活面是非常广泛的。当然在305篇作品中，最值得珍视的还是民歌，它们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是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它们是产生于劳动之中，所以它们就十分贴近生活，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劳动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诗经》里面的作品。首先看一下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例如《国风·周南》：“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袪之。采采芣苢，薄言馥之。”这是一首写在山坡田野之间妇女们结伴采集芣苢所唱的歌。在对劳动进程和满载而归的描写之中表现出一种非常欢快的情绪。“采采”就是采而又采的意思。朱熹在《诗集传》中注道：“采采，不止

一采也”，这个采通“採”。芣苢是车前草，它的子可以入药。“薄”是勉力去做，“迫切”的意思。“言”是语助词，“薄言”两字连用，表示急忙、赶快的意思。“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就是开始采集，从无到有。“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就是拾取，一颗一颗地拾取。“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就是捋取，用手指往后用力捋。“采采芣苢，薄言袪之”，“袪”即用衣襟把它兜起；“采采芣苢，薄言颺之”，“颺”就是把衣襟插到腰带上，因为古代妇女穿的是长褂子，这样兜的东西更多一些。

我刚才说了，这是一群妇女在采集芣苢的过程中随口唱出来的歌声。这首歌如果用现代汉语翻译下来的并保持一点民歌风味的话，可以这样翻译：“车前子呀采呀采，快快把它采起来；车前子啊采呀采，快快把它采起来；车前子呀采呀采，一颗一颗拾起来；车前子呀采呀采，一把一把捋起来；车前子呀采呀采，掖起衣襟兜回来。”这首歌词很简单，但感情却很饱满，节奏也非常明快，再现了当时的劳动情景，传达了一种劳动时的欢快情绪。我们把这首歌反复涵咏一下，就会恍入其境，仿佛看见三五成群的妇女在山坡旷野一边劳动，一边唱歌，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听后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这首诗只有三章，十二句。十二句里就有六句是重句——“采采芣苢”。诗章语言简单，节奏明快，“采采芣苢”构成了该诗的主旋律。这种简单的语言，优美的韵律，反复循环的咏唱，正是民歌的特色。我们仔细看这三章，它在层次构成上是很有讲究的。譬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然后就是“掇之”，然后就是“捋之”，然后是“袪”之，然后就“颺”之：这几个动词，先是开始采，接着是一颗一颗地拾，然后是捋，捋后是兜，最后是携起衣襟来兜。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在劳动当中，越采越熟练，手脚越麻利，越采越快，而且收获也越来越多；先是用衣兜着，兜不了把整个衣襟翻上来在腰间系着，更多地兜一点，从而

体现了一种劳动愉快的情景。这首诗要反复地读，才能把它的味读出来，如果你仅看到它简单的字句，这样简单的诗，又会好到什么地方呢？所以民歌作品，简单朴素但意味浓厚。为什么意味浓厚呢？它来源于生活，感情是饱满的。

还有一首诗也是写劳动的，这就是《十亩之间》。这也是一首富于优美情调的劳动诗歌：“十亩之间兮，桑间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这是一首采桑女劳动后招呼她同伴同归时唱的歌。“十亩之间”指的是桑树园的面积，十亩，不算小了。“桑者”就是采桑人，古代采桑、养蚕，劳动都是由女子承担的，所以这里应是写采桑女。“闲闲”就是优闲，指劳动后休息下来了。“行与子还兮”，“行”就是行将，就要；“还”就是回家，劳动以后就要回家了。还有一种标点方式就是：“行”是互相招呼：“走呀，咱们回家去吧！”“与子还兮”就是“我和你一块回家去吧！”“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泄泄”就是和乐、高兴的样子，即很融洽和乐。“逝”就是往，指一起回家去。

这首诗比上首诗更为短小了，只有两章六句。第一章描写在宽广的桑树林里面，采桑女劳动就要结束了，这时候就安祥地歇下来了。然后她们就相互招呼着，相约结伴同行，一路归去。第二章紧接着写采桑女已走在桑园之外了，这时候她们三五成群，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说笑，气氛非常轻松融洽，不久以后她们就消失在暮色当中了。这首小诗重章叠句，两章只换了几个字，但这六句每句之后却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了一种舒缓而轻松的气氛，这正好与诗歌的内容相适应，因为这是劳动完了之后休息回家途中所唱的歌。这几个“兮”字表现了一种轻松、舒适、欢快的情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经》里民歌的节奏和韵律，不仅是非常的优美自然，同时也像古人所评价的“运乎天机，不费雕刻”，就是说它是自然而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从自己的真情实感中产生的，不

是什么雕琢而成的。所以，《诗经》中像这种小巧的民歌，它们产生于生活，情感饱满，形式包括节奏韵律都是紧密地与生活相一致的。这一点我们不妨与刚才所讲过的同样描写劳动情景的《采芣苢》比较来看一看。《采芣苢》写的是一群劳动妇女采摘车前子的过程，它通过一系列采摘动作的变化和收获的增加，表现出一种饱满的劳动热情和无限欢快的情绪。《采芣苢》这首诗，以不断重复出现的“采采芣苢”这样一句构成了诗的主旋律，从而显示出这首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成功地渲染了当时那种紧张的劳动气氛，表现了当时边劳动边唱歌的愉快情绪。《十亩之间》这首诗，当然也是写劳动的，但是它洋溢着一种劳动后的欢乐感情，这种欢乐感情是劳动以后表现出来的轻松，因而它的节奏是舒缓的，声调是悠长的，那么它表现出来的整首诗的情调就和《采芣苢》不一样。《采芣苢》是在紧张的劳动当中歌唱出来的，而这首诗却是在劳动以后回家的时候轻轻松松唱出来的。所以，《采采芣苢》和刚才那首诗都是写一种劳动生活和欢快情绪的，一个写紧张的劳动，一个是在劳动后的轻松、悠闲，因此，它们整个诗歌的节奏、声调、音律也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把《十亩之间》也翻译一下的话，应是这样的：“十亩桑园宽又宽啊，采桑人歇工之后多悠闲呀；咱们一起把家还哪；走出桑园到外边啊，采桑人说说笑笑走得欢啊。咱们一起往家奔啊。”

我们选讲的这些诗里面，还有大部分是表现婚恋的诗。《桃夭》这首歌是当时婚礼上的一首喜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_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首诗可不要根据现在口头语去理解——“桃之夭夭”就是逃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夭夭”按旧注是“少壮”的意思，就是形容桃枝刚生成的那种弯曲矫健的样子。“灼灼”本是火烧的意思，这里解作鲜明耀眼。“华”古代就是花的意思，“灼灼其华”就是其花光辉夺目。“之子于归”中的“之子”即指那一个女子，“于归”

古代把女子出嫁叫“于归”，“归”即归往夫家的意思，所以这首诗是一首结婚的诗。“宜”即是适宜或者合适。“室家”即女子所嫁的人家，下边还有“家室”，与“家人”意思都是差不多的。“有蕢其实”，“蕢”就是果实，硕圆肥大的样子。“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蓁蓁”是形容树叶长处十分茂密，比喻家业兴旺。这是婚礼上演唱的一首祝贺女子出嫁的诗，祝贺她的新婚幸福、婚姻美满。现在汉族已经没有这种礼俗，在少数民族还有，结婚时很多人围坐在一起唱歌来祝贺。这首诗共是三章，都以“桃之夭夭”来起兴，用矫健多姿的桃树，比喻新婚女子的青春年少，身材健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第一章就用无比艳丽、光彩照人的桃花来比喻新娘子的姿容，应当说是非常贴切自然，而且联想丰富，就是说新娘子非常美，容颜光华照人，非常艳丽。同时古代的诗歌讲究赋比兴，“比”为比喻，“兴”即列举其他事物来产生联想再回到诗歌的内容上来，“兴”就是象征。古书里常是兴而比，比而兴，二者兼用，这首诗里实际上有兼用的性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作为开端，一方面形容新嫁娘容貌的华丽和青春正茂的姿容，一方面它又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就是以满树桃花照眼明的奇丽景象，成功地渲染了喜庆的热闹场面，烘托出婚礼上人人喜笑颜开的欢乐气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既比喻女子，又渲染婚礼上那种人人喜笑颜开的气氛。“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是一种祝愿的话，一种美好的祝愿，就是希望女子能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族。第二段就是“桃之夭夭，有蕢其实”，“蕢”即大的意思。这里表示结婚生子。第一章对桃花盛开进行描写，然后就喻其必然多子。古人把多子多孙作为家族兴旺、家庭幸福的一部分。意思即祝愿新娘早生贵子。从“开花”而联想到结实，从新婚而预祝她生子，这是很自然的联想。第三章“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其叶蓁蓁”，比喻桃树长得非常茂盛，枝叶茂密，形容的是桃树，实际上讲的是多子多孙，家庭兴旺。因此，这首诗

前两句写的都是桃树，实际上却有比喻和象征的意味。第一是比喻新娘子的美丽，“灼灼其华”，第二是比喻结婚后多生贵子，第三是表示家庭兴旺。

这首诗，它的好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前两句都用比兴开头，然后落实到对结婚新人的祝贺上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蕢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让人不由地产生联想。故这首诗看起来虽短小，但它把对新人的描写，对婚礼上那种欢快热闹的气氛，以至于对新人的种种祝愿，都表达清楚了。如果翻译一下，则应为：“桃树枝儿多矫健，明丽的花儿多照眼，姑娘出嫁在今天，夫妇生活多和顺。桃树枝儿多矫健，果实累累肥又鲜，姑娘出嫁在今天，生活幸福又美满。桃树枝儿多矫健，绿叶遮阴一大片，姑娘出嫁在今天，和和美美一家人。”完全表达出一种祝贺的意思。所以，《诗经》里的那些民歌确实很简短，但是如果你涵咏一下，懂得它表现的手法，那么读出来给人的感受就像带露的鲜花一样，非常贴近生活，而且也是非常优美，耐人寻味的。

还有一首比较著名的诗歌，就是《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中，道阻且右；逆流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是比较有名的，过去有一首歌叫《秋水伊人》，实际上就是从这首诗来的。“蒹葭苍苍”，“蒹葭”，就是芦苇，“苍苍”即指芦苇到秋天后的那种深青的颜色。“白露为霜”，即露珠因天气冷已经变化为霜，很清冷的样子。“所谓伊人”，“伊人”即那个人，这里指男子所爱的意中人。“在水一方”，即隔了条水，不能相聚。“一方”即在水的另一方，表示隔绝两地。“溯洄从之”，“溯洄”，即顺着河流逆水而上，“从之”即追踪她，寻找她。“道

阻且长”，道路既充满险阻又很长。“溯游从之”，“溯游”即顺水而下。“宛在水中央”，“宛”，宛然，仿佛，好像，即他所爱的人就像在水中的小岛上一样。这首诗也是重章叠句，只换了两个字。“蒹葭凄凄，白露未晞”，芦苇变成凄青的颜色，“晞”即干。“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湄”就是水边。“溯洄从之，道阻且跻”，“跻”，本来是攀登的意思，即很高。“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坻”乃是水中的小片陆地，就是好像他所爱的那个人就在水中的岛上一样。“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形容芦苇到晚秋开出白灿灿的芦花。“白露未已”，即白露降而不止，这是一种清秋的景象。“所谓伊人，在水之沚”，“沚”就是河边之意。“逆洄从之，道阻且右”，“右”，即迂回，表示道路弯曲，迂回难走。“逆流从之，宛在口中沚”，“沚”，即水中间的小沙滩，也是表示小岛的意思。

这首诗是一首优美深情的恋歌。诗的开头，描写了一幅秋苇青苍、露重霜浓的清秋之景。诗歌接着写正在这样的场景之下，诗人牵肠挂肚地思念起自己的情侣来。但眼前所见只是一片秋景寂寂，秋水漫漫，而不见自己所爱的人的身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即他所爱的人远隔秋水，遥遥不得相会，于是诗人感情起伏，就想去找寻她，想去会面，但是路远水阔，又多险阻。“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难以找到。于是乎他在往来徘徊当中，一会向上游看看，一会儿向下游看一看，突然他发现他的爱人就在流水的小岛上。可是呢，“宛在水中央”，人影迷离，似真不真，似假不假，可望而不可及，无法达到她的跟前，因为她在小岛上。所以，“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涘”，“宛在水中沚”，显然写的不是真实的情况，写的是一种幻觉，写的是一种在热恋中的人特有的因痴生幻的心态。因为太痴情了，太想跟她见面了，太爱了。诗里面写恋爱中那种痴情人的心理和感受，十分地真实，曲折动人。这一状况只有在痴情人当中才会发生。譬如两个人约会，要在某一个车站见面，等也等不来，又

不肯离去，结果突然仿佛在远处看到她的身影。哎，她来了，其实并非真的来了，是他因痴生幻了。所以它写痴情的那种感觉、心情，是非常真实，非常曲折，也非常动人。在艺术手法上，诗歌用秋景起兴，把一片水乡清秋的景物与愁惨的相思相交融，渲染了全诗的气氛。正由于如此，更增加了该诗的极大的感染力。因此，这首诗成为《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了。琼瑶的小说好像也有一个题目与此篇意境相似。民歌的特点就是重章叠句，只掉换了少数几个字，反复地歌唱。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尽情地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因为一遍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要两遍、三遍才行，乍一看是重复，实际上它在表达感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首诗是《木瓜》。现在有一句成语“投桃报李”就是从这里来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诗是描写民间男女互相赠答的爱情诗。用赠物来表情，本来是青年男女表示互相要好的常有方式。从该诗的内容来看，全诗是以男子的口吻写出来的，先是女子投物给男子相赠，然后这个男子予以回报。

“投我以木瓜”，“木瓜”是南方一种橙黄色的香瓜。“木桃”，“木李”也是两种水果。开头用了一个“投”字，“投”即抛礼物之意，不是“送”给他，而是“抛”给他。赠物定情的诗，《诗经》里也有几篇，都是送给他，递给他；但这用的是“投”，带有一种调皮和试探之意。“投”字给人以一种空间感、距离感，所谓“投石问路”嘛。这就意味着心有所爱，但还处在摸不清对方心思的阶段，“投”物给他，看他反应如何。同时，这个“投”字也表现了女子的活泼、主动、大方、深情。如果是个内向的女子，是肯定不会去投，不会这么主动的；如果不是深情，她也不会主动把东西送给男方。所“投”又是什么东西呢？看来却是比较寻常的东西，即“木瓜”、“木桃”、“木李”之类，虽然普通，

却都是美丽芳香的东西，我想这也应该有一种象征的意味，象征着爱情的美好。如果再深入联想一下的话，她投的是“木瓜”，“木李”，有没有一种像新疆民歌“葡萄熟了”——藏在心里的爱情已经成熟了，因而这女子想通过一种投送桃李的方式来表达爱情甚至于投其怀抱，以身相许的意思呢？下面接着写男子的回报，他“报”的是什么呢？是“琼瑶”、“琼琚”、“琼玖”。“琼琚”也好，“琼瑶”也好，都是一种美玉。古代男子是以玉为佩的，玉也是一种信物，赠给谁表示他们之间达成默契。从诗意上来看，女的是以芳香的果实为赠，男的以美玉作为回报，应该说都带有以身相许的意思。当然从所赠和所回报的物品来看，在价值上是有轻重之分的，但从爱情的方面看，物品的厚薄绝对不等同于感情上的重要性，其重在心在情而不在物，所以就引出了后面的两句直白的表述：“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也就是说美丽芳香的木果，深含着优美的情意；结实贴心的玉石，代表坚贞不渝的相爱信念；物有轻重，但相爱相许的情意是绝对不能以价值的大小来论的。所以说，“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即我已以心相许，我接受了你的好意，我要加倍地回报。

再讲一首《伯兮》。这首诗是写一个思妇的。春秋时代徭役是很重的，“春秋无义战”，统治阶级经常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后，男子就得出去打仗，外面有征夫，家里就有思妇。这首诗是思妇写的，她说：“伯兮~~去~~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伯”本指哥哥，这里指女子的丈夫；“~~去~~”，指很英武的样子，“邦之桀兮”，这两句是夸他的丈夫是国家英才。“伯也执殳”，“殳”是一种武器，这句话说他的丈夫为国打仗去了——“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指自从她丈夫为国往东打仗去了之后，她也没有心思再来打扮了。“蓬”，即蓬草，形容女子头发杂乱。“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膏”即洗发膏，“沐”即洗澡。这句是说，难道是没有洗发膏吗？可是我打扮好了之后又给谁看呢？此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雨其

雨，杲杲出日”，“其”即希望，“杲杲”，即很明亮的样子。这两句是说，我希望下雨啊，希望下雨，可是，明亮的太阳还持在天上，事与愿违，本来希望下雨，可是偏偏出太阳；本来希望和丈夫团聚，可是却团聚不了。“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我心里本是愿意和丈夫在一起，可是丈夫不在身边；即使想丈夫想得头疼，我也心甘情愿。第四章：“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痾。”“焉得”，即哪里；“萱草”，即忘忧草，古人认为有一种草闻它的气味，就令人忘掉忧愁。“言树之背”，即把它种在院落的北面。这句的意思是我从那里去得到这种忘忧草，把它种到我院子里面呢？“愿言思伯，使我心痾”，我对我丈夫是如此地眷恋，以至于想出心病了——想得神经衰弱了。这首诗是思妇写的，它表达出了她丈夫走了之后的那种心态，应该说是非常生动的。首先是夸他的丈夫，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值得崇拜的丈夫，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而离开了我，自从他离开我以后，我就无心打扮；虽然家里不缺洗发膏，也无心来梳洗打扮，因为我打扮了又给谁看呢？——当然，要是丈夫越不在家就越打扮，那就麻烦了！丈夫不在家就不思打扮，这也表现了该女子的深情。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思妇的感情，也曲折地反映了对当时统治者穷兵黩武造成夫妻分离的不满吧。

《诗经》里比较著名的还有下面的《君子于役》。这与上一首也是同样的题材。“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即指女子的丈夫，“于役”即到外面当差去了。“不知其期”，即不知到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已经到傍晚了，鸡已经回窝了，已经是黄昏了……丈夫服役去了，“如之何勿思”，我怎么能不思念他呢？这首诗写一个山村妇女，丈夫出去服役，她一个人在家，当黄昏到来时，鸡回巢，牛羊回圈，她却孤孤单单一个人，这时就更加惹起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大家都有这种体会，特别是当你刚刚离开家，一到黄昏华灯初上时，看见

别人的家庭都团聚在一起，你心里头就不是滋味了。这里也是这样。一到黄昏，连鸡、牛、羊都回到巢里去了，可是自己却孤孤单单，丈夫在外面回不来。“君子于役”，君子在外面服役；“如之何勿思”，教我如何不想他呢？“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是第二章。君子出去服役，“不日不月”，已计算不出多少月了，日期已经很长；“曷其有佸”，佸，相聚的意思，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他相聚呢？“鸡栖于桀”，桀，是一种木桩子，农村养鸡，在鸡窝里用树枝搭一个桩子。鸡已经回到它的木桩子上去睡觉了。“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括”也是相聚的意思，羊牛都下山相聚了，可是“君子于役”，丈夫还没有回来。“苟无饥渴”，既然盼不回他来，就遥遥地祝福他在外平安，希望他无饥渴，没有困难。这深深地表达了思妇的感情。

《采葛》这首诗：“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首诗表达一种与自己所爱的人离别后的相思之情。“采葛”，“采萧”，“采艾”都是一种植物。重要的是下边：“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和他的爱人相聚时是欢乐的，离别是痛苦的，因为两人特别相亲相爱，可是却见不到面。一天不见，就像三个月不见一样。下面是一天不见，就像三个季节不见一样，在最后说，一天不见，就像三年不见一样。这首诗虽然是重章叠句，可是由月到季，由季到年，表达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现在咱们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是这个典故，表达了一种热恋当中的人在不能相见、相会时度日如年的痛苦。

下面这首诗，《狡童》，就较幽默。写一女子爱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知什么原因，两人产生了误解，小伙子对她冷淡了，于是她就唱起了这首歌：“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狡童，如果准确地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小滑头”，说那个

男的是“小滑头”。说你这个小滑头啊，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了，不理我了呢？我为了你的缘故啊，连饭都不想吃了。“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一起吃饭了，“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不但不能吃饭，而且使我觉也睡不着。就是这样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感情。可能两人相爱，不知为什么，那男的冷淡了她，于是她心里非常痛苦。“狡童”是一种很幽默的说法，骂他“小滑头”，并不是不爱他了，就像现在骂“傻冒”一样，不一定说他傻。

下面这首也是女子写的爱情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且，念j。“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要是爱我想我的话——惠就是爱——你就撩起衣裳，淌过溱水来跟我相见，“褰裳”就是撩起衣裳的意思。她的意中人可能是在河对岸。“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要是不想我的话，难道就没有别人想我了吗？这个女的是比较厉害的，毫无乞求他的意思。“狂童之狂也且”，你这个人也太狂傲了，怎么这么大架子呢？“也且”是语气词。第二章意思也是这样，“洧”也是水名。你要是真想我，哪怕涉水也要跟我见面啊！“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好小伙子有的是，你不想我，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

《诗经》产生在我国两三千年的以前，作者大多是生活在当时北方广大中原地区的从事农桑生产的普通人民，他们的生活是朴实的，性格是浑厚的。他们有着朴实的生活，也有着朴实的愿望。《诗经》中的民歌作品正是他们朴实的生活和朴实的愿望的反映，是他们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从我给大家讲的几首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诗经》作品的艺术风格决没有什么矫揉造作之痕，甚至连华丽的词句都没有，完全是浑成自然，一片天籁，具有一种发自纯真之心的纯真之美。这样一种艺术造诣或者说艺术风格，往往是一般的文人作家所达不到的。当然，文人作家也有他的优势，他有较高深的语言修养。但是，从表达纯真之心的

纯真之美这个角度来说，一般的文人作品还是比不了的。这从我们刚才选的几首诗也可以看得出来。

讲《诗经》本来要讲很长时间的，因为时间不够，这次只是简要地讲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诗经》是一部什么书，它的内容、风格究竟有什么特点。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教务处供稿

张良皋 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金 陵 十 二 钗

——《红楼梦》中的超前女性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金陵十二钗”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得意之笔，对于这十二个女性，我们不大容易认识清楚。好像看起来这十二钗都很普通，小才微善，但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这些人物议论不休呢？我们说，就因为曹雪芹以他文学家的才华、哲学家的智慧写出了当时没有出现过的人物，所以大家不理解。我也因此称十二钗为“超前女性”。

对十二钗中的人物，有些本可以盖棺论定，譬如说秦可卿，第十四回就是描写她的丧事。秦可卿是工部营缮郎秦业从养生堂抱养来的，由此看来，她出身是非常寒微的。秦可卿嫁到贾家是“贫女入富室”，成了她的取死之道。她以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当宁国公长房的孙媳妇，将来要在宁国府当家。她的婆婆尤氏，在宁国府当家就不如荣府王熙凤那样有威望——因为娘家没有势力。秦可卿的将来也是个未知数。于是她就采取种种手段，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贾母，她是一个孝顺的重孙媳妇；对婆婆，她恭恭敬敬；对丈夫，她三从四德；对本家的这些叔叔、亲戚，他们喜欢什么她就做什么——包括她瞧得起的，如贾宝玉，她就“点化”他。她有她自己的“教育”方式。我说她是个“性解放者”。她与她的公公有暧昧行为，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她是性解放者，要

征服别人。她也知道这个家庭“无可为也”，腐烂之极。她在为将来当家做准备，收服可用之人。说不定将来她做了掌权媳妇后，会把宁府整治得不仅比尤氏好，甚至可以胜过王熙凤。这是个志气很高的人。然而在封建时代，因为她是女性，结局就不能不是悲剧。

有些人几乎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王熙凤这个人物，多能干哪！被曹雪芹写活了，她是《红楼梦》中的女曹操。有人说，“骂曹操，恨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凤姐在《红楼梦》中一出场，场面就热闹起来了，大家也是“骂凤姐，恨凤姐，凤姐不在想凤姐”。王熙凤精明能干，把个大家庭治理得不错。

我认为金陵十二钗都是命世之才，都很能干，只要有机会施展。探春理家时，大观园里井井有条。探春很会做人，正正派派理家。有人说她“六亲不认”，她所处的地位使她只能是这样。做官的有时必须打官腔，不然好多事是行不通的。

宝钗是个很成熟的人，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她也是能干之才。大观园中请她帮忙理家，无人敢小看她。黛玉后来也相当成熟，作为一个局外人对探春她们的治家之事看得非常清楚。五十六回“识宝钗小惠全大体”可以看出黛玉的成熟，若要黛玉来理家，相信她也可以办得很好。

还有顶尖人物元春。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贾宝玉的婚姻，我看是由元春决定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所见的部册上书元春判词为“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二十年来辨是非”是说20年的宫廷生活让她对是非看得很清楚，有她自己评论是非的标准。榴字为梅字的误写。元春是正月初一出生的，梅花为百花在一年中的第一花，所以以梅花指元春，而非有人说的石榴多子之意。“三春争及初春景”，说明迎、探、惜三春都不及元春。“虎兔相逢大梦归”如何解释？红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我曾提出过一个答案也未得到正式承认，但我觉得它的意思应该是将一个属虎的和一個属兔的拉拢

在一起。元春的画册上画的是一个弓和一个香缘。缘谐音“缘”字。弓就是牵合之意。生拉活扯，牵扯一段姻缘。这就是元春在红楼中所起的最大作用。红楼中谁属兔？细心的人一定早已得出结论：整部书中，明确点明秋桐属兔，那年她17岁。据此推算，那年宝玉也正好是17岁。所以宝玉属兔。薛宝钗比宝玉大一岁，应该是属虎的。所以元春在整个小说中的作用就是将宝钗和宝玉拉在一起结为夫妻。大家对此可能一下子想不通。按后来小说中的描写，不明明是凤姐瞒消息，设奇谋吗？事实上这是最大的冤案。凤姐是宝黛两人最大的精神支柱，她是支持黛玉的。这个逻辑也很好解释：设身处地想一想，若你是凤姐，要选弟媳，你选黛玉还是宝钗？肯定选黛玉嘛！选宝钗就太危险了。宝钗人缘好，模样也不错，家庭也厚实，又有文化，能干，行行都行。选了宝钗在荣国府当宝二奶奶，琏二奶奶就得退后。凤姐之所以当家管事，是因为荣府长孙媳李纨守寡，不能管家。现在有个能干的宝二奶奶，凤姐自然得让权。凤姐是有权就幸福，无权就痛苦的政治人物，对权力抓得紧，是不会轻易让权的。所以她选弟媳肯定选黛玉。即使黛玉有能力管家，她也不屑于管，不会整天手里拿串钥匙，挟着账本，跟这个吵嘴，与那个说话。有人说是二老爷贾政选定的宝钗。也不是，他最关心的是姨太太。哪个给宝玉作姨太太，他早考虑好了，跟赵姨娘一起商量的也是这事，所以他对宝玉的婚姻大事是不管的。至于说王夫人、薛姨妈有什么表示，我看也没有，王夫人没表态，很难说是王夫人决定的。其他人更不消说，有影响的人物就这几位。在这点上说首先要给王熙凤恢复名誉。

再说老太太，在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百首双星”就已经表态，只要她不断气就支持宝黛两人。八十回以前贾母对宝黛两人同等待遇，对薛宝钗特别客气，表现得很亲热。宝钗生日，老太太很赏脸，为什么呢？把你当亲戚看，对你客气，你的行为举止也要自觉——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宝钗的生日很隆重，并不是把

黛玉搁在一边，正因为老太太疼爱黛玉，黛玉也不会计较这些，贾母也不必按客套礼数来——这个态度已经够鲜明了。以后还有种种地方显示贾母把她的态度表现得很清楚。

那么元春为什么要选中宝钗呢？元春省亲，见过钗黛二人。大家都作诗，元妃还说“终是薛林二妹不同”。黛玉的诗：“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用作诗的规则来衡量，第一句就犯规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若认真论起来，黛玉也并未犯规。唐代试帖诗可以如此，但到了清代又有谁如此精通作诗？杜甫“放人渺天末”就是可以的。作为皇妃的元春并不专门研究诗，她只知“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一般规则，所以以此标准黛玉就犯规了。“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大观园是仙境吗？别了红尘吗？是花柳繁花地、温柔富贵乡嘛。整个这首诗，曹雪芹就写她是“胡乱应景”，随便写的。的确是没写好，匾额题“世外仙源”也不好。对这首诗的批评，分布在整部书中零散的都有。将《红楼梦》前后串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世外仙源”是桃花源。桃花源在宝玉试才题对额时，有人说把这园子叫作“武陵源”。这怎么行？宝玉都知道那是避难之地，现在是盛世怎能用这个名称？第二句“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用字太尖新，太俏皮。这种诗叫应制诗，是给皇室看的，用字要庄重、平和、雍荣华贵、大方。“借”就是贫，一幅穷像。天下本是皇帝所有，为何还要借？咏白海棠的诗，黛玉写“借得梅花一缕魂”，李纨就批评黛玉用字太尖新。“金谷园”用的是石崇的典故，不吉利，石崇被抄家，被砍头，把大观园与石崇的金谷园相比，比到哪里去了？！“花媚玉堂人”，元春会喜欢“媚”字吗？说她是杨贵妃、赵飞燕这类人物，这是什么话？皇妃没发脾气已是够有涵养的了。

这首诗让元春看了，就觉得黛玉是福薄之相。相比之下，宝钗的诗就非常华贵。就凭作诗，元春就认为宝钗是合格的弟媳。

另外，比较钗黛两人的家庭，在贾府日趋衰落时，结亲当然要找殷实之家。钗黛两人人品不相上下，就其他因素考虑，元春当然选宝钗。

黛玉在元春省亲之时到底作没作好诗？大家都知道她代宝玉作了《杏帘在望》，作的这首好诗给了宝玉了。非常好的一首诗，充满颂圣之意。这首诗做了友谊的奉献了。鬼使神差，黛玉全部的心思、才力作的这首诗送给了宝玉，可以说是为了纯洁的友谊，也可以说是为了爱情。元春大大赞赏黛玉替作的这首，认为这几年宝玉确是大大进步了。但黛玉自己的一首诗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就是悲剧。元春制造了悲剧，但也不能责备她。

李纨有才、忠厚。她当政就比较人道主义，决不像王熙凤动不动就打骂下人，体罚奴仆。李纨不会这样，但她办事照样办得公正。有什么证据？探春理家时，“三驾马车”李纨是头儿，干得很好，大家都服她。她是大奶奶，丈夫早逝，所以很不幸，没有条件真正让她登上当家大奶奶的宝座，所以她的才能没有得以施展。曹雪芹让她在此小小施展了一下，很不错。诗社中她做裁判，也很公平。

十二钗还有几位，我说她们都是超前的，迎春的结局多半是自杀，而且一定是死得非常令人同情，让人感到她也是在反抗，虽然是另一种反抗方式。自杀并不都是弱者的行为，一般人没有这种勇气。

还有巧姐，《红楼梦》中暗示她最后嫁给刘姥姥的孙子，是自己选择的婚姻。“文革”中下乡的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合还要登报表扬，那么两百年前，巧姐自主地找到自己婚姻的归宿，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有这样自主的婚姻就可以说巧姐也是个超前人物。

惜春，我们可以一笔带过。她信了教。但哪有像贾府这样的侯门千金出家为尼的？惜春出家与妙玉不同。妙玉是勉强的，另有来历。惜春却是一种宗教信仰，她看透了人生，有其哲学的根

据。

有一个问题人物，就是妙玉。妙玉进园，有一定来头，光凭喝茶就可知她过了一段很繁华的生活。她也很能干。妙玉主持栊翠庵，元春游园时，在庵中的描写很轻松，说明妙玉处事得体，符合佛教仪式，很称职。贾母到栊翠庵来，曹雪芹就多加了笔墨。妙玉请贾母吃茶，“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这个茶盘很讲究，云龙献寿，怎么不让老太太高兴呢？又是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成窑瓷器非常讲究，非常细腻。妙玉拿这个盖钟给贾母奉茶。盖子未揭开，老太太就发话了：“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道：“知道。这是老君眉。”这一问一答，层次相当高。老太太内行，一望而知是六安茶，但老太太把妙玉的茶当了普通六安茶，故意讲“不吃六安茶”。妙玉轻松回答，“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全凭留心打听。但她偏要老太太喝六安茶，所以才说是老君眉。老君眉是六安茶中极品，符合贾母的地位；老君眉是寿眉，妙玉也料定老太太一定很满意。还有一桩事明显地写了出她的留心。“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妙玉的贺帖早送到了——“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她怎么知道宝玉的生日呢？这就说明她的细心。她在贾府的环境中，威严自恃，无人敢犯。最后大家都不喜欢她，她也就是不要别人喜欢她。收拾茶具时，把那五彩小盖钟放在一边。这也很自然，没什么了不起，刘姥姥用过了，怕庄稼人不干净，搁在一边，多洗洗也就是了。并未说明这个杯子不要了。宝玉在旁自以为是妙玉的知己，了解她的心思，以为这个杯子妙玉是不要了，就跟妙玉说将此赏予刘姥姥。这是宝玉想过头了。妙玉哪里一定是要把这个杯子扔掉呢？既然宝玉说了，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把个杯子送给刘姥姥了。又说：“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这就是说过头话。妙玉自己的杯子还给宝玉用过呢！好多人看到此，就骂妙玉势利。实际上妙玉是顺着宝玉给的杆子往上爬，你说我要丢掉，我就索性说要砸掉。宝玉

又升一步：“只交于我就是了”，“你那里和她说话授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宝玉又叫几个小厮来洗地，妙玉则说，“让他们别进门来”——两人你高一步，我高一步，越抬越高。难道宝玉还真叫小厮抬水到庵中来洗地？仅是玩笑而已。整个大观园中妙玉有几个朋友？男性之中，恐怕也只瞧得起宝玉。故而有你自以为是知己，我也知你自视为我知己而引起的一段乐趣。是不是妙玉有什么非分之想呢？或者宝玉有什么非分之想呢？这一点，只怪曹雪芹写得太超前了。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超出他们两人这样许多界限而存的友谊。他们之间至少有身份的差别：一个尼姑，一个富家少爷。这相距太远了。还有僧俗之别：一个教徒，一个非教徒；年龄之别：妙玉进贾府时十八岁，当时宝玉只有十二三岁，两人年龄相差不小；还有男女之别。越过这么多界限，能够存在友谊吗？从前的人想不到这些。曹雪芹描写了很圣洁、很高尚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存在，在这个小小的玩笑中得到了表现。虽然只有一点点，也足以让我们相信这是超前的描写。以此观点来看宝玉与妙玉之间的感情，那是丝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后来大家罚宝玉到栊翠庵摘红梅，宝玉手到擒来。那并不是因为妙玉在想宝玉的心思，所以对宝玉特别看待。以这种观点来看红楼，宝玉、妙玉之间的友谊是不简单的，存在于当时是很稀奇的，因此不少人在其中找暧昧关系。

最后，我重点讲的是史湘云。我以为曹雪芹所描写的人物当中对史湘云如对黛玉、宝玉、宝钗一样下了不少笔墨。史湘云最后的结局，以我的见解来说，是一个终身不嫁的人，一个独身主义者。在当时，当独身主义者确实不简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史湘云终身不嫁》。《红楼梦》中对史湘云的婚姻写得很隐讳。书中二十八回，过端午节，元春打发夏太监来送礼。礼物中只有宝玉和宝钗两人的一样，比其他姐妹多凤尾罗二端，芙蓉蕈一领。这两样是嫁妆中的物品。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她看中宝钗了。这是示意。为什么不明说？在封建社会，她毕竟只是个孙

女，上面有史太君，还有她的父母亲。也不是说元春凭着她皇妃的地位就要主持这场婚姻。她只是告诉他们这是她的意见。而这个意见是很明显的。礼物是先送到老太太那儿的，然后再分下去。宝玉看后大吃一惊，是不是搞错了？为什么我和林妹妹的不一样，倒和宝姐姐的一样呢？这事贾母知道了，王夫人、凤姐等可能也已过目。而且元春还让他们五月初一到初三到清虚观打醮，平安醮，由贾珍——东府的头号人物带领，去烧香、跪佛，非常隆重。正是“享福人福深还祷福，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元妃要为贾家祈祷。这是《红楼梦》中写得最好的一回。元春的礼物发下来，林黛玉不懂？她当然懂，所以马上就不舒服了。宝钗不懂？她也懂，知道元春对她另眼相看，所以把礼物中的一串红麝串总带在手上，表明她是领情的。这让黛玉很不服气。

到清虚观打醮，其中有个插曲。凤姐先向张道士提个话，来得非常自然。凤姐说：“我们丫头的寄名符儿你也不换去。”张道士笑答：“符早有了”，“待我取来”。带了个托盘来，又说：“将哥儿的玉请下来，托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见识见识。”这里面就有文章了。老太太让宝玉出去给他们看，道士马上说：“外面人多，哥儿受不惯。”因为宝玉去了，他就只好变把戏了。把玉带了去，一时间回来了，盘子里装满了金璜、玉笋、事事如意、岁岁平安等三五十件金器宝物，说是各地道友的“敬贺之礼”，送给哥儿玩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老太太推辞不能要出家人的东西，张道士百般相劝让贾家的人留下这一盘子的宝物。宝玉说要拿出去散给穷人，道士又阻挡，“要舍穷人，何不就散钱给他们”，“别遭塌了这些东西”——非要宝玉收下不可。为什么？这里面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麒麟就摆在这里面，这可是史家的东西，老太太娘家的东西。在此之前，张道士已跟老太太提过了，说“哥儿也该寻亲事了”，“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若论这个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小道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示下，

才敢向人去说。”老太太当时听了之后，也不以为然，不知他说的谁家，就答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你可如今打听看，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老太太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并不是答复张道士，而是答复元春，也是向宝玉、黛玉、宝钗说明她的态度：我暂时不让宝玉成亲，哪个来都不行。这就间接答复了元春。元春是孙女，但又是皇妃，老太太要尊重她的地位，不能明说，只能暗示。不让宝玉早婚，又不在于对方的家庭，这样，贾母放弃了荣府选媳妇的原则。示意虽然林家不行了，但老太太不计较。

其实，张道士提的是史湘云。张道土地位很高，几个大家族他都可以去，当然也去过史家。而且史家也拜托他了。史家托了他，他又不能在贾母面前挑明。因为当时的风俗是只能男家求女家，即使女方有意也只能间接表示。所以张道士为了表达此意，先与老太太拿话说了，看不起作用，马上又走第二步棋：将史家的金麒麟与这些金璜玉节一起送上来。道士哪来这些东西？还不都是史家的。当然最重要的是金麒麟，而且麒麟的位置可以想象肯定摆在通灵宝玉的旁边，好让老太太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时也是暗示老太太：我张道士可是代表史家的，你老太太的娘家，你可要给面子。老太太看了之后就问谁家孩子有这么个金麒麟，宝钗讲好像史大妹妹有一个。本来是三天的平安醮，第二天老太太就不去了。去了没法说话。昨天已经说得很明显了，张道士再追着问怎么办？！

论地位，史家门第决不低于贾家、王家；论人才，史湘云在各个方面都超过黛玉和宝钗。首先一点，身体就比这二位好。湘云“蜂腰猿背，鹤势螂形”，是一种健康美，这样的条件用现在的审美眼光同样是第一位的。相比之下，宝钗就胖了些，黛玉又太瘦了。论聪明才智，史湘云的诗也作得非常好。“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共 70 句诗，史湘云一人独得 18 句，林黛玉 11 句，薛宝钗 5 句，其他人就

更少。黛玉加宝钗还不如湘云一人。我想曹雪芹写这回时,一定经过科学计算,要把史湘云的才学排在最高。凭史湘云的条件,做贾府的媳妇,就优越得多。而且她还有一个最优越的条件:中国人认为,“中表为婚,其生不藩”。贾宝玉与林黛玉是嫡亲的姑表兄妹,薛宝钗与宝玉又是嫡亲的姨表姊弟。史湘云是老太太娘家的内侄孙女,隔了一代,从优生角度讲也胜过钗黛二人。有人说元春省亲那么一段花团锦簇的文章为什么史湘云不在场?她要在岂不更热闹?你想史湘云能出场吗?她出来就没戏了。元春肯定一眼看中她,不需再考虑其他。书中故意不让她出来,然后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回接连写这个故事。五月初一,张道士提到史湘云。打醮刚回,五月初六史湘云就到贾府来了。史湘云自己并没有什么“中原逐鹿”之意,她跟宝玉的关系是“耳鬓厮磨”。他们接触得很多,不但宝钗不能比,黛玉也比不上。湘云襁褓之间父母双亡,从小在贾府长大。袭人是从小服侍湘云,后来才跟了宝玉的。史湘云每次到贾府来,上场连小锣都不敲一下,随随便便就来了。一次她来之后,就给宝玉梳头,还记得他辫子上的东珠原是四颗,现在少了一颗,问丢哪了。宝玉偷吃胭脂,被湘云从镜子看到,“啪”地一巴掌打下去,骂宝玉还是不争气的老样子。这些细节都说明宝玉与湘云之间毫无隔阂。宝玉有些怕湘云,史湘云可不怕宝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观园中所有的女性敢于瞧不起贾宝玉的首先就是史湘云。不是说她不喜欢贾宝玉,也没有多少男性能让她喜欢的。宝玉每天在女人堆里跑来跑去,这成什么体统?史家派了张道士做媒;初六又让史湘云到贾府来。这一趟来,大家看是怎么写的:平时她来去都很随便,这趟就非常威风了,穿戴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太多了,连王夫人都说:“也没见穿上这些作什么?”都是二婶婶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平时并不关心疼爱她的二婶怎么这回这么热心起来了?穿得整整齐齐,才好把全部饰物都带上,而且特地派了她的奶娘来,管小姐的穿戴。目的就是挂着金麒麟好让老太太看到,非让你表态不可。老太太也明白此意,口

风很紧,说如今你们大了,不能再满口孩子话,互不尊重!这就是警告他们,不可太随便,我可是不赞成这场姻缘。在园子里,湘云捡到一个金麒麟,跟她自己的一样。她肯定在想,这里也有个麒麟。二婶子怎么今天一定要我穿这么多衣服?而且千叮万嘱要把麒麟挂在身上?宝玉跟她说得了个宝贝,她也不清楚是什么,宝玉摸了半天没摸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湘云真太天真无邪——湘云拿出拾到的金麒麟问宝玉是不是这个,宝玉一见欢喜万分。这一来,两人之间一点什么暧昧呀,什么金什么玉呀都没有。钗黛两人过分地早熟,而湘云却无丝毫儿女私情。

当时几天的情形,你说林黛玉懂不懂?那么聪明的人能不懂吗?去了清虚观回来黛玉就受不了了,立刻歇斯底里大发作,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老太太当面表态:不是冤家不聚头,几时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事情到这儿还不能算完,埋伏下来了。所以后面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很多人猜测史湘云最后要嫁给贾宝玉,事实上,史湘云就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从她的诗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来。

宝黛的婚姻离成功甚至是间不容发。老太太虽不能明确向元春表态,但已间接说明。然后又间接地向薛姨妈表了态。宝琴来京成亲,李绮、李纹、邢岫烟一同来贾府。贾母见了宝琴非常喜爱,当场要王夫人认干女儿,又问多大年龄,许了人家没有。意思大家都清楚:老太太要宝琴。老太太当面问薛姨妈,薛姨妈只好实言相告宝琴来京是准备出嫁的,她福气不好,好像配不上你们贾家。老太太就说那太可惜了。王熙凤也凑趣说,我也早看好一对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说了。换句话说,老太太和凤姐都不要宝钗,宁要宝琴。她们知道宝琴来京是为什么。因为凤姐的兄弟王仁送他们来的,还能不知道宝琴来京是为成亲?凤姐故意这么说,那就是向薛姨妈讲明了我可不要你们家宝钗的,我也喜欢宝琴,怎么样?这是很微妙的表态。这种表态难道薛姨妈不晓得吗?这时,薛姨妈下了一步错棋:她看到邢岫烟怪好的,想该不该给薛蟠提亲;又

知道自己儿子不好,呆霸王一个。于是为薛蝌求亲。老太太将计就计,很是高兴,乐得做个大媒,还让凤姐快些筹备,说这真是好好的一对。这样宝钗的弟弟也要成亲了。过了不久,薛蝌选定了夏金桂,哥哥也结亲了。你薛宝钗还等什么?所以薛姨妈也要撤退:我家里有钱,有地位,女儿又是天仙一样的人物,难道找不到婆家,非要嫁给你贾家吗?何苦呢?金玉姻缘,黛玉第一个不愿意;史家做媒的来了,咄咄逼人;到处攀亲的人家多得不得了,我薛家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你家宝玉?从薛家的自尊心来讲,也不能接受。所以在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爱语慰痴颦”中正式地告诉黛玉:你放心吧,姨妈愿意给你作媒。黛玉许给宝玉,几方面都愿意。紫鹃赶紧来催:“姨太太既有这个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薛姨妈开了个玩笑:“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薛姨妈为什么不马上给黛玉作媒呢?她能够马上去作这个媒吗?她自己的女儿怎么办?宝钗心里有没有宝玉,薛姨妈心里不清楚?难道爱宝玉是黛玉的特权?宝钗也爱宝玉,薛姨妈也要考虑怎么做好宝钗的思想工作——这工作不好做。黛玉的婚姻的确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就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使得这场婚姻没有成功。所以《红楼梦》才是一段悲剧。我写个公式:

真 + 善 + 美 坏事

这就是悲剧。那么多人都是善良的,美丽的,纯洁的;老太太、凤姐、薛姨妈都是好心人,都想成全宝黛的好事,却老是办不成。我们在看《红楼梦》时,应该同时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如果:

真 + 善 + 美 好事

这就是宗教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中国好多戏都是这样,生旦团圆,皆大欢喜。如果:

假 + 恶 + 丑 坏事

那就是惨剧,而不是悲剧。许多人喜欢看苦戏。苦归苦,但不算悲剧。“文革”中很多都把此类东西当悲剧写,让人看了很恶心。如

果：

假 + 恶 + 丑 好事

这就是喜剧。

《红楼梦》是个最深刻的悲剧。把人间最美好、最善良、最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却逃不出悲剧命运。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本人审阅

沈石岩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

[在北京大学讲演]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大家知道，今年，1997 年正是塞万提斯诞生 450 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他的作品，权作对这位被狄更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等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伟大作家的又一种纪念形式。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于 1547 年 10 月 9 日——相当于我国明朝的嘉靖二十六年——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里，其父是个终身穷困潦倒的外科医生，为了养家糊口曾先后在巴利阿多里德、马德里、塞维利亚等地行医。塞万提斯从小就随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看样子他仅上过中学，在他的短篇小说《狗的对话》里谈到他的这段学习生涯，可以说，是自学成才。1564 年举家迁至塞维利亚，他得以有机会经常光顾“帕索”剧种创始人洛佩·德·鲁埃达的“小剧场”（注：“帕索”系西班牙的一种民间短剧）。塞万提斯从青年时期起就受到戏剧的熏陶。1568 年他撰写了一首十四行诗，一首三重唱哀歌以及几首八音节诗，被他的老师洛佩斯·德·奥约斯选进由他负责编选的、为悼念费利佩二世的亡妻伊萨贝尔而著的诗集中。以上就是塞万提斯的童年时代。

1568 ~ 1580 年是塞万提斯的青年时代。1569 年，由于塞万提

斯打架斗殴伤人,被警方通缉,12月他逃离西班牙。1561年1月,塞万提斯成了罗马红衣主教胡利奥·阿克夸维瓦的一名侍从,从而有机会游遍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和那布勒斯等地。这一时期塞万提斯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初次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撰写了几首赞美罗马的诗篇,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田园牧歌体小说。当时他只有22岁。由于不习惯主教宫廷里的虚伪礼节和阿谀奉承的习气以及别的年轻侍从又看不起他这个土里土气的书呆子,遂于1570年6月参加了驻扎在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1571年10月7日,虽然米格尔发着高烧,却不顾舰长让他卧病在床的命令,毅然冲上战舰的甲板参加了抗击土耳其军队的勒班多大海战;他英勇地冲上敌舰与敌人展开搏斗,尽管3处身负重伤,一直坚持到胜利,致使左臂残废,此后获得“勒班多独臂人”的称号。1572年,塞万提斯伤愈后重返军队,三年后,1575年,与其弟罗德里戈(也是西班牙士兵)一道请假回西班牙探亲,随身携带着统帅和总督的保荐信回国。他们乘坐的船行驶到马赛海面时,突然遇到土耳其海盗船的袭击,塞万提斯兄弟俩被俘。海盗们看到这两封信后,误认为这是个大人物,以为奇货可居,因此索取巨额赎金。塞万提斯的家人无法凑到这么多钱,只好于1577年先赎回罗德里戈。而塞万提斯从此就开始了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五年俘囚生活。五年之中,塞万提斯多次策划逃离,但均告失败,每次事败后,塞万提斯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这种无视严刑拷打的勇气得到难友和当地西班牙商人的尊敬,奴隶主们对他也畏惧三分,他们叫嚷道:“只要把这个残废的西班牙俘虏看牢,整个阿尔及尔的安全就有了保障。”1580年,在两位好心神父的帮助下,米格尔终于回到了西班牙。回国以后,他才知道家庭已经陷入赤贫状况,于是又不得不回到军队继续服役,以上是塞万提斯一生中的第二阶段——国外冒险阶段。

第三个阶段——初步尝试文学创作并遭到失败的阶段。1583年塞万提斯看到自己因手残而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故返回马德

里,四处求职未成,开始决定以写作为生。1584 年底,塞万提斯和他一位崇拜他的经历而又喜欢阅读骑士小说的姑娘结了婚。婚后,塞万提斯不想依靠妻子的陪嫁过活,就重新返回马德里,从事他所喜欢的文学创作,就与他的妻子分居了。1584 年至 1586 年,塞万提斯创作的作品留下的悲剧只有《被围困的努曼西亚》。该剧描述了古代西班牙的努曼西亚人英勇抗击罗马侵略军的故事。罗马军队围困努曼西亚城长达 14 年之久,然而全城居民在漫长的抗战年代里,无一人投降,最后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烧掉了城里的所有财物,集体自杀,只有一个小孩因藏在大桶里而存活下来。罗马军队的将领俘获了这个孩子,并命令他把努曼西亚城城门的钥匙亲手交给罗马军队的主帅(根据罗马人的惯例,攻取一座城池之后,必须由当地的一个居民将该城的城门钥匙交给战胜方,才算取得胜利)。小孩从罗马人手中拿到钥匙后,登上城楼,跳了下去,努曼西亚城的最后一位公民就是以这种方式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1808 年法国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并围困萨拉戈萨等城池,在 1936~1939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德意法西斯纵容下,敌视共和国的西班牙军队围困了马德里城。在这两次民族危机中,在上述被围困城池都上演过塞万提斯的悲剧《被围困的努曼西亚》,以此来鼓舞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志。

在这个时期,塞万提斯还写了二三十个剧本,但演出后反映平平,这些剧本也没能收集出版。1585 年,塞万提斯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颂爱情的田园牧歌小说《伽拉苔亚》,同时他又根据自己在阿尔及尔的经历写了《阿尔及尔的交易》一剧,反映了俘虏们在恶劣的环境下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但这时,被人们誉为西班牙“天才的凤凰”的戏剧家洛佩·德·维加活跃在西班牙的舞台上,观众们更喜欢看他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塞万提斯不得不终止创作,只好在 1587 年到塞维利亚从事军队的征粮员(军需官)工作。

1587~1605 年为塞万提斯一生中的第四个阶段,即为生存而

奋斗的阶段。作为一名军需官,四处征收粮草,塞万提斯得罪了地方豪绅,特别是教会,被诬陷“未经上级批准私自出售三百梅迪达的小麦”而被关进狱中。获释后,经朋友介绍,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作税收员。但不幸的是,塞万提斯将收缴的税款存在一家私人银行,银行破产,经理携款潜逃,塞万提斯又一次因无法上缴税款而被捕入狱。据后来塞万提斯回忆,创作《堂吉诃德》这部传世的不朽之作的最初念头就是他在塞维利亚蹲监狱时产生的,因为在他担任征粮员和税收官的这15年里,走遍了西班牙南部的城市和乡村,见识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既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也亲眼目睹了大量的丑恶现象,这些东西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结合他自身的经历觉得非常有必要编成故事讲述出来。1605年,在塞万提斯58岁时,《堂吉诃德》上集出版了,受到热烈欢迎。当年就再版了六次,并被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出版。当塞万提斯继续撰写下集时,1614年竟有人化名抢先出版《堂吉诃德》下集。这部内容低劣并对塞万提斯进行人身攻击的伪作却得到教会、报刊检查官批准出版。塞万提斯十分气愤,加快了写作速度,于161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下集,又获得成功。虽说他过去出版了一部受人欢迎的作品,但作家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并还屡遭不幸(如,因涉嫌杀人而被捕入狱,因女儿的陪嫁问题被控诉,法院催逼偿还所欠的税款,几位亲人不幸相继离世:弟弟战死沙场,守寡的姐姐病逝等),但是这位作家仍然以坚强的意志坚持文学创作。他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下面是酒馆,上面是妓院的吵吵嚷嚷的环境中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除了前期的《被围困的努曼西亚》、田园牧歌小说《加拉苔亚》外,在1600~1616年的创作高峰期期间,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警世典范小说集》(1613年),反映爱情与风俗的《八出幕间短剧和八出喜剧》。此外还有歌颂忠贞的爱情和骑士理想的小说《贝雪莱斯和塞西斯蒙达历险记》(于作者死后1617年出版)。塞万提斯几经创作上的失败,终于在1605年,58岁时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堂吉诃

德》上集。但他临终前的生活,与以前别无二致,尽管他的名字受到敬重,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国首都得到赞扬,他却依旧是个穷诗人。1616年,对文学界来说,是一个悲惨的年头,在这一年里,更具体地说,在同年同月同日,1616年4月23日世界文坛上的两颗光彩照人的彗星陨落,莎士比亚死于斯特拉夫城的农舍里,塞万提斯也在马德里的破旧寓所与世长辞。在塞万提斯逝世前四天,1616年4月19日,为《贝雪莱斯和塞西斯蒙达历险记》写完了献词后才封笔,在他逝世前的1613~1616年,这短短的近三年里,他拖着病弱之躯,紧张从事文学创作,笔耕不止,写就了《警世典范小说集》、《帕尔纳索斯之旅》、《八出幕间短剧和八出喜剧》、《堂吉诃德》下集以及《贝雪莱斯和塞西斯蒙达历险记》等五部作品(其数量占中文版八卷本的《塞万提斯全集》的一多半以上)。真可以说,塞万提斯有一个硕果累累、光彩照人的、达到天才之巅的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下笔如有神,将他一生中的酸甜苦辣的生活积淀,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之水从天而降,全部倾泻在稿子上,这就叫作瓜熟蒂落。

现在介绍《堂吉诃德》。在本书的第二章堂吉诃德吟唱了这么一首诗歌: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但哪像这次如此殷勤。/他们在款待堂吉诃德,/他刚从家乡到达此地。/公主照看着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由小姐服侍。这首诗歌就是大名鼎鼎的堂吉诃德出游时,在一家小客栈对着他遇到的两位姑娘吟唱的。这是他在模仿他所读过的旧武侠小说里的派头,需要时要通报大名。仓促之际,只好从他读过的、记载朗萨洛特武功的古谣曲里套用了一首,正如他自己所说,此诗“酷似眼下的情景”。如果我们将原诗与它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堂吉诃德将原诗里的主人公,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圆桌骑士朗萨洛特的名字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吉诃德的这个名字还是他第一次出游前不久才取定了的名字。

这位吉诃德先生就是闻名遐迩的、古代第一的“骑士迷”,看骑士小说入了迷的人。他是西班牙拉曼查地区小乡村的一个老式乡

绅。他有一份不大不小的田产；“他吃的大锅杂烩里常放的是牛肉（意思是说羊肉比牛肉贵，没有条件经常食用羊肉）；晚餐几乎顿顿是葱头拌肉末，星期六羊蹄羊骨（为了纪念 1212 年西班牙人击败摩尔人，明文规定，周六禁止动荤，但是动物的下水，蹄子，骨头例外，据说这个禁令一直维持到 18 世纪），星期五只吃扁豆（礼拜五是耶稣受难日，为天主戒斋），星期日添上一道鸽子肉，这样就花去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三”。他本人大约 50 岁左右，生的“仪表堂堂”，脸上无肉，骨瘦如柴，喜欢闻鸡起舞，热衷于打猎，他的真名可就难以深入地考察了。有人叫他吉哈达，也有人称他为盖萨达，不过根据我们这位作者的最后意见，他认为，这位主人公应该叫吉哈达，而不是盖萨达。因为这个名字不但与他出游前几天为自己起的雅号“吉诃德”十分接近，而且其含义与他那“身材精瘦，面貌清癯”的尊容比较相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堂吉诃德读骑士小说上了瘾，猎也不打了，家务也不管了，没昼没夜地读骑士小说。书中那些荒诞人物、事件不分昼夜地缠绕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眼前不断出现骑士、恶霸、仕女、名媛、毒龙猛兽以及决斗等，总而言之，一句话，所有骑士小说里的世界统统变成堂吉诃德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了。他收罗所有的骑士小说，不论是抄本还是孤本，凡是能够弄到手的，他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搞到，就这样，他那有限的家产几乎被他折腾光了。

但是堂吉诃德走火入魔的表现还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他自己也是个无双的骑士，而这万恶的社会正等待他去除暴诛乱，自然他也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受到正式的“骑士”封号。这反而使他更加急于外出包打天下，以便实现他那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壮举，这样一来也许从什么大公爵那里讨到个正式封号。第一件事，他先把祖上留下的、布满锈迹和霉斑的一副盔甲找了出来，精心擦拭之后，发现只有顶盔，还缺少一件顶顶要紧的东西，因为那副盔甲还缺一个保护头面的全盔。好在吉诃德先生有的是办法，他利用硬纸板做了一套面具装在头盔下面，这就成了一具完整的头盔了。

但他还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他要试试这副加工的头盔是否结实,他便仗剑砍去。糟了,费了他整整一周时间做成的东西竟如此的不牢。他不喜欢这么不经砍的面具,于是决定再重新做一个,这次格外小心,他在硬纸板的里面衬上几条铁条。做成之后,装在盔顶上,他很有理由自信,这次是坚固得很,并且也无需用剑去试验了。

盔甲置办齐全后,吉诃德先生要干的事情,就是看他的“玉马”。他家中这匹马的骨头根根突出就像西班牙硬币的边角那样。他自认为,这匹马应该比他在骑士小说中看到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骏马“布塞法罗”,比熙德的胯下坐骑“巴别卡”要好上多少倍。他用了四天的时间给他的马选取名字。这四天功夫的一大半也许是花在自问自答上了。像即那样绝世无双的“骑士”胯下的坐骑要是没有个特别的名字,那不就太岂有此理了吗?对,一定得有个名字,而且还得是个响当当的名字,这名儿应该表示那匹马在主人得到“骑士”封号之前就已经是一匹不同寻常的马了。他想出了无数的名字,挑来挑去,自己发问,自行回答,终于取定了,杨绛先生取其谐音将它译为“驽马难得”,因为以我们这位主人公之意,认为此马“从前是匹瘦马”(即西文原意),但今非昔比,自从堂吉诃德使用了它之后,便是一匹非凡的马匹了。马儿是有了名字,但是马的主人也得有个新的名字,这也是件让吉诃德先生颇费心计的事。足足花了他八天的时间才确定下来,叫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认为,这位乡绅的本名叫吉哈诺(有瘦长脸之意),但是这位先生觉得瘦长脸太俗气,于是稍一改动几个字母,就变成吉诃德了。其实这样的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有例可寻,《水浒传》里有个高太尉,原来是个踢蹴子球出身的泼皮,由于他的球踢得好,人们就叫他高球。后来他发迹之后,觉得这个“球”字不雅,于是就改为“俅”。此外,熟读骑士小说的吉诃德先生还知道,大名鼎鼎的骑士阿马迪斯的名字后面还拖个地名“高拉”,从而全名叫阿马迪斯·德·高拉,于是吉诃德先生也给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个地名,叫作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这位热爱本乡本土的吉诃德先生觉得这个雅号,不仅清

清楚楚地指明了他的出身籍贯,而且家乡也会因为他的功成名就而变得名垂青史。还有一件事更让堂吉诃德放心不下,吉诃德先生知道,凡是“骑士”都有个“意中人”,一位仕女,美人。以便将自己这颗火热的心和侠胆义举奉献给美人,没有意中人的骑士,就好比一棵树没有叶子,不结果子,犹如一个缺乏灵魂的躯壳。吉诃德先生以心问心地说道:要是我打败了一个巨人,我不能叫他到我意中人跟前匍匐着听候美人的发落,就像骑士小说里描述的那样,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行,我一定得有个意中人,我崇拜的“名媛淑女”,“心的归宿”。巧得很,吉诃德先生就有一个现成的意中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位长相一般的农村姑娘,吉诃德先生曾为了她,弄得神魂颠倒,自然对方一点都不知道竟会有人把她当作天仙般地崇拜。这个姑娘名叫阿勒东萨·罗伦索。吉诃德先生也要为这个意中人起个新名。这个名字既要像个公主的芳名,又得跟自己的雅号相般配。于是他就确定为颇有贵族气质的杜尔西内亚,然后再拖上一个表示这位女士籍贯的尾巴,“德尔·托博索”。吉诃德先生觉得这个名字既鲜艳,又别致,还铿锵入耳。准备就绪之后,吉诃德先生认为时机成熟,并且认为他若再不去“行侠”,换句话说,再不把自己奉献给这个等待救援的世界,那简直是一种罪过了。于是在热得要命的7月的一天早上,东方还没发白的时候,吉诃德先生非常秘密地绑扎妥当,骑上自己的那匹“宝马”驽骍难得上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游。

吉诃德先生总共三次出游冒险。本书上集叙述了他的第一、第二次出游,下集讲述吉诃德先生的第三次出游经历。第一次是单枪匹马,受伤而归。后两次他找了本村的一个贫苦农民桑乔作为侍从,一同出游。被骑士小说迷了心窍的堂吉诃德以为到处都是妖魔鬼怪和行凶歹徒,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羊群当军队,把磨坊当监狱,还把酒囊当成巨人头,干了一桩桩荒唐可笑的事情,其结果是他那锄强扶弱、救危济困的理想化为泡影,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直到临终前他才从自己疯狂的幻想中醒悟

过来,用自己的遗嘱对骑士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果他侄女未来的丈夫也是爱好骑士小说的人,那么她将被剥夺财产继承权。

我们知道骑士文学是歌颂骑士制度的产物。盛行于 12、13 世纪的西欧。西欧分成许多小国,国王下面的许多大小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贵族下面还有小贵族,他们也有自己的领地。这些封建领主都有自己的武士,又称作骑士。而西班牙 15、16 世纪流行的描写游侠骑士的小说,称之为骑士小说,它是在西班牙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在西班牙中世纪反抗来自北非的摩尔人统治的、收复失地的解放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骑士小贵族的特殊集团,他们成为光复失地运动的主力军。虽然西班牙的骑士制度已经瓦解,但骑士小说仍然盛行,尤其在 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即现在的拉丁美洲以后,激起了新的冒险热潮。这时西班牙人人人觉得生逢吉时,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企图去西印度群岛,即拉丁美洲,一显身手(塞万提斯亦曾有过这种打算)。西班牙王室为了占据更大的殖民地,攫取更多的金银财宝,正需要这种业已过时的骑士精神。尽管作为维系封建关系的骑士制度瓦解了,但封建精神的枷锁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西班牙复兴后,称霸于欧美亚非四个大洲,成为最早的殖民大国,自称日不落的国家。这种骑士就成为西班牙人理想中的英雄。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骑士小说的盛行。尽管骑士小说并不是从西班牙本土兴起的,它的前身来自英国的骑士故事和法国北部的英雄史诗。但它与史诗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主人公有崇高的目的,为祖国或宗教而献身,而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则只为个人事业孤军奋战,有时则纯粹为了冒险;史诗的情节是依据真实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叙述,而骑士小说的故事则是在纯属臆造的境界中展开;在史诗中,妇女居次要地位,主人公几乎与爱情隔绝,而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则为美人赴汤蹈火;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常常是粗犷豪放,而骑士小说的英雄往往是温文尔雅。

骑士小说的主题反映封建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即为爱情、荣誉或宗教而显示出的冒险游侠精神。西班牙的民族自信心,十字军的冒险精神,虔诚的宗教信念,在骑士小说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小说中的主人公游侠骑士,往往被写成见义勇为、锄强扶弱、英勇善战、举世无敌。而这一切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动力均来源于爱情,故事情节不外乎是:为取得贵夫人的欢心,骑士历尽神奇的各种惊险遭遇,赢得骑士最高荣誉之后,凯旋而归,成为国君、领主或朝廷里的显赫人物,然后分封他的朋友和侍从,并与一贵妇人或一远方公主成亲。这时,一切宿敌,包括那些善于施用魔法妖术的敌人,均被扫荡殆尽。

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在 1321 年左右出现,但具有本国特色的骑士文学形成高潮,则是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当时最为流行的骑士小说有《阿马迪斯·德·高拉》(1508 年)、《埃斯普兰迪安的英雄业绩》(1510 年)、《希腊的堂利苏阿尔特》(1514 年)、《帕尔梅林·德·奥利瓦》(1511 年)、《骑士西法尔》(1512 年)等。

骑士小说也成为反对宗教改革的工具。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耶稣的最初的骑士事业”,当时也出现不少小说,将耶稣、天使、圣徒的事迹也作为游侠骑士来描写,如佩德罗·埃尔南德斯·德·比利温布拉莱斯的《太阳骑士》(1552 年)。据统计,从 1508 至 1550 年间,几乎平均每年有一部新的骑士小说问世,共出版了 60 余部。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人不读骑士小说,可见其流行之广。骑士小说行文冗长,叙事繁复,语言拖沓,人物的性格和外貌雷同,中心思想与内容大同小异,艺术价值不高。随着骑士制度的衰落,骑士小说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塞万提斯写《堂吉珂德》的初衷是“让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看来,作者的直接目的达到了。从塞万提斯为骑士小说迷画的这幅疯疯癫癫的漫画像中读者看到阅读骑士小说后所产生的恶果,但作为一部名垂青史的杰作

还有着更为久远的深层含义,不管创作之初作者是否意识到这点。更为深层的含义是塞万提斯将吉诃德先生作为英雄来歌颂的。从他那一桩桩模仿骑士的癫狂之举中,人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从良好愿望出发,立志铲除人间的恶魔,他反对压迫,锄强扶弱,充满了无私无畏的精神。这时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已经不是中世纪的那种为美人而献身的武士了,而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想的勇敢的战士,在他头脑清醒时,显示出他那渊博的学问,是一个才智横溢的人物。他发表的有关美德、自由、民主、人的意志的言论,对子女教育的看法(他认为父母对子女所选学的学科不应用强制的手段去制约,而应根据子女的才能而决定),对诗歌、翻译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诗歌公认为具有讽刺、抨击社会上一切弊端的功能),都是那么有条有理、振振有词。当他谈武艺,论天文地理,强调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的重要意义时,讲得那么头头是道,见识卓越。在桑乔被派出担任海岛总督时,临别前塞万提斯要求桑乔正确认识自己,要求他以美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生活要简朴,工作要勤奋,姿势要端正,不得沉溺于女色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堂吉诃德对理想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一信念可以视为投向当时封建社会的匕首。正如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评论的那样:“他是热情的人道主义者,是个学识渊博的真正智者。”尽管他的愿望是好的,有着美好的理想,但是这种不顾实际的幻想,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往往是事与愿违,屡屡失败。他搭救了牧羊少年,但他走后却使得这位少年吃了更大的苦头,难怪后来这位少年再次见到他时,请求堂吉诃德答应他,当他再有困难时千万不要再来救他,可以说,他既害了别人也讽刺了他自己。这种理想脱离现实,一味蛮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的人物典型也是塞万提斯精心塑造的,从而后来堂吉诃德就成为理论脱离实际的代名词。堂吉诃德身上的矛盾而复杂的性格,反映了塞万提斯思想上的矛盾,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么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才华横溢的塞万提斯却为社会所不容,受伤致残,被俘受辱不说,还多次蒙冤被关进牢房,还得承受

家庭的种种矛盾与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的袭击。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境地,塞万提斯从来没有被吓倒过。但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抱负,却在他的文学创作里一一得以实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在欧洲所有一切文学著名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庸俗和伟大、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别林斯基语)的传世之作。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仆从桑乔·潘沙与堂吉诃德相辅相成,是主人的对照,彼此交映生辉。塞万提斯通过桑乔这个人物概括了16世纪西班牙农民固有的特点:稳健、冷静、实事求是,具有较正确的判断力。就是说,他是人民精神的体现者。而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对他产生影响,使他没有理想,缺乏热情,有时还显得有些贪婪、狡猾。但他往往在堂吉诃德沉醉于虚幻的狂想、认不清现实的时候,他能说出清醒的、合情合理的话来,以纠正塞万提斯的错误,指出真理所在。这是桑乔所起的作用。桑乔的庸俗之处,在于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为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过上舒适的生活,最最让他烦恼的是跟主人到处冒险的时候,没有口福可享。但是桑乔的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堂吉诃德的精神感染了他,明知跟着这个疯主人不会捞到实惠,可他仍然一片忠心,不肯背离主人而去。在下集里,桑乔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当他担任海岛总督时,秉公办事,为官清廉,为百姓作了不少好事。这段体现桑乔聪明才智和管理才能的描写也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个人物塑造得也很深刻。主仆二人不论外表还是性格、出身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高一矮,一瘦一胖,就连坐骑也不一样:一匹瘦马,一头胖驴。主仆二人处处形成对照,两个人游历过程中,堂吉诃德具有深不可测的骑士道理想,而且还经常神志颠倒,而桑乔则那么清醒,讲究实效。因此,两个人是相辅相成,也是相接相连的人物,写得妙趣横生。全书的冲突就是在这个一智一愚的两人对话里发展起来的。人物的鲜明个性和思想感

情都是通过对话和行动充分体现出来的。所以德国诗人海涅认为,堂吉诃德和桑乔合起来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并巧妙地将一对对互相矛盾的因素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的层次更加丰富,人物性格更为突出,同时也使小说的哲理性更加深邃。对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可以看到《堂吉诃德》一书的影子。

从《堂吉诃德》一书的结构来看,全书分为主要情节,即堂吉诃德和桑乔的几次冒险故事,桑乔当海岛总督处理政务的故事以及这两个主人公和理发师等人物出场、讲述的故事,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此外还有诸多的插入故事,即次要情节,尽管这些故事不是为了了解主体故事必不可少的篇幅,但是它的人物有时还与主体故事相交叉。这些次要情节,即指由不同人物讲述的插入故事,它们有维德马上尉讲述的被俘经历,有十四个长短不一、情节各异的故事以及一篇与主要情节毫无瓜葛的、由神父当从朗读的一份拾到的手稿《一个具有好奇心的鲁莽汉子故事》。塞万提斯在上述故事中根据每个故事的不同内容,分别地将过去业已存在的文学叙述传统模式,如摩尔人小说,田园牧歌体小说,意大利式小说,言情小说,骑士小说等手法运用进去。总之,塞万提斯以堂吉诃德和桑乔的冒险出游为主线,写成一部有连贯性和系统性的、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三次出游的前因后果都有详细的交代,下集里堂吉诃德在公爵府第作客以及桑乔出任总督的那几章,作者采用了相互交替的手法,轮流描写在不同场合里发生的故事,例如45、47、49、51等章是关于桑乔的故事,而46、48、50、52等章则是讲述堂吉诃德的活动。这样一方面兼顾到同时展开的情节,另外一方面吸引读者注意这对并行的情节。这也是《堂吉诃德》结构的另一特色。尽管作者将主次要故事巧妙地揉和在一起,但纵观全书也有某些纰漏,如有些细节前后矛盾甚至遗漏,上集过多地穿插次要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主要情节的发展。

《堂吉诃德》的出版取得巨大成绩。作者在世时,已经出版了16次。在他逝世后的300多年里,在国外翻译出版了1000次,影响很大,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一部不朽的名著。这部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堂吉诃德》,其人物的复杂个性引发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理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及对其形象的剖析与进一步的联想,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生动、光彩照人。因为不同的读者从人物复杂的特性上各取所需,找到自己的或别人的影子。

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知识界对塞万提斯这位作家,特别是对他的名著《堂吉诃德》并不陌生,早在1922年林纾(林琴南)先生用文言文首次译出《堂吉诃德》,中文版定名为《魔侠传》。到了30年代,傅东华先生开始从英译本转译《堂吉诃德》上集,具体地讲,众1935年6月到1936年4月,在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上连载12期,即《堂吉诃德》上集52章里的前33章。直至1939年他才将后面的19章补译出来,这时《堂吉诃德》上集的单行本方出版问世。1947年,这个版本出版了第三版。解放以后,1950年,1954年商务印书馆和作家出版社将傅译《堂吉诃德》上集本又分别再版了一次。直到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方出版了傅东华先生从英译本转译的《堂吉诃德》的全译本。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花了多年心血直接从西班牙文译出《堂吉诃德》上下两卷集,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在改正错误或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于1987年修订本再版。到了1995年,在我国又出版了4部从西班牙文直译的新译文,他们的语言文字,译笔风格各有千秋。这是我国翻译园地里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表现。

我们刚才说到,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已经有了《魔侠传》译本,其实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早,仅与我们的邻邦日本相比,我们都是东方的文化大国,都遇到与西方语言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差异,但是日本早在19世纪就已经有了《堂吉诃德》的日文译本,

1927 年,即《魔侠传》出版五年后,又出版了第二个日文译本。至于西方的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在《堂吉诃德》出版不久的 17 世纪,不仅在很短时间里翻译介绍了这部作品,甚至有的国家《堂吉诃德》的译文版本竟多达 10 多种甚至 20 多种。

1955 年我国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在北京举办了“世界名著《草叶集》出版 100 周年、《堂吉诃德》出版 350 周年纪念大会”,著名学者、专家还在各大报刊发表了介绍评论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塞万提斯热。但是从出版书籍角度上看,当时仅有两家出版社出版了塞万提斯的作品,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傅东华的、从英文转译的《堂吉诃德》全译本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祝融先生翻译的《惩恶扬善故事集》。这部《惩恶扬善故事集》,实际上是 1997 年出版的《塞万提斯全集》中文版里的第五卷,由 13 个短篇小说组成的《警世典范小说集》的选译本。在塞万提斯的著作中,《警世典范小说集》占据着重要地位,它被看作是《堂吉诃德》一书的补遗。换句话说,如果塞万提斯没有写出《堂吉诃德》,他仅凭《警世典范小说集》一书就可以跻身于著名作家的行列。而祝融的从其他语种转译的《惩恶扬善故事集》,这个版本的遗憾之处主要在于译者从 13 个短篇小说里,仅仅选译了 5 个短篇,难以让读者看到如此重要作品的全貌。改革开放后,1982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纪念塞万提斯逝世 366 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会后十位西班牙语国家驻华大使在校园内种植了一棵白皮松,命名为“智慧之树——塞万提斯之树”,它成为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佐证。目前这棵树与 1986 年 10 月安放在北大校园内的、马德里市政当局送给北京市人民的塞万提斯青铜塑像相毗邻,树与塑像,现在成为北大校园内过往行人驻足观望,流连忘返的校园景点之一。所有这些都扩大了塞万提斯在中国的知名度。

塞万提斯对翻译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堂吉诃德》第二卷的第 62 章里,他借助堂吉诃德之口说:“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都

好比是反面观赏弗兰德斯挂毯,图案倒是都能看见,可是被乱七八糟的线头弄得模糊不清,不像正面那么平整光滑……当然我不是说干翻译这一行有什么不好……”塞万提斯的这段话,一方面证明翻译工作的艰辛所在,同时也是对那些滥译、乱译者的抨击。在《堂吉诃德》上卷的第6章里,塞万提斯就抨击了西班牙人赫罗尼莫·乌列阿上尉翻译的《疯狂的罗兰》,指责他使原诗的“韵味大为减色”,认为他是在“自找挨骂”。但塞万提斯并不是对翻译工作蔑视、否认翻译工作,将它一棍子打死,对好的译作他也是大加赞扬的,书中他还提到另外两个译本的译者,他认为“他们精美的文笔简直使得译文和原著难以区分”。在《堂吉诃德》下集的献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四面八方都催我把自己的堂吉诃德拿出来。最急切的莫过于中国的大皇帝了。一个月以前,他用中文给我写了封信,亲自派人送来,要我,更确切地说是恳求我给他捎去一本《堂吉诃德》,因为他想建立一所卡斯蒂利亚语学校,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当课本。同时还聘请我当校长。”固然这些都是塞万提斯的戏言,尽管由于中国大皇帝忘记让使臣捎去来华的路费以及当时身体欠佳的塞万提斯也无意出国,也就无法协助中国培养西班牙语人才。但是1997年《塞万提斯全集》中文版八卷本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解放后培养出来的这支西班牙语文学翻译队伍业已成熟,并以翻译出版他的全部著作方式纪念了这位未能成行来华出任“校长”一职的塞万提斯450周年诞辰。

北京大学教务处供稿 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正如鲁迅因阿Q而不朽、阿Q也因鲁迅而不朽一样,塞万提斯因堂吉科德而不朽,堂吉科德也因塞万提斯而不朽。我们读《阿Q正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内心深处却在流泪。同样,我们读《堂吉科德》,发现掩盖在堂吉科德近乎痴迷疯癫的言行的外表下,竟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灵。文学,惟其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了解到如此丰富的心灵世界。有了

文学,我们对人的理解,才不会像历史或政治结论那样冰冷。

夏雨田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武汉市文联主席

幽 默 与 人 生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和大家相识,并谈谈我对“幽默”的感受。但大夫不同意,说我的肝与肾都有病,尤其是肝已趋硬化。而演讲不同座谈,站在这里句句要提丹田气,是很伤肝的,我亦感到“心有余而肝不足”。但学校多次邀请,盛情难却,使我颇为难,讲吧,对不起我的肝,不讲,又对不起大家的心,最后,还是舍肝从心了。

近几年身体的确不争气,啥病都找上我,因为我的免疫功能太差,整个身体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任何病菌、病毒都可长驱直入,不像诸位,体内有正规军防守,我这儿只有几个民兵。很多朋友见面都关心地问我:“你还好吧?”我真不知怎么回答,我说很好,不真实;我说不好,又欠礼貌,只好回答:除了身体,哪儿都好!这也不是假话,有些人,身体一垮,情绪、心境、信心、理想、追求、热情……一股脑都跟着垮下去了,人的整个状态便垮了,而我,尽管身体垮了,但整个精神状态没垮。我常自嘲:我是软件发硬、硬件发软。肝是软件,我这儿发硬;腿是硬件,我这儿发软。但我又说:软也好硬也好,生活永远美好,人只要活着,就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有人说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都看得很穿、很淡、很透,所以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包括重病乃至死亡。其实,所谓看穿、看透也有很大的区别,佛门叫四大皆空,把理想寄托于极乐世界;还有一种人,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认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对许多事

取无所谓的态度。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亦不可取。我追求的是淡薄名利,无私无畏,以豁朗、达观的人生态度对待一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困难挫折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万事如意”只是一句吉祥话,人世间是永远不可能万事如意的。关键倒是我们怎么对待诸多的不如意。现在一个时髦词叫“潇洒”,什么是潇洒?吃喝玩乐的潇洒,游山逛水的潇洒,人人都会,那不是真潇洒!真正的潇洒,是把那些不潇洒的事,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拼搏,把它转化成潇洒,把不如意的事转化为如意。这个转化过程才是潇洒的真谛!潇洒的本质!

我虽然在文艺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5个年头,至今还担任着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市文联的主席,还是全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但从本质上说,我仍然是一个喜剧工作者。我当过专业的相声演员,写了三百多万字的相声、小品、轻喜剧、电视喜剧,出版过百万字的喜剧相声作品专著。我写的最多的是相声。从侯宝林大师起,马季、姜昆、侯跃文、冯巩、牛群、李金斗……等两代相声名家均演出过我写的相声作品。我也发表过几十万字的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但不管写什么,我作品的主格调是喜剧的、轻松幽默的,我希望读者与观众在欣赏我的作品时能开怀大笑,更希望笑过之后,还能在笑声以外收获点其他的东西。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如何与相声和喜剧结缘的。但我知道大家都喜欢以笑为审美特征的艺术品。我的座右铭是:我爱相声!相声通向笑声;我爱笑声,笑声通向人民的心声。笑能帮你宣泄喜怒哀乐的情怀,笑能帮你应对酸甜苦辣的人生,我们笑着同昨天告别,又笑着迎接新的黎明。愿人生有更美好的笑,愿笑声中有更美好的人生!

人有七情六欲,笑乃七情之首。人人都会笑都爱笑,但会笑不见就得懂得笑,会欣赏笑,更不见得会得心应手地运用笑。

笑是一种审美效果,无论幽默、滑稽、喜剧,它的美感特征都是笑。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笑:高尚的笑、卑微的笑、雅致的笑、通俗的笑;有深刻的笑、浅薄的笑、有有益的笑、也有无益的笑、甚至有

害的笑……相声演员台上常说：“我是研究笑的……对笑最有发言权……”其实未必！我写过演过数百段相声，但我至今并不认为自己真正地——起码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解理解笑的真谛。

有段相声，批评某些人语言不美，话必称他妈的。“你他妈的，我他妈的，他他妈的，都他妈的……”一口气罗列了十几个他妈的。过后观众评论：“这段‘他妈的’真他妈的过瘾！”对糟粕语言非但不反感，反而津津乐道。笑过之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所以，无论创作或欣赏以笑为审美效果的艺术品，都应该有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即笑的目的与功能是什么。笑的确有娱乐功能，它更有审美、认识功能，还有讽刺与幽默的功能。相声以讽刺见长，强烈的讽刺可以带来强烈的笑声。但讽刺必须注意分寸，特别是对人民内部的讽刺，讽刺搞不好容易以点代事、以偏概全。比如人们对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这无疑是相声的用武之地。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讽刺不正之风的段子，笑过以后，不能让观众觉得不正之风已无可救药，当今干部已基本烂掉，前途一片黑暗。要是一段喜剧作品，观众笑过后留下了这样的效果，便不是作者的初衷了。有一段相声写一个农民的驴吃了庄稼被罚款，农民借驴发泄对某些干部大吃大喝的不满，农民指着驴说：“你以为你是谁？什么都敢吃！你当你是干部呀，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里把所有的干部与有吃喝风的干部划了等号，这你不准确了。这如同排球健儿，比赛时高高跳起，重重扣下，球落地开花，观众一片欢呼，接着又一片惋惜，原来球扣出了界，界内球打到界外，跳得再高，姿势再美，扣得再重，也是白搭，不仅不能得分，反而失分。

诚然，讽刺是相声的特长，但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新人新事也不是不能通过笑声给以表现的。对相声来说，表现新人物、新事物既有可能，也有需要！喜剧的种子不仅在被讽刺的人物身上可以开花，在可歌颂的人物身上同样可以结果。笑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不是所有的生活现象都可以把人物带进喜剧的天地，但喜剧的天地是广阔的，它

包

容

的人物形象,生活现象,有善恶,有美丑,有反面人物也有正面人物……

前苏联一位喜剧大师说:“你要寻找笑声吗?那么你就去找——不协调。”是的,很多笑声都溶解在不协调之中。喜剧之所以引人发笑就是把观众带进了形形色色的不协调之中。听一位处长打电话:“喂,老张吗?我老李呀,关于我儿子分房子的问题靠老兄多关照。至于你姑娘的工作安排,我心里有数。本来,今天下午我要亲自给你姑娘去联系的,不巧有任务,局里要我明天给机关的同志上党课,讲讲端正党风的问题,我得准备一下。明天上午,我先给机关的同志上党课,讲党风,下午就去跑你姑娘的事……”结果,大家笑了。为什么,不协调!丑的东西偏以美的面貌出现;美与丑尖锐地对立起来了。他要走后门,又要讲党风,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言行不一,可鄙又可笑。不协调,就是我们常说的矛盾,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内容与形式,动机与效果,真与假,美与丑,爱与恨,正确与谬误……当你用喜剧的手法揭露这种矛盾时,笑声也就迸发了。这些矛盾既存在于反面人物身上,也存在于正面人物身上。我写《归国记》,在描绘一位天真的共产党员时,既写他在生死关头的无私无畏,也写他生活中的弱点,甚至还写他有几分“妻管严”。二者的不协调便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当他把唯一可以躲避炮弹的床底下让给两位普通群众时,自己只能把头伸进床下,而身子屁股都露在外头,这本是很滑稽的形象,他却说:“莫看藏头露尾,不美之处最美。”这个包袱(笑料)既引起了笑声,也歌颂了正面人物。同样,在这个段子里我还写了一位临危不惧的老书记。当没见过战争场面的女工吓哭了时,老书记也“哭”了,女工们很奇怪,老书记说:“我是领导,你们是群众,群众哭领导不哭,脱离群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做思想工作,观众便被带进了正面的笑的世界。

无论是讽刺的笑还是歌颂的笑,都离不开幽默。幽默与讽刺

是一对孪生兄弟,却又有很大区别。讽刺是投枪匕首,可以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然而,我却更偏爱幽默。幽默与讽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讽刺一般是愤怒的、尖锐的、锋芒毕露的。而幽默则比讽刺宽得多,幽默的背后有同情,有谅解,有宽容,有期望,也有无可奈何。讽刺往往用来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抨击,而幽默则运用寓庄于谐的手法来评价生活。幽默的东西常常比讽刺的东西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同样是笑,我个人主张多一些幽默的笑而少一些讽刺的笑。同样是矛盾,讽刺可以使其催化激发,而幽默则能使它淡化稀释。

幽默不仅是艺术手段,也是人生态度。以幽默的态度对待人生,人便可以变得洒脱一些,豁达一些,开朗乐观一些,对名利,对仇怨甚至对生死均要看得散淡一些,透彻一些。

幽默的至高境界是无私无畏无我。无私无我,天宽地阔。达到这个境界自然不易,但我努力朝这个方向靠拢。心底的私欲减少一分,胸怀的天地便能宽出一尺。从这个意义上,“笑一笑”便不是生理年龄的“十年少”了,而是生命与青春的“十年少”了。它使你在任何情况下,生命燃烧,青春永驻。哪怕面对挫折、失败、病痛乃至死亡,也依然会有一种淡泊宁静豁达心态。这种心态,对人对自己,于公于私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在 1981 年这年走上了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很多人见面说:当官啦!我说我很忌讳这个“官”字。官,本是个中性词,无所谓好与坏,只是代表一种职务。可因为旧中国长期以来官与民是对立的,因而一提到官,感情色彩上就多少有些贬意,以官字打头的词汇多是贬义词,官场、官商、官腔、官倒、官僚主义、官官相护、官样文章、官逼民反……有人见面一口一个部长,一个书记,更有人昨天喊我老夏,今天忽然调了头:叫我“夏老”。那时我只有 44 岁,就成了夏老,也老得太快了。我在单位多次声明别喊我什么书记、部长,就叫老夏。有人劝说:当领导不同说相声,嘻嘻哈哈的,要严肃,庄重,有一些威风,否则不能镇邪。你跟人家嘻嘻哈哈,人家就

跟你没大没小,权威就树不起来,领导要有领导的风度。我感到很难,也许我可以用演员的技巧来表演所谓领导的风度,但一天要演几个小时,太辛苦了。实践告诉我,某种领导的风度恰恰是群众敬而远之的因素。当领导,身上应有一种凝聚力、辐射力、信服力,但这种力的形成,不是靠风度而是靠作风。人们常说:菜蓝子里看形势,其实更多的是从干部的作风上看形势的。群众评价干部作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先看干部怎么用权,看你是不是以权谋私的。以权谋私的干部当然是少数,但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少数人的不正之风会使整个干部形象遭到污染。

这些方面,我较注意。文化部门虽是穷单位,但也并非完全是清水衙门。权与私、权与钱与利也是可以挂勾的。有人告诫我:要想在一个单位站住脚,就必有几个“自己人”。有关领导也问我,有没有工作比较合手的人需要调到一起来工作。也确实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志、老同学提出愿意调到文联协助我工作,我一个也没答应。机关常有这样一种说法:谁是谁的人,谁是属于谁的。我则认为,人事问题上一定要公道正派,五湖四海。什么“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样的话只能在恋人之间讲,在机关里,每一个人只能是属于集体的。我这么说,也尽量这么去做。有一些省市领导向我推荐干部,我和党组的同志则坚持一条,不管谁推荐来的,首先看是否符合条件,不能任人唯亲、唯上。因此,对有些人,尽管来头很大但条件不合,我们也一一做好解释工作,未予接纳。而对于自己的亲属则更须严要求,我的两个女儿都埋怨我,没有关心她们的工作安排。说我朋友遍湖北、遍全国,安排一下子女,小菜一碟。而我,则坚持她们有多大本事做多工作。这样,大女儿如今只是普通的幼儿教师,而二女儿,24岁了,还待业在家。

文艺界是个名利场,互相攀比之风较盛。我呢,一坚持做思想工作,二坚持以身作则。我主管分房,寸土不要;我主管刊物,绝不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文章;我是单位的党政一把手,而尽量把小车让给老同志艺术家们乘坐。我父亲年逾九十,远在30公里外的

华中农业大学生活,我每周都要从汉口赶到华农去看望双亲(二老身边无人,只有一个小阿姨)。秘书长每次都给我安排了车辆,我均婉谢,而是自己连转三四次公共汽车,回到华农。有时大雪,公汽停驶,我便步行 30 公里回家。孩子说,别人的节假日是爸爸的长征日。我还给自己定下一条,在市内公务,只要自行车 20 分钟内能到达的地方,我均骑车前往。有时也有些思想波动,开全市的大会,我往往被请到主席台就坐,而主席台上坐的人几乎都是“有车阶级”,散会时有人会问:夏部长,您的车来了吧?我说来了,司机就是我本人。什么司机?自行车司机!我想,坐在主席台上,大家都坐一样的椅子,四条腿。而散会后,别人都是四个轱辘的车,我却是两个轱辘的车。但很快又意识到跟别人比坐车,并不是光彩的。以坐车作为荣辱的尺度、贵贱的标准,是等级观念、世俗观念的反映。

近年,走穴成风,演员要高价成风。我就跟青年演员们讲,战士们在战场杀敌是没有讲什么津贴、奖金,更不会讲什么出场费的。当敌人冲上来时,战士们会向连长声明吗:“连长,敌人冲锋了,我们也要上阵了,这出场费怎么算哪?扎死一个给二百元报酬吧。哎哟,连长,上来大个儿的,大个儿的可不好扎,你得翻一番,给四百元吧!”不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端着刺刀就冲上去了,没有想到报酬。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劳动都不要报酬,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我自己也有正当的物质需求:房子希望铺大理石;冰箱换个三开门的;彩电来个二十九寸的。这都需要物质条件。我把它叫小目标,小目标可以有,但不能太过分太超前,更不该不顾自己的具体收入而盲目追赶所谓新潮流。要摆正大目标与小目标的关系。如果颠倒了,那么小目标越大,大目标就会越小;小目标越清晰,大目标就越模糊;小目标占据生活的全部,大目标就烟消云散了。钱,应该有,多点更好,但来路一定要正当,要光明,不要见钱眼开,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以权谋钱。

近几年我重疾缠身，肝肾夹攻。人的心肝肾犹如军队的司、政、后，是最要害的三大部门。而我，三个部门有两个已经政变夺权，剩下的一个也欠巩固。一般情况下，不病死也愁死了，是幽默帮了我一把，使我在重病中依然笑得出来，不但自己笑，还能通过作品把笑带给大众。我在病床上写了三四十万字的相声、小品与喜剧电视。连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元旦晚会都有我的作品与观众见面，尽管我自己倒在病床上，但看到亿万人因我的作品而开怀畅笑，因我的作品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我也感到无比欣慰。在病房，我常与病友们对疾病对死亡进行调侃，跟病友们议论“那边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物价是否稳定？住房是否紧张？有没有不正之风？开后门？公共汽车是不是也很挤？我说，公共汽车挤点不要紧，有人让座的，雷锋同志在那边嘛！有人说我，你才五十多一点岁，现在就过去太年轻了点儿！我说，毛爷爷那边也要干部年轻化嘛！哈哈一笑，许多人都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的确，死亡无法制约，但活法却可以选择。现在有个说法：“别活得太累！”我以为这话可以理解成：人活着，不要为名利所累，为私欲所累，也不要为各种逆境、挫折所累！更不要因为你活着而使其他许多人受拖累！基于此，我在病床上也想尽力为社会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1994年，江上发洪水。我正处在病危之时。江水猛涨，我腹水也猛涨，肚子比七八个月的孕妇还大。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靠在病床上，仅用了十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一整台抗洪救灾的文艺晚会的撰稿工作，命名“情也滔滔，水也滔滔”。有人说，这正是我当时精神状态的写照。

正因为运用了幽默的武器，我的病比预料的结果要好得多，原来大夫说夏雨田只有四个月的生命了，还当面对我说：“你不要掉以轻心，你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说，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倒计时，无非我接近终点的时间更早一些而已，越是这样，我越要掰着指头过日子，丁丁点点不浪费，真正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无限之中去。

我运用幽默,幽默了自己也幽默了别人。

此时,我又想到毛泽东。毛主席是很幽默的,无论言谈话语还是文章著述,处处都闪着幽默智慧的光芒。毛主席是伟人,而幽默增添了伟人的魅力。毛主席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当前,我们有的相声不那么可笑,或笑得别扭庸俗。有人说,相声进入低谷。去年与几位相声大腕议论相声,大家都有点气不顺,觉得相声越来越难弄。一位说:“说我是什么相声艺术家,什么艺术家呀,我都快不会说相声写相声了。过去怎么逗怎么乐,现在怎么说怎么有意见,就是乐了还骂你格调低俗,哪儿讲理去!”上帝”也太难伺候了。这几位说的是笑话也是实话,何止相声,不是有人发牢骚:“小说没趣儿,电影乏味儿,电视蒙事儿,还是麻将来劲儿。”此评价固然有失公道,但多数人对文艺不满足也是事实。其中观众最喜欢的是相声,意见最大的也是相声。我想原因有许多,主观的、客观的,但有一点是明白的,今日之相声,离生活远了点儿,离群众远了点儿。相声本是最贴近生活的,与生活稍拉开距离便感到没着没落。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有心则行。相声不在长短,有生活味儿才浓!

说实话,现在“上帝”未必难伺候,而是我们某些文艺家伺候上帝的心还不诚,意还不真,闭门造车,随意编造!“上帝”如何会买账。文艺也有个质量万里行的问题,也有伪劣假冒的问题。相声创作也要提倡精品意识!也要防伪打假!

最后,我把我的一个作品《老实人》中的一段台词献给大家,做为本次演讲的结束。

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来,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随风摇摆,不做骑墙草。

有话不吞吞吐吐,有病不遮遮盖盖,思想公开,工作公开,缺点公开,生活公开,有话拿到桌面儿上来,不在桌子底下胡蹬暗踹!

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不装懂,

不会不瞎猜,成绩就说成绩,失败就说失败。

名誉地位,不争不抢不伸手,大是大非旗帜鲜明敢表态,不说假话,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不说绝话,认认真真实实在在。

总而言之,丁是丁,卯是卯,好是好,坏是坏,多是多,少是少,慢是慢,快是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是办一切事情的根据和统帅!

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向 21 世纪阔步朝前迈!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幽默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演讲者抱病登上人文讲坛,把欢乐带给了大家。那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虽然读到这篇讲文稿,大家依然会笑声不断,但却很难领略到现场的气氛(在整理编辑本文的文稿时,编者常常会产生这种遗憾之情)。这里,编者衷心地祝愿夏雨田先生在继续给我们带来欢笑的同时,也用幽默战胜病魔,创造奇迹。

王立平 著名作曲家

音乐与人生

[在北京科技大学讲演]

音乐与人生联系太紧密了，音乐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茶余饭后有个响头，听起来很高兴。音乐其实从它的产生到发挥作用，跟人生，甚至跟社会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我 1973 年从农场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我去厂里后，一场风波刚刚过去，叫《南京长江大桥》事件。当时有个纪录片叫《南京长江大桥》，有人向中央打报告，说这个片子里用了前苏联“列宁山”的音乐，报告一直打到江青、张春桥那里。他们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对所有人员彻底清查，并带上一大堆帽子，还要查三代。在那个年代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创作，谈不上对艺术的追求。有一部片子叫《针刺麻醉》，要配乐，可那时只许用 13 段音乐，用“下定决心”、《国际歌》，不太合适，最后选中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大路上扎针灸。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艺术。那时写完曲子就互相听，听像不像什么，怕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我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开始我也狂热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窗外响起的歌“向黑线开火、开火”的曲子是我写的，弄了半天我才发现是向我自己开火。那时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哪里是艺术，完全是吵架，并且是不讲理的吵架。还有样板

戏。样板戏是精品，但是它表现的思想那么高，那么全，男人都没有媳妇，女人都是寡妇，很少讲人情。8亿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这样的艺术怎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爱好、不同性格人的需要呢？那时候人们都很痛苦。我记得，有天有位老领导突然推开门说：“上班时间你们不去学习，不去写作，打扑克！”事后，我们找领导悄悄说：“您以为我们打扑克痛快呀，我们是痛苦才打扑克的。”

有人说作曲是玩技术；有人说靠才华；有人说是靠运气。其实音乐艺术是非常艰难的一门艺术。我们当时听那种聒噪的东西太多了，老百姓对这种无尽无休的争啊、斗啊已经厌烦了。对永远唱高调的最响、最强、最革命的艺术厌烦了，人们需要艺术的回归、美的回归，找到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己心声的艺术，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可是，当我们没有回过味来时，铺天盖地的邓丽君来了。当时很紧张，有人说，国民党百万大军都没有反攻成大陆，一个歌星邓丽君就席卷大地，已经反攻大陆了。有人说，大陆是两邓统治，政治上是邓小平统治，艺术上是邓丽君统治。

为什么邓丽君歌曲受到欢迎？因为过去喊着各种口号，现在突然有人在耳边轻轻地说几句特别有人情味的话：我爱呀！我想呀！我怀念呀！一下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容易接受。我觉得邓丽君有些歌不错，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不必禁她的歌，不要让年轻人什么都不接触，用命令、不讲道理的办法禁是没有用的。严格说艺术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的，是属于服务行业，是为大家服务的，是创造精神财富供大家选择、欣赏的行业。相反，我们要提供更好的东西给大家。有一次我到东北的一个林区，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教育。那时我写出了《太阳岛上》等作品，林区的几个小青年说，他们都爱听邓丽君的歌，仅有的两盘磁带都转录了邓丽君的歌。可是后来听了几首歌，包括我和施光南的歌，他们说也很好。这就为难了，仅有的两盘磁带都录了邓丽君的歌。后来他们一咬牙，洗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把我们那些歌录上了。

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没有人说你们必须洗掉什么，必须录什么，但是他们觉得很喜欢这些歌，那么他们就洗掉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我心想，什么时候咱再写点好歌，把那盘也洗了，不就都是咱们的天下了。所以，我觉得艺术是一种竞争。

对待摇滚乐，也是这样。我不赞成说摇滚不好，青年人好动，什么都想听听、滚一滚，只要不出大格，没关系。另外，我认为如果对青年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千万别听，最后，咱们的知识吃得、看得、听得都是纯粹又纯粹的东西，大概就会缺乏免疫力，还没刮风，就打喷嚏，就感冒了。所以有些东西，要容我们的青年自己去接触，自己去鉴别。另一方面，我也应该告诉大家，音乐是有三教九流的。什么叫三教九流？比如说古典的、传统的交响乐，那真是高雅的，它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才华，而且听了以后真是陶冶你的性情，给你一种善良、一种对美的启迪，而且能引发你很多的智慧和联想。有些东西则是一般的東西，这些一般的東西相当于咱们吃饭里的各种佐料，就是说它既不是维生素，也不是蛋白质，增加点就有点味，但是只吃它的话你肯定营养不良。这样的東西听听也无害。但是也有些東西我弄不明白，过去我们都是走在大路上，后来走着走着都是小道上，而且闹了半天鞋都脱了，都是赤脚走了。

后来，邓丽君的歌听来听去大家就不怎么感兴趣了。在生活中有时就需要换换口味，在音乐中也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媒体也有问题，常常是想一出是一出，就是贪自己的爱好，也影响着咱们广大青年的审美趣味。首先，我决不是贬低港台音乐，港台也是中国的地方，任何艺术里面都有高低之分，它们当中真也有很好的歌，从格调到技巧、直到给人的一种感受，都是非常高雅的。但是也有平平的东西，听着也没觉得怎么样，也就过去了。同样花费时间，为什么不听一点真正的能给人艺术上的启迪，心灵上的感悟、熏陶的东西，为何不听一些好的呢？我想，作为欣赏音乐来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趣味，尽管

我不想说要求大家怎么样，我仍然还想说，大家多听些好的东西。而且这些好的东西不要光听别人说，而需要自己去感受、品味。总之，我希望采取比较宽松的办法。朋友们别觉得我听了一场摇滚乐，就不好了。我觉得年轻人什么都了解一下，但是要有自己的看法，多去想一想，多去接触一下，给自己一个自己的结论，究竟怎么对待各种音乐，大家就会从音乐的鉴别之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而且生活也就更丰富了。希望大家欣赏音乐要用心去听，因为，音乐是用心写的，用心唱的，也希望人们用心来领悟。用心来领悟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不但得到愉快，得到精神境界的一种升华，更能得到美的享受。音乐特别能启迪人们的悟性，因为在所有的事情里，音乐是最要感觉的。有的人弹钢琴特别流畅，技巧特别高，但弹完没有味道，味道在一个音与一个音之间强一点或弱一点上。同样一首歌有的人唱起来特别带味，音乐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从节奏、旋律一直到美感，是可以启迪人的。

1978年，我创作了《潜水姑娘》，当时用了电吉它。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候有个说法，土流氓玩刀子，洋流氓玩吉它。所以它被打成流氓乐器，凡是弹吉它的，带红箍的大妈都要记上一笔。用吉它表现美的形象以前没有过，一来就是特务、日本鬼子，咚咚弹两下，以此表现反面形象。我就想用一用电吉它，试试看，也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印象。当时找弹吉它的很困难，后来听说一个叫陈志的会弹吉它，他当时在建国门菜场卖白菜，后来试了试效果很好，放映后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人生就是要用美的境界、美的艺术、美的音乐装点着美好的希望与生活。

偶然的机会让我去写《太阳岛上》，当时时间很紧，没有乐队，只有用电子琴、吉它来伴奏。后来有的人去了太阳岛，回来说：你骗了我们，太阳岛上没有唱的那么好，那里一地冰棍纸，哪有你说的那样漂亮。我说你们上了太阳岛，我还没上太阳岛

呢。这是一首好歌，可是作者没有深入生活，这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生活在先，创作在后？恰恰相反，不是的。实际上“太阳岛上”这首歌我并不是写太阳岛，我是借题发挥，借着太阳岛响亮的名字、地方，来抒发我们这代人打倒“四人帮”之后，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憧憬，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带着真挚的爱情，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的花靠汗水浇，献出你智慧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这实际上表现了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未来的向往之情。看了“太阳岛上”这个题材，我似乎找到了一个闸门，找到我倾泻这种创造激情的渠道。我们说体验生活是不是看一看就是体验生活？实际上有人见了生活并没有体验。体验生活要用心去领会，而且还要积累生活。艺术创造，关键是用真诚的激情来写，艺术不仅仅是才华、机遇，更不是仅仅用技巧，而是来自真情。这种真情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深刻的感受。

我写第一部故事片的插曲是《带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剧组找到我很高兴。当时电子琴、吉它很流行，而别人说我是玩这个的老手。剧组跟我说：“一定要写好，只能成功，不能成仁。写好了整个电影界的门都对你打开了，写不好也不是关上，只是再写就难了。”可是我一看本子，我就有种茫然所失的感觉，主人公刘杰是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带着对人民的感情同敌人斗争。有人说：他跟《追捕》里的“杜丘”一样，写一个“啦呀啦”就行了。可我想这种工农干部抱着吉它唱“啦呀啦”怎么行，总还是要写个符合他这个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曲子。我怎么来写这个曲子，如果要写活点，赶时髦用流行的唱法最好，最好带点摇滚。但是这个人物、这个题材、这个故事不能是那样。主人公在人生关键时刻，放弃的是自己，想的还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至死不渝的理想。如果玩闹一下，你理想你的，我玩闹我的，就亵渎了主人公。当时兴不要讲革命、国家、人民，讲点爱

情啊、花啊、草啊，不要用二胡等土的东西，来点电子琴、电吉它，来点洋调。可是这一切对《驼铃》都不合适，要符合这个人物，就要用点民族调，需要用点二胡之类民族乐器。但这样的话很可能走不红。这首歌的歌词是：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撒下一路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不负人民养育情。战友啊！战友！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

这首词实际融进了我个人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家、有多少次的分别，我的16岁的小妹妹去农村了；我的父亲是名优秀教师，被逼死了；我母亲也是优秀教师，被送回老家农村了；我也被送到农场。原来是那样一个温暖的家，突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一样分别两样情”，这种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默默无语两眼泪”，不愿意说，不愿讲的话，那个年代人们都有深深的伤痕。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这首歌，不是这首词多么美妙，而是她真挚的感情使人们找到一种共鸣。写完后，有的同志听了以后说：你的歌是感人，听了以后真想落泪，但是你这样写太不划算了，写一个影片歌曲是一个机会，你再也不弄个《潜水姑娘》、《太阳岛上》，那就亏了，现在那些东西很时髦。我再三考虑后，觉得父亲、老师从小教育我要真诚，如果要真诚地写这首歌，只能这样写。土点就土点吧，要洋等有机会再洋。结果效果非常好。后来，电台催我搞专题节目，我说哪有那么多节目，够不上一个专题，不就是《太阳岛上》、《潜水姑娘》、《飞翔的小鸽子》啊。他们说：最近最红的《驼铃》（影片《带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也很好啊。我问：什么？他说：《驼铃》。我实在没有想到，那时《驼铃》和《牡丹之歌》是群众点播最多的歌，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低估了普通群众对艺术的欣赏

能力，我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件事对我是深深的教育，在创造过程中不能追赶潮流，也不能贪图什么出风头。创造也像其他做人做事一样，诚诚实实地去做，认认真真的去做，只要你辛勤地去耕耘，我相信会有一个丰硕的秋天。

我再谈谈《少林寺》歌曲的创造。河南的同志找我写有河南味的插曲，歌词顺利通过了。接着我开始谱曲了，我当时写的是河南味，写完后导演问河南的同志怎么样，河南的同志说行。过了一天，我找导演说《牧羊曲》我想改改，导演说：重写？谁说不好？干嘛重写！我只是想写得更好一些。因为原来的曲子有豫剧的调，河南味挺足，可是除了河南人又有多少人对河南的风格那样熟悉呢？况且这是个香港的片子。这是其一。其二，所谓民族品格在河南集中体现就是豫剧，中国戏剧形成就是四百多年，一千多年前豫剧还不知道在哪呢？而这部片子反映的却是唐朝初年的事。其三，恢复历史原貌也不行。如果写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曲子，专家说这纯系唐朝出土的东西？可今天老百姓听了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圈，一个是必须符合剧情，让人们今天看到历史是那么回事，同时又得让今天的人能接受，我们也能接受，又得符合历史，符合现在。这样一个圈套一个圈，给我留下的余地太小了。我想尽可能几个方面都照顾到，同时使它有一种质朴的感觉，后来我写了新的《牧羊曲》。这也是音乐与人生，因为这并不那么轻松。当我写出来感觉不错，别人一片赞扬的时候，当我承认他是一个亲生孩子的时候，我把他舍弃再重新来一个，该面临着多么艰苦的选择。这需要有一种勇气，需要一种远见。

后来，我连着写了四首歌曲，有一首是影片《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剧组原来要求我写爱海洋的歌，要写公海上的民族，不要听出来是哪国的歌，就是海员们传唱的歌。后来我想来想去，还是写人对海洋的一种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爱字，但是说来说去都渗透了一个爱字。爱什么呢？爱母亲、爱童年、爱生

活、爱祖国、爱未来、爱大海。这首歌词，有些词作家认为平白、不雕琢，其实它是非常精心的雕琢，以至于把它的痕迹也雕琢掉了。我想在蹲牛棚时，我想叫妈没有人当我妈，我热爱着自己的祖国，有人却说我是“反革命”，无法辩解。后来我跟院长说：当时你的学生是“左”派、是党员，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们喊着那么高昂的口号，现在这些人都到国外去了，有的给资本家打工，有的赚钱发财，我这个“反革命”还在这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呢。我这种始终不渝的“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身旁”，即使是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我也是始终没有忘记，“就像妈妈一样，总在我身旁”，这是对祖国、对信念自始至终的一种真挚的爱。最近，我去台湾访问演出。今年台湾1500所小学举行歌咏比赛，必唱的一首歌就是《大海啊，故乡》。我很感动，在台湾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这首歌。对每个热爱母亲、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会在这里找到真挚的感情。我感觉到音乐有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当人们唱黄河，也包括唱“大海是我故乡的时候”，人们的心是相通的，她可以跨越海洋，跨越空间，可跨越许多平常生活中难以跨越的距离。实际上音乐与人生是相关的。

我再讲讲《红楼梦》音乐的创作。《红楼梦》的音乐创作很难。导演、编剧、服装、道具，《红楼梦》里都有根据，什么人物、什么性格，干了什么事、穿了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住什么房子，《红楼梦》里都有，真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但是没有一句调调、旋律。所以别人都可以再加工，而我只能无中生有。而且男女老少读没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贾宝玉、林黛玉，大家都有那么一个形象，千差万别，这就给我造成一种困难。我在中学就看过《红楼梦》，我觉得读《红楼梦》的过程就是体味人生的过程。林彪垮台后，我的“反革命”帽子也没了，我再次读《红楼梦》，我从《红楼梦》中体味到中国人的思想、传统、喜怒哀乐、恩恩怨怨，体验到许多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当时

有人建议按流行歌曲来创造，现在香港管它古代片、现代片一律用电吉它，流行什么就上什么，听着好听就行。这倒也是一个简便的办法。可是我一想，这是中国的历史名著，没有历史的感觉怎么能行？但是，历史的名著毕竟是 80 年代拍的，没有今天的这种时代特点，又怎么可以？同时，又要符合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必须写得深刻，可是，你面对的观众是从 5 岁的小孩到 80 多岁的老人，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的文化比较低的人，不考虑到这么大的观众面又怎么可以？一到动笔的时候，真觉得没胆写了，不知道怎么写了。我想了很多很多，后来我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写好，我不能流行什么就写什么，别人骂我行，不能让曹雪芹骂我。如果曹公有灵的话，他会说这小子还是认真写了，就行了。这是其一。其二，它的基调是什么，我觉得既不能是曹雪芹，也不能是我王立平，要用 80 年代的感觉重新解释《红楼梦》。想来想去我概括为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这感慨既有曹雪芹的，又有曹雪芹笔下许许多多不同命运的人物的。这些惆怅，这些感慨也是今天的人们把他搬上屏幕重新改编的意图。1987 年《红楼梦》演出后，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

最后，我想讲讲改革开放——充满着春天的气息的现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许多希望、机会，但也面临着困惑，有许多挑战，甚至有许多的无奈。文艺界的状况是喜忧掺半。现在有些词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的人看不懂，不知道他说什么，书也是这样，仔细读也读不懂；还有些句子我都懂，放在一起我就读不懂了。有人说，读不懂的时候，就说：嗯！很深刻。现在在艺术上假冒伪劣特别多。前一阶段，有些人批评追星，追星的主要是中小學生，包括部分大学生，让我在报纸上也抨击一下追星。我说我不抨击，这事怪不着孩子们，有些人为了赚钱就是要制造这种气氛。比如有那么一个名字是两个字的香港歌星，来京后票价卖到几百块钱，哄着孩子们把压岁钱都拿出来了，然后跟父母哭着

喊着去买票。我看那个歌星要说长得漂亮，在座的比他漂亮的多得是，要说唱歌又五音不全，我还没有听他唱准过。可就是这样来了一番包装，不仅在香港包装了，我们共产党有些官员也稀里糊涂去包装他，包装以后给谁看呢？给你们，骗孩子们的钱。孩子们真追星，让我们来批评孩子。当然，我也要说说孩子们，你们自己要凭着自己的知识、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品品好坏，有些人恨不得让你们糊涂点才好呢，这样他们可以左右你们，让你们给什么就喜欢什么，最后那些人赚钱。

我们这些作曲家收入很低，《太阳岛上》给我稿费 15 元，《带手铐的旅客》也是 15 元，《飞吧，鸽子》是 3 元钱，诸如此类的事也是很很不合理的。现在，有些人把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用来赚钱，确实亵渎了艺术，而且扭曲了艺术在人们心中的位置。现在某某人唱两首歌，真就值 7 万、8 万元钱？我听了感觉真不值那么多钱，特别是中国老百姓还有不少人没做到丰衣足食，国家还穷，文化水平普遍还不高的情况下，花那么多钱接受那种包装，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之所以能做这种包装，能赚那么多钱，是有人起哄，也总有人愿意掏腰包。大家去欣赏艺术，并不一定花钱多的艺术就是好艺术，而有些艺术，质朴的艺术倒是不需要花多少钱的。

我认为现在的艺术最大的缺点是浮躁，这个时代充满着浮躁，这种浮躁是人们的短视，短期行为，没有长远观点，什么都是一次性的。当然像一次性塑料饭盒，刚开始我很心疼，后来想想传染了肝炎，不合算，我也赞成了。可是什么都是一次性，袜子穿一次扔了，歌听了一次不要了，这是不对的。文化艺术不是短期行为，艺术、文学、文化还是要沉甸甸的，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老祖宗。

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政治等。但是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台湾青年，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比我们大陆的学生看得更重。我觉得不能对我们的祖先采

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有些东西确实是糟粕，应该批判，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首先应继承，然后再取舍，如果什么都不继承，还谈什么取舍呢？不管学理科、工科，应该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素养。

现在，我们面临着浮躁的状况，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这种诱惑，这种诱惑可能是走捷径的诱惑、成功的诱惑、名的诱惑、利的诱惑。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选择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最后，我想起我写的一首歌词，这段歌词叫《十字路口》，我们面临着分配、工作、交朋友，这些都是十字路口，每天都遇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要有自己理智的、明智的、不悔的选择。这首词本来是写交通警察的，我在此泛指了——

常站在喧闹的十字路口，顾盼着人生的前后左右，有的人以这里做为起点，也有人把这里当成尽头，有的人从这里分道扬镳，也有人到这里重新聚首。啊！十字路口能容四季风雨，还有那八方来客，啊！十字路口能走千乘车马，还有那万众人流。东南西北，红灯绿灯，毕竟有先有后。人各有志，志在四方，总有到达的时候。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童志军

【编者絮语】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听到王立平先生早年创作的歌曲时有何种感受，作为在八十年代初期度过大学生活的编者，常常地感到，王先生创作的音乐已与编者的大学生活、青春年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好的音乐，无论是严肃的还是通俗的，总是表现了时代的审美理想，因而也成为时代的表征之一。

周韶华 湖北省文联主席 著名画家

中西美术纵横谈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美术方面就发生了“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两大论战。这两大论战持续至今，今后还可能持续下去。就论战内容而言，今天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来认识，主要存在两个误解，而且又有正负面之分，因此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

一方面的误解：以康有为、陈独秀为代表，提出打倒“四王”（清代四位主要的代表作家，因都姓王，故称“四王”），主张美术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鲁迅提出拿来主义，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国。

此派主张彻底引进。清代“四王”从思想、实践统治整个画坛，此风延续下来，以传统为本位，主张完全崇古时尚，认为中国古典的国粹是最美的。而激进派则认为“四王”的作品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已经完全不能反映今天的时代了。时代要发展，就要彻底地“拿来”，引进西方的美术，整个美术体系都是这样的。后来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画家，如徐悲鸿、林凤眠、李可染、傅抱石等。他们在其艺术中既保留了传统内容，又突破性地借鉴了西方的东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激进派的观点的正面意义在于：为美术带来了革新，带来了发展，其负面效应是对传统持一概的否定态度。

另一种误解：认为传统就是国粹。

八国联军瓜分中国造成国人在心理上有一种对外域文化的恐惧感，完全抵制外来文化。认为中国三大国粹（中国画、中医、京剧）发展是最精彩的。这是不能否定的。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派或中统派。民族文化保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在文化上发生断裂，这是这派的正面表现。时代不断发展，当今大文化发展跨时代的变革是自然潮流。这也正说明了传统派的观点保守的一面。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下产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孕育的中国传统水墨画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的文化背景是农耕文化，而现在已是工业文明时代，文化观念也应该产生一个跨时代的变化。中国文化应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因为农耕时代，艺术的存在形式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或是一些文人画。传统文人主张艺术与生活离得越远越好，导致绘画长时间地远离时代的步伐，与艺术要反映生活这一主旨疏远。

艺术反映生活，折射现实。初期，画家起步艰难，以至闹出了笑话。很长时期，国画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情不符合。从历史角度看，这显现出艺术、绘画的保守性了。为开创新的局面，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探索，有些画家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也做出了成就。齐白石等人坚持传统的正宗地位，在其基础上向前发展。这就使近代几大家比古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古今贯通、中西融合，这是我的观点。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风采，另一方面要同全世界进行交流，沟通感情。艺术语言应该国际化，相互沟通，这样才能从东方文化圈进到世界文化圈。从大文化的观点看，就是要在工业文明时代探索新的东方艺术，而不是以古典文化服务于现代。

前不久，我在《建构新东方艺术的畅想》一文中，提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新的文化复兴应是一个崭新的东方文化。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这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历史上有过彩

陶文化、青铜文化、汉唐雄风等代表时代意义的文化，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理性目标，建立新的东方文化。

有明确的理性目标，全身心地投入，是成就事业所必需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一个投入问题。一个人要想成功，要想成为一个实业家、艺术家，没有一个理性目标和全身心的投入都不可能实现。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精神富有，精神上的富有就是人的知识、文化、阅历，这的确是一个很艰苦的奋斗过程。就行万里路而言，近期我的新疆之行行程两万多公里，粗线条地在南疆、北疆、天山上下观览。至此，全国的主要的地区、名山大川我都已去过，如东北的长白山、青山角；西边与邻国接壤地区；南边天涯海角，还有台湾等。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我还到达过海拔六千多米登山队的大本营。亲身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亲身体验，自己的思想、心灵、艺术灵感都无法活跃起来。总是抄袭古人、临摹古人是因为没有亲身体验，没有自己的感受，画是画了，但心中无主，离开了画本毫无办法。

没有一种事业心，没有一种目标意志，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就难以做出成就。无论干什么事业，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就不可能达到自己所理想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建构新的东方艺术。

仅有这个目标，问题并没有解决，除了投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双向投入以外，还要很好地解决艺术上的难题。要有解题方案，明确难题是什么，解决方案要达到什么目标，对这些都要十分清楚。

就古今关系而言，茫茫苍古、广博今朝之中首先要找到一个问题点；中西方融合过程也需明确融合的突破口，否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解决难题的方案，对一个画家来说最主要的是解决艺术语言问题，如西方近百年，特别是自从印象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变革幅度巨大。印象派是从色彩上突破的，以前画家用色彩

黑是黑，白是白，与平常视觉相同。而印象派将光、光的色彩融入绘画，在光线不同、角度相异的地方用不同的色彩表现，导致一场绘画的变革，其艺术语言是从色彩上突破的。后印象派认为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不能做色彩的奴隶。艺术表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艺术应该是人的生命的投影，是人的情感的倾吐关注。作品中要看到人的情感、人的表现，而不能做色彩的奴隶，色彩应该表现人的生命、情感和爱。凡高的作品其色彩表现了一种炽烈的爱，虽然他的生活很痛苦。他曾说过：“要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对人类的永恒的爱给人民，让他们在欣赏作品时得到一种快感。”后印象派的色彩解放，为以后各流派的林立充当了先锋。

我的解题方案也还是离不开解决艺术语言的矛盾，中西艺术、绘画的融合难题在于中西艺术基础语言符号的矛盾。就我个人而言，是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画的基本结构是点线构造；西方绘画总的来说是块面构造，讲立体感。中国绘画的点线非常美，点线的运动，各种线条（水平线、垂直线、抛物线、波浪线）构成中国绘画的最基本语汇。我将点线与块面融合，使块面运动起来。因为写意文化充满了一种流动感，而块面构造含有一股逼人的力量。中国画由其特有的软性画创造了写意文化的动感，而大的块面产生的力量、力度，在大型展览中，往往后者更能比出中国画的“软”。因此，要解决挺拔、雄伟的气势，就一定要借鉴西方的块面。再者将中国的点线放大为块面，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以往的中国绘画通常是单因子，我认为现代绘画应该是多因子的复合构成，要能找到统一，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二是中国的水墨与西方色彩的融合。从历史上看，这也是一对矛盾，唐代重彩的绘画极为辉煌，但水墨画占主体地位以后，极少使用色彩。就色彩本身而言，极富表现力，表现了一种情调、情感、音乐感。我认为把色彩引入中国画，会使国画发生一场革命。三是中国绘画结构与西方构图的结合，中国

画构图较西方而言，是一种平面感觉，没有一种张力、一种视觉的冲击力。我的构图法则是以诗布局，以诗和力为主导，采取铺天盖地的方法，由一个视觉中心点向四边辐射、延伸，从而产生力度，产生博大的感觉。

对中西艺术在语言上相融合的这一问题的实践，我是这样实践的。问题究竟是否完全解决还不能确定。在创作过程中，矛盾还时常出现。传统文化是永远不应该去掉的。中国以书法入画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是很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在使用色彩时，表现块面时都不能忘记书写情。

今天跟大家讲的，可能给大家有启发的就是一个人的事业要成功，首先要有目标——明确坚定的理性目标；其次是找到难题，确定解题方案，全身心地投入，把事业做为自己的第二生命，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就会成功的。没有文化也可以变为有文化，从低水平到达高水平。我个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一个好的身体也很关键。咬定青山不放松，认定了，就这样走下去，千难万苦不回头，事业就可以获得成功。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何炳华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韩石山 山西省作协专业作家

作家的训练

[在山西大学讲演]

一、训练的必须

这里所说的作家的训练，不是单指写小说，也不是单指写散文或写诗，是指一个作家的全面的训练。他可以有专攻，有偏废，那是他的志趣在此不在彼，绝不是说他能此不能彼。

作家是否需要训练，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有分歧的。好些人认为，作家靠的是天赋与经历，粗通文墨就行了，古今中外许多有名的作家并没有多高的学历。然而，真正熟悉文学史实，对创作的甘苦知之较深的人，就不会这么认为。训练有素的作家与未经正规训练的作家是不相同的，有全面训练与只有片面训练的作家也是不相同的。特殊情况例外，对于绝大多数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正规而严格的训练，绝对是事业成功的坦途。任何取巧的办法，比如求高人指点，靠自己的悟性，在生活中的磨炼，纵然侥幸成功，也只能说是“傍门左道”。上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多成不了作家，不等于作家连大学也不必上了。

训练的重要性，在新时期这一茬作家身上看得最为明显。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起初是思想解放的先导，社会正义的呼声，后来才日趋归于文学的本份，为大众提供

了虽不丰富但也还差可人意的文学读物，同时仍未忘记先前的职责。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文学也就肩负了特殊的使命，这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学的特色。

新时期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新时期作家的淘汰之快，也是其他时期所罕见的。对文学稍为关心而年龄又稍为大点的人，都会记得，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每年的短篇小说评奖，都要推出一批新进作家，除了极少数能持续地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外，大多很快就烟消云散，不知所之了。当时有人仿照清人赵翼的诗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语虽刻薄，却不能说不是实情。

不能责怪他们不知轻重。十年之久的动乱，耽误了他们的学业，匆遽而降的社会责任，不给他们从容的准备，仓促上阵，来不及整理身上的铠甲，也来不及磨砺手上的刀枪，只能绰起最便捷的家伙，作最痛快的厮杀。已然完成他们的使命，便去做他们更其胜任的事情，将练就的本领留作业余的欣赏，自不必和文学这刁钻的姑娘作长久的厮缠。站在文学这边，我们可以望洋兴叹，他们在“洋”那边也有他们各自的欢愉。这是彼此的理解与旷达。然而，也可以肯定，总有那么极少的一些人，清夜扪心，会有一丝失落的哀伤。或许他们会责怪自己当初缺乏坚持下去的毅力，不，这回他们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不是毅力，更多的是他们缺乏一个作家必具的训练。

作家的训练，我认为应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训练，即文化知识，心理素质，人生体验（含思维方式）和写作技巧。

先谈文化知识的训练。

二、文化知识的训练

长期以来，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上甚至文化界，有一种偏狭的观念，认为当作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文化知识，只要

文从字顺，有生活积累就行了。高玉宝不是连书都没念过，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吗？陈登科初学写作时，遇上稍为繁难些的汉字不会写，要用图画符号来代替。沈从文该是一代名家了，就没上过中学。外国的，有高尔基、马克·吐温等。新时期以来，好些插队知青成为作家，都是高中或初中学生，也佐证了这种看法。

不可否认，这都是事实。但绝不能作为通例。他们之中，有的确实天分极高，有的是凭自学得以补偿。就是那些天分极高的人，也绝不是全靠天分，必然在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身的文化知识。反过来说，倘若他们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绝不会成为他们事业的障碍。

看看 30 年代中国文坛的情形，或许会对我们有些启发。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文学的高峰时期，如先秦即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人们的文学意识还不强，但《庄子》、《孟子》及《论语》中显示出的文风，足以师法后世。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魏晋风骨至今仍为人们所钦仰。再一个便是本世纪 30 年代，也即新文学的成长时期。我劝喜爱文学或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务必浏览或研读 30 年代名家的作品。科举时代，研习古文的人，讲究“书不读秦汉以下”，意思是要真正汲取古文的精髓，必须从先秦诸子入手，比如学《庄子》的恣肆，学《孟子》的雄辩，学《论语》的儒雅。而研习 30 年代名家的作品，则是从事白话文写作的津梁。一个人不熟悉 30 年代的优秀作品，而要从事创作，就会不得要领，没有根底。

30 年代的作家是个什么状况呢？

简单点说，他们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后一代传人，又是外国新文学在中国较早的传播者，也可以说是接受世界新文化的先驱者。这批人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小时候熟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年轻时又纷纷出国深造，对西方文化的源流知之甚详。可说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能各自广有建树，造就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今欧美和日本的名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博士，大学教授。我国的文学，眼下还处于一个不太高的水平上，究其原委，与这一代作家大都学历不高不能说没有关系。

三、心理素质的训练

常听人说，作家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这话猛然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好比说国家主席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一样不容反驳。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不一定全是这么回事。

理由很简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立。你得想跳，才能跳起来，才能跳得高。你老趴在那儿，也就别怪人家把你当条狗。同样的，你得想当作家，才能成为作家，若连想都不敢想，一辈子也当不了作家。公允点的说法应当是，想当的未必能当上，而不想当的肯定当不上。

这话显然不能服人，且看另一种解释能不能说得通。

意大利有个大文艺理论家叫克罗齐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艺术的直觉，我们和那些大艺术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多些，我们的少些。平日里，朋友间常会这样说：“你这人还有点艺术细胞。”我们不是也往往会为自己的一句俏皮话或一个美妙的构想而暗自欣喜吗？

还有一种情形，我们常常因为羞怯，有意无意地抑制了自己的艺术才能，扼杀了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欲望。才能如同酵母，只有给以环境和温度，才会发起来。谁也不可能是十成的天赋，有那么四五成，加上后天的训练，足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了。古人说的“功以学成”，正是指此而言。

当作家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就是心理素质方面的训练。

怎样训练不好说，把训练要达到的目的说明白，怎样训练也就清楚了。也即是说，什么样心理素质的人，最容易成为作家。

这就要说到作家这个职业的特点。各种说法多得很，有的说

是心灵的使者，有的说是在感情世界里探险，有的说是剩余感情的发泄，有的说是个人的自诉。我的看法是，将自己的灵魂坦露给世人。佛家说一花一世界，实际上，真正可以和世界的广大繁富相比的，只有人的思想或者说是人的灵魂。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优秀作家，而任何一位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能吸引甚至倾倒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就是因为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展示了一个无比广大繁富的心灵世界，可以让你尽情地浏览，尽情地感知。

这样一说，就知道哪些人不宜于当作家了。那些自我封闭的人，那些常是心怀鬼胎而又不愿为人所知的人，那些思想僵化，只知以别人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绝然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人，那些只知紧跟别人，离开别人就不会行走的人，都不宜于当作家。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敢将自己的灵魂坦露给世人。

需要解释的是，常“心怀鬼胎”不要紧，只要你愿意叫人知道就行，而愿意叫人知道的“鬼胎”也就不成其为“鬼胎”，只能说是思维敏捷而又心地坦诚，反倒是优秀品质了。其余的几种人，只是说不宜于当作家，并非说不可以在别的方面建功立业，比如说他可以当一个合格的厂长经理，或者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知道什么样的人不宜于当作家，也就等于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成为作家，也就等于知道作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了。

人是要有点自信的。我就是靠了一点自信，才混上文坛的；你说是小人得志，我也认这个帐。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多被理解为要看清自己的缺点。实际这句话是中性的，也包括看清自己的优点。在“文革”期间，我入不了党，当不了官，娶不下老婆，发不了财，苦苦读书 17 年，就会写一手好文章，要是连这么点自信都没有，还活在世上干什么？

上苍生人不易。一个人从怀胎到出生，七灾八难不死长大成人，父母养育，师长教导，不干点正经事，岂不太窝囊太冤枉。虽说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挂，可这中间几十年你总是衣衫裹

着臭皮囊，总得讲究个体面。要体面就得有一番作为，要想有作为怎敢失去自信？

说自信还有点笼统，更具体地说，人要有自我豪迈感。党和国家常提倡我们要有民族自豪感，我们的民族是由 12 亿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没有自我豪迈感，民族自豪感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这个民族也就真的成了万劫不复的劣等民族。有了自豪感，还得会自我欣赏，否则你就自豪不下去。大家都自豪了，谁还顾得上你的自豪，因此，要会欣赏自己。平日做件漂亮事，说句漂亮话，甚至做个漂亮的小动作，都应当暗自欣喜甚至沾沾自喜才是。

四、人生体验的训练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过分地强调社会阅历对作家的重要，好多人认为自己所以成不了一个大作家，是因为自己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或是局处一地，或是生活安定，未经过大的波折与磨难。曹雪芹所以写出《红楼梦》，是他从小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与那么多女孩子打过交道，中年后穷困潦倒，发愤著书，才写出那样一部传世之作。海明威所以写出《丧钟为谁而鸣》，是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生入死，身上多处受伤，感受极深。具体到这两个作家，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对他们的成功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若要举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如果只须举例来说明，也可以举出许多阅历不太丰富而成了举世公认的大作家的例子。比如福楼拜，几乎老是住在乡下的住宅里，很少去巴黎，却写出了《包法利夫人》这样的名著。福克纳一生都住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是一个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地方，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代名家。普鲁斯特只活了 51 岁，终其一生，可说是在病榻上度过，然而，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横溢的才华，仍完成了煌煌几大卷的《追忆逝

水年华》。

仅以这样的个案来争辩，近似于抬杠。公允的说法应当是，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作家是重要的，但它绝不是一个作家成功的前提；较之丰富的社会阅历，敏锐的体验与深邃的认知更为重要。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社会阅历，丰富与否只是相对而言。对一个有心人，不太复杂的人生活活动，也可能产生无比富丽的人生体验，对个莽汉来说，纵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在他的心头也只落个一片茫然。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就社会阅历而论，绝对是至理名言。

为了扩大人生的视野，一些作家走出书斋，走出自己生活的地方，寻找题材，增加自己的人生体验，诚然无可厚非；为了保持心里的宁静，为了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有的作家远离尘嚣，逃避繁华，“躲进小楼成一统”，也无可非议。我们只能评说他对所写的题材熟悉不熟悉，把握得了把握不了，最终写出了怎样的作品，不必去追究他究竟是不是个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

《红楼梦》上有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说是对人生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最简捷的概括。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散文剧本这类样式的作品，人生体验的深刻与否，是至关重要的。曹雪芹所以写出《红楼梦》这样的惊世之作，有那么丰富的封建大家族的生活阅历只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对其中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那么洞明，那么练达，才是成功的保证。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认识。两者有关联，却绝不是一回事。艺术真实，是以生活真实作参照的，但它本身绝不等于生活的真实。法国著名作家兼传记文学家莫洛亚在评论普鲁斯特时说，“真正小说式的东西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而是在真实的世界与虚构的世界二者的差异之中。”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要是叫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这

样的作家说来，则是绝妙的艺术只存在于他们个人的头脑中。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纳博科夫就说过这样不客气的话，“世上只有一个文学流派，那就是天才派。”有他那样的才气和成就，你也得承认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体验与思想的升华又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对人生有深刻体验与认知的作家，必然会进入思想的层面，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对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独特的表达。说作家应当是个思想家，是对作家的恭维，也是对作家的苛求。思想家比作家要伟大得多。作家可以成为思想家，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家合格与否的标杆。不过，一个卓越的作家，他的思维方式总异于常人之处，要不怎么能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

一般人考虑问题，多是顺向思维，你什么好，他就说这个更好，人云亦云，向无定见。这多少年，人们的思维总是过多地受政策的引导，形成某种定势，就是一般的作家，也很难摆脱这种束缚。比如说，农村的政策变好了，农民的生活开始变好了，一般浅薄的作家，就写农民怎样进城，怎样照像，怎样要跟城里人比阔气，又怎样张扬了人格，怎样鄙弃海外归来的财主，表现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一个人吃上几顿饱饭，其长进就这么快吗？有作为有节操的作家，总是既写了眼下农村的变革，又写出了几千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历史，在当代农民身上的印痕，心头的创伤。这绝不仅仅是写法的问题，乃是一个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是否进入了思想层面的高度。

再如，有人将这次文学的复苏，归之于政策的英明，感恩戴德，不胜惶悚。我以为，可以这么看，也可以不这么看。说可以这么看，因为这是实情，没有对极左路线的清算，没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就没有新时期的文学。说也可以不这么看，则是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文学本来就有它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先前没有，是过错，是罪恶。就像一件物品，本来就是你的，被人夺去了，如今又还给你，能说这是他给你的吗？有

些 1957 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20 年后平了反，感激涕零，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怎么就不反问一声，当初凭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又凭什么 20 年之后才平这个反？

这里举这几个例子，意在说明思维方式对作家的重要，究竟对这些问题该作出怎样的历史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了。我的意思只是说，对人生体验的训练，最终应上升到思想的层面，要不你的认识就不会深刻，就不会精辟。

五、写作技巧的训练

这是初学写作者最喜欢听的一个题目，却是懂得点为文之道的人，最不想谈，也最谈不好的一个题目。因为你怎么谈也不能谈他个条清缕析，确凿无疑。你说简练好，有繁杂也很好的，你说平淡是一种境界，有绚烂也达到一种境界，且是更高境界的。各种情形都谈到了，又等于啥也没谈。给明白人不用说，给不明白的说了还是个不明白。

不过，我还是想试试，看能不能说得稍为明白些。

中国古典文论是个宝库，许多见解极为精辟，其中有个文气说。最初是曹丕提出的，韩愈又作了极好的发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意思是文章的好坏，全看作者的心气。韩愈的发挥见《答李翊书》，他将气又形象地比喻为水，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苏东坡又在这个基础上，作了更为生动形象的说明，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不可不止。”这就等于连一篇文章的开头结尾，怎样行文都说了。对如何行文，古人有个比喻，仍是借助于水的，叫“随物赋形”，意即流到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

说来说去，只是一句话：会写的怎么好怎么写，怎么写怎么

好。跟不说差不了多少，关键是那个气就把握不住，比喻为水也是枉然。

点透了一下子就能明白，这儿的气，完全可以理解为心理素质，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心理素质时，实际上已将天赋包括进去了。所以将心理素质讲得那么多，正是这个原因。

有天赋，有学识，心理素质必然好。克罗齐说：直觉即艺术。直觉好，自然就知道怎么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

这么说不成了一切跟着感觉走了？没错，就是这么个理。笔不会写字，是手抓住笔写的，手上没有思维神经，是脑子指挥手动弹的。这里的脑子，我们平常说是心。心里觉得怎么好，在你来说，怎么就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写出自己认为好的文章。

至于公认好与不好，那得看你的感觉对头不对头，也即是说你的艺术直觉如何。不行，若是天赋不足，那就没救；若天赋还可以，仅是训练不足，只有加强训练，舍此别无他途。

这么说就没技巧了？

有。各种介绍文学常识或写作经验的书上都有。只有方法归方法，运用之妙，本乎一心——又归到心上去了。

不过，我仍然认为，那些前人或今人总结出的写作技巧，还是要学习的。宁可学了用不上，也别用了不知道，自个好都不晓得好在哪儿。自觉总比不自觉强，知羞耻总比不知羞耻强。

有些大作家常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技巧，自己的书里也从不用什么技巧。看似很谦虚，很诚实，实则是撒下弥天的大谎，欺世盗名，自欺也欺人。自欺可，欺人则不可。我们就是再糊涂，还不知道你上过小学、上过中学吗？既上过中学老师能不讲些作文技巧吗？莫非你真是石头缝里蹦出的孙大圣？我们就是再没文化，还不知道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天衣无缝，自然天成，鬼斧神工这类耳熟能详的陈词烂调吗？你不过是你全是爱国爱民的赤诚，不经意间就写出了天衣无缝的宏文巨制罢了。我们那

么尊崇你，你却将我们当小孩子玩耍，良心何在？

鲁迅也说过绝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书的话。那是他认为这类书大都不得要领，劝年轻人别误入歧途，不能作为他本人不相信写作技巧的依据。事实上，他的小说，他的杂文，都是很讲究技巧的。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探讨中国小说写作技巧源流的著作。而《答北斗杂志社问》、《不应该那么写》等，则是专谈写作技巧的文章。

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鲁迅引用一位俄国作家的话说，应该怎样写，必须从大作家们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而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最好是从那同一部作品的未定稿去揣摩。只是这类稿本，除了研究者，一般读者很难看到。近几年，有些现代文学名著出了汇校本，校勘者将不同版本文字的差异汇集在一起，除了个别文字的讹误外，大都是作者的精心修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家怎样玩味文辞，使之更为妥贴。我看到的有李劫人的《死水微澜》，还有钱钟书的《围城》。

任何艺术，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一个是艺。比如绘画，怎样运笔，怎样着色，是技；而画出风骨，画出境界，则是艺。对写作来说，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一般规律，可称为技，而写出氛围，写活人物，就可说是艺了。技精而进乎艺，一方面得益于训练，一方面还得看你的天赋和心性。就是心性，也还有个培养的问题，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也就是一种心性。

具体的写作技巧，这里就不谈了。“风行水上，自然为文”，这是文的本义，也是文的最高境界。一切艺术，再没有比本其自然更为可贵的了。这里的自然，不单是指写法，而是内容与写法的和谐一致。现代派作品中那些古怪的题材，奇异的心理，也要写得自然才好。

写作，作为一门艺术，其难度其最高境界，与物理学、数学等尖端科学理论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我的一位搞理工的

朋友，看过《围城》之后，赞不绝口，说这本书达到了人类智慧眼下在文学方面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这样的评价显然比文学界的那些评价，要精辟得多。一个优秀作家，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较量，看你的智慧有多高，看你能不能把你的智慧推到一个极致。

六、人生的一种修炼

爱好写作的年轻人，都想把写作当作事业，甚至是终生的事业，生死以赴，务期实现。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就应当有强烈的事业心。但人人成功，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成功者毕竟是极少数。

古代的文人，把著书立说当作“名山事业”，孜孜以求，到老方休，而真正做到的能有几人？到头来，大都是长叹一声，饮恨而歿。

我倒觉得，别把文学创作看得那么高，那么神乎其神，要以平常心待之。

这样还能写出好作品吗？

能。

文学是艺术，艺术创造讲究的是心境。看得太崇高，太神圣，必然竭心尽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必然心浮气躁，难以求得心境的平和，反而欲速则不达，妨碍自己的创作。以平常心待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怨无憾，更能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

人生是一种磨难，不妨把创作看作人生的一种修炼，修炼你解脱磨难的本领，实现你历经磨难的价值。

当今不少年轻人，一发现自己有写作才能，便急不可待地要从事写作，想尽快地写出传世之作。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过是像钱钟书在《围城》的前言中所说，“我们常把

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实际上，写作的冲动和写作的能力往往不是一回事。

在这方面，古代的作家们要从容得多。作家，是现在的叫法，过去只叫读书人，现在习惯上也还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叫法实在好。最初的读书，或许只是为了求取功名，如愿以偿或彻底绝望之后的读书，则是一种日常的功课，也即一种人生的修炼。永无尽期，死而后已。现在的文化人，将自己的工作室称为书房，好像是写书的房间，在过去，那意思是读书的房间，或是放书的房间。在过去的文化人看来，读是根本，写是余兴，写是势利的，读才是高雅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高雅二字不知坑害了多少过去的读书人，使他们满腹经纶，而身后片纸不存。殊不知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中少数杰出人物留下了堪称为经典的著作，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平静而又充实地走完了人生的途程，这是今天的作家无法理解的。

读书可以是一种人生的修炼，写作也同样可以是一种人生的修炼。能在这种修炼的过程中留下惊世之作固然欣慰，就是一事无成，这一过程本身，不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莫大的福气吗？

山西大学教务处推荐 有删节

【编者絮语】创造力是无法训练的，否则，我们就可以按照某种程序批量生产创造性人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创造力不需要基础训练。如果说，基础训练是“有法”，那么，创造则是对规范的超越，是“无法”。杨振宁先生说他是得到了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教育的好处。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更注重“有法”，而美国的教育更注重“无法”。从“有法”到“无法”，是飞跃。文学创造与科学创造，同是创造，其基本的原理是一致的。

周传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电影文化漫谈

[在北京科技大学讲演]

如果让我讲电影文化、电影艺术，还要先从科学技术谈起。因为电影不等同于故事片，它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人类进入 20 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后，电影也随之诞生，并不断发展到今天成为用视听语言，用光和声传达信息的记录艺术。在所有传统艺术中，没有一种艺术与电影艺术是完全相似的，它是 invented art，是工业发明的。那么电影为何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呢？在本世纪 60 年代，法国专门进行了艺术领域的研究，探讨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电影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都离不开物理学，谈光时是光学，谈声音好坏是电声学，胶片曝光是化学……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一个领域，就是科学技术，而且是高科技。正因如此，我一向持有的观点就是：电影只有进入大学，综合性大学才有发展前途。

电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有了这种意识后，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电影其本质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特点？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问题：电影可以成为艺术，但不一定是艺术，而且不是说商业渠道的影片才是电影。它在医学、地质上用途也很广。它是一门用视听语言（nonwordal language and ordio-visual language），用光和声传达信息的艺术。世界上艺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表演艺术（performance

art)、再现艺术 (representation art)、记录艺术 (recording art)。第三阶段也就是用摄影机、录音机记录下来，再用光和声再现的电影电视艺术。谈到这儿，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电影艺术家不去研究电影艺术，而是强调电影与文学有关，强调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具有文学性、戏剧性、音乐性等等，大谈“综合论”。我们有必要把电影与文学作一下比较。电影由于受 20 世纪科技观念支持，其思维方法呈现立体性、多元性特点，而文学是线性的，无法像电影一样同时带给你若干信息。电影里无文学，文学能看得见听得见吗？文字是一个抽象符号，只根据你的生活经验引起你的联想。打个比方，“耀眼”是文字符号，而你的眼睛并无刺痛感；“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听不见，你的耳膜也不会发生任何振动。文字是抽象符号，不通过学习不会懂，而电影是记录生活现象。所以说电影与文学完全不一样。一位美国教授曾经这样说：“你们电影‘综合症’ put everything into the cinema, cinema isn't the cinema——把什么东西都溶进电影，电影就不是电影了。”正是这样一种电影理论指导电影创作者，同时电影创作者又把观众这种观念培养出来了：观众只习惯于听对话而不习惯看银幕、画面上的东西。曾经有几位美国学生疑惑地问我：“你们的广告为什么是这样拍的？为什么只用文字说话，视觉上不传达信息？”我想这是问到了中国影片的要害，而美国广告一大特点就是说话不多，但信息传达量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注意电影中视听语言的运用。我们的电影是后期制作，无混响，干涩，听起来很难受。视听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很纯洁。它强调视听思维，用光和声去思维，而不是用文字语言。大家一定很喜欢看国外的广告片，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他们很善于利用视听语言，总是吸引你的注意。《第一滴血》内容不太健康，但它利用了电影的“幻觉”规律，创造出一种奇特的效果，在观众头脑中产生很强的幻

觉，使他们得到感官上的享受，觉得很刺激。这种“幻觉”处理让我们这些人很好地体会到了电影这是一种全新的视听语言。

那么，视听语言其本质是什么呢？可以这样来解释：电影的银幕形象不是在银幕上完成的，而是形成于观众的大脑中。银幕上没有运动，每个画面都是静态的，但画格连续运动在你的头脑中就形成了完整连续的画面。这是个心理学问题。现在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越来越走向视听语言。早在人类出现时就开始使用视听语言，此后，人们的视听语言逐渐衰退，但在电影电视出现以后，人们的视听语言又逐渐恢复，用得也越来越多了。这种文化普及到今天，许多发达国家已把它作为第三种语言。我曾参观过瑞典的一所小学，它的第一语言是瑞典文，第二语言是英文，第三语言就是电影。我看了后很是欣慰，感到电影艺术前途光明，是很有希望的。

其次，电影的空间和音乐是电影中重要元素。从现在的观念来说，空间是最主要的。你所表现的故事空间，其他声音是不能取消的，并要与音乐协调起来。电影的空间是一个物理空间，是光和声塑造的，是用摄影机和录音机记录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无限的，画框只是有限空间观念。从实际上讲，中国电影界空间观念很落后，我们的空间都是虚构的，而电影是记录写实的，怎样去把实在的东西表现出来，是我们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我想任何一位导演都不会拍出这样一种所谓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里求实，实里求虚；以实化虚，以虚化实；实实虚虚，虚虚实实”的影片来。

那么如何更好地呈现主题？这就需要恰当地运用电影中第二种重要元素：音乐。音乐首先要与画面结合，即 marriage。不能把观众注意力全集中到音乐上，而是让观众注意画面，让音乐来感染观众。电影界有句行话说得好：“最好的音乐就是让观众听不见。”如果观众在看电影时随着音乐节奏打起拍子，那么这种音乐可以说是创作的失败。因为它把观众注意力吸引到音乐而不

是画面上。音乐能达到一定渲染效果，也能恰当地表现主题。电影《巴顿将军》中开篇的音乐就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主题的信息：单音的号，表现他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气息的军人；管风琴的出场，表现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因为管风琴是天主教所使用的专门乐器；短笛和小鼓演奏的高亢激昂的军乐，代表了他是一位美国军人。可见歌曲必须与整篇内容结合在一起，又必须与空间里其他声音相结合，要注重真实性，要知道电影是记录生活而不是浪漫文学。相比之下，我国许多电影音乐不注重与主题的联系，不注意与空间紧密结合，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或者更像一场音乐演奏会。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位作曲家，他在给影片片尾加主题音乐的时候，要求其他什么声音也不能有，对话也不要。可要知道，一个曲子虽三分钟，但在电影里是一场戏。这位作曲家他的观念全错了，电影是记录，应真实，不能错把它当成音乐会音乐。我们的音乐用得太简单了。因此，我总在电影界呼吁，电影里任何记录都要真实，要符合时代特点。

或许在座的同学们就要问，您讲了这么多电影元素，那么演员呢？演员不是很重要吗？许多演员演一部片子的报酬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元。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电影里最重要的不一定是演员。在银幕上看到的只是演员的记录影像，在摄影师眼里演员是什么？只是道具。在美工师眼里呢？是色块。一部片子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摄影师、剪接师、美工师、录音师、创作者，最后才是演员。如果是音乐感染了观众，那么演员就应让音乐去展现，如果色彩是饱和的，那就让色彩去表演。

顺便说一句，我很不同意电影电视界中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电视观众喜欢节奏慢的”。不是中国观众喜欢节奏慢的，而是你拍不出节奏快的，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最后，我想谈谈对好莱坞电影的一点看法。大家可能很熟悉，我是反对好莱坞的。只要深入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好莱坞电影好看，但不等于是艺术。它的影片很少传达思想信息，全是

旧的、老的一套。虽然例外不是没有，但总的来说是这样。许多美国高级知识分子和学生都认为好莱坞电影是垃圾。《阿甘正传》中阿甘是个三 K 党人物，它向大家证明了什么？蠢才也是天才吗？我在德国慕尼黑电影学院讲课时正好赶上啤酒节，席间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他非常高兴地了解到中国同行对好莱坞电影的理解与他们是同样的。我曾发表过许多篇文章痛斥好莱坞电影，我很担心它最终会毁掉我们民族的电影事业。所以我很愿意到大学中讲一些影片，大学生判断力、理解力都很强，好莱坞电影是很好看，但要看其内容与实质就完全不同了。我希望你们首先提高电影文化水平，能欣赏电影学院一些当年拍出的影片，进行交流，拍出更好的片子。而且我们也只有提高观众的文化水平，提高自身制作水平，才能抵制好莱坞影片的冲击。

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这次讲座，以飨广大同学：“你对电影文化的要求高，你才会欣赏到更多的东西。”谢谢大家！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刘 佳

经济与社会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

[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一、产权改革比价格改革更重要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有两种改革思路在进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价格改革是主线，另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改革是主线。这种争论已有十五六年了。持价格改革为主线观点者的根据是这样的：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就要由市场来调节，价格应完全放开。他们根据的是 1949 年西德的经验。在 1949 年以前，西德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凭票供应，因此，西德进行了改革，取消物价管制，价格全部放开。西德虽然动乱了一阵，但几年以后经济就恢复了。于是有人根据这种经验认为，西德通过价格改革取得了成功，中国就不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经济学界相当多，曾占有优势。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西德在经济改革中取得了成就，但这种改革思路对中国是不适合的。因为两国的基本

条件不同：西德是资本主义国家，是私有制社会，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价格放开后，企业能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市场环境，所以价格放开是可以取得成效的。然而在中国，企业都是有病的，新创办的企业有类似“小儿麻痹症”的病，不灵活；老企业包袱很大，得了类似“老年痴呆症”的病，也不灵活，所以放开价格是没有用的。假使企业还处在政企不分、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状态，放开价格又有什么用的呢？只能引导物价轮番上涨。另外，西德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见效，原因之一是当时正是“马歇尔计划”实行之时，大量美元涌入西德。假如物价上涨，商品奇缺，可以用美元进口商品，这样，国内的短缺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却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面，外国也不会帮我们美元使价格恢复稳定。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当时西方好些国家在帮助西德恢复经济，但德国过去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就会恢复。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落后状态，人才奇缺，市场也不完善，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基础，如果价格放开的话，导致的将是混乱，而不是有秩序。这两种观点当时在有关会议上都曾互相交锋过。我是坚持产权改革为主线的。我认为，价格可以放开，但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价格放开后，有可能一夜之间又会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理由是，万一物价控制不住，那就会冻结物价，重新发票证。然而产权改革、企业改革的车轮是不可能倒转的。所以，产权改革比价格改革更关键，更重要。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走。后来又有人提出，为何东欧几个国家仿西德经验，把价格放开以后又取得成功了呢？中国当初仿照东欧放开物价不就行了吗？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东欧国家毕竟是小国，小国改革与大国改革是不同的。中国是大国，放开价格以后恐怕就很难控制；其二，是东欧在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全盘私有化，而中国能吗？不能，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的改

革只能走产权改革之路。国外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把放开价格的改革看作激进的改革，而缓慢放开价格的改革被认为是不激进的。这是错误的。真正有效的改革不在于放开价格，而在于微观经济基础能否重新构造，虽然，中国的改革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假如我们紧扣产权改革，那我们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所以我们不能以国外的评论为准。

产权改革的重要性，经过十来年的争论，终于被人们所认识了。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正是由于企业改革的落后造成的。要知道，价格改革，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会赞成，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到一定程度也会赞成。为什么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也会赞成呢？这是从甩掉财政包袱的角度出发的。价格放开后，国家就不再管，补贴由企业、单位负责。然而产权改革只有主张市场经济的人才会赞成，因为产权改革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政府职能必须转换，政府控制的部门的人财物大权就消失了，这就触动了计划经济派的核心利益，对这个问题，应有清醒认识。

二、失业问题比通货膨胀问题更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中国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转型任务与发展任务同时落到了中国的身上。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发生通货膨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发展初期，投资规模大，二是在发展初期，产业结构处于失调状态，所以经济一发展，短缺部门就更短缺，这就会引起结构性通货膨胀。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国家，除这两个原因外，还有转型期中的另外三个原因。一是隐蔽性通货膨胀的公开化。什么是隐蔽性通货膨胀呢？这是指：表面上物价未上涨，但实际上有钱买不到东西，凭票供应，50年代就是如此。这完全是靠严格的价格管制实现的，如果继续保持严格的价格管制，那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价格管制就要逐步取消，这样物价当然会上

涨。就如一缸水，要把一个皮球压进水里去，需要用很大的力，而手一松，皮球就起来了。所以隐蔽性通货膨胀公开化造成的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它没有经历计划体制阶段，不存在这种由价格管制来维持物价稳定的现象。二是同国际市场接轨。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是封闭的价格体制，初级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工业制成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开放以后，由于逐渐地同国际市场接轨，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了，并与国际市场价格看齐，而工业制成品价格在短期内不会下跌，因为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这就造成平均价格水平的上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存在这一点，因为它们并不是封闭的价格体系。三是在投资规模过大的通货膨胀中，还存在体制性因素，这是指，在计划体制下存在的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胡子工程、无效益投资等情况，在转型时期并未消失，这样必然形成投资过大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存在，因为它们的投资主体是要承担风险的。

由此可见，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通货膨胀问题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要复杂得多。这该怎么办？比如医生看病，有两种疗法，一是顺势疗法，一是逆势疗法。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复杂原因造成的，决不是靠单纯紧缩就能解决的。单纯紧缩很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如企业效益下降，三角债增多，失业者增多，市场疲软。所以中国的问题应采取顺势疗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经济，只要经济发展了，只要通货膨胀率适度，收入增加了，即使物价上涨，生活仍能改善。可以回想一下，从 1978 年到现在，物价涨了几倍？约 10 倍左右，而生活水平却提高了。所以问题不在物价的上涨，而在于经济的发展。假定 1978 年以来，保持物价稳定，不让其变动，我们今天的经济能发展到此种程度吗？我经常谈到“自行车假设”：自行车只有骑得快，才会稳。对通货膨胀问题应如此

看待。

失业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大家知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下降。在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城市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岗位，这就造成失业。这种现象，中国也存在。但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国家，还有第二个原因造成的失业。国有企业单位人浮于事，改革时要求提高劳动率，这必然造成企业人员过剩，一部分人被分流出来；如果不改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职工也只有下岗。所以中国产生失业的来源有两个。一般的发展中国没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没有那么多有大中型企业，也不存在国家硬性向企业派劳动力的情况。因此我们遇到的失业问题也更复杂。但为什么失业问题比通货膨胀更令人担忧呢？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下，只要人们有工作，有收入，生活就不会发生大的影响，顶多不过是吃好与吃差的问题，而失业则不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有得吃还是没有吃的问题，这会导致社会治安恶化。那么该怎么办呢？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有新的工作岗位；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消费结构才会发生变化，第三产业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再就业训练固然重要，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新的工作岗位。我常说：“运动中求平衡才是真正的平衡，发展中求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所以失业问题比通货膨胀更值得重视的问题。结论是：我们应把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增加工作岗位方面。

三、经济增长率

经济要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低。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在 8% ~ 10% 是适当的，否则失业问题很难解决，财政收入也难维持。有人认为，经济基础小的时候，可以发展快一点；经济

基础大了，要增长就不容易了，发达国家才 2%，我们有 5% 就不错了，不可能达到 8% ~ 10% 的水平。这种观点错在忽略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如果采用结构分析，将得出另一种结论。

可以把经济分为第一、二、三产业，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当经济发展处于第一阶段时，农业所占比重很大，工业比重很小。这时，经济基础虽小，但经济不可能快速发展，因为靠农业本身不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阶段，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加大，这时，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因为靠工业投资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时第三产业规模小，第三产业的滞后将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第三阶段，农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增大，第三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时，经济同样可以高速发展。只有到了第四个阶段，第二、三产业都已达到较大规模，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降。今天的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中国目前仍处于第二阶段，或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因此完全有可能在今后 30 年内保持高速度发展。那些以为经济基础大就不能高速发展的人，只知道总量分析，而忽视了结构分析。

有人认为，既然经济增长要快，就要增加投资，于是通货膨胀就难以避免。这种观点正确吗？我看，只能算对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投资有双重效益：投资既增加了社会总需求，也增加了社会总供给，所以供求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再次取得平衡。问题在于总供给中不能有“水份”。但现实中，总会有一部分是无效供给，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为什么会有无效供给呢？关键在于体制问题：投资体制未改革，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假设投资主体承担风险，有效供给就会增加，无效供给会下降，投资的双重效益发挥出来，这就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又有人提出异议：投资增加后，总需求增加在前，总供给增加在后，时间差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投资总会引起通货膨胀。这种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它偷换了讨论的主题。我们讨论的是社会投资，而不是个别项目

的投资。社会投资是若干项投资的总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从社会角度看，今年有若干项目上马，但以前几年的投资在今年形成了生产能力，所以时间差是不存在的，所以问题仍然在于投资结果能否形成生产能力。

要增加投资，就会有一个问题：钱从哪儿来？一是国家拨款，一是中外合资，一是通过证券市场来筹集。那么国家有那么多钱吗？我们说，“上游有水水库满，水库有水水渠满”。国家财政是一个水库，只有企业活了，“水库”才有“水”，“水库”放水后，文教、卫生、科技、扶贫等才有“水”。而目前，“水库”缺“水”，因为企业亏损严重。还有一个问题：上游有水，是否就流进水库？水库有水，是否就流入水渠、灌溉田地呢？中间是否存在滴漏、截流现象呢？这个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四、产权转让

不妨先从经济学中的“木桶原理”谈起。一个木桶的板条长短不一，这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也不取决于各块板条的平均长度，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在经济学中又称为短线决定原则。如何解决呢？一是从长板上锯一块下来补在短板之上，这叫生产要素的替代。二是把这个桶拆散，然后用木板重新组装一个桶，这叫生产要素的重组。但这两个办法在中国都遇到了困难。问题在于各块“板条”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不大可能把长板条锯下来补在短板条上，因为跨部门的要素流动很困难。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把桶拆散再重组，那就更麻烦了。当把桶拆散时，板条就被各部门抱回家去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因此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产权转让来解决。但这又引起了某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产权的转让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当然是错的。只要我们把好资产的合理评估及专款专用两关就可以了。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把

生产资料卖掉了，那么社会主义还存在吗？这种观点是不懂经济学的表现。因为货币形态只是暂时的形态，实际的过程是：实物形态到货币形态再到新的实物形态，况且新的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比原来的肯定要高。谁也不会把新厂卖了去建旧厂，而只会是卖旧厂、建新厂。

也有人认为，中外合资要慎重。有一种观点叫“反对靓女先嫁”。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假如出嫁是一件坏事，是把良家女子推入火坑，那么无论靓女、丑女都不该嫁；假如出嫁是一件好事，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国家增加税收，增加就业，那么靓女、丑女都可出嫁。问题是对方娶谁。如果靓女不能出嫁，丑女又嫁不掉，怎么办？难道要等靓女老了、丑了才嫁吗？靓女能靓多久？世界技术发展之快，市场竞争之激烈，你今天效益好，三年以后会怎么样呢？唐诗中有两句：“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此时不嫁更待何时？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家里的女孩相貌平平，就多给一些陪嫁品，就是说，效益差的企业，多给优惠；效益高的企业，要价高一点，主动权在我嘛！

下面谈一下对民族工业的保护问题。民族工业需要保护，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应研究的是民族工业的含义究竟何在？现在沿用的民族工业的含义很可能是 30 年代的。当时日本商品打入中国，打击了民族资本企业，所以提出保护民族资本，这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变了。至于民族工业的含义，可以由学者去讨论。保护是必要的，但保护应有条件，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而且不能是永久保护，永久保护只能成为保护垄断和落后。中外合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叫“土洋货”，进口产品叫“真洋货”。假如某一种产品不够，要从外国进口，这时增加的就业是外国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外国的税收。而当购买中外合资企业的产品（“土洋货”）时，增加的就业是中国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中国的税收，而且中国工人还从中学到了技术。因此与其购买“真洋货”，不如鼓励中外合资企业生产“土洋货”。

五、地区收入差别

目前，我国东西部差别增大，原因何在呢？这与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关。东西部有何区别？其一，内地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相对不发达。沿海则相反。其二，内地是生产资源的省份，沿海是资源加工的省份。在宏观调控中，首要目标是要抑制通货膨胀。银行信贷抽紧，国有企业主要靠银行贷款，这样，它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非国有企业有多种融资途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内地国有经济比重大，沿海非国有经济较发达，于是东西部差距拉大了。此外，宏观调控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对资源产品价格控制得很严，而对加工制成品价格的控制比较难，控制相对就松一些，所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扩大了。内地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

那么地区差别的扩大合不合理呢？既合理又不合理。合理部分表现为，它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试想一个壮劳动力在贵州山区，一年能有多少产值？而在珠江三角洲，又会有多少产值？同样一亩地，当其在甘肃、宁夏交界处时，一年有多少产值？而在浦东，一年又会有多少产值？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所形成的收入差别是合理的，不能抹煞这种差别。那种人为地把两者拉平，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不合理部分表现为资源价格的不合理。资源价格偏低，使得生产资源的省份收入减少。这种不合理的部分能改，但不能太急。资源价格合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让资源价格一步到位，就会使物价起连锁反应，通货膨胀就会控制不住。所以要慢慢改，逐步走向合理。在这一过程中，内地仍是吃亏者。

内地和沿海人均收入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哪里？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差别。国家公务员收入差别不大，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也是国家规定的，主要是奖金的区别，而奖金则与企业经济效益

有关。内地企业有效益好的、差的，沿海也有效益好的、差的，所以国有企业工人收入差别也不大。收入差别在农民那里表现得最明显。广东农民人均收入好几千元，而西北、西南山区农民大多数只有两三百元，差别为什么这样大呢？主要有四个原因：一，乡镇企业的发达与否。沿海乡镇企业发达，内地乡镇企业落后。二，沿海农民靠多种经营取得收入，而内地农民是单一的种植业。三，就种植业来讲，自然条件有区别。沿海气候温和，雨水充足；而内地干旱、高寒。四，沿海农民多数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网，而内地家庭都是封闭式家庭，自家穷，亲戚也穷。所以我们要在内地发展乡镇企业。尽管内地办乡镇企业的条件不如沿海，而且起步也晚了，但农产品加工业还有潜力可挖。我们知道，光靠按资分配是不能使农民脱贫的，要靠按劳分配。第一类是跟本人劳动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第二类是不与本人劳动相结合的按资分配。农民的脱贫除了靠按劳分配外，还要靠第一类按劳分配，即有农民入股的乡镇企业，有职工入股的乡镇企业，从中取得“分红”的收入。仅靠种粮食，农民能致富吗？顶多能糊口。要使农民脱贫致富，就必须参与乡镇企业及流通领域的经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二条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特产。第三条是科技部门要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这将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

六、民工潮问题

民工潮是当前中国经济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有人说，民工潮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交通拥挤，城市社会治安等等。对民工潮究竟应怎么看？中国是转型发展中国家，必然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今天的中国，从珲春到丹东，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是中国的黄金海岸。大队民工向黄金海岸流动，他们不是 60 年代的盲流，而

是在寻找各自的发展机会。尽管民工潮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经济学的高度，从转型发展理论来看，民工潮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第一，如果没有广大民工外出，沿海经济发展能这样快吗？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支撑着全国的经济建设。第二，民工外出打工是要把钱带回家的。现在外出民工达 8000 万人，有人估计已超过 1 亿人。每个民工每月平均寄 100 元回家，8000 万民工每年带回家的钱就是 1000 亿元人民币。这些钱繁荣了当地经济，活跃了当地市场，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个功劳是不能抹煞的。第三，民工出来后，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今天的第二代民工已不同于 80 年代初的第一代民工。80 年代初的民工是抱着“找几个钱回去讨老婆”的想法出来打工的，而 90 年代的民工是为了“学本事”。这是巨大的人力投资，8000 万民工自己花钱培养自己，国家未花一分钱。“叶落归根”，外出民工哪怕是 1/3 回乡，家乡就要发生巨大变化。湖南靠近广西的零陵地区（永州市），过去经济相当落后，现在乡镇企业都发展起来了，靠什么？靠的是外出打工的青年回乡办厂。“昨天的打工仔就是今天的创业者，今天的打工仔将是明天的创业者。”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没有广大民工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第四，我们讲农村妇女解放，讲了这么多年，成效甚微。但自打工妹出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个地方打工妹外出得多，哪个地方的风气就开得早。最闭塞的地方是没有打工妹外出的地方。中国妇女的解放，要冲破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这是很难的。但市场经济可以冲破它，打工妹的外出就是一种冲击波。有人认为打工仔、打工妹都往外跑了，农田由谁种呢？实际上，农民之所以外出，一是因为农业的比较利益太低，二是因为农村闲置劳动力太多，所以农民才出来打工。

七、区域研究的新方法

人们常把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块，或者以省来划分，由此形成的发展战略是梯度推进战略。这对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是否有用呢？所以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假定不以省为单位，而以县为单位，根据人均收入标准，将县分为三个层次：在地图上，富裕的县涂成红色，中间部分涂成黄色，贫穷的县涂成蓝色。这样就可以发现：红色的县大多在沿海一线或大中城市周围，蓝色的县在几省交界地区。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战略——中心城市连网辐射战略。“红色”地区的中心城市连成网，共同向“蓝色”推进，使“蓝色”的面积不断缩小。这种战略对中国也许最为有效。那么，大公司在此过程中起何作用呢？能否找到一个兼顾企业和扶贫的结合点呢？这就要把公司的盈利目标与扶贫目标结合在一起。目前国内某些企业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已有一些经验，取得了很好成效。

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北方的经验是办短期的农民职业教育，让农民脱贫。现在房子容易弄到，教员也不缺少，关键是没有学生。因为农民住在大山区里，距县城很远，付伙食费也有困难。可以采用贷款方式。来学习的农民什么时候脱贫，什么时候再还贷款。

八、小企业的作用

在中国，不能只发展大企业，小企业也十分重要。“无小不活，无小不富，无小不快，无小不稳”，这四句话反映了现实情况。目前，“一家两制”比较普遍，它使社会对失业的承受力大大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加。现在苦就苦在“一家一制”的，即一家人都在国有企业工作。工厂发不出工资，生活

就困难了。为了做到“一家两制”，就需要大力发展小企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合伙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私营经济的立法。《合伙企业法》为私人投资提供了保证。合伙企业是指由两人以上组成的负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合伙企业法》促使小企业迅速发展，活跃城乡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下一步应加快制定独资企业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得经济进一步活跃。

九、个人收入分配

这也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之一。市场经济是注重法制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下决不容许坑蒙拐骗、贪脏枉法。而今天为何存在这类情况呢？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法制建设滞后的表现，如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只要我们增强法制建设，这种情况可以逐步改变。

有人说：“造原子弹的人的收入不如卖茶蛋的多。”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假如卖茶蛋的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便无可厚非。这就要提高公务员、知识分子、科研人员的收入。但现在尚未做到，为何？一是国家力量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我们多年生活在计划体制下，计划体制不重视竞争，甚至排斥竞争。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出效益，所以人才与收入挂钩。在发达国家中，哪一个造原子弹的人的收入比卖茶蛋的低呢？所以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种现象。再来看计划经济中的情况。计划经济中也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计划体制下，卖茶蛋的人赚钱多，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今天为什么会存在此现象呢？这是因为我们处在转型发展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国家公务员、教师等都在计划体制下领工资，工资体制未变，而卖茶蛋的人先行一步，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收入。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必然的规律。

那么我们在收入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分配不公，两极距离太大。这是事实，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点。一方面，对扶贫工作要重视。另一方面，要分析富裕的人的情况。目前，有钱人的收入分两类，一类是非法收入，如贪污、走私、欺诈、制造假货等取得的收入，这不存在收入调节问题，只要是非法收入就应没收。另一类是合法收入，对这一部分应用税收来调节。在适当的时候，国家将开征遗产税，这是很重要的。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征收遗产税有个前提叫财产收入的登记制度，应当及早建立这个制度。此外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征收遗产税，目前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社会意义表明政府要从事社会的分配的协调，而经济意义则不大。因为现在中国的大款都是三四十岁，无法征到遗产税。

当前中国分配中的首要问题仍是平均主义问题，因为中国过去长期是小农经济的国家，平均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把吃大锅饭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思想短时期内很难改变。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也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何况吃大锅饭也从来不是一口锅，有大中小灶之分。为什么改革前人们能感到心理平衡呢？因为人们总是跟自己较熟悉的人在一起吃饭，不知道别的锅里吃什么，更想不到会到别的锅里吃饭。而今天人们感到心理不平衡，主要是：以前跟自己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样了，别人都富了，而自己收入却增加不多，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进而埋怨社会分配不公。所以平均主义思想对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一大阻碍。

十、经济中的活和乱

有人认为，一搞市场经济，社会就乱套了，似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井井有条的。是否如此呢？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只是书本上写的，其实计划经济下是乱的。为什

么？计划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计划分配。计划分配有三个原则：一、平均原则。有利于维持社会安定，害处在于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二、历史原则。根据历史上形成的分配比例进行分配，这会使老实人吃亏。三、目标原则，即根据轻重缓急排列进行分配。由于轻重缓急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所以会变成“长官意志”，从而形成“权力经济”、“批条经济”。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如何呢？关键是要建立市场规则，这样就会“活而有序”。

关于“乱”的问题，还可以谈一谈“王海现象”。有人认为，王海不是真正的消费者，没有资格索赔；又说王海动机不纯；或王海专找国有企业的麻烦。还有人说，北京出了一个王海，商店就乱了；如果出了更多的王海，岂不更乱了吗？这些说法都不对。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决定给王海颁奖。在会上，我说对王海的指责不能成立。第一，在交易中，买方买到假货，为什么不能索赔？比如说，零售商向批发商购买，买的是假货，批发商能说“你不是消费者，你没有资格索赔”吗？第二，要说“动机不纯”，那么卖假货的商店才是“动机不纯”，为什么你卖假货赚钱呢？第三，王海是相信国有商业企业，才去那里打假的。国有商业企业如果不卖假货，有什么好怕的？我同时也指出，打假仅靠王海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体制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应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着手。因此，“王海现象”的出现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乱”，而只说是“从乱到活”的表现。

十一、社会最终需求

经济要发展，增长率要高，这就涉及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持续发展有两个条件：一，要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二、要有最终产品的市场。社会的中间需求只能造成短时间的经济发展，因为中间需求是工厂的购买，工厂生产出产品，最后还是要靠消费者购买。目前的中国经济恰如一辆汽车，刹车容易启动难。宏观

一紧缩，马上就停了，但要再启动，就难了。两次调整利率，取消保值储蓄，市场仍未启动，原因何在？主要是宏观政策松紧不对称，当宏观经济政策抽紧时，主动权在政府，提高利率，减少财政支出，马上就紧了，见效了。而要经济启动，主动权在消费者，他不买，你毫无办法。

要使最终需求旺盛，就得找新的增长点。有的同志谈到有两个经济增长点，房地产和信息产业。对了一个半。住宅建设是增长点，这是对的，而“信息产业是增长点”说对了一半。因为，信息产业假如生产家庭电脑，那是最终需求，假如生产的是自动控制机床，那是中间需求，中间需求不一定能带动经济发展。但无论从哪方面讲，住宅要发展，信息产业要发展。

房地产业不是泡沫经济，发展中出了一些问题，那是经济中的泡沫，经济中的泡沫是正常现象，把房地产业看成是泡沫经济，这是误解了。有点泡沫也不要紧。

为什么房地产业发展不起来呢？看来贷款政策有问题。长时期内，银行贷款给房地产商建房子，而房子又销不掉，造成积压，就不能还贷款，造成经济不能运转。我们应与国外一样，可以给房地产商贷款，但那只是流动资金。主要的贷款要给居民，居民用长期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房子，房子卖出去了，经济就活了。如果房子太贵，就降低价格，将房子建在郊区，这样，房地产就发展起来了，同时也带动汽车、建筑材料、电器、家具业的发展，整个经济就活了。最终需求起来了，我国经济就会走上一个新阶段。

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应作出正确的判断。今天的形势是最终需求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这跟人气旺与不旺有关。预期收入好，可买可不买的就买；相反，则可买可不买的不买。一字之差对市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为什么人气不旺呢？因为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职工下岗，在社会上引起购买力下降。这就是说，职工下岗，不仅本人没有购买力，而且会影响其他人，其他人看

到某个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后会想：“暂时存点钱，少买点东西吧。说不定我们单位也会发不出工资哩！”于是商品就会积压。

还应进一步考察：“软着陆”的提法是不科学的。这是新闻界用语，而非经济学家用语。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它与均衡经济区别在何处？均衡经济在达到均衡线时是零通货膨胀率和零失业率。但中国不可能达到零通货膨胀率和零失业率的均衡线，而会有一个正常的通货膨胀率和正常失业率。那么这种正常的通货膨胀率和正常的失业率是多少呢？还没经过充分研究，现在还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非均衡条件下的均衡线何在，那么通货膨胀率要降到多少才称做“着陆”呢？“着”过了头，岂不是飞机要钻入地下了吗？

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不光有通货膨胀率，还有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下来了，失业率却在提高，要“着陆”也得两个轮子落地才行，一个轮子“着了陆”，行吗？

假设把整个经济发展比作是经济起飞的话，起飞以后应该是直飞目的地。目的地在何处？实现现代化。飞行的过程中要设法避开雷区，可以左，可以右，可以高，就行了，不需要中途着陆。干嘛要着陆？着陆以后，还要再起飞，因为还没到这个目的地啊。因此，“软着陆”是新闻记者的用语，是一种形象化表述。“软着陆”这个词从哪里来的？从航天科学中来，因为航天器登上月球，要徐徐下降，否则就跟月球撞了。这在航天科学中可以用，在经济学中则是不科学的。今天中国的问题，从非均衡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应该有一个正常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或者说短缺度。这个比率究竟是多少？要研究。

十二、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比较

大家都关心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国有大企业的改革现在已是很明确了，就是按公司法的要求改成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股份制企业，好处是一样的，即：产权明确，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投资者负有限责任。它们的区别何在呢？在技术上，它们有三个区别：第一，股东人数不一样。有限责任公司要求 2 人以上、50 人以下，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明确的规定，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人数在 1000 人以上。第二，最低资本额不一样。有限责任公司中，工业企业为 50 万元人民币，技术咨询服务为 10 万元人民币，没有上限，但有下限。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这是最低的要求，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则为 5000 万元。第三，有限责任公司不发行股票，投资者以认股的方式写入章程。比如三个人搞有限责任公司，写上：你 40%，我 30%，他 30%，这就行了，不发股票。股份有限公司则要发股票。以上这三个区别是技术性的区别。关键的是第四个区别，就是股份转让的方式不一样。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转让必须经过其他多数股东的同意。为什么呢？很简单，当初我们是有合同的，共同办一家公司。今天你不干了，股份要转让给别人，当然要跟我們商量，同意你就走，不同意你就不能走，因为你不能违背了当初的协议。你说我实在有困难，我要走，结果大家讨论，同意你走，但我们有权先买下你的股份，我们不买，你才能找外面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限责任公司是资本的結合加上人的結合。股份有限公司就不同了，股份的转让不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我买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的股份了，我今天要转让。“喂，你们王府井百货公司的股东们同意吗？”你去找谁呀？谁理你，你要卖就卖吧，管你卖不卖。所以股份有限公司只是资本的結合。

在中国要搞大公司的改革，走有限责任公司道路呢还是走股份有限公司道路？两者都要走，但大多数企业将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更少数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这是必然的趋势。

现在有许多人不懂，好像一谈到股份制改革，就讲到发行股

票上市。实际上，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有好处，也有不利之处。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两方面是优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一是它的融资集资渠道更广。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们自个儿认股，顶多在外面找一个来加入，渠道是有限的。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是公开发行的，有更广泛的融资渠道。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的知名度高，知名度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之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这个好处。但也要看到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比，股份有限公司也有不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地方。第一，股东们要求分红的压力太大。大家干嘛要来买你的股票，要看你的利润率是不是高。规模再大，利润率不高，也没有用。这一来，股东们要求利润率高，这个压力多大啊，给每个公司的肩上加了担子。假如盈利率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大股东是用手投票的，小股东是用脚投票的，小股东说这家公司不好，就走，把股票卖了。因此，股份有限公司跟社会上的股民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这个公司赚钱，大家都来捧你，公司不赚钱，怎么讲也没用，股民就把股票卖了。有限责任公司就不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说走就走，大家开会讨论，不让你转让股份，你就不能转让，这样就把大家捆在一起。所以有限公司责任公司承受的压力就小。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场形势不好的时候，公司承受的分现金的压力太大，因为股民要分现金。如果市场形势好，那就说得说，配股我要，送股我也要；但如果市场形势不好，配股是没门儿，你不但分不钱给我，而且要我交钱给你，我不要配股。送股，越少越好，我要现金。如果一个公司6月份开股东大会，它哪有那么多现金啊，它必须提前几个月做准备，卖掉一部分资产，卖掉一部分股权，凑足现金，这个压力太大了。前两年股市不好，一些董事长都说，不得了，套了一个绳索在脖子上了，我哪有那么多现金啊。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股东人数少，大家聚起来开个会，说今年利润不好，大家忍耐忍耐，大家一通过就行了，因为大家捆在一起，公司办好

了再说吧。第三，假设股份有限公司由一家控股，那么集资的渠道就窄了，因为一家控股，发行量就少了。还有人说，公司被控股了，咱们就别去了。不控股，情况就不同了。你说你效益好，别人比你的效益还要好；你说你规模大，别人比你的规模更大，山外有山嘛。好，你辛苦了半天，别人把你一收购，公司归他了，董事长换了，总经理改聘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啊？收购对股民有利，因为一收购，股票的价格就上涨了，所以股民都希望收购。股民不管你这个企业是谁的，他不会忠于这个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同，它不发股票，无法收购。你要来收购，行，咱们先谈判，条件合适，允许你加入，条件不行，不理你。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中国大多数企业改革走有限责任公司道路，少数企业走股份有限公司道路。但这不妨碍有限责任公司以后可以过渡到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的改革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集团，层层控股，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子公司和孙公司中，有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有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要分好几种。A 股是国内投资者用人民币购买的。B 股是国内发行的，外商用外币购买的。H 股是在香港上市。还有红筹股，香港人最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到，B 股是在内地注册的、是中国证监会审查的，他不大放心。H 股稍好一点，它虽然也是内地注册的、由中国证监会审查的，但要经过香港联交所复查，所以比 B 股好一点。红筹股是在香港登记注册的中资企业发行的，一切按香港的规定办，由香港联交所审查，所以香港股民对红筹股的信任度较大。

十三、证券市场

发展证券市场首先对国家有好处，因为这是国家优化资源组合的一种方式，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一种好形式，空谈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是没有用的，必须同技术改造结合在一起。而今天的

技术改造是需要钱的，钱从哪儿来？国家投资是一个渠道，中外合资是一个渠道，另一个渠道就是从证券市场筹集。技术改造了，产品推出去了，公司才站得住，所以发展证券市场对企业有好处。对广大的股民有什么用呢？对股民就很难说了，因为证券市场是个毫无规律的市场。对股民来说风云莫测，所以要谨慎从事。那该怎么办呢？下一步应大力发展共同基金。这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因为基金是属于大家的。

十四、第三种调节

人类出现已好几十万年了，市场形成不过几千年，而政府的形成则更晚。在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形成以前，人类生活靠什么调节，总有一种力量在调节吧？那就是道德调节。在市场形成、政府出现后，偏远的山区、荒漠中的小村，市场力量达不到，政府力量也达不到，那里的运行靠什么力量在调节呢？道德力量在调节。再看，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居城”，是因为城里比较安全；“大乱居乡”，因为城市是必争之地。大乱时，市场瘫痪了，政府失灵了，人们只好躲到乡下去。这时社会照样运行，靠什么调节呢？也是靠道德力量调节。在社会生活关系中，交易关系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是非交易关系。非交易关系中，有家庭、同学、同乡、师生等关系，学术活动、公益事业的活动都在非交易关系领域内。市场力量达不到这个领域。政府调节也只是规定一个大框架，人们不能越过法律规定的界线，但政府调节深入不到这个领域内部。内部靠什么调节，同样靠道德力量。因此，在市场、政府调节外，还有第三种调节，这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以前这个领域不被重视，没有充分研究。实际上，它存在的时间更久，涉及的领域也更广。

企业工作，要适应市场的调节，那是无形之手在进行调节。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有形之手调节。一个企业内部搞企业文化建

设，文化建设运用的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校园文化的建设也是道德力量在调节。社区文化建设同样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每个人的自律更是道德力量在调节。要把经济建设好，道德力量的调节是很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要让它起更大的作用。

以收入分配来说，市场进行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即市场根据各人提供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政府调节（如征税等）是第二次分配，最后变成了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可分解为投资与消费、或储蓄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就到此为止了。现在要问，在个人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后，有没有第三次分配呢？有。这就是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分配。这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你为什么要把钱捐给灾民呢？你为什么会帮助失学儿童上学呢？你为什么资助你那些穷亲戚呢？你为什么捐钱办学校呢？这些都是道德力量作用下的第三次分配。经济越发展，第三次分配起的作用可能越大，因为人的需求层次是不同的。当收入增长以后，需求层次会更高，人们会有更多的第三次分配，也就是说，道德力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不是政府强制的，也不是市场根据效益分配的，而完全是道德上自愿的分配。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财大气粗”不一定正确，权大才气粗。财多应该是气顺的，因为财多以后，可能会想到社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然人家为什么会捐钱给慈善机构和学校呢？

十五、创业精神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有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写了许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另外，他对中国的宗教也进行了研究。他的这些著作在当时没有多大影响。他死了几十年后，全世界兴起了韦伯热，重新把他的书拿出来看。韦伯主要研究为什么资本主义在 16、17 世纪时起源于西欧，为什么不起源于南欧？南欧的资本主义萌芽比

西欧要早。但当时天主教（旧教）在南欧占主导地位。旧教的伦理是：人是有罪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怎样赎自己的罪？一是去修道院修行，二是把财产捐献给教会。这两条路都不能使经济发展，所以南欧不是适宜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地区。那么再看东方。韦伯研究的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很昌盛，但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三大宗教占主导地位：佛教讲轮回，做好事，下辈子投胎得福，它重来世，轻现实，经济没法发展；道教主张清静无为，后来演变了，上层信奉道教，追求享乐，想长生不老，炼丹，这发展不了经济，下层讲平均主义，也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儒教求自我道德的完美，修身养性，人生的目的是做个好官，忠君，光宗耀祖，这也不能刺激经济。因此韦伯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再看西欧。在 16~17 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人们信奉新教。新教伦理是：人是有罪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怎么赎自己的罪？以上帝的名义勤奋工作，积累财富。积累财富越多越好，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能干更大的事，这是为上帝完成任务。这种思想，促使英国和荷兰搞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我们今天不去评论韦伯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其中体现的创业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二战”后，德国与日本被打败。譬如说，日本被打败了，政治上不行了，但日本民族又起来了，靠什么？靠经济的发展。日本人当时想，只有拼命地干，只有经济起来了，才能翻身。这种思想支撑了当时日本经济的发展。稍后，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起来了。比起发达国家，它们已经晚了一步，晚了一步更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启发的。刚解放时是有这种精神的，50 年代初的大学生有这种精神。接着，反右、反右倾、“文化革命”，几次折腾后，创业精神消失了，留下的是空虚。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二次创业，需要有第二次创业的精神。没有起飞的精神，不可能有起飞的现实。听说华中理工大学很重视人文科学的研究，我非常高兴。研究理工的人，假定缺乏人文思想，假定对创业精神没有深刻的了

解，将来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用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希望大家能重视人文科学的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供稿
根据录音整理，已请作者本人校阅

杨福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复旦大学讲演]

我在 1996 年曾听说过“基于知识的经济 (knowledge -based economy)”一词，今年 2 月又亲耳听到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到知识经济 (knowledge economy)。什么是知识经济？对我国甚至世界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在 200 年前，工业经济开始替代农业经济，那么，在今天，知识经济正开始替代工业经济。这是一个机遇，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又是一个挑战。

比尔·盖茨现象

英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出现是今天知识经济开始形成的标志。这位比尔·盖茨先生已连续三年位居世界富豪榜首。而且，其上升速度非常快：近一年来，平均每周增加资产 4 亿美元。而名列第二的富豪，已与他相差近一半！他的成功，他的兴起与别人完全不一样。在农业经济的社会里，少数人依靠对土地的控制，对奴隶的占有获取巨额财富；到了工业经济的时代，除了对土地、劳力的控制外，还依靠自然资源、运输工具等积累财富，从而出现了一批全球首富。例如石油大王、汽车大王、船王等等。而盖茨的产品是软盘及软盘中包含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广

泛推广打开了计算机应用的大门。这是一个崭新的产业。据美国总统的一位科学顾问介绍说，现在微软公司的产值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而且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 5000 家软件公司，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决不亚于名列前茅的 500 家世界大公司。靠知识致富的比尔·盖茨登上了世界首富宝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他的成功启示我们，可以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这或许是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既然资本是生产要素之一，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显然，知识理应成为分配的最主要依据之一。

我们知道，工业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制造业，制造业为工业经济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本世纪 70 年代，制造业约占一个工业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 30% ~ 50%，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但此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近几年这一比重一直在下降，现在至多只占 20% 左右，而制造业从业人数则下降得更快。即使从制造业本身来看，当今的制造业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增加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内容。比如波音 777 的设计，以前在设计时要做风洞试验，现在则完全在电脑上进行虚拟现实设计，其零部件的生产、组装更是完全自动化。再如现今汽车的设计、生产中，电子部分的内容大大增加，如用计算机研究两辆汽车的碰撞过程、人员受伤的情况，以及如何来防止和最大限度地降低受损伤的情况等。防撞装置的研制也改变了过去的实物试验。

可以预计，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制造业的总量将会衰减，但衰减到一定程度就相对稳定了，而此时的制造业将增加许多新的、软的成份。

比尔·盖茨的产品主要是知识型的（“软”的），所以说知识经济的另一个标志是软产品的比例大大增加，其本身不仅可以作

为一个产业，而且以前的一些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增加知识的含量加以软化。

现在，在企业资产中，无形资产的比例正在大大增加。据测算，美国 1995 年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的比例已高达 50 % ~ 60 % ；同时各类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咨询业务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这也是知识经济的一个特点。

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说：

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软件知识产业的勃兴是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初具框架的标志；

以知识作为资本发展经济，知识将作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软（件）的比例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大大增加，包括专利、商标等在内的无形资产在整个经济资产中的比例大大上升，咨询业日见兴盛。

作为工业经济主干的制造业已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新科技知识。

信息——知识经济的燃料

本世纪初，有人已把石油比喻为工业经济发动机的燃料，虽然那时刚刚把汽油发动机用在四轮人力车上，还没有好的公路，更没有高速公路。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是知识经济发动机的燃料，而且我们已初步有了信息高速公路、信息数据库。在工业经济社会里，人们谈论发电机、铁路、福特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我们必须熟悉半导体、芯片、光盘、计算机。

现在《纽约时报》一天的信息量等于 17 世纪一个人一生所能得到的信息的总和；在一片指甲大小的芯片上可以存放两年的《人民日报》的信息量；用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的

内容；利用信息高速公路，1秒钟就可以把两年的《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光。到本世纪末，一束光纤将可传输现在全世界每一天所有的电话通讯量。

英特尔公司的创始者戈登·莫尔在1965年曾提出一条规则，俗称莫尔法则。即：每18个月微处理机的能力翻一番，而其价格不变（或称：相同能力的计算机价格每18个月降50%）。事实证明他的法则是正确的，例如，在1984年台式小型计算机每秒只能运算200万次，而在1994年已达到2.56亿次；可以预料在1998年将超过20亿次。

现在，美国已有70万个私人网络，日本有7.5万个，欧洲有1.4万个。全球135个国家共有220万台计算机进入Internet，并且还继续以每月10%~15%的速度在增长。

软件的发展，网络的产生，虚拟技术等广泛应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新特点，这使得知识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作用与以前大不一样。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化工业、知识社会……各种新名词不断涌现。

对未来的影响

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包括教育、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等活动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现在要让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来估量这场革命对科技、教育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影响，可能还操之过急，但是，笔者愿以日美竞争中的一个实例来说明一点，即：能否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兴起，对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

在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已觉察到，美国经济的竞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下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对此，他组织了由经济学家、学者、科技顾问为成

员的“工业竞争研究委员会”。经过近两年的研究，他们发现，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力将会超过 18 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时对中国的冲击。他们发现：美国的经济已分为两块，一块是旧的，进展缓慢；另一块是新的、刚成立 5~10 年的、以计算机为特征的中小企业，进展神速，其代表就是微软公司。微软公司创立不到 20 年，已有 1.5 万名雇员，资产达到 1500 亿美金，超过了美国三家汽车公司的总和。而这种新型的企业正是日本的弱点。因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方案。美国政府适时采取了“依靠高等学校与工业界相结合”、“发挥自己特长”的战略方针，而拒绝了诸如利用外汇汇率、增加关税来加强竞争力的各种近视的建议。事实证明，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 40 年中，日本发展了 53 家钢铁联合企业（是美国的 4 倍），50 家摩托车工厂（是美国的 5 倍），12 家汽车公司（是美国的 4 倍），42 家计算器公司、13 家传真机制造厂、20 家复印机制造厂（家用电器公司，是美国的 3 倍），280 家机器人公司（是美国的 6 倍）……

但在同一时期，美国却大大加强了计算机、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芯片工厂，美国 280 家，日本 20 家；计算机、软件公司，美国比日本多千倍以上（高等学校对此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现在，美国每三户人家就有一台计算机，而日本每十户以上的家庭才拥有一台；而私人网络的使用率，日本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知识经济领域，日本已大大落后于美国。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知识经济时代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不可抗拒。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经济无疑会对我们国家的

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知识经济逐步形成过程中及形成以后（我认为，即使在发达国家，知识经济从形成到成熟至少要 20 年时间），我们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策略。

知识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千变万化”。有人说，对企业发生影响的诸多因素已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动态瞬变的。搞企业管理的必须研究一系列新问题。一个企业如果要生存、发展，会面临许多问题，过去都是用静止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现在在知识经济形成中，这些因素都是动态的，而且变化非常快，正以比以前快 10 倍的速度变化着。以前好像是有风来，现在是台风，你怎么去适应它？不能适应，企业就要垮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一些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大公司都在纷纷联合并存，因为，他们懂得只有强大的集体才能抗击狂风巨浪的冲击。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就必须把素质教育与通才教育放在学生培养首位。否则，我们的学生就很难适应今天这种瞬息万变的形势。我们不赞同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培养学生，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此外，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要训练学生与人共事，不能只看到自己，要讲究团队精神。只会孤军奋战的人已不适应今天的形势。

再者就是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要让学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一个人很难永远是成功者，理性地面对失败应是当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总之，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还要采取更为开拓的多种形式来培养、训练我们的青年一代。

现在，国际上有人认为，随着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若干年后大学可能不必存在了，靠网络学习即可。这种说法误解了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区别，夸大了网络的作用。大学阶段主要是教育，教育学生怎么全面发展，怎样成为国家栋梁、社会英才。这是网络所不能及的。而网络将使学生的课程、讲座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教育资源得到更大程度的共享和利用，并对学生参与研究工作发生重大影响，更会替代一些短训班的功能。培训班将是今后社会中的一大特点，在 21 世纪，终生教育将成为人类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总之，知识经济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崭新的经济形态，现在对此的一些理解都可能失之偏颇。但这里面有大文章可做，我们都应像罗丹所塑造的“沉思者”那样去勤于思考，为未来做准备。

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供稿

【编者絮语】这篇演讲是国内最早介绍知识经济的文章之一。演讲者十分敏锐的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征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为著名大学的校长，演讲者还深切地感受到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提出的新的要求，以及发展教育副业对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性。

赵景瑜 山西大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公关艺术在大观园

[在山西大学讲演]

—

《红楼梦》的的确确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是世界文学的瑰宝。我们能有这部小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中国的骄傲，我们应当引以自豪。因此说，做为一名中国青年，不管你是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医的、搞评论的抑或搞创作的，都应当认真地阅读它、研究它。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领略过大观园内外所展现的洋洋大观的艺术世界吗？那里的建筑雕 绣槛，高楼插空；那里的山石牴牾纵横，曲径通幽；那里的奇花异草，更是如喷火蒸霞一般。

就在那大观园的围墙之内，一方面是主子们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用着玉盘金碗，坐着八抬大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奴隶们受蹂躏、受侮辱，在忍无可忍之下起而反抗。一方面是封建礼教桎梏着青年男女；另一方面是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婚姻自主的呼声频频喊出。一方面是贪污纳贿，高利盘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是旱涝不收，盗贼蜂起，家破人亡。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可谓深邃远见，最先全面地宣布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

就在那大观园的里里外外，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九百多个人物，有帝王、后妃、皇亲、国戚、王爷、兵丁、太监、官吏、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丫环、仆役、管家、小厮、市侩、村媪、伶人、娼妓、道婆、道士、尼姑、和尚等等，《红楼梦》可谓写出了整个封建社会末世各种人的总体。

就在那大观园的里里外外，你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法律、科举、婚姻、奴婢、租佃、吏治、宗教，以及饮食衣着、医药卫生、园林建筑、经营管理、风俗习惯许多方面的感性知识，《红楼梦》不愧是一部百科全书型的小说。

二百多年以来，《红楼梦》以如此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究它的艺术堂奥。研究者形形色色：有封建达官贵人在探究它，例如清宗室永忠、弘昼、敦诚、敦敏等；有各种文人也在探究它，例如评点派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索隐派大教育家蔡元培，新红学派胡适、顾颉刚、俞平伯，著名学者王国维，爱国民主人士山西老乡景梅九，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等；不仅这些人物在研究，还有革命导师毛泽东、革命文豪鲁迅、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等也在研究它；就是大汉奸汪精卫、反革命头目林彪、江青也在研究它。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的一种“红学现象”吗？这真是红学史上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

今天，我以薛宝钗这个人物为代表，来分析一下《红楼梦》中的公关艺术思想和实践。

二

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公共关系学，它纯系舶来品，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公共关系一词，也没有这种学问，当然就谈不上有这种职业了。也有人认为，中国虽然也有过一些公共关系活动，但是它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的状态，从未有过公关理论作指导，即使有实践活动，也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这些观点都是不科学的、缺乏根据的。殊不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公关思想和公关实践。像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古代史书、兵书、笔记、话本，以至《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古典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可发掘出关于公关的智慧与思想。被称为“公关之父”的现代国际公关先驱丹尼尔·爱德曼，就多次强调说，世界最早的公关理论和活动源于中国，2500 年前的战国时期的说客、纵横家苏秦、张仪，便是卓越的公关专家。

“公共关系学”正式形成学科较晚，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实践性的应用学科，并同时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职业，很快地流传到资本主义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新时期，它也由南至北传入中国大陆，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公共关系学主要研究一个社会组织如何运用各种信息传播、双向沟通的手段，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社会关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使自己和环境之间相互适应，同步发展。这是现代社会组织内求团结完善，外求和谐发展的经营管理艺术。同理，中国古今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如此，而且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并且取得了光辉的实践成果。例如孔子的“仁”、“孝”、“中庸”、“和为贵”的思想，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哲学，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理论以及“荣辱观”、“谈说”、“辞辩”之术，等等，都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要言之，公共关系就是协调各种公众关系，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的一种实践活

动，而这种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理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俯拾皆是。可见，公共关系学并不是欧美各国人的专利，我们所引进的只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狭义内涵的公共关系，并不是公共关系学的全部。那么，在我国具有与西方公共关系学精神内核相同的传统公共关系学，究竟是怎样一个面貌，又是怎样被历代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呢？我们不妨以传统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剖析一下。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说过，薛宝钗是大观园里的一位公关小姐，颇善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我们且不去管曹雪芹当初对她的创作倾向是褒是贬，我们只管从宝钗在大观园里对自我形象塑造的效应来看，就可知她是怎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公关人物了。

在薛宝钗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公关理论与行为。她的精神世界完全渗透在儒家的那一套思想体系中，儒学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实践理性的直觉思维，而轻视技艺与自然。所以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特别是“孝”与“和”的儒家思想贯穿了她的整个公关思想，并在实践中体现出积极的意义。

我们知道，公共关系活动是由“主体”、“对象”及联结二者的“媒介”三个要素所构成。所谓主体，即谁搞公共关系？所谓对象，即和谁搞公共关系？所谓媒介，即通过各种信息传播、双向沟通的手段，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宝钗在大观园里的全部活动，正体现了这三要素。

“孝”，是她体现在对上关系的公关思想。孝中包括着“无违”与“悦亲”两种涵义：“无违”为孝，就是指生前死后都要依礼去侍奉祭祀父母亲长；“悦亲”为孝，就是要使父母无时无刻地感到精神高兴，生活满意。这在儒家思想中被看得很重。《孝经·广要道章》说：“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

者寥，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孟子还断言说：“事亲不悦，弗信于友矣”，“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章上》）在《红楼梦》中，真正领悟并实践了孔孟孝道的只有宝钗一人。有时，“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处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话半时，园中姊妹处也要度时闲话一回。”（第四十五回）所谓“承色”，就是顺承迎合父母长辈以博欢心的意思。当贾母捐资为她过生日，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时，她“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贾母自然欢喜，无怪乎贾母慷慨捐资二十两银子为她过生日，并称赞道：“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第三十五回）当元妃从宫中送灯谜让大家猜时，“宝钗等听了，近前一看……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第二十二回）她这一内心世界虽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是也正是她虚伪的表演满足了贾妃的虚荣，让贾妃自觉灯谜出得高明，从而使贾妃在众人中挣足了面子。也正因如此，她也为自己在贾妃面前树立了一个美好形象，得到了与众姑娘不同而独与宝玉相同的赏赐。在第三十二回所描写的金钏跳井事件里，从宝钗对王夫人的安慰中，我们的确不难看出宝钗性格中有颠倒是非、诬蔑死者的丑陋的一面，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

钏的装裹而头疼的问题，毫无忌讳地拿出自己的两件新衣给金钏作了装裹，使死者入土为安。宝钗这大有深意的言行举止，我们以为是她作为一个晚辈对长辈的悦亲、博爱以及有教养的惯性活动，并非贬薛派们所云的是她为了“爬上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时时处处刻意去巴结逢迎。试想，在生日宴上，尽要大家都不爱吃唯独自己爱吃的，不去照顾大家的情绪，难道就能表明自己并无野心吗？很快地猜出灯谜来，难道于己于人就觉得有趣吗？不去安慰王夫人，不给死者装裹，作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人，难道就会心安理得

吗？把宝钗诸如此类自觉不自觉的行为说成是她实现野心的手段，把她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看得大有

当说，她对长辈的恭顺逢迎是体现了儒家孝道在她思想中的渗透，这一自觉不自觉地实践儒家公关思想的效应，自然便博得了长辈们的欢心和疼爱。

“孝”是儒学的核心，也是重要的公关思想。儒家专著之一的《孝经》便强调要有“诤子”的精神，认为“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章第十五》）即在关键时刻还必须反对父母的错误意见，否则一味盲从，这恰恰走向了孝的反面，使父母因做错事而陷入不义之境。宝钗在公关实践中也是如此，很辩证地继承了这一精神。她在处理两代人带有原则分歧的观念冲突时，也算是一个“诤子”。就以“呆霸王调情遭苦打”这一回为例，薛姨妈出于对儿子的偏袒心疼，不问青红皂白地执意报复柳湘莲，想借贾府权势，去擒拿柳湘莲。当时还是宝钗明智地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第47回）宝钗在此以她惯有的冷静豁达、明智达理进行了有力的劝谏。她理智客观地判明了事件的性质、诱因，以及对家庭利害的考虑，认定再不能偏心纵容薛蟠“生事招人”了，从而警醒糊涂的薛姨妈，制止了不义的报复，化解了一场冲突，其结果不仅没有化友为敌，甚至还产生了化敌为友的远距离的公关效果。

总之，“孝”在宝钗的交际活动中起着积极作用，从客观效果来说，为她在大观园中给最高统治者的脑海里树立了完美的个

人形象。

“和”，是薛宝钗又一重要公关手段，它依然来自于浸透她灵魂的儒家思想。《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惠则足以使人”，“敏则有功”（均见《阳货篇》），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惠、敏五种美德，做到了五种美德也就达到了“和”的目的。“和”以现代意识来解释就是团结、友好、和睦。所以“和”这个道德标准，在公关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贾府是一个显赫的封建贵族之家，但又是一个正在走向全面崩溃的没落之家，它的内部已日趋末落、腐朽，宗派倾轧，嫡庶纷争，主奴矛盾充斥其间，再加上那些一代不如一代的不肖子孙，穷奢极侈，偷鸡摸狗，安富尊荣，养妓畜娼，秘事丑闻乃至逼死人命之事层出不穷，把个堂堂的国公府闹得像个污秽不堪的臭泥塘一样。照理说，在这样一个龌龊不堪、充满罪恶的社会细胞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很难适应，但宝钗却能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在如此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显示出她的一番能耐，体现出她的公关才能。

这首先表现为宝钗对待平辈中姑娘小姐们的态度上。她能体谅父母双亡、依靠婶母过活的史湘云的苦衷，主动提出代她做针线活。并能考虑到湘云的经济状况，代她出资筹办别具特色的螃蟹宴。她对人真是体贴入微，怕损伤了湘云的自尊心，于是，告诉湘云“千万别多心”，此举使得湘云十分感动，心直口快地表示要把她“当作亲姐姐一样看”。家道贫寒的邢岫烟，一来贾府宝钗就对她很好，考虑到她的家庭状况，推心置腹地劝告她要“从实守分”，“该省的就省了”，又为岫烟赎棉衣，让她早晚好穿。就是对刻薄多忌的林黛玉，宝钗也以“和”为法宝，容忍退让时居多。当黛玉借雪雁送手炉一事指桑骂槐之时，宝钗明知是在奚落她和宝玉，但“素知黛玉如此惯了，也不去睬她”。对此，她表现得宽厚大度，避免了一次难堪的冲突。宝钗对于林黛玉的

琐屑繁复的猜疑中伤，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浑然不觉”，装聋作哑，故作糊涂的姿态，因而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中，使黛玉感动不已，追悔不已，并自我检讨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在这一回中，宝钗还流溢出她与黛玉肝胆相照的善心与气量。可见，以和为原则，浑然不觉，退避礼让，肝胆相照，是宝钗消除误会、解决棘手的人际关系的最好的公关手段。

她在对待丫头婆子们时，也完全没有一点贵族小姐的骄横之气，不是以势压人，而是以“和”为重，时时处处庇护着下人。她保护着“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使香菱幸运地逃脱了第二次被卖的悲惨命运。为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生存空间，她总是以温和儒雅的聊天式的公关手段处理事情。第56回描写的“贤宝钗小惠全大体”的故事，便体现了她的公关活动水平。谈话中，她不摆出小姐的架子，也不像探春那般严厉训斥，而是在委婉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间接而又鲜明地达到了警告众婆子的目的，使众婆子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她的劝告，从而既保全了双方的面子，不伤和气，又达到了严肃治家的理想效果。难怪“便是那些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呢！

即便对待人格低下、人人厌恶的贾环和赵姨娘，宝钗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既不排斥歧视他们，又不拉拢纵容他们。就连送土仪也没有忘记他们，难怪赵姨娘感激地说：“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宝钗这种“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第二十一回，庚辰本夹评），煞是她处

理人际关系时公关手段的高明之处。宝钗就是这样以“和”为手段和目的，与那些最难相处的人物在人际关系上求得和谐，进而为自己创造出—个宁静和睦的生活环境。

其次，薛宝钗的“和”的公关思想，还表现为对大观园中诸种事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及对信息的掌握与运用。比如第62回中写到宝玉问宝钗为何锁门—事时，我们且看宝钗如何回答，就知道她是如何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并处理信息的。书中这样写着：

—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了。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省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子，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儿了。”

由此可见，宝钗清楚—切而不介入，她用“关门主义”来求得自身的清白与太平。但又不是完全不介入，她把—切情况告诉了平儿，这样，宝钗既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信息灵通的能量，又没有因为自己的信息传播挑起—新的事端，得罪更多的人，更没有卷入—什么矛盾纠葛，而是与这位善搞平衡、颇有人望的平儿结

盟。应当说，在贾府各种关系冲突中，她起着健康的作用，在获得信息方面她是独占鳌头的。而获取信息，对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关系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迅速地获取信息，才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信息。宝钗就是在充分地掌握信息之后，根据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制定了其行动的准则，即知之不厌其多，行之不厌其少，行当所行，止当所止。确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在行动上，她是时时处于守势，以守为攻，但在掌握信息上却是处于攻势，以利明哲保身和自我保护，否则，既锁上门，又管门外事作甚？不论有意无意，注重信息的获取与沟通，表明她在公关实践活动中对于中介的重视。这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处理方式，则又表明了她的公关手段的高明。

在那样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主人奴仆中，在那些可厌可鄙的纨绔子弟中，薛宝钗得到了合府上下的交口称赞，她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功的公众关系，是离不开儒家的“孝”与“和”的公关理论指导的。儒学的传统公关理论与薛宝钗的公关实践对我们今人来说，也不无参考价值。如果我们今人能像薛宝钗一样把儒家的公关思想正确地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争取在双方沟通的基础上，通过与公众的敏感的交流活动，得到相互的理解和好感”（美国公关学者 H. 弗雷齐尔·穆尔、费兰克·卡鲁帕语），并通过信息交流和关系协调规律的运用，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那么，今天又何愁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没有立锥之地呢？所以说，薛宝钗是我国文学作品中较早具有公关意识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成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小姐。

山西大学教务处推荐 本人整理

朱光磊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和性质

[在南开大学讲演]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个社会成员构成呈单一阶级划分状况的历史前提下，由于以经济形式多样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为重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强力推动，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在持续经历着一个阶层性的社会分化过程。比如，工人阶级已趋多元化，知识分子和官员这两个引人注目的阶层已经明显有了新的面貌，1000 万人的三资企业职工成为了工人阶级中的成分；一些曾经存在过、而后被消灭的阶层，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又重新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分别达到了 2500 万人以上和至少 50 万人的规模；农民，这个中国最庞大的群体已于 80 年代开始分解，并从中分化出的亿万人之众的乡镇企业职工阶层这一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对比关系的力量。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不远的将来，工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成员构成的曙光。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中，一个本处于相对封闭条件下的社会，其阶层分化如此迅速、广泛、深刻，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及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进行周详的研

究是理论工作者的使命。而且，这个事实已经和将对中国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之巨大和深远，现在还是难以估量的。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以上提到的如此之大的社会变化。不断出现的社会群体和利益冲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从理论上提出了要求。这种分化的基本态势或特征如何？这种分化的后果，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分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还是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我想从这一分化的特征和性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

这次规模巨大的阶层分化，是整个中国社会机制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必须充分注意的一个前提。它是在中国原有的社会分化节奏被一系列运动打断之后勃然发作的。我们的社会分化的程度原本很低，但我们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迅即迎来了相当规模的阶层分化。时代的先进性与历史的滞后性的交错作用，使这一分化产生了一些它所独有的特征。

（一）新旧阶层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高速度、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仍在继续。

这次分化是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高速度持续进行的，而且是一个更大分化的准备。这个特点反映到社会成员的构成上，就是不论是新兴阶层，还是传统阶层，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比如，产业工人正面临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考验，从中再剥离出一部分的可能性极大；农村仍有 1.7 亿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预计仅以民工的形式离土离乡的人每年就将增加 1000 万人；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仅行政机关就将分出 25% 左右的人员。1992 年，上海私营企业的增幅为 84.13%；一些省的领导人说，个体私营经济再发展两三倍也不足为过；全国情况也大致如此，个体私营

阶层的扩大已成定局。

阶层格局的这种不稳定性，必然造成各阶层在社会心理上的不稳定状态。比如在中青年官员和知识分子中，跃跃欲试“下海”者不少；不少个体私营业主在投资问题上留有余地；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影响职工情绪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各个阶层在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上都还不“到位”，都还在寻找着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点。

（二）出现了“两栖人”现象。

阶层之间总是相互渗透，彼此交叉的，但在改革中，由于政策的不明确、不果断等因素，也导致了非正常模糊阶层界线的现象，即“两栖人”现象。两栖人，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双重阶层属性的社会成员，主要包括：留职停薪人员；兼任经济实体实职的官员；请长假外出谋职等。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不规范的阶层重叠现象是难免的，但其所带来的弊病应当引起注意。具有多重社会角色的人受多重利益的支配，往往会对某一政府决策在不同的场合下表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意见。这样，决策会受到较多的干扰和牵制，尤其难以得到准确的决策反馈。而且，留职停薪、请长假、里闲外忙，还容易把在旧圈子养成的懒散作风带到按新机制运行的团体中去，并会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在劳动力很充裕的情况下，一人占有两个岗位也很不经济。

（三）各阶层在分化中增强了独立意识，利益要求明朗化，但组织化的程度依然很低。

过去，只讲人民利益的统一性，甚至用国家、集体利益去消融、代替各阶层的特殊利益。改革已使这种消融、代替无法以过去的方式实现。兼顾各种阶层的利益，已成为普遍共识，被旧的社会机制控制住的阶层特殊利益要求开始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在现阶段，改革受到了各阶层的一致支持。同时，分化还处于起始期，各阶层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加之政策导向的有力影响，目前独立性的发展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良性的。但近年来

在一些阶层的内部，各种联谊性、信息交流性的社团活动有增多的趋势。

（四）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问题过早出现。

“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是指学历、社会地位较低但收入较高的现象。一方的优势正是另一方的劣势，一种不平等抵消另一种的不平等，对于协调阶层关系并非无益。但这种状况往往是在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在不发达阶段，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少，相应地参与高层次管理或服务的人也就很少，而且收入水平也较高。在发达国家，财富的象征地位已大大下降，收入和地位上差别已经不那么引人注意了。中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不规范性，往往使知识分子和官员因工作的规范性而失去率先分配社会财富的机会；相反，毗邻流通领域的阶层却容易在不规范的经济生活中游刃有余。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给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以较高的地位和报酬，来激励年轻人去仿效他们，带动民族素质的普遍提高。问题在于，我国过早出现了阶层地位不一贯现象。锯齿状的收入对比关系容易使专家层灰心丧气，也容易使先富起来的人小富即安。

（五）社会分化的急速发展，导致了“学历社会”的提前结束。

从“身份社会”向“业绩社会”的过渡，不可能瞬即完成，必然经过某些中间环节。这个中介一般表现为并行存在的“学历社会”和“财富社会”，即重视高学历和财富的社会气氛。“学历社会”具有“身份社会”和“业绩社会”的征兆，但它所强调的是后天努力和平等竞争，减弱了先辈在地位、财富上的影响，因此它在导向上是进步的。同时，学历便于度量和比较，较为真实可靠。因此，在“身份崇拜”被打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用学历作为衡量人的一个重要尺度，是自然、方便和相对合理的。

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到80年代中期中国有过一个“学

历热”。但很快，“学历热”便于 80 年代中后期迅速降温。“学历社会”的提前退去，必然产生“财富社会”的补位效应。将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较之身份标准也不失为进步。但考虑到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应当说“财富社会”所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倾向对人的消极影响，远远比重文凭大得多。在还达不到真正通过业绩标准客观评价人的时候，过早地贬损学历的意义，只会为拜金主义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打开一面方便之门，不利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六）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阶层之间的政治差别缩小，经济差距加大。

改革之前，人们的差距主要是在“政治生命”方面。目前，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各阶层都在平等参与国家管理，一些长期受压抑的阶层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各方面都不存在着明显的压抑感。少数人出于既得利益或因受旧观念影响而散布的对一些阶层的歧视性观点，已很难引起共鸣。但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各阶层在经济上的差距拉大了。这主要表现为：工农两大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依然存在；个体私营阶层与薪金阶层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而且出现了新的高收入人员类型，如经纪人、包工头、食利者、文体明星、外资代理人等；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总之，上述特征，或是值得总结的经验，或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许多现象是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的。虽然这些复杂情况的出现，给认识这一分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带来了一定难度，但也为我们通过努力丰富对于阶层分化问题的一般认识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性质

只要不是从本本、偏见和既得利益出发，不是对唯物史观和

全球状况一无所知，那就不难得出明确结论：这次阶层分化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直接产物，而不是“副产品”；是社会关系优化基础上的重组。只要肯定改革，就必然要肯定它的主流是积极的。这种进步性，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这种社会分化推动了我国由“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过程。

恩格斯曾讲过这样的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享·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在于 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性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恩格斯行文中提到的梅恩上述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句试图概括人类文明史的用语，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个传诵不衰的名句。应当承认，这个提法确实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东西，它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契约，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用契约取代身份的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的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尽管当时这种进步不过表现为用金钱关系去取代封建等级制度，但晚年恩格斯还是肯定了它的历史进步性。

我国近十余年来的阶层分化运动也证实了这一判断的生命力。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传统因素的影响相当大，许多历史任务被遗留到今天完成。但许多身份因素在这次分化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现在，城市各阶层，对身份的依赖已大大减少，农民也突破了身份的束缚迈向了市场，个体私营企业主及从业人员、三资企业职工等更是在没有身份优势，又没有身份束

缚的起点上开始了他们的发展历程。

中国正加快步伐向“契约社会”迈进。劳动人事制度、选举制度、住房制度等的改革，使利用身份优势获取利益的余地缩小了。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都在学习运用契约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束缚人的框框正在一个个被取消，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的活力增加了。

第二，这种社会分化，通过对社会成员有机构成的有益的改善和调整作用，对经济建设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首先，社会分化的实质是分工原则在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体现。近十余年来，国家初步运用市场机制调整了各阶层——社会分工的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加强了一些亟待发展的领域的人力资源配置，缩减了劳动力相对过剩领域的人口规模。这提高了社会运作的效率，为今后进一步调整社会分工的比例关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其次，社会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人的激励作用。过去，我们只重视精神鼓励，甚至寄希望于通过说教来解决积极性问题。显然这不成功。在目前的条件下，坚持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原则，强调“能出能进”、“能上能下”、合同制、聘任制，淡化干部与工人的界限等社会流动手段，对于刺激劳动热情是必要的。

第三，这种社会分化造就一个成长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概念的一个基本含义，即是指在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那一部分社会力量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规章等。这次分化造就的一批脱离了“单位体制”的人员，如乡镇企业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无上级”社会群体及生活于其间的机制，已经构成了初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这使我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增加了一个弹性因素，也减轻了政府在管理、财政上的压力，加大了社会流动上的余地。虽然，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也是亟待研究的课题，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出现对社会发展利大于弊。

第四，这种社会分化对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有推动作用。

社会分化本身并不是政治，但它能够为政治发展提供某些“生长点”。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

其一，农民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非民主、非法制因素的社会根基。我们相信，当未来的史学家回首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发现，此时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中，一个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庞大、也很保守的人群终于分化了。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将是由此起步的。农民特别是开放地区的农民接受民主观念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其二，阶层的独立意识与阶层关系流动化并存，人们的约束感下降。这虽有增加不稳定因素的一面，但也有助于人们自主地表达各自的利益要求，也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身份和单位来保护自己。

其三，社会分化同经济因素结合以后，社会权力结构在它的基础层面上，已经发生了力度不是很大，但却是引人注目的变化。广大群众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特别是基层政权建设的热情明显提高。在 1992 年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还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个体户迫切希望当选的情况。农民企业家难免与当地农民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对于其他阶层和高层决策来说，他们又往往成为农村社区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则通常利用舆论优势，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已有一部分人进入决策圈。这种变化对于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痼疾，加大意见综合的广泛性很有益处。

阶层分化也有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比如，具有经济实力的阶层难免会有通过非程序手段谋求政治权力的倾向，甚至萌生一些试图超越法制的念头。但由于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核心作用，以及各阶层在现代化这个民族愿望上形成的“利益联盟”，阶层分化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影响主要是健康的。

第五，这种社会分化初步转变了社会思想文化观念，提高了群众对社会变动的承受能力。

面对过去所难以想象的社会分化，每个阶层都在审视着自己的位置。面对着少数人财富的迅速增长，有人认为可以理解，有人愤世嫉俗。但总的趋势是，人们逐渐接受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并开始试图通过竞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经历了一个由惧怕分化、贬损分化到参与分化的过程。现在，“利益”、“竞争”等过去耻于出口的概念已经普及化。与此相一致，人们对于从政治变故到物价上涨的各种社会变动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了。

第六，这一分化与当代世界范围的社会分化趋势是一致的。

面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为起点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成员构成大调整，中国的阶层分化明显滞后。经过十余年的加速分化，这个差距不仅已经缩小，并且明显表现出了二者在发展趋势上的一致性。

一是，在工业劳动者不断增加，农业劳动者不断减少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在 80 年代初，全球有工业劳动者 5.15 亿人，预计到 2000 年将达到 7.3 亿人左右。但这种发展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的，即每年增长 3% 以上，而发达国家每年增加不超过 1%。相应地，农业劳动者急剧地减少。我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一亿多乡镇企业职工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劳动者 10 年翻了一番以上。这是世界工业化史上罕见的超高速增长。

二是，劳动者白领化。美国早在 50 年代就经历了白领和蓝领 1 1 的转折点，进入了白领化时期。现在，西方国家的白领阶层一般占劳动者的 45% ~ 60%。在我国，这一转化已于 80 年代启动。天津市统计局的一份报告表明，90 年代初较之 10 年前，脑力劳动者的比例由 17.19% 升至 20.72%，体力劳动者的比例由 82.81% 降为 79.28%，升降幅度为 3.53 个百分点，其中产业工人下降了 4.77 个百分点。这个趋势在东南沿海地区就更明显一些。

此外，在第三产业劳动者阶层的扩大、劳动者的国际流动和

国内流动增多等方面，我国也发生了与世界总体趋势相一致的变化。

第七，这种分化既造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也推动了社会的共同富裕。

现在，极少数人的暴富和 2700 万极贫困人口的存在，容易给人们以“两极分化”的直观印象。一部分人甚至认为阶层分化已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直观毕竟是直观。大量的资料证明，我国的现行政策没有导致“两极分化”。进入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贫富差别确实有所拉大，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贫富差距仍处于可以允许的限度以内，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我国的贫富差别不完全是阶层因素本身造成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别的最深刻的根源是三大差别。另外，人口因素，自然条件，比如实行计划生育与超生，是处于沿海还是内地，是特区还是非特区，也都对贫富差别有一定的影响。

社会阶层分化，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利益得失的复杂问题。在分化的起始阶段，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分化难免会使一些人陷入窘境，但大凡社会分化的高潮时期，又总会为有心人留下许许多多的发展机会。我们必须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上来分析这些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以和解的愿望来对待社会矛盾。民族富强和民族统一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注】

H.S. Maine (1822 ~ 1888 年)，英国法制史专家，著名学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250 ~ 256，73 ~ 74

参见拙作：全面历史地看待我国现存的“贫富差距”．人民日报．1994.6.21

南开大学教务处供稿

陈一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婚姻家庭的变化与 青年人的恋爱择偶

[在北京科技大学讲演]

和大学生谈论婚姻家庭、恋爱择偶方面的问题，或许有人说这个还早，其实呢，也不早了。婚姻家庭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得太迟缓了，所以世世代代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在谈现代社会的男女交往和恋爱择偶这个主题之前，稍提一下近年来婚姻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期间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也正经历一个过渡，即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 1949 年到 1979 年这 30 年间，我们的婚姻家庭、恋爱择偶非常平静、非常规范、非常简单。但从 1979 年以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集中表现为社会离婚率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81 年全国平均离婚率为 4.7%，1991 年翻一番，1995 年北京市已达到 20% 左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这并不是说现在的人比过去更没良心、更没责任感、更没道德感，而是说现在的人在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婚姻选择比老一代更复杂了，需要他们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道德水平来适应现代婚姻的要求。

传统社会的婚姻道德比较简单，首先是因为那时经济上的贫困。1949 ~ 1979 年 30 年间，我国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刚够养家糊口，夫妻一旦结合便受到经济纽带的约束，相依为命过日

子，谁也离不开谁，那时的婚姻具有“经济共同体”的意义。其次那30年间基本上是多生育。众多的子女也成为束缚夫妻关系的一条纽带，如果夫妻吵架想离婚，想想五六个孩子，一人分三个确实过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婚姻只是一个“生育合作社”。“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合作社”是传统婚姻的基本功能，所以那时的婚姻在这两条外在纽带的维系下就比较容易稳定。加上传统社会中传统观念的影响，使人们恪守婚姻是终身大事，应该“从一而终”、“白头偕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也成为一条纽带外在地维系着传统婚姻。再加上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什么都是政治，婚姻是同志加夫妻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夫妻要求离婚，法院会给办学习班，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很难离异。当时家家户户都在这四条纽带中生活，稳定性极大，安全感极强，但人没有多大自由，要跳出这个圈子非常困难，通常是“吵吵闹闹几十年，别人还说好姻缘”。

70年代末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今天的婚姻不再是过去传统的模式了。首先是经济发达了，人们挣钱多了，钱多之后夫妻关系悄然松动了，相依为命之感没那么强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不再靠家里，转向靠市场，作为维系婚姻关系的“经济共同体”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其次是生孩子少了，独生子女的父母在考虑离婚时就简单多了，反正就一个，跟你跟我都养得起，所以孩子作为维系夫妻关系的纽带被弱化，“生育合作社”没有意义了。作为第三条纽带的传统观念也开始松弛，现在的流行歌曲、广告媒介、报刊杂志都在重复商品经济的价值观，“不在天长地久，只在曾经拥有”。第四条纽带的政治运动也不搞了，过去了。

传统纽带已经不再成为维系婚姻关系的保证，走向现代的婚姻依靠的是内在纽带的凝聚。这个内在纽带就是感情。现代婚姻非常注重讲究感情。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从养儿育女，过日子这样一些日常重负中解放出来，也从沉重

的社会压力、政治压力中解放出来，成为满足夫妻双方情感生活的温馨的港湾、沙漠中的绿洲。这种以情感生活为纽带、为基础、为保证的婚姻关系比起“经济共同体”、“生育合作社”进步多了，高级多了，但也困难多了。这是因为情感生活是一种包括性的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在内的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东西，比起票子、房子、面子、孩子这些物质的、外在的东西脆弱多了。上下嘴皮一碰，说“感情不合”、“没有共同语言”，这就足以使恋人分手、夫妻离异，而且这都是法官调解不了的，党委书记批评不了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众多男男女女仍然是“经济共同体”成员、“生育合作社”社员的坯子就去承担情感、心理、文化共同体的任务，结果没有岗前培训，上岗不会操作，失败了。

第二个问题讲现代社会的男女交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女授受不亲”，意思是说男女不能相互接触、相互交往，一旦交往便是谈婚论嫁，男女能够在一起的唯一机会就是成为夫妻，否则只有私奔。现代社会已经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女性已经走向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样男女交往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如此。现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娱乐。人在性成熟后，由于情愫的伴随，使得男女一起更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娱乐型交往占现代男女交往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对于处在青春期的男孩女孩，都非常希望娱乐时能和异性在一起，在娱乐中满足对异性的神秘感和好奇心，寓青春期的渲泄于娱乐之中。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男女交往的第二个功能是社会化。社会化过程中少不了男女交往，男女交往可以帮助男女双方发现自己在异性心目中的位置、价值、魅力，帮助自己了解异性的千姿百态，这对将来选择终身配偶是一个心理准备。缺少男女交往的社会化过程是非常不完善的，北京单身者俱乐部中有许多人是在找对象中不该剩下的剩下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该交往异性时没有交往，到了二十八九岁发现自己该找老婆或

丈夫了，却不会找，因为没有练习过，没有准备，不了解异性，心目中的异性就是自己的母亲或父亲，以致择偶时发生心理障碍。男女交往的第三个功能是业务上的功能。工作、学习中的切磋、合作当然可能有同性，但两性之间情愫的伴随使得业务上的异性搭挡非常容易满足青春期的心理需求，有利于业务的成功。业务活动中与同性坐在一起和与异性坐在一起，感觉就是不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男女交往还有满足心理需求的功能。当工作、学业不顺，当与同事、同学、老师关系不融洽时，人都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安慰。这时如果有同龄异性来敞开心扉，说几句非常到点的话，就特别容易抚平心理的创伤。这又是情愫的伴随。男女交往的双重意义就在这里，它能帮你解除苦闷，但也容易使你产生误解，可能是爱上了。处于逆境时非常需要救命草，但当拉住上来后便发现不需要这根草了，所以许多人在烦恼、挫折时陷入恋情，过了这段时间便发现没多大意义，当时如饥似渴地需要异性的安抚，而现在不需要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需求。最后谈男女的婚恋型交往。男女在各种类型的交往中，可能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经常一块活动，可能基于共同的心理需求而在一个时期内互相安慰，相依为命，这些可能的许多项交往功能加在一起，就促使两个或几个异性之间形成友谊群体、朋友圈。异性之间绝对有真正的友谊，其不同于同性友谊就在于有情愫的伴随。友谊和爱情之间没有多大的界限，友谊完全可能发展到爱情。当在众多异性朋友中进行筛选淘汰，有些朋友就是朋友，但进一步发展起来和某个异性朋友更接近，各个方面更合得来，而且有很深的感情交流，于是进入恋爱，这是完全可能的。大学期间学校对恋爱的态度是一不禁止，二不提倡，不禁止就好，就可以开始感情上的修炼，这是一个远期准备，不可能到该嫁丈夫或该讨老婆的时候再找一个异性感觉感觉。经过友谊，爱情最终走上婚姻。婚姻则非同小可，因为婚姻要找的是终身伴侣，没有人说婚姻走一段算一段，签个合同，五年一换。所以说婚恋型交往需要

特定条件，如需要双方家庭背景、教育水平、价值观念、角色观念、兴趣爱好、性格、年龄等的同源或认同，而在其他交往中则不需要这些条件。婚姻在任何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中都有严格的法律和公众舆论道德来约束，以保障它的稳定性、严肃性和审慎性，因此婚姻不是闹着玩的，它需要双方彼此做出终身的承诺，需要双方同样具有信守、兑现承诺的能力。

总之，现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功能不完全是婚恋，而且有些功能恰恰是婚恋所达不到的。人生活在大千世界中，人生舞台越来越大，人在某个时候会在舞台的一个角落建立起自己的婚姻关系，但有了婚姻关系之后人仍然需要到大千世界中去交往，所以大千世界中的男女交往要持续到永远，是婚姻所不能取代的。建立终身关系的人和大千世界中交往的人是不同的，二者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夫妻搞错了，他们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婚姻关系，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在角落内互相占有，互相控制，不允许对方回到大千世界中，导致现代男女之间占有与反占有的斗争，造成婚姻家庭的悲剧；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人虽然经过严肃认真的选择建立了自己的港湾，但当远航出去之后发现另外一个港湾也不错，于是就在那里歇息下来，而把原来的港湾放弃了；当进入新的港湾之后，发现仍然不能永久呆在那里，于是还要出去远航，继续发现新的港湾……这就是现代社会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大千世界和港湾之间永远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有了港湾就不要大千世界，也不能到了大千世界就不归宿到港湾。现代男女交往不仅是少男少女、青年男女的权利，也是成年、老年男女同样应当享有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讲现代青年的自由选择配偶和浪漫的爱情。择偶问题和爱情问题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当代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是经过自由择偶和浪漫爱情而结合的，但过了几年、十几年又落入不幸的境地，婚姻关系半途而废。这和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下的从一而终、白头偕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为什么？

首先，对于自由择偶来说，现代青年人在选择配偶时确实很自由，他们可以利用婚姻介绍所，征婚启事等把几十个、上百个候选人调动起来，实行“差额选举”，但恰恰正是这种自由择偶的婚姻更不容易稳定。这是因为自由择偶有两个冒险的因素：一是冒机会的风险。假如你从18岁时开始选择配偶，选到24岁时选定了，与你选定的人定下终身。但你这时只是24岁，你只能在看到的人中选，不能在看不到的人中选，只能在今天中选，不能在明天中选；当你34岁时，可能发现一个比当初更优秀的，于是就相见恨晚了，45岁时可能有相见更晚的，一个人不可能到80岁临终时再和相见最晚的人结婚。这就是一个要命的逻辑，自由择偶不能穷尽选择机会。过去说选定了就是有主了，不去奢望别的，虽然还去欣赏别的，但欣赏不是行动，现在的青年人许多已不满足于欣赏，要把欣赏变为行动，有主了可以换主，于是离异悲剧就出现了。悲剧的借口可能很多，其实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放弃选择的机会。所以，在这种自由支配下的婚姻就很难稳定。今天婚姻的困难就在于自由选择，只知道自由，不知道对自由的限制。自由择偶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变化的风险。假如你从18岁开始自由择偶。到24岁择定了，你很满意，觉得很完美，于是结婚，但过了8年、10年……时代在变，人的心理外表都在变，到时能否接受变化了的配偶对你是一种考验。许多人离婚时都说，当初选择时可不这样，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德性。20岁时都是大眼睛、双眼皮，美丽动人，50岁时满脸双眼皮，这也是变化。因此，在每一个自由择偶的社会里都要严格的法律、道德来规定婚姻关系，自由择偶在择的过程中可以非常自由，没有法律规定能够择几个，但一旦择定，迈进婚姻的大门，自由就没了，取代自由的将是责任，对对方的责任，对子女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可惜的是，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在婚后仍不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虽然在口头上做出了承诺，但

在内心深处不愿或者在实际能力上无力信守这种承诺，于是导致反悔、背叛。如果双方都有这种心理准备，那倒也好，因为爱情的结果不外两种，幸福结合和遗憾分手；但往往一方没有这种准备：你说了要永远永远，可现在又不永远——所以，自由择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风险，自由择偶的婚姻是不容易稳定的婚姻。这就要求社会用更多、更严格的法律道德来约束，要求当事人行使自由权力时有更高的承诺感、更厚重的责任心，这样人们才能享受自由择偶时代婚姻家庭的美满幸福。

其次对于浪漫爱情来说，浪漫爱情是现代青年人婚前的序幕，男女交往中的特权、享受，没有人愿意放弃对浪漫爱情的追求，但浪漫爱情也给婚姻关系的稳定增加了太多的困难。首先是浪漫爱情具有其本能性。爱情需要一种本能力量来驱动，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本能和爱情、婚姻相比，就在于它转瞬即逝，一旦满足即告消失，不完全专一在某人身上。本能作为浪漫爱情不可缺少的驱动，可以使人屡次掉进爱河，但把本能作为婚姻的承诺就太危险了。这是因为婚姻除了能把性关系变为合法，满足本能需求外，还包含着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婚姻代表的是一种终身承诺。而现实生活中，许多少男少女、青年男女由于不能抑制浪漫爱情中的本能冲突，出了事故，然后不得不用婚姻去抹掉这个事故，但终究发现不能做长久夫妻，事故最容易出，但后果不好收拾，回炉不得。其次是浪漫爱情具有主观性。恋爱中的人我爱你，你爱我，自己死去活来，可别人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种完全跟着感觉走的主观性具有很大魔力，常常会使完全不相配的一对在一起，最后在婚姻的客观性面前主观性黯然失色，许多婚姻就是因此而破裂。当你和恋人在一起时可以觉得天空特别蔚蓝，阳光特别灿烂，但你心里要提醒自己，今天可能阴天下雨，这种感觉不会长久，是主观的。只有这样，将来主观性暴露在客观性面前，你才不会觉得唐突、惊讶。第三是浪漫爱情的虚幻性。恋爱时每个人总是把自己最光明、最美好、最可

爱的一面展示给对方，以便吸引对方，得到对方，而把阴暗面暂时克制住，隐藏起来。恋爱双方都戴有色眼镜，所谓“情人眼中出西施”，这样的“西施”是虚幻的、靠不住的。所以处于浪漫爱情中的人应保持一份清醒，如果对方缺点没有看清楚，将来狐狸尾巴钻出来，吓一跳，后悔不及。这就要求每个人在恋爱时要瞪大一双眼睛，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有的人在恋爱中就把两只眼都闭上了，糊里又糊涂地谈恋爱，这样下去将来吃亏上当少不了。最后浪漫爱情具有动态性。恋爱发展到一定程度，准备结婚，进入浪漫爱情的激情期，婚后随之而来的是浪漫爱情的冷却期、休眠期，这期间夫妻要在长期的生活考验、矛盾冲突，磨合协调之中去接受对方作为一个人全部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只有经过这些才能结成真正的夫妻情谊。夫妻情谊不像浪漫爱情那样如火如荼，但它深沉凝练，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它要伴随夫妻渡过漫长的婚姻旅程。尤其是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人都要活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假如还是二十几岁订下终身，将来要和一个配偶厮守五六十年、六七十年而不厌倦，那将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许多人正是在这漫长的婚姻旅程中渡不过爱情的低谷期，于是便中途分手，婚姻裂变，希望重新寻找曾有的浪漫、飘逸。过去的许多婚姻都是自然解体的婚姻，配偶 50 岁时自然离去，用不着离婚；现在夫妻双方活到八九十岁还都健在，要渡过多少困难、坎坷才能达到自然的终点。这就好比驾驶一辆小车，过去从 20 公里开出去，到 50 公里的尽头，即便车破破烂烂、驾驶水平不高、保养状况不好也都能凑合；现在同样从 20 公里开出去，要开到 100 公里，就需要提高车的质量，提高驾驶水平，注意维修保养。过去两人只要能生孩子便能做夫妻，但今天仅仅会生孩子的男女不见得能做夫妻，因为今天的婚姻已成为一种最高级、最复杂的“职业”，婚后仍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总之，自由择偶和浪漫爱情非常好，它比传统婚姻使人享受多了，幸福多了，美满多了，文明多了，进步多了，但也危险多

了；现代人无权拒绝自由择偶和浪漫爱情，但他们在接受自由择偶和浪漫爱情的同时，也要接受它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这正是现代人婚姻困难的原因所在。

最后讲择偶标准问题。婚姻不是社会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所以没有一个统一模式，但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来看，确实有几个基本方面值得注意。首先要考虑婚姻的同源性，即实行同源择偶。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家庭背景的相似性。因为一个人成长的家庭背景、家庭文化圈对他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试图使配偶改变这些，服从自己的文化圈，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家庭背景相似的夫妻在婚后生活中更容易相互协调。这便是文化上的门当户对。夫妻间的许多矛盾并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两人的协调不协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两人家庭背景的相似不相似。二是受教育程度的相似性。受教育程度不完全是学校文凭，但学校文凭毕竟代表着文明熏陶程度，其中包括做人、伦理道德、良心责任等等。同源择偶是一种新的“门当户对”，是同一文化层次上的选择，不注重择偶标准的同源性，试图通过婚姻去改造一个人在二十几年里留下的“文化遗产”，这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这也正是许多婚姻悲剧的原因所在。其次要考虑价值观的认同。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元价值观，多元价值观支撑着社会上不同的职业领域。但作为夫妻，朝夕相处，如果有不同的价值观，将非常难以协调。一对恋人刚开始恋爱时可能是外表的吸引，但深入下去谈恋爱，就是要在谈的过程中使价值观磨合，取得相互的认同。再次要考虑的是角色观念的认同。解放后30年，法律政策都保障男女平等，女人不再依赖男人，这样造就了两代好丈夫、好妻子。但今天有些人又开始倡导性别角色的分化，呼唤贤妻良母，呼唤成功楷模，这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传统观念的继续，所以今天的妇女解放仍在寻求夫妻双方在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协调。有些夫妻本是大学同学，女方也不错，决不亚于男方，但婚

后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当后勤部长全心全意保男人，结果一保二保保出个现代陈世美。这并不是男人要当陈世美，而是男人被保上去之后，发现山上的世界很精彩，山下的世界很无奈，居高临下看女人，怎么看怎么庸俗，怎么看怎么没价值，角色分工上的不协调导致文化圈上的差异，结果婚姻裂变，不可挽回。女人的悲剧就在这里，她找丈夫是找整个世界；而男人的优越也在这里，他找妻子只是找个女人。所以对于婚后夫妻在社会上、家庭中的角色分工，在恋爱时就应拿出来讨论，角色观念上的认同也是婚姻成功的一个保障。第四个要考虑的是性格。什么样的性格最好，没有特别的回答。但现实中许多成功的夫妻都是互补型性格，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热情大方一个沉着冷静，这些都是较好的例子。一个人选择配偶，其实是在默默地、不知不觉地选择自己不具备的那个性格类型，性格相左的人搭配在一起更容易稳定。第五个要考虑的是年龄。现实选择中究竟是男大女小，还是女大男小，没有定论。因为人的年龄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别，选择配偶时更应注意的是心理年龄，只有心理成熟程度相差不远的两人，才更易于组成较好的搭配。第六要考虑的是对方家庭、朋友的情况。因为通过恋爱而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联姻，和对方家人关系处理不当也会反过来影响夫妻关系。另外，通过观察对方家人与对方的关系，也可以预测将来对方与自己的关系，一个对家人粗暴、无礼、冷酷、自私的男孩或女孩，婚后不可能对其配偶宽宏大度，温顺善良，而对对方社会圈子、朋友圈子的考虑也是同样，因为和对方结合以后，对方朋友可能成为将来的共同朋友，能不能接受对方朋友也是能不能接受对方文化的一部分。

按照以上标准进行择偶，无论多么精细、多么努力，但择定的只是一个原材料，而不是成品。这就好比工匠、艺术家、雕塑家在选择材料时特别小心，但他们不是选择好与不好，而是选择适合与不适合自己的手艺。即便选到了最好的原材料，但如果缺

乏加工雕琢的技艺，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那它在你手里也会成为废品。所以很多婚姻的不幸，并不是原材料选错了，而是后来加工创造的失败。婚姻一辈子都应在创造之中，生命不息，创造不止，择偶只不过是创造的开始，它虽然非常重要，但只是成功的一个环节，成功的婚姻是终身不渝地创造加工出的艺术精品，其中的学问多得很。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供稿 录音整理：左鹏

【编者絮语】恋爱、婚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几千年，一代又一代人，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形式相同、内容相异的爱情悲喜剧。就人类所范的错误的重复率而言，爱情婚姻无疑是最高的一种之一。前人的经验教训永远无法取代现在人的体验，这也是人性的优缺点和人生的美丽的所在。守财奴不可能为失去的金钱而歌唱，少女却可能为失去的爱情而歌唱。许多爱情的错误竟是如此的美丽而凄艳。当然，我们这样说，决无鼓励大家都去体验这种美丽的错误的意，毕竟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真诚的爱。那么，这篇演讲还是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

后 记

本书第一卷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1997年2月19日发表的书评认为，本书“展现在任何专业的大学生面前的，都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思维天地！”“这本书对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品位、格调、情感和价值观的取向均大有裨益。”香港《文汇报》在1997年7月22日的报道中指出，本书是“内地‘大学校园人文现象’的总结，也可容本港学生拓展知识视野，提高文化修养”。许多学者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指出，这是一本“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精品。”广大大学生更是予以厚爱，踊跃购买。在华中理工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山西大学、大连铁道学院等院校，本书第一卷的发行量均超过1000册。在华中理工大学更是出现了一千多人冒着严寒，排队等候签名售书的感人场面。

这些充分说明了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充分表明了人文讲座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崇高的地位。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使我们备受鼓舞，激励着我们把最精彩的讲演稿整理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第二卷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国家教委和许多高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同志一直关心本书的出版工作。文科处处长刘凤泰同志则给予了具体的支持。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除担任本书的顾问外，还同意我们选用他的讲演稿。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白同朔等要求有关方面配合，

做好征稿工作。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杨承运专程将讲演录音送到武汉。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湘斌、南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杨桂华、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吕浩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任果，此外，还有山西大学、东南大学、吉林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务处向编委会推荐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讲演稿。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及时地将讲演稿加以整理，送编委会选用。没有这些领导、同志们的辛勤工作，第二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一大批学者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及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踏实的学风也使我们肃然起敬。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纪念这部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的诞生，李士坤教授尽管身体有所不适，仍在病榻上审校稿件。杨叔子、厉以宁、吴小如等教授的稿件也是反复审校后才送交编委会。

此外，华中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一大批热心的同学也为整理稿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将其姓名列出。

限于本卷的结构和篇幅，此次还有一批优秀稿件未能选用。我们将在以后各卷中陆续刊用。

在此，谨向关心本书，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领导、学者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卷的征稿、编辑出版工作是在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协作组组长杨叔子院士、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出版社社长余健棠教授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余健棠、黎秋萍、包以健、姜新祺、焦微同志分别审读了全部书稿。李东明同志做了书稿的复审工作。出版社的余东升同志、文学院何流清同志负责征稿工作。余东升同志负责稿件的遴选工作，并对部分稿件根据录音进行了重新整理。

编 者

1997年12月15日